

上下五千年

上古篇

春秋戰國篇

秦漢王朝篇

魏晉南北朝篇

隋唐五代篇

宋遼夏金元篇

明朝篇

前清篇

後清篇

民國篇

中華人民共和國篇

第三卷

科普教育与艺术修养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上下五千年

夏于全 常桦 主编

第三卷

秦汉王朝篇目录

第一章 秦王朝的短期统治

第一节 秦王朝巩固统一帝国的措施	(1)
一、南征北伐、扩大统一	(1)
秦驱逐匈奴之战	(1)
秦征南越之战	(4)
二、专制集权 推行郡县	(6)
三、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度量衡	(13)
四、上农除末 民自实田	(15)
五、焚书坑儒 禁止私学	(20)
六、五德终始 繁刑酷法	(22)
第二节 秦末农民大起义	(29)
一、赋役无休 天下苦秦久矣	(29)
二、陈胜“揭竿”而起	(34)
三、起义军阵营的扩大	(42)
四、前仆后继 奋起亡秦	(45)
第三节 楚汉相争	(51)

一、刘邦集团在反秦起义中的崛起	(51)
鏖战黄河南岸	(51)
攻取宛城	(54)
破武关取峽关	(57)
约法三章	(59)
二、楚汉相争	(62)
函谷争夺	(62)
火烧咸阳	(69)
烧绝栈道	(71)
韩信拜将	(72)
三秦之战	(79)
项羽杀韩王成	(84)
项羽击田荣	(85)
彭城之战	(89)
韩信定赵降燕	(97)
韩信灭齐	(107)
蒯通说韩信	(111)
荥阳突围	(115)
陈平智设反间计	(119)
广武对话	(122)
鸿沟为界	(126)
固陵之败	(127)
垓下之围	(130)
乌江自刭	(132)

第二章 西汉王朝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汉初巩固和加强大一统王朝统治的措施	(135)
一、郡国并行 混合政体	(136)
二、休养生息 重农抑商	(142)
三、剪灭异姓诸侯王	(146)
长乐宫中室斩韩信	(146)
夷彭越宗族	(153)
讨伐英布	(156)
韩王信投降匈奴	(162)
平定张敖叛乱	(165)
卢绾叛降匈奴	(169)
四、剪灭诸吕	(174)
惠帝“仁弱” 吕后专横	(174)
吕后临朝 诸吕封王	(177)
诸吕谋变 周勃安刘	(180)
第二节 西汉王朝的盛世景象	(184)
一、文景之治	(184)
二、平定七国之乱 加强中央集权	(189)
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194)
第三节 西汉王朝的衰亡	(200)
一、汉武帝晚年决策方针的转变	(200)
二、昭宣时代的政治经济	(205)
昭宣时代的政治	(205)

恢复经济的措施	(214)
三、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	(220)
四、王莽改制	(228)
五、赤眉绿林起义	(232)

第三章 东汉王朝的兴衰

第一节 “光武中兴”与明章之治	(239)
一、光武中兴	(240)
二、明章之治	(245)
三、东汉农兴、手工业、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248)
第二节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	(251)
一、地方豪强势力的急剧膨胀	(251)
二、外戚宦官争权	(253)
三、陈蕃窦武谋诛宦官的失败	(259)
四、党锢之祸	(266)
五、羌、汉人民的反抗斗争	(269)
第三节 黄巾大起义	(272)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全国性多民族统一的形成

第一节 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	(278)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发展	(279)
一、匈奴族	(280)
二、乌桓、鲜卑族	(289)

三、蛮、越各族	(294)
四、西南夷各族	(298)
五、氏、族及西域各族	(304)
第三节 汉族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311)
一、同北方各族的关系	(312)
二、同南方各族的关系	(317)
三、同西方各族的关系	(319)

第五章 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学术思想	(322)
一、秦代法家思想与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结合	(322)
二、汉初黄老思想	(327)
三、儒道争雄与经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332)
儒道争雄	(332)
经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337)
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体系	(345)
四、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350)
五、经学的神学化和今古文之争	(354)
六、桓谭与王充的唯物论、无神论思想	(364)
七、熹平石经	(368)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科技文化	(371)
一、刘向、刘歆父子完成《七略》	(371)
二、赵过在农业上的贡献	(372)

三、第一部农业科学著作《汜胜之书》	(374)
四、秦汉时期地理学的发展	(376)
五、蔡伦造纸	(377)
六、天文历算家张衡	(379)
七、张仲景与华佗	(383)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383)
神医华佗	(384)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文学	(391)
一、诗	(391)
二、赋	(393)
三、散文	(395)
第四节 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	(401)
一、中朝经济文化往来	(401)
二、中日文化往来	(402)
三、“丝绸之路”的开辟	(403)
四、佛教东传与中印文化交流	(404)
五、中国同越南、缅甸等国的经济文化交往	(407)

秦汉王朝篇

第一章 秦王朝的 短期统治

第一节 秦王朝 巩固统一帝国的措施

一、南征北伐、扩大统一

秦驱逐匈奴之战

秦统一六国，据有了燕、赵北部地区的全部疆域，这样秦、燕、赵北部就连为一体并与东胡和匈奴接壤。在秦统一六国作

战时,无力北顾,燕、赵两国也倾全力与秦交战,对北方的防御力量大为减弱,匈奴此时即乘虚南下,其兵锋已达阴山、五原、云中。秦之上郡、陇西等地边境也常遭匈奴袭掠,严重威胁关中和都城咸阳的安全。秦既已灭亡六国,对北部边疆的安全自然引起了充分的重视。

生活在中国北方与秦王朝接壤的少数民族,至秦统一六国前后,已逐渐融合为东胡、匈奴、月氏三大民族,并以匈奴最为强大。匈奴部族主要居住于蒙古高原地区。匈奴单于头曼为一世之雄主,他雄心勃勃,常以武力征服周围弱小部族,多年来,与赵、燕、秦交兵于三国北部长城内外,成为三国之大患。它已占有了现今之辽宁西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宁夏等一带地区。匈奴已将东胡部族全部逐赶于燕山以东,将月氏部族逐赶至祁连山以西地区,并进占河套水草丰茂地区,人强马壮,经济繁荣,且男女老少长于骑射,勇猛凶悍,具有相当强的野战机动作战能力,成为北方各国最难对付的敌手。

秦在统一六国之前,秦、赵、燕三国北部地区长期受到匈奴等部族的袭掠,边境地区烽火连绵不断,人民生命财产经常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当时除原赵将李牧防守代郡期间堪与匹敌之外,各国既无征战匈奴的精兵勇将,也无对匈奴作战长期有效的战略,多以筑长城单纯防御为主,战略上始终处于消极被动的局面。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为消除来自匈奴的侵袭,寻求对匈奴作战的策略,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亲自沿边境地带巡视,进而确定了对匈奴作战的战略:(一)从内地移民充实边境地区,开发边境地区的经济,以增加战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二)修筑从内地通往边境的道

路,为调兵运粮提供可靠的保障;(三)连接秦、赵、燕之长城,使之成为绵亘相联的防护屏障;(四)加紧战争准备,收复失地,彻底战胜匈奴,永保边疆巩固。

秦军按以上战争策划,在完成战争准备的基础上,确定了以下具体作战计划:先将侵占陇西河套之匈奴赶到贺兰山脉与狼山山脉以西,将侵占赵边境地区之匈奴驱赶至赵筑长城以北。秦以大部兵力进击河套北部,以一部兵力由北地郡,进击河套南部,收复河套地区后,主力由河套北部地区渡过黄河,向高阙、狼山山脉进军,一部兵力由河套西南地区渡河,向贺兰山方向进军。

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命将军蒙恬率领 30 万大军开始对匈奴作战。蒙恬亲自率主力,经过现在的陕西榆林向河套北部地区进发,一部兵力出萧关直趋河套南部地区。秦军由于进攻突然,来势迅猛,加之匈奴在河套地区兵力有限,匈奴难以形成有组织的抵抗,秦军遂将河套地区的匈奴扫除,顺利进占河套地区,黄河南岸尽为秦收复。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春,秦军主力由五原渡过黄河后,迅速进至狼山山脉,一部兵力渡河后攻占贺兰山地区。秦军兵威势猛,匈奴在秦军的打击下,深为恐惧,向北方逃走。至此,秦、赵原边境地区全被秦收复。秦驱逐匈奴之战胜利结束。

蒙恬收复原被匈奴所占地区后,设立五原郡,郡治在今内蒙古之五原。该郡共辖 44 个县。为巩固后方领土,秦始皇命蒙恬率军加修由高阙沿阴山山脉至云中原赵国之长城,并新修由高阙沿狼山至榆中之长城,同时责令云中、代上谷、渔阳、右北平等郡组织人力加修与连接燕赵原长城,经过多年修筑,

长城逐渐连接成为秦北方一道绵延巍峨的防御屏障。

秦征南越之战

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国的西南部、东南部广大地区还没有统一起来。秦代所指的南越地区即今福建、浙江东南部、广东和广西的一部分地区。这个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森林茂密，十分富饶，但为山川所阻隔，南越与群蛮部族仍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社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居于中国境内的越人主要分布于今华南和华东的广大地区，分为西瓯、东瓯、南越、闽越等几个部分。西瓯约在今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南越遍布于今广东南部、北部与西部地区；东瓯、闽越散居于浙江、福建一带。西瓯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南越和闽越主要从事渔猎和农业。越人“断发文身”，文化知识落后，各部互不统属，甚至经常自相残杀，作战虽勇敢，但缺乏大部队的整体协同观念，更没有相应的战略头脑，无论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均明显地劣于秦军。南越居住的地区，高山大川纵横交织，沼泽密布，陆路交通极为不便，一些城邑之间虽有山路相通，但也多蜿蜒于丛山峻岭之间，对大部队的进军造成极为不利的障碍。相比之下，水路交通尚比较便利。东面有鄱阳湖五水，西面有洞庭湖四水，有的可以通达南越、闽越、西瓯部族居住的一些地区，为水路进军的重要通道。秦国此时正值并灭六国之后，国富兵强，军威鼎盛，秦始皇想乘胜南征，统一中国东南与西南的广大地区，以完成全国统一大业。

秦军统一南越之战，系在广大地域对付分散之众多部族作战，无法集中力量于一地作战略决战，因而采取多路分兵进

击的作战行动,如遇重大抵抗再合兵共击。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述,秦军征南越计划分五路大军作战:一军塞镡越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驻余干之水,这样各路大军即可适时向前推进,分别进入闽地、粤地、广州、桂林等地。既分路行动,也相约合击,确保作战胜利。

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起,秦始皇派尉屠睢率 50 万大军按照以上的作战计划,进入与南越、闽越等接界之地区,“三年不卸甲弛弩”。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五路大军开始按预定计划行动。

秦军统帅尉屠睢亲自率领第 3 路军,从长沙、宜章南下,发展顺利,击溃越族许多部落,瓠君采宁战死。

秦之另一路军出兵当年顺利进至闽中区,击破了闽越人的抵抗,将所占地区建立为中郡。

秦第 5 路与第 4 路军,分别由镡城、零陵进兵合击,占领了桂林周围广大地区,进而占据红河流域地区,建立了桂林郡和象郡。

秦王朝为了支持对南越西瓯的战争,还组织人力开凿灵渠,以沟通湘江与桂江支流漓江,这对支援当时的战争和南方以后的开发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秦统一中国东南、西南广大地区后,除了设置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外,还安置了从内地迁移的几十万谪民、贾商赘婿等,以开发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衍生息养殖人口,这对四郡地区的发展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二、专制集权 推行郡县

秦兼并六国后，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即中国历史上的秦朝。如何统治这个幅员辽阔、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是秦统一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秦王政功成业就，首先令群臣议帝号。臣僚们诚惶诚恐，选择三皇中最尊贵“泰皇”为帝号，然而秦王政自以为功业盖世，前无古人，便兼取三皇五帝的尊称，定帝号为“皇帝”。又规定皇帝的命称“制”，令称“诏”，天子自称“朕”。从此皇帝所拥有的独断的权制，不仅成为定制，而且在形式上也更为完备。这是秦王政为强化君权，由皇帝独自运用权柄，推行法度的重要步骤。与此同时，他命令为除古谥法，避免“子议父，臣议君”，以维护皇帝的权威。秦王政在实现专制极权的道路上，终于迈出重要的一步。他自称“始皇帝”，希望把他所开创的帝业世代传下去。为此，秦王政在统一后的政治体制及其相关的问题上，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关于统一后的政治体制问题，秦朝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多数官员，主张在燕、齐、楚等地区，另设封国，立秦始皇诸子为王，以便控制这些边远的地区。廷尉李斯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周初所封子弟同姓很多，结果形成诸侯混战的局面，连周天子也无法制止。如今天下统一，他建议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用赋税赏赐诸子功臣，不宜再分封诸侯，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宁。秦始皇采纳李斯的意见，决定全面推行郡县制，从而开创一整套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制。

根据种政治体制,秦朝在全国设立中央、地方两级统治机构,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中央的行政机构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即秦汉常统称为“三公”的高级官吏。其实它们的实际职权和官阶差别很大,也不同于后来的三公制,而且秦朝是否设太尉这是个疑问。它们的职权及设置情况如下。

秦朝分设左、右丞相,以左为尊。丞相为百官之长,即最高行政长官。他们承奉皇帝旨意,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秦始皇后期,李斯由廷尉擢为丞相,参与诸多重要决策,丞相职位显要。李斯本人封为列侯,当时人称之为“君侯”,地位仅次于皇帝。李斯曾感叹说:“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史记·李斯列传)这是秦始皇统一以来丞相权势最盛的时期,它正折射君权之集中。秦二世时,丞相由宦者赵高充任,又称中丞相。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太尉职掌“武事”,协助皇帝处理军务,是秦所设职官。但是见于史书记载的,秦在统一前夕,只有国尉之设,尉繚曾任此职。秦朝建立之后,不仅国尉职衔消失,也未见设置太尉。后来沈约所撰《宋书·百官志》,以及成书唐初的《晋书·职官志》,在叙述太尉一职建置沿革时,均不提秦国或秦朝有太尉之设。此职或不常设,故史籍记载甚少。

秦朝初设御史大夫,职掌副丞相。其职权管辖的范围,包括监察百官,主管图籍秘书,督察地方诸郡,接受公卿奏事等,在朝廷中起着特殊的作用。秦朝一些军事大事,往往由御史大夫的属官承办。秦军南征岭南,负责凿渠转输军粮的,就是监

郡御史禄。秦始皇坑儒，审问诸生，办理案件的，又是御史。御史大夫的官属，最主要的有御史中丞。上述御史大夫的职权，多由中丞具体执行。

丞相之下，分设“九卿”。他们是一些职秩稍低的中央高级官吏，主要掌管宫廷事务，或者封建国家某项政务。其他分职如下：

奉常，职掌宗庙礼仪，负责祭祀之事。秦始皇设博士官 70 人，掌通古今”，特备问对，也归并在奉常所属机构中。

郎中令，掌禁中侍卫皇帝诸职。赵高在秦二世即位之初，曾任此职，自称居“上位，管中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皇帝的近侍之臣，所辖机构庞大，其中以郎官人数最多。

卫尉，主宫廷守卫之职，包括宫门兵禁、屯卫宫殿、值宿徼巡等等。如秦朝末年，秦二世在望夷宫斋戒，不仅宫门有卫令统兵防守，而且“周庐（庐舍）设卒甚谨”（《史记·秦始皇本纪》），四周由卫士警卫。

太仆，掌宫廷车马。皇帝出行，则主舆驾仪式，出宣诏命。秦朝沿袭古制，分设车官、马官，又置太仆统领。如中车府令，即主乘舆路车，赵高曾任此职。

廷尉，职掌刑辟，主刑罚断狱，是最高司法官。

典客，掌管少数民族入朝事务，主持接待、朝觐礼仪，典宾礼是它的主要职责。

宗正，掌管皇帝事务。

治粟内史，主管封建国家的财政，如钱谷赋税收入及支出。

少府，主皇室的财政，管理山海池泽之税，供给皇室生活

所需。其事务繁杂,机构庞大。

此外,中央的高级官吏还有:掌管京师治安的中尉、掌管修建宫室的将作少府、掌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典属国等等。所有这些高级官吏,各自还有一些数量不等的属官、吏员,执行各种具体政务,组织中央庞大的统治机构。他们从丞相到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一切政事均由皇帝裁夺。

秦朝的地方行政机构,推行的是郡县制。郡县制不是秦朝首创。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已有郡县之设。但是秦朝建立后,郡县制作为地方行政制度,才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行,其行政机构也更加完善了。当时全国分为 36 郡,后来因边地陆续开发,郡在辖区不断调整,全国郡数增至 40 余郡。秦朝的郡大县小,郡统辖县,是地方最高的行政机构。郡设郡守和郡尉,中央另设监御史。

郡守是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主管一郡的政事,诸如郡内的民情风俗、农桑垦殖、司法治安、属县吏治、兵事军务等等。由于郡守负有治理地方之责,职重权大,秦对郡守的选任相当重视。如秦统一前夕,曾以秩位相当列卿的内史腾出任南郡守,便是一例。守腾出任之时,秦在“南郡备警”,则郡守的职司不仅主民事,还负有军事方面的重责。

郡尉协助郡守,掌管军事,秩位比郡守稍低。除了掌军务之外,有时郡尉也统兵作战。秦朝开发岭南地区,即由郡尉屠睢将兵击越人。

监御史职掌监郡,隶属于御史中丞,是中央监察地方的官员。其职责及地位特殊,既监察地方行政,也执行某些重大使

命。

此外，京师为都城重地，所在郡县不设郡守，另设内史掌治京师，地位相当列卿。

郡下分若干县。县的行政长官称县令，不满万户的县称县长，掌管一县的政务；县设县尉，主管县内的治安、征发戍卒等；又设县丞，协助县令、长，并掌管司法。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设“道”，道与县并行，性质同县的行政机构类似。

县下设乡。乡有三老，掌教化；有嗇夫，主管司法、赋税；有游徼，管理治安。乡之下为里，里设里正，又称里典。里中有什伍的组织。

此外，秦时还有“亭”的设置。班固所称“大率十里一亭”（《汉书·百官公卿表》），指的应是按地域距离分设的。它的职能，主要是维持地方治安，传递文书等。“亭”设亭长、求盗等亭吏。秦朝末年，刘邦以泗水亭长，为县送刑徒于骊山，基本与上述职能相符。其隶属关系，则更象县的派出机构，而不属于乡管辖。

秦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郡、县两级制，它直属于秦朝中央统辖。郡县长吏由中央直接派遣，是中央在地方行使权力的代表。他们必须执行中央旨令，接受中央的监督和考核，从而使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

随着上述政治制度的推行，秦朝关于官吏的选迁、考核、赐爵、秩俸等，也有一整套相应的制度。

在官吏选任方面，秦朝沿袭商鞅变法以来的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以功授官”的封建官僚制。在这种制度下，以军功授官是选任官吏的主途径，一些在统一战争中立有军功，

或者有特殊贡献的人员,秦始皇相继授予各种不同的官职。对高级武官的任用,有的尊宠倍加,甚至成为几代人相袭的官职。秦将蒙恬及其父祖,还有王翦和他的子孙,都是三代相袭为高级将领。司马迁称“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显赫的军功不仅是仕进的阶梯,又是子孙袭封为武官的条件。从“蒙恬因家世得为奉将”来看(《史记·蒙恬列传》),秦朝武官世职的现象,显然属于“恩荫”之类的封赐。

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频繁战争减少了,以军功选官的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尤其秦朝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相继推行,全国政事日益增多,封建国家各级机构需要各种人才,因此其它的选官途径也同时并行。如征聘士人从政,或从低级吏员中征举人材,就是其中一种。前者如秦始皇时期,叔孙通“以文学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待诏于博士中;后者如萧何以郡卒吏考课第一,监御史拟入奏朝廷征用萧何。这类征召性质的选官,被征之士去从可以抉择,如萧何即不应召。

对于低级官吏的选任,秦朝实行由地方推举的方法。《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这种选官方式,不仅要受财产、品行、年龄等条件的限制,而且被推举者还要经过试职,才可以正式任用。刘邦在秦朝时,“及壮,试为吏”(《史记·高祖本纪》),即经过试职,而后被任命为泗水亭长。

此外,盛行于秦昭王时期的任举制,或称保举,大约秦统一初期还在实行。这是由官吏荐举人才,并作担保,官府加以

任用的选官方式。如秦王政时期，李斯入秦，就是由吕不韦保举为郎的。但是，如果保举违制，或所在不当，保举者将受到惩罚。云梦秦简《秦律杂抄·除吏律》规定，如保举曾被撤职永不叙用的人为吏，罚二甲；《除弟子律》规定，如保举弟子不当者，则耐为候，即处以剃去须鬣的耐刑，罚做伺望敌情的刑徒。

秦朝对地方官吏的考课，实行的是“上计”制。即每年年终，由地方派人到京师上计簿，上报辖区治状。上计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农桑、户口、赋税、钱粮、治安、断狱等，以使中央了解各地的政情风俗，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并作为官吏升迁赏罚的根据。

秦朝的赐爵制，源自秦的赐爵制。它在全国统一后，也发生某些变化。秦推行赐爵制，本意在于奖励军功。凡获得爵位者，可根据不同等级，享受某些特权，如入仕为官，赎罪赎身，获取田宅，役使庶子，封邑食税等。秦王政即位后，以军功赐爵仍然没有改变。如公元前 238 年，秦平息嫪毐叛乱时，对斩敌立功者均拜爵，参战的宦者也拜爵一级。但全国统一之后，赐爵出现了明显变化，即修驰道及徙边也可以授爵。

秦朝的官秩，即官阶等级和俸禄，实行的是秩石制。这就是以“石”的数字表示官阶，依照不同的官阶等级授禄。如秦统一前夕，因吕不韦事件的牵连，一些官吏被迁往房陵，其中就有“六百石”、“五百石”之官。全国统一之后，大约仍沿袭此制，但官吏的等级差别，以及不同等级官吏的俸禄，今已无法确知。

总之，秦在统一全国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完整的、崭新的政治制度，开创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

治,为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车同轨, 书同文,统一货币度量衡

为了巩固政治上的统一,秦始皇对货币、度量衡及文字,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战国时期,由于商品交换日益频繁,货币流通也随之扩大。当时各诸侯国所铸造的货币,种类形制繁多,大小轻重各异,计算单位很不一致。战国时期的金属铸币,考古发现数量极大。其中以铜铸的货币为主,黄金铸币极少,只局限于个别地区。铜质币可分布、刀、圜钱、铜贝等,分别在不同地区流通。

布币,形如铲状,或称**刀币**。它的流通地区,主要在韩、赵、魏、周等地。

刀币,如刀形,流通地区主要在齐、燕,还有赵国等。

圜钱,为圆形,可分圆孔、方孔两种。主要流行于秦国,以及周、魏等地。

铜贝,俗称“蚁鼻钱”,形同海贝,流行于楚国。

金质货币,有楚国的金版,外形呈规则方形;另一种是圆形的,又称金饼。金币上钤有若干小方形的戳记,“郢 爰(称)”、“陈 爰(称)”(一作“爰爱”、“陈爰”)是其中主要两种,此外,还有钤“卢金”圆形印记的金币,以及银质布币的出土,均属楚国货币。

秦统一全国之初,上述货币依然在局部地区流通,与当时的统一局面很不适应。为此,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旧币,统一

使用两种货币。一种是黄金,称为上币,以“镒”为单位,一种是圆形方孔的铜钱,称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币制的统一,有利于商品交换,便于地区间的经济交流。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也相当混乱。它给地区间的商业交往造成很大困难,不利于手工业的发展,对秦朝课取赋税,也很不方便。秦统一中国后,下令“一法度衡石丈尺”(《史记·秦始皇本纪》),对度量衡制度进行改革。现存秦朝的铜权及方升,刻有当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的诏令,就是这次改革的遗物。

与此同时,对六国异形文字加以整理。我国文字经过长期的演变,自西周末年以来,逐渐出现文字分歧的现象。到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分立,各自为政,“文字异形”情况,更加严重。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下令以秦的字体为规范,对六国文字加以整理,将繁难的大篆改为小篆。据载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就是以秦篆(小篆)书写的本子,作为推广的标准范本。

秦朝还有一种书体,称为隶书(秦隶)。隶书笔划方折平直,比小篆简化,书写更为简便。据许慎《说文解字·序》载:“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这种书体的流行,与秦的“官狱多事”,政务繁忙有关。因为日常公文往来,用秦篆书写很不方便。但是,隶书不是创始于秦朝,至少战国晚期已广为使用。云梦出土的秦简,就是用隶书写成。所传秦始皇时程邈作隶书,大约他曾对这种书体进行过整理,使之成为秦朝日常通用的文字。

秦朝“书同文字”不仅使当时通行的小篆、隶书两种主要书体规范化,便于政策法规的推行,而且由于隶书的推广及流行,终于为汉字新书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秦朝是汉字发展转折的时代,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

此外,为了清除割据自守,加强地区间的联系,秦朝一方面堕壁垒、决川防,一方面修治驰道、统一车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割据称雄,往往据险修建关塞、壁垒和堤防,以抵御敌国的军事进攻。这些防御性的军事设施,自然成为地区间的交通障碍,不利于各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秦统一全国后,下令拆除上述各种防御设施,为消除地区间的隔绝铺平道路。

同时,还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两条贯穿全国的驰道。一条向东通往齐、燕地区,即今河北、辽宁、山东一带;一条向东南通往吴、楚之地,即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一带。驰道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植松树一株,路身的修筑采取了加固的措施。这两条驰道的建成,便于秦朝对各地的控制,有利于交通。

四、上农除末 民自实田

秦从商鞅变法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秦王朝的建立,又进一步为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秦始皇三十一年(前 216 年),秦朝“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即命令拥有土地的平民向官府自报占有田亩的数量,由官府加以核实。实际上,这是封建国家以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权,并作为征收赋

税的根据。它大大促进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对于地主阶级尤其有利。那时候,土地占有形态基本上可分为三种类型,情况如下。

国有土地。这是由封建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土地,包括苑囿园池、山林薮泽、可耕农田、无主荒地等。秦朝设立专门机构少府,管理这些国有土地。其中,如苑囿园池所占的土地,数量相当可观,主要分布在京畿附近。后来刘邦还定“三秦”,曾改秦朝苑囿园池为民田,仅关中就有许多处。

秦王朝所掌握的国有土地,由于实行军功赏田制,其中一部分被用于赏赐有功之臣,因而转化为私有土地。有一些国有土地则由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管理,并使用一种称为“隶臣”的官奴隶耕种。秦简《仓律》对农忙季节从事农业生产的隶臣,还具体规定了每月可增加半石的口粮。此外,还有一部分国有土地,由官府授与农民耕种,受田农民必须交纳田租及刍稿之税。在秦朝,这种国有土地仅仅是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形式。

地主私有土地。秦朝地主阶级的构成,可分为官僚地主、豪族地主、一般地主等。

官僚地主,包括有军功的官吏、宗室贵族等。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实行依军功赏赐田宅的制度,一些有军功或事功的官员,分别得到了数量不等的土地赏赐。直到秦朝建立前夕,王翦率师攻楚,还“请田宅为子孙业”(《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表明封建国家赏赐的田宅,可以转化为子孙的产业,即承认赐田为私有。秦统一后,这些拥有大量土地,又有政治权力的有功之臣,便形成官僚地主。他们是新兴地主阶级中的重要阶

层。

豪族地主，指六国的强宗豪家，成份比较复杂。有的是把持地方的豪户大族，经济上有相当的实力；有的是六国贵族及其后裔，在各地仍保持一定的势力。秦王朝建立之后，迁徙 12 万户豪富于咸阳，其中不少是大豪族地主。

一般地主，指工商业地主，或从自耕农发展而来的中、小地主。战国时期，因经营商业、手工业而致富的现象，非常普遍。那些富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将大量货币财富用于土地买卖，形成一批工商业地主。还有一些中、小地主，是由少数自耕农发家，转变而来的。一般地主虽然不是权势之家，但是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经济力量，寻求政治上的发展。如乌氏（今宁夏固原南）有个叫倮的，因经营畜牧业而成巨富，被秦始皇视如“封君”，享有与列臣同朝请的资格。

上述各类封建地主，以“见税什五”的地租，对贫苦农民进行剥削。他们还大肆进行土地兼并，以至秦朝的“富者田连阡陌”，形成“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汉书·食货志》）的局面，反映秦朝继战国之后，封建土地私有制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除了超经济的原因之外，土地买卖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杠杆。

自耕农占有的土地。自耕农是独立的劳动者，一般都拥有一小块土地。他们是农民中的主要成份，担负着封建国家繁重的赋役。秦国自耕农最多。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实行每户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赋税的政策，因此造就了大批的自耕农。后来，秦招徕大量“三晋”之民，赐给一定数

量的田宅,又出现一批自耕农。秦王朝建立后,推行“上农除末”的政策,迁徙大量居民,开发新地区,先后迁琅玕(今山东胶南县南)、丽邑(今陕西临潼东北)、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榆中(今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达十几万户。这些被迁的居民,便成为新迁地的自耕农。其结果不是农民得利,而是使封建地主所有制得以巩固。秦朝自耕农多如汪洋大海,但地位极不稳定,少数人可能上升为中小地主,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甚至破产变为佃农和雇农。此外,那时的官府及官僚、豪富之家,还存在众多的奴隶,这是奴隶社会的残余。

从上述土地占有情况看,封建地主仅占总人口的少数,但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向封建国家所交纳的赋税,只是剥削总量的一部分;而人数众多的自耕农,每户只占一小块土地,却要负担繁重的赋税。所以,秦“使黔首自实田”,实际获益者只是地主阶级,自耕农则成为封建国家奴役的主要对象。他们必须根据所占有的土地数量交纳田租,而且还要负责其它赋税及徭役。

秦朝的赋役,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田租,即田赋。这是对土地所有者征收的土地税,一般按所拥有土地的数量征收。《汉书·食货志》称,秦统一全国后,实行“收泰半之赋”的税额,即相当获物的一半以上。除了征收谷物之外,每顷土地还要缴刍(饲草)三石,稿(禾秆)二石。刍稿之类的征收,是属于田租的附加税。

第二,口赋,指人头税。它是按人口数征收的赋税,大约每年年底八月(秦以十月为岁首),官府即登记户籍名册,以便进

行征收。《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称，秦朝征戍不止，“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所谓“头会箕敛”，即按人头课取，以畚箕敛之。这里指的就是征收钱币的人头税。

第三，徭役。秦朝以徭役繁重著称，据《汉书·食货志》载，主要的徭役有更卒、正卒和屯戍等。农民每年必须为郡县服劳役一个月，称为“更卒”；成年男子一生要服兵役一年，称为“正卒”；还要戍边一年，称为“屯戍”。其实农民负担的徭役，远不止上述各种，一些临时性的征调，则不作为徭役计算。如秦末农民战争爆发，李斯等人认为，“戍漕转作事苦”（《史记·秦始皇本纪》），是农民反秦的原因之一。可见农民所承担的徭役，至少还有漕、转、作、事等繁重的苦役。这些苦役，包括转输粮草，运送军需，兴建土木工程，以及杂徭役差等。

秦朝徭役繁重。还表现在应役年限长。根据秦制，男子17岁傅籍，开始承担徭役等义务，至60岁为免老年龄，方可免除徭役。在规定的年限之内，农民必须随时听候征调，不应役或延误期限者，都要受到惩罚。如果屯戍失期，甚至要被处死。

总之，秦王朝“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确认封建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使封建土地私有制在全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自耕农所占有的小块土地，既可以买卖又可以转让，封建地主凭借政治权势，或者雄厚的经济实力，也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它既把自耕农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封建国家奴役的对象，又为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迅速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五、焚书坑儒 禁止私学

秦始皇在全国统一之后，开创封建中央集权制，推行一系列法教政令，引起朝廷内一些人的非议。这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争论愈演愈烈，终于发展成公开的斗争，并演变成震惊全国的焚书事件。事情的引发还是围绕政治体制问题而展开的。

关于秦朝实行何种政体问题，秦统治集团内部分歧严重。前述早在秦朝刚刚建立之时，持不同政治主张的双方，曾经有过一番较量。但是这种分歧一直没有消除，因而引发成公开的斗争。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年），在一次宴享群臣的酒会上，仆射（博士之长）周表臣盛赞立郡县、废分封，颂扬秦始皇的威德前无古人。这时，博士淳于越指责不周青臣为“面谀”，认为不恢复分封制，就无法使秦的统治长治久安。

李斯针对淳于越的言论，称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自古因时代不同，治理方法也随之改变。如今天下已定，法令统一，儒生“不师今而学古”，指责当世，惑乱百姓。他们以“私学”诋毁“法教”，指摘朝政法令，“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甚至造谣诽谤。这种现象如不禁止，必将削弱皇帝的威权，臣下结成反对的派别。李斯议论的核心问题，即“私学相与非法教”，有碍于“定一尊”。于是，李斯主张禁私学，焚《诗》《书》，实行文化专制的政策。

李斯的建议包括：一、除《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外，其余的史书和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等，一律限三十日内交官府烧毁，逾期不烧即处以黥刑，罚筑城四年的苦

役；二、凡议论《诗》、《书》的弃市，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情不举的，与犯禁同罪；三、禁止私学，愿意学习法令的，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并诏令付诸实行。

秦始皇既然下令焚书，许多古代典籍都付之一炬，其中六国史籍损失最大。司马迁说，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史记·六国年表·序》）。因为这类史书对秦“有所刺讥”，又是藏于官家，自然不能幸免于难。直到东汉班固作《汉书·艺文志》，由于这类史书存世甚少，以至所著录六国史籍寥寥无几。《诗》《书》及百家语之类，损失则比史籍要小。古代典籍经过秦火浩劫，损失不少，但是并没有全部被销毁。事隔100年之后，司马迁著述《史记》，书中征引、述及的古籍不下数十种，说明有些古籍还是保存下来了。甚至被李斯斥为“私学”、指为“祸首”的诸子著作，也没有完全被烧绝。西汉中期以至东汉初年，诸子文篇依然存世。《汉书·艺文志》诸子类，还详列各书所存篇数。这些书籍成为劫后余存。它们所以能保存下来，除了秦博士官所藏书籍不烧之外，当时民间私藏禁书是重要的原因。秦博士伏生壁藏《尚书》就是其中一例。当初废除“挟书律”，许多典籍纷纷出世，大都是民间私藏的结果。汉景帝时，鲁恭王广治宫室，也从孔壁之中，发现大量的古籍。

秦始皇焚书的目的，为的是定法家于“一尊”。在“定一尊”的口号下，各种学派的言论被禁止，百家思想受禁锢。一句话，禁绝一切异端思想，这就是焚书的实质。这种以焚书为手段的文化专制，造成我国古代文化的劫难，使长期积累的文化遗产遭到极大的破坏。

秦始皇焚书的结果，引起士人诸多不满，因而又演成坑儒

事件。焚书的第二年,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唯恐骗术败露,反遭杀身之祸,便私下攻击秦始皇。他们指责秦始皇“贪于权势”,独裁朝政;“专任狱吏”,不用博士;“乐以刑杀为威”,骄横自用,而且双双逃亡。秦始皇闻讯,以方士行骗诽谤,耗费巨万;咸阳诸生,“为妖言以乱黔首”(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为罪名,下令追查诸生罪状,结果将犯禁的460余人,统统坑杀于咸阳。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事件的引发及结果看,其主要意图是定思想于“一尊”,实行思想统制,其方法则采取以暴力的手段,对待非暴力的思想文化。这种文化专制的政策,不仅使古代文化遭受破坏,束缚学术思想的发展,也堵塞了议政的言路。它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六、五德终始 繁刑酷法

秦始皇所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皇权是这个阶级专政的集中体现。强化皇权对于刚从封建割据走向统一的秦王朝,无论是争取六国民心归附,还是巩固刚刚确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都是必要的。秦始皇在全国统一之初,首次实践邹衍学说,推论“五德终始”之说,正是利用它作为强化皇权的手段。

“五德终始”是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创立的学说。它所根据的“五行”起源很早,不是邹衍的新发明。“五行”指金、木、土、水、火五种物质元素,曾被用来说明宇宙纷繁事物的构成,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元素。邹衍利用五行相克的原理,即金克

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终而复始，附会社会政治历史，创立“五德终始”说。根据这种学说，“五德”即五行之德，指金德、木德、土德、水德、火德等，认为古代帝王将兴，必居其中一德，上天还将显现祥瑞，以符应示知人们。历史依照五行相克的顺序，终而复始，成了改朝换代的现象。在战国“七雄”角逐的时代，这种学说作为诸侯割据称雄、争夺天下的舆论工具，深得一些诸侯国君的信仰。尤其是战国后期，诸侯国地位逐步升级，大有并吞天下、取代周朝的势头，因此这种学说更加备受推崇。后来，邹衍的学说被燕、齐方士所利用，成为与神仙术结合的混合体，流行于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人兜售“五德终始”说，声称黄帝得了土德，“天”先显现黄龙地遁（蚯蚓）为符应，颜色尚黄。夏禹得了木德，取代黄帝的土德，“天”显现草木繁盛、秋冬不凋零为符瑞，颜色尚清。商汤得了金德，取代夏朝的木德，又有银从山里流出为祯祥，颜色尚白。周文王得火德，取代商的金德，则以赤乌为符应，颜色尚赤。如今秦统一中国，取代了周朝，这是水德克火德，早在 540 年前，秦文公东猎讲、渭之间（今陕西宝鸡县东），曾经获得黑龙，便是水德的符瑞。很显然，这里的“天”、人之间，可以感应相通。“天”依照五行相克的原理，决定朝代的更迭，支配帝王的兴废、所以秦朝取代周朝，乃是合“天数”的结果。秦始皇即皇帝之位，也是“天意”所嘱了。这顶要“天”加冕的桂冠，比起秦始皇自封“皇帝”的尊号，就更加神圣而具有权威性了。于是，世俗的专制皇权，被神化了；秦取代周朝的历史地位，也被“正统”化了。在秦王朝建立之初，这种学说对于维护统一，争取六国民心归附，无疑是极好的舆论宣

传。虽然它的“五德转移”，天命无常的思想内涵，与秦始皇希望帝位“传之无穷”的欲望相悖，但是现实更需要借助“天”神化皇权。

因此，秦始皇根据邹衍的学说，确认秦朝为“水德”之始，并依照“水德”进行改制。例如：改正朔，以建亥之月为正，即以冬十月为岁首，接受百官朝贺；颜色尚黑，衣服、旌旗均用黑色；数以“六”为纪，符、法冠均六寸、舆六尺、乘六马、六尺为步；改河（即黄河）为“德水”，等等。这是“五德”说自创立以来，第一次由秦始皇付诸实行。

秦始皇尊“五德终始”说，还有另外一层深意，即以“水德”尚法为根据，推行严酷的法律制度。根据“五德”说，秦为“水德”之始，“水主阴，阴刑杀”（《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因而尚法严刑，便成为据“水德”改制的主要内容。这不仅符合秦尚法的传统，与秦始皇的法治思想，也极为一致。司马迁称秦“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恰恰是秦始皇借“五德”之说，行尚法之实，以严刑峻法强化皇权，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具体反映。

为了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秦始皇“明法度，定律令”（《史记·李斯列传》），对原有的秦律进行修订，在全国颁行统一的法律令。修订后的秦律，现已散佚，无法了解它的全貌。但从现存有关的文献，以及出土的部分秦律，仍然可以窥其繁酷的特点。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一千余支秦简，多数是秦的法律文书，大约写于战国末年至秦朝初年期间。它们所反

映的是秦王政继位以来,及至秦统一初期的某些法制内容。简中抄录的法律条文,只是秦律的一小部分,但律名多达 29 种,表明秦律种类繁多。这些律文涉及的面相当广,包括农田垦种、山林保护、牲畜饲养、粮草管理、货币流通、物资管理、手工业生产、徭役征发、刑徒使用、军爵赏赐、官吏任用、保举子弟、从军劳绩、府库收藏、傅籍法规、征发戍边,对游士的限制,以及官营手工业产品的评定等等。律文的内容明确,规定具体,有的近乎琐细,这里试举一例。如《喜喜苑律》规定:“在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评比耕牛。满一年,在正月举行大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田啬夫酒 1 壶、干肉 10 条,免除饲牛者一次更役,赏赐牛长资劳 30 天;成绩低劣的,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们资劳两个月。如果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 10 下。又在乡中举行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里典资劳 10 天;成绩低劣的,笞打 30 下。”(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类似的法律条文,它作为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法律规范,在秦简中比比皆是。这类秦律不管是它的种类,还是律文的细节,都体现了“繁”的特点。这表明秦律作为秦统治者的意志的体现,全面贯彻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并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系统的法制体系。

秦律的另一特点,是以“酷”著称。秦律的核心是刑法。它承袭商周时期的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并在它的基础的加以发展。五刑可归纳为死刑和肉刑两类。秦朝的刑罚,包括死刑、肉刑、罚作、迁刑和赎刑,共计 5 类。每类根据不同的论罪方法,又可公为若干不同的刑种。

第一类,死刑。见于史书记载的,仅刑名即可分为斩、戮、

舂、车裂、弃市、梟首、腰斩、生埋、赐死、夷族等 10 余种。

“斩”，指斩首。如秦朝时，凡戍边失期者，“法皆斩”（《史记·陈涉世家》），即以斩首论处。“戮”，也是斩首极刑，但受刑方法不同。秦简《法律答问》载，“戮”，指“生濠（戮），濠（戮）之已乃斩之”，即先施刑辱示众，而后斩首处死。秦二世曾沿用此刑，将“六公子戮死于杜”（《史记·秦始皇本纪》）。

“舂”，又称磔、车裂、体解。这是古时分裂肢体的酷刑，秦王政以来沿用未废。如秦始皇二十年（前 227 年），荆轲刺秦王失败，以“体解”处死。秦二世时，又有“十公主所死于杜”（《史记·李斯列传》）。秦末投降秦军的宋留，则被秦处以“车裂”之刑。

“梟首”，斩首而悬首于木上，见于秦王政新政时的记载。当时秦平息嫪毐叛乱，其党羽 20 人均梟首处死。

“弃市”，在市井当众处死，与“腰斩”同是古刑种。前者如“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后者如李斯论腰斩于咸阳市。

“赐死”与“夷族”，也是秦国的旧刑罚。秦二世时，赵高设谋杀害扶苏，就是“赐剑以自裁”（《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被杀之后，他的家族则“夷三族”（《史记·李斯列传》）。

“生埋”，又称阬杀，见于云梦秦简《法律答问》。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 年），460 余名犯禁的儒生，均被阬杀于咸阳。

第二类，肉刑。这是指亏残肢体一类的刑罚，包括黥、劓、刖、笞、宫等，原是商周时期常见的刑罚，秦朝仍然广泛使用这个类刑罚。

“黥”，在面额上刺刻涂墨，即墨刑。秦简《法律答问》载有

“黥以为城旦”的刑，受刑者不仅受肉刑，还要服筑城的劳役。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年），李斯奏请焚烧《诗》、《书》，令下 30 日不烧者，黥为城旦，就是袭用这种刑罚。又据《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秦朝范阳令“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可见这是常用的刑罚。

“劓”，割鼻；“刖”，断足，或称“鑿足”，即刖刑、“斩左止”，都是摧残肢体的酷刑。《盐铁论·诏圣篇》载：秦始皇“任刑必诛，劓鼻盈索，断足盈车”，同样是两种常用的刑罚。

“宫刑”又称腐刑，男子割势，女子幽闭，是破坏生殖机能的刑罚。如秦始皇以“隐宫徒刑者 70 余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分作阿房宫和骊山墓。

“笞”，笞打。笞刑是肉刑中比较轻的刑罚，但云梦秦简有“熟笞”的条文，则受刑者被笞致死或致残，就很难避免了。

第三类，罚作，即劳役刑。这是对犯轻罪者以服苦役的刑。罚作刑可分为如下几种：一、髡钳为城旦、舂；髡钳即剃发并加以刑具，男为城旦即筑城、女为舂即舂米。二、完城旦、舂：“完”即不髡钳，仅服筑城、舂米的劳役。三、鬼薪、白粲：男为鬼薪，即为祠祀采薪；女为白濛，即为祠祭择来。四、司寇、作如司寇：司寇即伺寇，男子罚往边地守备，女作如司寇。五、戍罚作、复作：男戍罚作，即罚往边地服劳役；女复作，即作于官府。上述各种罚作刑刑期，因限于史料而无法确知。然而“汉承秦制”，惠帝即位之初，罚作仍在实行。《汉书·惠帝纪》注引应劭语，城旦、舂为“四岁刑”；鬼薪、白粲“皆三岁刑”。髡钳城旦、舂，比城旦、舂为重，刑期当在四年以上，《汉旧仪》称，“皆作五岁”。又司寇、作如司寇，“皆作二岁”。戍罚作、复作最轻，刑期

“皆一岁到三月”。汉初承袭秦的刑制，则秦朝各种罚作的刑期，大约与汉初相仿。

第四类，迁刑。又称徙谪，即流放。这是将有罪吏民放逐到边远地区的刑罚。如秦平息嫪毐叛乱后，曾将其舍人 4000 余家，徙迁于房陵。三年后，吕不韦饮鸩自杀，其舍人被迁房陵者，亦非少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秦朝北逐匈奴，从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至阴山（今内蒙古包头市北）地区，建立 44 个县，并迁徙有罪吏民充实之。

第五类，赎刑。这是以交纳财物赎罪，借以减免刑罚的一种变通形式。在云梦秦简中，有赎死、赎宫、赎迁、赎黥、赎耐的记载，即从耐刑以至于死刑，均可用财物赎罪。赎刑所交纳的财物的数量，也已无法确知，大约是以刑罪轻重为依据的。据秦简《司空律》载，凡无力交纳财物赎刑者，允许以服劳役的形式抵偿。然而不论采用何种形式赎刑，秦律所保护的是官僚贵族的利益。例如秦律规定，秦所属少数民族的首领、无爵的宗室贵族，有罪可享有赎免，或减处较轻赎刑的优待。又如，有“公士”爵的人，以劳役赎刑，允许不穿囚服，不加刑具。葆子以上犯罪，在官府以劳役赎刑者，可不加监管，而且还允许以年龄相当的人代役。一般地主可用奴隶、牛马的劳役抵偿。赎刑对于贫苦农民，不仅无力交纳赎罪的财物，即使以劳役赎罪，也无权享受上述种种优待。

秦朝的刑法严酷，刑种繁多，是秦统治者压迫人民、镇压敌对势力的暴力工具。它们对于维护皇帝权威，保护地主阶级利益。巩固封建政权，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秦始皇在全国统一伊始，首先借“五德”说从神化皇权、以法制强化皇权两个不同

方面,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这就是尚法的秦始皇所以“朝圣”邹衍,青睐“五德终始”说的原因所在。

第二节 秦末农民大起义

一、赋役无休 天下苦秦久矣

秦统一全国之后,秦始皇不顾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广大人民对于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迫切要求,继续以无休止的徭戍役使人民,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因而使秦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加深。

早在兼并六国时,每当秦军攻灭一国,秦始皇即令绘制该国宫殿的图样,并在咸阳北阪上大兴土木,仿照各国宫殿的式样修建。当时在渭水北岸,从雍门以东,直至泾水、渭水北岸,建成无数的宫殿。全国统一后,秦始皇对咸阳宫加以扩建,在渭水南岸修建宫殿,形成渭水南北,宫观殿屋星罗棋布,遥遥相对;复道甬道纵横交错,绵连不断的景象。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 年),一座规模更加宏伟的朝宫,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又破土动工了。这就是被历代文人墨客所倾倒的阿房宫。阿房宫又名阿城,是朝宫的前殿,因作宫于阿房故名。故址在今西安三桥镇南,阿房村及古城村一带。阿房宫东西宽 500 步,南北长 50 丈,庭中能容纳上万人,下面

可以竖立 5 丈的大旗。据《三辅黄图》载：“始皇广其宫，规模三百余里”，已建成的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阁道逶迤相属，工程之浩大可谓前无古人。据司马迁记述，当时“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形成以咸阳为中心，遍及渭水南北，函谷关内外的宫殿群。秦始皇广治宫室，耗费无数，后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秦始皇不仅生前穷奢极欲，还要为死后安排豪华的享受。他在即位之初，开始修建陵墓，即骊山墓。据载陵墓高 50 余丈，周围 5 里多，墓内修筑宫观殿宇，陈设各种奇器珍宝。经考古调查及发掘，现陵墓陵丘高 43 米，基身设有内外两城，内城周长 2500 多米，外城周长近 6300 米。在陵东侧发掘出 3 个兵马俑从葬坑，总面积为 2 万多平方米，出土陶俑及陶马“约六千余件”，形状与真人真马相仿。兵马俑坑的布置，是按军阵场面排列的，体现了当年烜赫的军威。秦始皇为了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征用刑徒 70 余万人，并从巴蜀、荆楚等地调运各种建筑材料，途中转输十分艰难。

秦朝长期用兵，戍役也十分繁重。其中对匈奴的战争，动用了 30 万兵力，延续 10 余年之久；对百越的战争，用了 50 万兵力，前后延续七八年，后来又再补给兵源。这些旷日持久的战争，广大人民不仅要负担兵役，还要承担转输的力役，甚至妇女也属征调之列。其结果“戍者死于边，输者殁于道”（《汉书·晁错传》），造成人民重大牺牲，死伤不计其数。此外，筑长城、开灵渠、修驰道、直道等，所动用的劳力，更是无法计算。

秦朝徭戍之繁重，朝野众品一词。秦末起义的农民发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呼声，正是农民不堪忍受繁重徭戍奴役的

具体表现,连秦朝统治集团中的李斯等人,也认为徭戍繁重是农民反秦的主要原因之一。秦朝繁重的徭戍,使人民不胜其苦,再加上秦的赋敛无度、刑罚严酷,形成人民“力罢(疲)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亡(无)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赭衣(罪人)半道”(《汉书·贾山传》)的悲惨局面。秦统治集团对于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促进了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人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继韩国贵族张良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未遂之后,秦始皇三十六年(前 211 年)。在东郡(郡治今河南濮阳)的一块陨石上,有人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样,秦始皇派御史追查无结果,竟下令诛杀当地居民。这年的秋天,在华阴平舒(今陕西华阴),又有人拦住秦朝的使者,咒骂“今年祖龙(指秦始皇)死!”(《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公开的反秦活动,有的是六国旧贵族对秦怀有敌意,表明秦朝社会矛盾的复杂因素。然而,张良行刺未遂不仅宣告个人冒险举动的破产,也反映六国贵族势力已是强弩之末,未能形成推翻秦统治的社会力量。

与此同时,一种从根本上推翻暴秦统治的斗争,正在各地出现。这种反秦斗争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刑徒、奴隶和秦朝的低级官吏。他们逃亡山林湖泽之间,在那里积蓄反秦的力量,或者发动小规模起义。如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人彭越,以渔耕为生,活动于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县境内)一带。后来,他率领少年百余人,又收诸侯散卒,组成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在巨野泽发动小规模起义。

又如六县(今安徽六安县)人英布,因触犯秦律,受到黥刑,又被遣送骊山,罚作苦役。那时骊山刑徒数十万人,受着难

以忍受的奴役。英布策动一批骊山刑徒逃亡，入江中（今长江下游一带）“为群盗”。这是刑徒有组织的反秦的起义。

此外，还有刘邦聚众起义。刘邦是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人，曾试补秦朝低级官吏，做过沛县泗水亭长。有一次，刘邦为沛县押送一批刑徒去骊山服役，许多刑徒在途中相继逃亡。刘邦估计到不了骊山，其余刑徒也将会全部逃光。于是，他把所有刑徒通通释放，自己带了 10 余人逃往芒、碭（今安徽永城县北）山泽之中，在那里积聚反秦的力量。上述这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它揭开了秦末农民反秦斗争的序幕，预示着一场反秦风暴即将来临。不久，秦始皇病死巡游途中，更加速了这场反秦风暴的到来。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 年），这位好大喜功的秦朝皇帝，再一次开始他的东巡。随行的有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以及中车府令赵高等人。这年十一月，秦始皇行至云梦（今湖北洪湖及湖南洞庭湖一带），又沿长江东下，经过丹阳（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到达钱唐（今浙江杭州市），然后上会稽山。之后，又北至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南）、之罘（今山东芝罘）。当他到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西南）时，就病倒了。秦始皇病重之时，曾写信给公子扶苏，让他赶回咸阳办理丧事，结果这封书信被赵高扣下。这年七月，秦始皇死在沙丘平台（在今河北广宗）。

秦始皇之死，在大臣中引起极大震动，他们各有各的打算。李斯因秦始皇死在外地，生前未立太子，唯恐引起天下大乱，决定秘不发丧。他们将秦始皇的尸体置于炆凉车中，令百官奏事、送饮食如故，准备回到咸阳再作安排。官员中以赵高最为忙碌，他正在策划一项与秦朝命运攸关的阴谋。

赵高原来身世卑微，因懂狱法，被任命为中车府令。又做过胡亥的老师，教给他狱律法令。赵高为了篡夺朝政大权，准备改立胡亥为太子。他不仅扣下秦始皇给长子扶苏的书信，竭力怂恿胡亥夺取皇位，而且还以官禄权势为诱饵，对李斯进行威逼利诱。李斯为保全自己，终于失节妥协。他们合谋假造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又假造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以扶苏和蒙恬将兵屯边 10 余年无功，扶苏诽谤父皇，蒙恬不加制止的罪名，赐剑逼令扶苏“自裁”，蒙恬“赐死”，还命令他们把兵权交给副将王离。扶苏接到书信后，最后自杀身亡。蒙恬怀疑其中有诈而不肯死，结果被囚禁在阳周（今陕西绥德西）。接着，赵高又给蒙毅妄加一个罪名，声称蒙毅在秦始皇生前，曾经反对胡亥为太子，因此将他逮捕入狱，囚禁在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

赵高杀害扶苏，囚蒙氏兄弟之后，立即赶回咸阳。这时，他们才宣布秦始皇的死讯，同时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赵高阴谋得逞，官为郎中令。这是掌管禁中侍卫皇帝的要职，为他进一步篡夺朝政大权作准备。李斯虽然官为原职，但是只能听从赵高的摆布了。

秦王朝经过这次政变，赵高与胡亥篡夺了秦朝最高的权力，加剧了秦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秦王朝的统治日薄西山，已无法摆脱覆亡的命运了。

二、陈胜“揭竿”而起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在巡行东方的时候病死在路上，他

的小儿子胡亥谋杀了长兄扶苏，做了二世皇帝。秦二世夺得帝位以后，听信宦者（就是太监。“宦”读“患”）赵高的话，又杀害了 12 个兄弟和许多大臣，受到连累的人成千成万。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统治力量大大地削弱了。

又昏庸又凶暴的秦二世，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压迫。他继续修建阿房宫，征调各地的兵士 5 万人到咸阳来充当他的卫兵，还养了无数的狗马鸟兽。咸阳的粮草不够了，他勒令各地人民即时缴纳，并负责运送。人民运送粮草到咸阳来，要自带吃食。咸阳附近 300 里地内，人民不能吃自己种的谷子。

就在秦朝的统治极端残暴黑暗而统治力量相对地削弱的情况下，关东的贫苦农民陈胜和吴广，燃起了第一把反秦的烈火。

陈胜别名陈涉，是阳城（在现在河南登封县东南）地方的雇农。有一次，他和同伴在一起替地方耕田，耕得累了，在田边的土墩上休息，他愤激地说：“如果咱们有出头的日子，谁也不要忘掉谁！”公元前 209 年七月，秦二世征发住在闾左（村子的左边。“闾”读“吕”）的穷苦人民防守边疆，陈胜被征发到，他的任务是去防守渔阳（在现在河北密云县西南）。这一次上渔阳的戍卒（守边军士。“戍”读“树”）总共 900 人，大部分是农民，其中有一个叫吴广，是阳夏（现在河南太康县）人。他和陈胜因为比较能干，都担任了屯长（队长）的职务。

这一支强迫编制成的队伍，从现在的河南走到了安徽北部的大泽乡（现在安徽宿县西南）。这时正当雨季，连绵的大雨，淹没了田地，冲毁了道路，他们便困在大泽乡，没法继续走路，不可能在规定的期间赶到渔阳了。按照秦朝的法律，不按

期到达防地的要处死刑。900 个人眼看都活不成了。陈胜便和吴广商量道：“横竖是死路一条，与其白白地去送死，不如起来反抗！”吴广完全赞成。吴广和群众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他便到群众中去进行鼓动工作。于是不到几天，在 900 个戍卒的心里，就有这样的共同想法：“跟着陈胜走，从死路里找出活路来！”

起义的行动，是从陈胜、吴广杀死秦朝的将尉（秦朝的武官叫做尉，将尉是统领这九百人的武官）开始的。那天吴广故意去激怒将尉，将尉鞭打吴广，并且拔出身上的剑来要杀吴广，吴广就夺过他手里的剑，杀死了他；陈胜从旁帮助，把另外两个尉也杀死了。事情闹开了，两人就召集全体戍卒，激发他们说：“咱们本来都是要杀头的；但是好汉子应当死得轰轰烈烈，那些王侯将相，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为什么咱们不能拚一拚呢？”九百个人齐声喊是。他们迅速建筑了土坛，袒露了右肩，宣誓起义。陈胜被推做将军，吴广做都尉。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他们决定组织起来，共同进行推翻秦朝残暴统治的斗争。他们原是一支没有刀枪的徒手队伍，这时便拿锄头、木棍作武器，在竹竿顶上扎上布片当作旗帜。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揭（“揭”读“结”，是高举的意思）竿”起义。

起义军很快地占领了大泽乡，接着又攻下了蕲县县城（在现在安徽宿县南面。“蕲”读“其”）。从蕲县分兵两路，一路由符离县（现在安徽宿县符离集）的一个农民葛婴率领，向蕲县以东各县发展。主力部队在陈胜、吴广亲自指挥之下，接连攻取了蕲县西北面的 5 个县城。各地农民自己带了粮草，来参加起义军。不到 1 个月，他们便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 1 千多、步

兵好几万,成为一支力量强大的队伍。

起义军乘胜向西推进,打到了陈县(现在河南淮阳县)城下。陈县的县令已经逃跑,只有县丞(县令的助理)在守城。起义军杀死了县丞,占领了陈县。

陈县在战国时期,一度做过楚国的国都,是当时的一个大地方。从地理位置上看,它更显得重要。古时候有一条有名的运河叫做鸿沟(就是现在的贾鲁河),就在陈县境内和淮河的支流颍水会合。这条鸿沟是贯通黄河和淮水的重要交通线,秦朝靠着它转运江淮地区的粮食和物资到关中(指现在的陕西省)去。起义军夺取了陈县,截断了秦朝这一重要交通线,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同时也使自己便于取得物资,并且在军事上处于优越的地位。这是起义军的重大胜利。

这时起义军的声势浩大,为了加强领导,为了更有力地对秦朝展开攻势,这样就有组织政府的必要。陈胜便召集当地的三老(相当于后来的乡长)和各阶层人士来开会商量。大家在会上一致推举陈胜做王。于是起义军的政府便在陈县建立了,国号叫张楚,是“张大楚国”的意思。因为这一带原是旧楚国的地方,楚国灭亡后,流传着“楚虽 3 户,亡秦必楚”的话。(意思是说楚国虽然只剩三户人家,但是灭亡秦国的必定是楚国)。这里的“三户”是指 3 家贵族,不过这话也反映了人民怨恨秦朝统治、怀念过去国家的情绪。陈胜便提出讨伐暴秦、张大楚国的口号,号召人民一齐起来反抗秦朝政权。在陈胜的号召下,各地人民纷纷起义杀了秦朝的官吏,打起张楚的旗帜。当时自动结合的上千人的起义队伍,多到数不清,他们都把陈胜当作领导人。

起义军的政治中心陈县，这时聚集了各色各样的人物。这里面有前六国的残余贵族和游士（游士是战国时期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因为他们到处活动，如果今天在这一国处得不合适，明天就到另一国去，所以叫做游士），有称为儒生的地方知识分子，他们对秦朝政权都是不满的，甚至是仇视的。六国的贵族曾经遭到秦始皇的严厉镇压，当然是秦朝统治者的对头，他们也时刻在图谋复辟（“辟”读“必”）。游士在战国时期，依靠各国贵族，取得功名和富贵。秦朝灭掉六国以后，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社会地位显著地降落下去，还要受到秦朝政权迫害，一有机会，他们便想聚众而反，因而参加了革命斗争。儒生也投奔起义军，因“焚书坑儒”而起，——秦始皇为了推行新制度，曾经烧了许多古书，活埋一批引用古书来批评秦朝法令的儒生。各阶层人士纷纷依附陈胜，说明农民起义的影响扩大了，但是起义军的成分也复杂了。

张楚政府成立以后，在军事上作了一番布置。起义军的骨干被派到各地去，对秦朝发动全面的攻势。起义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是这样的：

一、由假王（“假”是代理的意思）吴广监督田臧（“臧”读“髡”）等将领向西进兵，进攻目标是荥阳（“荥”读“形”）。荥阳在战略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黄河和济水的会合处，又是鸿沟的起点，占领了荥阳就可以阻挡住秦兵的东下。而且当时关东的粮食，运到这里后就储藏在荥阳西北的敖仓里，敖仓是关东最大的粮食仓库，夺取了敖仓又可以解决起义军的粮食问题。所以攻取荥阳是起义军首要的也是严重的军事任务。

二、由陈胜的老友陈县人武臣担任将军，游士张耳、陈余

担任左、右校尉(校尉是比将军低一级的武官),率领三千起义军北渡黄河,进攻前赵国的地区,以扩大起义军的活动范围。

三、由汝阴(现在安徽阜阳县)人邓宗领兵进攻九江郡(郡城在寿春,就是现在安徽寿县),深入淮南地区,以巩固后方。

在这时候,起义军的东路军主帅葛婴,已经进兵到东城(现在安徽定远县东南),立了一个叫襄彊(“彊”读“强”)的前楚国贵族做“楚王”。不久听说张楚政府已经成立(当时交通不便,张楚政府成立的消息传到东城比较迟),便杀掉襄彊,回到陈县报告陈胜。陈胜怪葛婴自作主张,杀了葛婴。葛婴受了朴素的小生产者意识的限制,以为只有贵族才能做王,所以拥立了襄彊,对革命斗争来说,这是要产生不良影响的,葛婴是犯了过错的。不过他是立有大功的、独当一面的大将,而且已经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行动,陈胜却给予最严厉的惩处,这就太过分,不仅伤害了将士间的和睦而且是一种自戕行为。

另一方面,假王吴广统领的西征军,遇到荥阳秦军的坚强抵抗,一时攻不下荥阳。陈胜又派陈县人周文带兵西征。这个周文是游士出身,曾经在以前楚国大将项燕的军队里担任过差使,懂得兵法。陈胜便任命他做将军。周文从陈县出发,绕过荥阳,直攻咸阳。他的军队进展很快,沿路不断地有农民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到了函谷关的时候,已经有兵车千辆、兵士好几十万人,这是起义军的主力部队。他们胜利地进了函谷关,一直打到距离咸阳只有几十里的戏(在现在陕西临潼县东南)才驻扎下来,起义军的声势便达到了最高潮。这是公元前209年八九月间的事,距离初起义的时间不过两个月。

秦朝政府到这时候才发现形势的严重,但是已经来不及

征发军队，二世皇帝非常惊慌。少府（管理皇家财产的财务长官）章邯（“邯”读“含”）便建议赦免在骊山做苦工的刑徒，把他们武装起来，去迎击起义军。秦二世就叫章邯指挥着这支几十万人的军队，对周文进行反击。周文所率领的起义军是新发展起来的，缺乏战斗经验，又缺乏武器，加上处在孤军深入的境地，因而被秦军战败，退到了关外，等待后援。

起义军的这一不利局面本来是可以扭转的。当时全国性的大起义已经形成，起义的队伍风起云涌，从四面八方袭击秦朝政权。其中力量比较大的，有占领沛县（在现在江苏沛县东面。“沛”读“配”）的刘邦领导的起义军，在吴县（现在江苏苏州）发动的项梁、项羽叔侄领导的起义军，他们的力量都在继续壮大中。秦朝政权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而且陈胜派出去配合周文西征的军队，由将军宋留带领，走南路打进南阳（在现在河南省），将要从武关（在现在陕西丹凤县东南）攻入关中；武臣一路起义军又在黄河以北地区获得很大的发展，可以从西北面进攻关中。因此起义军的形势仍然是良好的。可是武臣一路在胜利进军中，领导权落到异己分子张耳、陈余手里，这一变化牵动了大局，搅乱了农民革命的阵营。

原来张耳、陈余都是野心家，他们两人的参加起义，是抱着一种卑鄙的阴谋的，这就是利用农民群众的力量，来恢复以前的分裂局面，以发展个人的权势。当陈胜得到群众的拥护，将要称王时，两人便提出不同意见，要陈胜选择六国旧贵族做王，陈胜没有同意。张楚政府成立后，两人又图谋夺取武装，向陈胜要了3千人马，名义上是去开辟新地区，实际上是去打自己的天下。由于借着陈胜的名义，打着张楚的旗帜，所以兵势

很盛，一渡过黄河就连续占领了 30 多座县城，军队也发展到好几万人。就在公元前 209 年八月，这路军队进占旧赵国都城邯郸（“邯”读“单”）的时候，张耳和陈余正式背叛了张楚政府。他们拿陈胜杀死葛婴做借口，劝陈胜所派遣的将军武臣脱离陈胜，以免由于功劳大反而遭杀身之祸。武臣听了他们的话，自立为赵王；陈余做大将军，张耳做右丞相。陈张两人掌握了军事、行政实权，武臣成了傀儡。陈胜命令武臣急速出兵接应西征大军，张耳、陈余却教武臣向东北方旧燕国地区扩张势力。武臣部将韩广，领兵到了旧燕国地区，也在当地旧贵族分子怂恿下，自立为燕王。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旧齐国贵族田儋（“儋”读“单”），趁农民大起义的机会，在狄县（现在山东高青县）自立为齐王。陈胜部将周市领兵攻下旧魏国地区，迎立在陈胜身边的旧魏国贵族魏咎（“咎”读“救”）做魏王。

旧贵族复辟的局面出现了，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分散了。

周文率领的西征部队得不到支援，在现在河南西北边境艰苦地战斗了两三个月，牺牲很大。周文在渑池县（渑池在今河南渑池县西）境内壮烈自杀，部队也失散了。

章邯指挥秦军继续东进，下一个打击对象是围攻荥阳的起义军。在这个紧要关头，围攻荥阳的起义军却发生了内哄。由于吴广缺乏军事指挥经验和知识，在成为起义军的副首领以后又骄傲自大起来，在荥阳城下屯兵四个月，没有什么进展。将军田臧等见秦朝主力军就要开到，恐怕遭到秦军的里外夹攻，招致失败，便假托奉陈胜的命令，杀害了吴广。这支起义军分为两部分，将军李归等率领一部分人马，继续驻在荥阳城

下；精锐部队由田臧亲自率领，往西北面去争夺敖仓。结果在敖仓附近和章邯的大军相遇，起义军大败，田臧战死。章邯迅速进兵荥阳城下，李归等也兵败身死。

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从战略上看，田臧等想把起义军从被动的地位转变到主动的地位，从劣势转化为优势，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不过他们在强敌当前的情况下，用私自杀害统帅的办法来改变战略，却是错误的。这支起义军在荥阳城下停留了好几个月，士气原来不高，剧烈的内部斗争更使得军纪松懈、军心涣散，所以一和强大的敌人接触，便全军复没了。

起义军的两支西征部队差不多损失光了，陈县便暴露在秦军的进攻矛头之下。秦二世又增派军队镇压起义军，几十万秦军在章邯统领下，猛烈地从荥阳向东南方面推进。当时陈县兵力很单薄。黄河以北的起义军已经被旧贵族利用了去，作为他们割地称王的工具，没有一支兵渡河来救援；陈胜派到淮南和南阳方面去的起义军，一时又赶不回来。情势十分危急。陈胜采取了紧急措施，一面处死了从前线逃回来的败将邓说（这里的“说”读“阅”），整肃军纪；一面派上柱国（当时最高官号，相当于宰相）蔡赐率领一部分起义军，阻击章邯的大军；另外派将军张贺率领一部分起义军驻扎在陈县西门外，以便策应。章邯的军队打败蔡赐的军队，并且杀死了蔡赐，随即向张贺的兵营发动攻击。陈胜亲自到张贺营里，领导起义军作战。因为敌人力量太强大，张贺战死，陈胜不得不放弃陈县，向东南退却。他经过汝阴，到了下城父（在现在安徽蒙城县西北）地方。车夫庄贾叛变了，杀害了陈胜，投降了秦军。

宋留带领的一支西征军，正在从南阳往武关的路上行进

中,得到陈胜牺牲的消息,撤退到新蔡,遇到秦军,宋留竟投降了秦军。这个投降将军被解送到咸阳,受到“车裂”的刑罚。

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失败了。这时是公元前 209 年 12 月,陈胜从领导起义到失败牺牲,一共经过 6 个月时间。

三、起义军阵营的扩大

在陈县反秦旗帜的号召下,一个波澜壮阔的起义浪潮席卷了全国,各地出现了“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史记·张耳陈科列传》)的情况。许多规模大小不等的起义军,在全国各地纷纷起兵响应。

刘邦在沛县起义。刘邦自从亡匿芒、砀山泽之间,就在那里组成一支反秦的队伍。陈胜攻陈县后,沛令如惊弓之鸟,主吏萧何和狱掾曹参,主张借刘邦之力,起兵响应,并派樊哙召回刘邦。当刘邦率领队伍回沛县时,沛令唯恐刘邦有变,又反悔了,还要杀萧何和曹参。萧何、曹参逃出城去,加入刘邦队伍。于是,刘邦在沛县父老的帮助下,杀沛令,自立为沛公;又由萧何、曹参、樊哙等人聚集沛县子弟二三千人,在沛县起兵。刘邦先后攻下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方与(今山东鱼台西),又还守丰邑(今江苏丰县)。

项梁、项羽起兵于吴县。项梁是楚将项燕的儿子。秦灭楚之后,项梁因杀人,便携其侄项羽,避仇于吴县(今江苏苏州市)。陈胜起义后两月,会稽郡守殷通见秦朝大势已去,想派项梁发兵反秦,发展自己的势力。项梁乘机使项羽杀了殷通,收集周围各县精兵 8000 人,组成一支反秦的队伍。项梁自立为

会稽郡守，以项羽为副将。他们先后攻下附近许多县，在江东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

英布起兵响应。早在陈胜起义之先，英布在就率骊山刑徒，逃入今长江下游一带，组成起义队伍。陈胜起义消息传来，正在今鄱阳湖一带活动的英布，便联合番阳（今江西波阳县东北）县令吴芮，共同起兵反秦，起义队伍发展成几千人。后来，闽越王无诸和东瓯王摇，率越人归附番阳令吴芮，也加入了由英布率领的起义军。当项梁定江东，渡江向西发展时，英布所属起义军，又并入项梁的义军。

酈商起兵于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人酈商，在陈胜起义时，聚众数千人，起兵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两年后，刘邦率军攻打陈留，在酈食其（酈商之兄）的劝说下，酈商所率领的这支 4000 人的队伍，又加入刘邦的起义军。

秦嘉等人的淮北起兵。陈胜称王后，当时的陵县（今江苏泗阳县西北）人秦嘉，铚县（今安徽宿县西）人董潋，符离（今安徽宿县西北）人朱鸡石，取虑（今江苏睢宁县西南）人郑布，徐县（今江苏泗洪县南）人丁疾等，在淮北起兵响应。他们汇集成一路起义军，北攻郯县（今山东郯城县北），围困东海郡守庆。秦嘉自立为大司马。

张良聚众起义。张良自从行刺失败，就隐姓埋名，亡匿于天邳（今江苏邳县西南）。秦王朝没有被他的铁锤打倒，却淹没在农民起义洪流中，历史形势驱使他加入到起义的行列中去。当陈胜在蕲县兵后，张良聚集百余名少年，也参加反秦起义。后来，景驹在留县（今江苏沛县东南）自立为楚王，张良势力孤单，正想前往归附，却在途中巧遇刘邦。他加入刘邦的队伍，被

拜为厩将，后来成为刘邦的重要谋臣。

彭越起兵响应。彭越一直在钜野泽一带活动，后来有百余名少年加入他的队伍，使这支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刘邦攻打昌邑，还得到过彭越的帮助。

陈婴在东阳起义。陈婴原是东阳（今安徽金湖西南）令史，陈阳少年杀县令，聚众数千人，推陈婴为首领，队伍发展到2万人。

此外，还有一些秦朝的低级官吏，地方“豪杰”及儒生，在起义爆发后，纷纷投奔起义队伍，参加反秦的活动。如沛县的狱吏任敖，刘邦起兵后，即投奔起义军，做过御史。又如沛县人周昌及其从兄周苛，原来都是泗水卒史，刘邦起兵攻破泗水守监，他们都加入起义军。还有，吴广围荥阳时，陈胜征聘豪杰谋划军事问题，上蔡人蔡赐加入起义军，官为上柱国。又如鲁国儒生，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当陈胜攻占陈县后，也持礼器投奔起义军，做了博士官。

陈县“张楚”政权的建立，推动了全国起义浪潮的高涨。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起义军遍及全国各地，尤其在楚国故地，“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史记·陈涉世家》）。参加这次反秦起义的，除了以农民为主体外，还有奴隶、刑徒、儒生、六国贵族，秦朝低级官吏等，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起义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股声势浩大的起义浪潮，极大地冲击着秦王朝的统治。但是，由于参加者成份复杂，又给起义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因素。

四、前仆后继 奋起亡秦

秦末农民起义的第一次高潮虽然失败了。但是，起义人民没有被杀绝，也没有被气势汹汹的秦军所吓倒。以吕臣为代表的起义军率先继起，有力地回击了秦军的猖狂进攻。

吕臣原为涓人，是陈胜的近侍。陈胜死后，吕臣在新阳（今安徽界首县北）组织“苍头军”，继续举起推翻暴秦统治的义旗。不久，吕臣率苍头军收复陈县，杀死叛徒庄贾，恢复了“张楚”政权，使起义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

秦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即命令左、右校尉围攻陈县，陈县再度失陷。吕臣退出陈县，重整起义队伍，并与英布起义军联合，实力大大增强。这两支起义军合力回击秦军，大败秦军左、右校尉于青波（今河南新蔡县西南），然后挥师北上，第二次收复了陈县。吕臣联合英布再一次大破秦军，表明起义力量联合对敌，则秦军可挫，它预示着新的反秦高潮必将来临。

果然，在青波一战结束不久，以项梁起义军为主力而汇成的起义洪流，逐步地形成了。

项梁杀会稽守殷通，起兵三个月之后，陈胜就失利撤出陈县了。那时奉陈胜之命，正率军攻打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的召平，听说陈胜兵败的消息，就渡江并假借陈胜的命令，拜项梁为上柱国，让他迅速领兵向西挺进，迎击秦军。

项梁率 8000 兵力渡江，首先派人与陈婴取得联系，建议联合西向攻秦。陈婴说服他的部属，率 2 万人的队伍，加入项梁起义军。项梁渡过淮水之后，又有英布、吕臣、蒲将军率领的

起义军加入。这时，项梁所属的起义军，已经发展到六七万人，并在下邳（今江苏邳县南）驻守。那时候，在这一带割据称雄的秦嘉，企图阻项梁西进，遭到项梁的攻击。

秦嘉原来起兵于郯县（今山东郯城北）。早在义初期，陈胜曾派去武平君畔为监军，但是秦嘉拒不受命，表明他不受陈胜的约束。陈胜兵败出走之后，秦嘉在留县（今江苏沛县东南）立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还派公孙庆联络田儋，企图联合田儋发展割据势力。当项梁进军下邳时，秦嘉陈兵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东，又想阻止项梁西进。在这种情况下，项梁认为，陈王兵败下落不明，秦嘉擅立景驹为楚王，这是背叛的行为。他发兵攻打秦嘉，秦嘉不堪一击，逃至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时，被项梁所追杀。秦嘉的队伍投降，项梁收编其余部，壮大了起义军的力量。

接着，项梁准备从胡陵率军西进，正好章邯军来到栗县（今河南夏邑）。两军相遇，势不两立。项梁派朱鸡石、余樊君迎战，但出师不利，余樊君战死，朱鸡石败逃胡陵。于是，项梁率起义军转攻薛县（今山东滕县南），在这里处死败逃的朱鸡石。

这时，转战丰、沛一带的刘邦，也投奔项梁来了。刘邦自沛县起兵，先后攻取胡陵、方舆，又还军守丰邑。秦朝的泗川监平，曾将兵围攻丰邑，但被刘邦迅速击破。于是，刘邦命令部将雍齿守丰邑，自己则率兵东进薛县。不料雍齿怀有戒心，竟以丰邑叛降周市。刘邦闻讯，立即还军，却未能攻取。后来，项梁入据薛县，刘邦亲往求见。项梁派 5000 人马，由五大夫将 10 人统率，帮助刘邦攻下了丰邑。雍齿逃往魏地。

至此，以项梁、项羽起义军为主力，包括英布、吕臣、蒲将军、陈婴、刘邦等几支起义军，便汇合成一支强大的反秦力量。它成为一支继续陈胜之后推翻秦朝统治的主要队伍。

秦二世二年（前 208 年）六月，项梁得知陈胜定死无疑的消息，就在薛县召集诸将商议大计，以便推进反秦斗争。范增特往劝说项梁，要他立楚国的后代，便于争取民心。项梁采纳他的意见，从民间找到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心，立为楚怀王（即义帝），都于盱胎（今江苏盱眙北）。又封陈婴为上柱国，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在此前后，项梁领导的楚军与秦军在今苏鲁豫交界一带多次激战，屡获胜利。八月，项羽、刘邦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大破秦军，斩三川郡守李由。项梁又进占当时东部交通中心名城定陶（今属山东）。于是便有些轻视秦军，表现出骄傲情绪。宋义劝他说：打了胜仗之后将骄卒惰的必败。如今士兵已经有些懈怠，秦军却不断在增加，我很替您担心啊。项梁听后也没有认真注意。宋义奉派出使齐国，路上碰见齐国使臣。他便对齐使说：你将要去拜会武信君，我看武信君必将吃败仗。你走慢些可能躲过，走快了必将碰上这场灾祸。九月，章邯在得到关中大批援军以后，果然在定陶大破楚军，项梁战死。项羽、刘邦等收集余部退保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楚怀王也迁到彭城直接掌握起义军。

章邯在定陶大胜击毙项梁后，认为楚地不用担心了，便渡过黄河北攻赵地。这时陈胜派去的武臣已在内部斗争中被杀，张耳、陈余拥立赵歇为王。章邯大破赵军，占领邯郸，赵歇、张耳退保巨鹿（今河北巨鹿）。章邯命王离等围攻巨鹿，自己率大

军驻扎巨鹿南边保护粮草供应线，作好长期围困的准备。陈余收集赵国北部各地军队数万人来支援，驻扎在巨鹿北边，却畏惧秦军势盛，不敢接战。燕国、齐国派来的援兵，以及张耳的儿子张敖率领的援兵也驻扎在陈余营旁，但全都害怕强大的秦军，谁也不敢带头进攻。王离等兵精粮足，勇猛攻城，巨鹿城内食尽兵少，非常危急。张耳多次催促陈余进兵，陈余却始终按兵不动，徘徊观望。

楚怀王得到赵国求救的消息，也商量派兵。这时，宋义由于预言项梁必败而知名，楚怀王召见听了他的议论后很赞赏，便任命他为上将军，统帅楚军援救巨鹿，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一同前往。楚军行至安阳（今属河南），停留 46 天不进兵。项羽主张火速前进，配合赵军内外夹攻，必能击破秦军。宋义却认为不如坐山观虎斗，让秦赵先决战，秦胜则乘其疲敝攻秦兵，赵胜则乘虚西进占关中。他还针对项羽严令军中说：勇猛果敢但不听指挥的一律斩首。他又派遣他的儿子到齐国任职，还大摆筵席送行。这时正是严寒的冬天，再加上大雨，士兵又冷又饿。项羽愤怒地宣称：本应努力进攻秦军，却在这里久留。现在收成不好人民穷困，士兵们杂食菜粮充饥，军队也没有储备。却不肯渡河到赵国筹粮，配合赵军反攻，还说什么等待秦军疲敝。秦军强大，赵国新立，坐视不救，赵国必破。赵国覆灭，秦军气势更盛，有什么疲敝的机会可乘？国家安危就在这一战，却不体恤士兵，不效忠楚王，专顾私情，不是国家的大臣。一天早上项羽去朝见宋义，就在营帐内砍下宋义的头并号令军中说：宋义勾结齐国共谋反楚，怀王密令项羽将他处死。这时，诸将慑服不敢抗拒，于是共推项羽代理上将军，并派人

报告楚怀王。怀王也就任命项羽为上将军。统领全部楚军救赵。

项羽接过指挥权，立即派出精兵 2 万为先锋渡过漳河援救巨鹿，获得小胜并与守军建立了联系，陈余也请求增派大军。于是项羽亲率全军奋进，渡过漳河之后，他下令打破釜甑、凿沉渡船、烧掉营房，只携带 3 天的干粮，表示勇往直前拚命杀敌誓不回头的决心。到达巨鹿反把王离包围起来，切断其粮道，九战九胜，大破秦军，生俘王离，其余秦将有的被击毙，有的被迫自杀。这时诸侯援军结成 10 几处营垒驻扎在巨鹿城边，却都不敢出战。当项羽亲率楚军纵击秦军时，他们都躲在营垒上观战。英勇的楚军无不以一当十，喊杀声震天动地，他们竟看得心惊胆战。等到打败了秦军，项羽召见诸侯援军将领，他们进入辕门，个个跪下移动行进，不敢抬头观望。从此项羽便成为诸侯联军统帅，诸侯军将领都接受他指挥。这时是秦二世三年（公元前 207 年）十月。

王离所部是原来蒙恬统领的抗击匈奴的精锐部队，这时全被项羽歼灭，秦军士气大减。章邯所部久战疲困，经此打击更无斗志。他派司马欣回到咸阳汇报，赵高拒不接见，吓得司马欣抄小路逃回军中对章邯说，现在赵高当权，下面再怎么努力也是搞不好的。就算打了胜仗，赵高必然嫉恨，打了败仗更免不了受惩罚，希望你慎重考虑。陈余也派人送信给他，指出秦国必亡，他的处境更困难，“有功亦诛，无功亦诛”，只有同诸侯军联合反戈击秦才是唯一出路。章邯这时更加动摇，狐疑不决，便派人同项羽接头。项羽乘机连续进击，屡败秦军，章邯无法，决计投降。项羽因军粮缺乏，也愿意接受投降。秦二世三

年七月,双方在殷墟(今河南安阳)订盟。章邯被封为雍王,留在楚军中,司马欣为上将军,统领归降的秦军为前锋,与诸侯联军一同向关中进攻。从前东方各地民众服徭役路过关中时,经常遭到秦国官民的欺凌侮辱。这时秦军投降后,诸侯联军的官兵趁机报复,也反过来欺压秦降军,使他们心怀疑惧,窃窃私议,埋怨章邯等人。项羽知道后与将领们商量,认为是个隐患,但却不采取妥善办法消除磨擦,反而在新安(今河南淅池)城南乘夜晚发动偷袭,坑杀秦降兵 20 多万人,只留下章邯、司马欣和董翳 3 个光杆司令随同他们入关。这样一来,项羽虽然在军事上取得重大成果,为推翻秦王朝作出了贡献;但是在政治上却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遭到关中人民的切齿痛恨,反为其后刘邦的兴起帮了大忙。

杀降者,而且是杀 20 万降者,这是一件很不得人心的事。在任何的战争中,杀降者只会孤立自己,促使未降之敌采取更加顽强的反抗态度。活埋了这 20 万秦降卒,就等于把他们的父母妻儿以及亲戚朋友,都推向了反秦斗争的对立面,增加了关中百姓对起义军的对抗情绪。项羽的军队入关之后,之所以遭到了关中百姓的抵制,有人讽刺他是“沐猴而冠”,这与这次活埋降卒有很大的关系。

巨鹿之战消灭了秦军主力,秦王朝的灭亡指日可待。而在巨鹿之战的同时,刘邦则率兵乘虚向西攻秦,由于秦军主力在东,刘邦所部一路上所向披靡,于公元前 207 年挥师直抵距咸阳不远的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此时,赵高已杀掉秦二世,拥立二世侄子婴,削去帝号称秦王。不久子婴杀掉赵高,开城投降刘邦。自此,残暴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中覆灭

了。

第三节 楚汉相争

一、刘邦集团在反秦起义中的崛起

鏖战黄河南岸

刘邦率领的西征军兵力异常薄弱，尽管并未遇到秦军主力，但开始四、五个月也只能在河南、山东交界处徘徊，进展不得。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 207 年）二月进至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有个叫酈食其的“狂生”替刘邦策划时指出：你带乌合之众、散乱之兵不满万人，却想直入关中，简直是自投虎口。酈食其建议刘邦攻取高阳附近拥有丰富储粮的交通要冲陈留（今河南开封南），并表示愿意先去说服他熟悉的陈留县令归顺。刘邦采纳了这一意见，果然顺利地占领了陈留，这才得到整顿发展的机会。

刘邦占领陈留后，因为酈食其献计有功，封他为广野君。酈食其的弟弟酈商，在陈胜起义之后，也在当地聚众 4000 人响应起义，这时也在陈留参加了刘邦的起义军。刘邦在陈留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就继续开始西征。

陈留西边的一个重要城市是开封(今河南尉氏县北),刘邦进攻开封,未能攻克。这时酈商率领一支军队进攻开封西的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取得胜利,被封为信成君。

刘邦西进在开封受阻,就向北移动,在黄河边上的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与杨熊率领的秦军相遇,经过激战,杨熊军败走曲遇(今河南中牟县)。刘邦追至曲遇东,又大败杨熊军,杨熊退守荥阳(今河南荥阳县)。秦二世认为杨熊军一败再败,有失军职,派使者在荥阳将他处死。

荥阳是秦在函谷关外设的军事重镇,有重兵把守。刘邦没有再追击退守荥阳的秦军,而是绕开这一带秦军主力,突然南下进攻颍阳(今河南襄城县北),这一带因为有张良活动的基础,所以很快就将它占领了。刘邦攻占颍阳的目的,看来主要是与在这里进行游击的张良会合。

刘邦与张良在颍阳研究了下一步作战的方案。张良向刘邦建议,绕过敌军重兵据守的荥阳,移军西北,攻占战略要地轘辕关(今河南偃师县南),然后再从那里西进入关。刘邦接受了张良的意见,移兵攻占了轘辕关。

这时赵国的将领司马卬,正率领一支军队准备渡过黄河,西进入关。刘邦怕他先入关抢了自己的功劳,就占领了黄河的渡口平阴(今河南孟津县),以阻击赵军渡河。

从轘辕关西进的一个主要敌军据点是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刘邦在洛阳东郊与秦军接战,刘邦军队失利。刘邦如果再绕过洛阳西进,那么他的后方就有占据荥阳、洛阳的敌军,易受前后夹攻,处于被动。如果强攻洛阳后再西进,又会延误西进的时间。刘邦和张良研究后决定,改变入函谷关的打算,

而改由敌军防守比较薄弱的武关(今河南西峡县西)进入关中。刘邦及时地改变西进的路线,看来是完全正确的。

刘邦决定改变西进的路线后,就由洛阳东郊向南进至阳城(今河南方城县)。这里是韩国的故地,他趁机和张良攻占了10余城后,就让韩王成留守阳翟(今河南禹县),以牵制这一带的秦军,帮助自己稳定后方,然后请张良与自己一起,参加西征的战斗。刘邦的部下,善战的武将多,而缺乏懂兵法的高级参谋人员,张良对兵法很有研究,他提出的一些战略战术思想,也很适合刘邦的口味,刘邦这次请张良跟着自己西征,是很有远见的。张良在西征中,也给刘邦出了很多高明的主意,对刘邦很快进入关中,推翻秦朝的统治,起了很好的作用。

秦朝的时候,从当时的关东(今河南、山东一带)进入关中平原,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经过函谷关,另一条经过武关。从函谷关进入关中,路途较短,路也比较好走,是当时的主要通道,所以秦统治者在关内外都设有重兵把守。陈胜起义之后,先派吴广率主力西征,结果在荥阳城下受阻,未能进入函谷关;随后陈胜又派周文率第二支西征军,他绕过荥阳等秦军的据点,很快就进入了函谷关,可惜孤军深入,后来被迫退出关中。这两支西征军都在函谷关附近被敌人消灭了。

从武关进入关中,虽然路远难走,可秦军的防守较弱。陈胜曾派宋留率一支西征军想从武关进入关中,军事进展很顺利,很快就叩武关的大门,可惜宋留中途动摇降秦,也未能进入武关。刘邦一开始也想从函谷关入关,可当他遇到在那里防守的秦兵阻击后,很快改变了入函谷关的决定,而准备由武关入关中。刘邦在兵力有限而时间又很紧迫的情况下,避开敌人

重兵防守的地方,改攻其薄弱地方的决定是正确的。

攻取宛城

阳城属秦南阳郡管辖。刘邦在阳城对军队进行了一些休整后,为了加强军队的机动力量,能尽快地进入关中,就把军中的骑兵集中起来,与秦南阳郡守吕雉,在犍县(今河南平顶山市南)东郊进行了激战,吕雉战败退守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刘邦认为吕雉已是战败之军,怕再进攻宛县会延误进关的时间,就放下宛县不攻,率军继续西进。

张良认为刘邦这种把敌人留在后方,自己冒险前进的战术很危险,万一前面遇到强敌,暂时失利,很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张良就对刘邦说:“你虽然急于要西进入关,但要考虑到现在秦兵还很多,到处都在依险据守,抵抗起义军前进。现在我们没有攻下宛城就西进,前面有秦的强大队伍在抗击我们,如果守宛城的秦军再从后面袭击,我们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刘邦是一个很善于接受别人正确意见的人。他觉得张良的话很对,就马上改正,连夜率军从另一条路返回宛城,并更换了旗帜,在黎明的时候,在宛城守军未发现的情况下,把宛城又包围起来。宛城的守军误认为这是另一支起义军,吕雉感到宛城的再次被包围,起义军不拿下来决不会再撤走了,觉得守城无望,就想自杀。

吕雉的部下陈恢,见郡守对守城失望了,想自杀殉职,就劝他说:“你不要忙于自杀。我再想一想解救的办法,如果无效,你再自杀也不晚。”

陈恢有什么高招呢？他只不过想借反秦起义军急于入关的机会，为吕雉的投降讨价还价。陈恢逾城到了城外，找到了刘邦，向刘邦建议说：“我听说你在西征时，楚怀王有约在先，先入咸阳者封为王。宛县是南阳郡的都城，南阳是个大郡，下属有县城数十座，人口众多，积存的粮食也很多。现在郡守自认为投降起义军，必然会被处死，所以不投降，要坚决死守宛城。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强攻宛城，必然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一时也难以攻下；如果你不攻下宛城继续西征，宛城郡守必然会率军在后边进攻你。在此形势下，你如果强攻宛城，就延误了先进入关中占领咸阳的机会；如果放弃宛城不攻而西进，又有强敌在后，随时有前后被夹攻的危险。为了解脱你现在进退两难的处境，我向你建议，最好的办法是劝宛城的守军投降，封其郡守为起义军的官吏，让他为起义军驻守这里，还可以征调他的兵马，为起义军西征出力。你如果在宛城这么办了，秦在其他地方的守城将领，听到起义军来了，就都会争着开城门欢迎你，你不用费一兵一卒之力，在西征的路上就会畅通无阻，很快到达咸阳。”

陈恢看来既了解刘邦的处境，又很熟习当时秦朝地方官吏的思想和心理状况。秦的一些地方官吏，已经看到秦统治即将瓦解的形势，他们之所以还拚死反抗起义军，是因为过去为秦统治者卖命，作恶多端，怕得不到起义军的谅解，对他们进行报复。陈恢的话，再一次提醒刘邦，在西征中要加强政治攻势，不能光依靠武力解决问题。所以刘邦很高兴地接受了陈恢的意见，接受宛城的投降，封吕雉为殷侯，还封陈恢为千户。这样就不但没有因为攻宛城损失兵力和耗费时间，反而从宛

城得到了军事和物资上的支援。

刘邦在宛城的这一封秦的投降官吏为侯的做法，很快就传到其他秦的地方官吏中，对秦的统治起了政治上的瓦解作用。本来秦的一些地方官吏在强大的反秦起义浪潮中，正感到走投无路时，刘邦的这一做法，给他们指明了政治前途和出路。从此以后，刘邦的西征就很顺利，西征军所到之处，秦的地方官吏纷纷不战而降。

刘邦的西征军接着又攻丹水（今河南淅川县西），秦守将高武侯戚鳃、襄侯王陵投降。丹水已经靠近武关，但刘邦没有从这里马上进攻武关。他为了解除后方可能的威胁，又向东南进攻胡阳（今河南唐河县南），在这里遇到参加反秦起义的秦番阳令吴芮派来的进行反秦活动的部将梅黢。梅黢和刘邦的军队采取联合行动，迫使析县（今河南淅川县北）、酈县（今河南南召县南）的秦守军投降。这样，刘邦就基本上清除了在南阳郡的秦朝力量，为西入武关稳定了后方。

刘邦在进入武关前，一方面派魏人宁昌为使者，去劝说秦二世投降，但使者被秦二世扣留，未起作用；另一方面，为了争取进入关中后，得到秦百姓的支持；减少进军的阻力，刘邦在这时整顿了军队的纪律，约束部下不得烧杀抢掠。这些都为刘邦入关后的胜利进军，创造了条件。

刘邦从碭县出发西征之后，占领宛县是继占领陈留之后，取得的第二次大的胜利。这两次胜利都是依靠计谋和政治攻势取得的，因为刘邦当时的兵力有限，如果单纯依靠军事行动，肯定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战果。这说明由于秦统治者的残暴和不得人心，也由于全国反秦斗争的高涨，秦的统治实际上已

临近瓦解。

宛县是南阳郡的郡治所在，它是刘邦西征中继颖川郡的阳翟外，占领的第二个郡的首府。但颖川郡是个小郡，地位远不如南阳郡重要。所以刘邦占领宛县，不但打开了进入武关的门户，在政治上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破武关取峽关

武关在河南和陕西的交界处。刘邦占领了南阳郡以后，武关就完全暴露在刘邦军队的面前。

刘邦正准备进攻武关的时候，章邯的大军向项羽投降了。这两件事都促进和加剧了秦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秦的丞相赵高为了控制秦二世，达到他专权的目的，一直不把秦军在前线失利的情况告诉秦二世。章邯的投降，对秦统治者震动很大，赵高怕再也瞒不住秦二世了，就制造了一次宫廷政变，先发制人，杀了秦二世，立他哥哥的儿子子婴为秦王。赵高为了求得缓兵之计，就派使者到刘邦处，表示愿意和他分王关中。

刘邦研究了秦使者的意见，认为赵高在耍花招，并不是真心想投降，决定不予理睬，继续进攻武关。

在研究进攻武关的战术时，张良认为，武关地形险要，一夫当关，万夫难攻，不宜采取强攻的办法。他建议让酈食其和陆贾带着大量财宝，去贿赂守武关的秦将，松懈其斗志后，趁其不备，再突然进攻，可能比较省力。刘邦采用了张良的办法，果然一举攻下了武关，打开了进入关中平原的南部大门。

新立的秦王子婴，听说赵高与刘邦相约，要消灭秦宗室子

孙，与刘邦分王关中，就设计诱杀了赵高，并纠集最后的一点兵力，在峽关（今陕西蓝田县东南）设防，企图作阻止刘邦西进的最后挣扎，但是已经太晚了。

峽关前据峽岭，后枕蕞山，关城设在山口的险要处。刘邦破武关以后，一路没有遇到秦军的阻击，进展很顺利，见到峽关有秦军把守，就想派两万人马，立即强攻。

张良认为峽关很险要，秦又派重兵把守，他们必然会做殊死战，不同意立即派兵强攻。张良先派人做了一些侦察以后，就对刘邦说：“秦的守军作战能力很强，不可轻视敌人，强攻会使我们受到损失。我了解到峽关的守将是个屠夫的儿子，商人都很看重利。你最好留在大营中坚守，派出少量的先头部队，让他们带5万人的食具，以为疑兵；再在周围的山上，张旗鼓噪，做出要大举进攻的样子；然后再派酈食其带上重金，去见秦的守将，以利引诱他投降。”

张良的计谋果然很灵。秦将是个贪财之徒，他得了酈食其送来的大量财宝，又看到刘邦军队咄咄逼人的进攻之势，觉得坚守不如投降对自己有利，就表示愿意投降，与刘邦合军西击咸阳。

刘邦听到不费兵力，峽关的秦军就投降了，很高兴，准备举办投降的仪式。但是张良觉得其守将虽然被收买而叛秦，可他的部下不一定服从。如果部下继续抵抗，打起来就要拖延时间。于是他又向刘邦建议说：“不如趁秦将欲投降，军事上松懈无戒备的时候，突然发动进攻，必然可以很快击败秦军，拿下峽关。”

刘邦认为张良说的有理，就一方面与秦将继续谈判有关

投降的事宜，一方面偷偷派兵从小路绕过峽关，爬上峽关后的葭山，然后突然前后夹攻峽关的秦军，很快占领了峽关。

峽关败退的秦军，又匆匆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设防，准备再作垂死的挣扎。刘邦的军队追到蓝田北，再次击败秦军。刘邦消灭了秦朝的最后一支防卫军队后，进军咸阳的路就全部打开了。

刘邦拿下武关和峽关，都是按照张良的意见，用重金贿赂了守将后，趁其松懈而不备，突然发动进攻，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武关和峽关对秦朝统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军事要地，其守将一定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可是他们在大敌当前时，都置秦统治者于不顾，接受了敌方的贿赂。按秦律，守将接受敌人送的东西是要处死刑的，可是他们在金钱的诱惑下，都敢犯这条法律，这说明秦统治集团已经非常腐败了。看来张良对秦统治集团中的这一腐败情况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才一而再地建议刘邦采取这个办法，而且都收到了效果。

约法三章

公元前 207 年 10 月，刘邦率军顺利地进到咸阳。这时，秦王朝内部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三年来，赵高施展种种阴谋手段，玩秦二世于掌中，最后控制了秦王朝，独揽大政，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自以为聪明得计，其实这样的倒行逆施恰好是自掘坟墓。正是他的胡作非为，瓦解了秦王朝的统治机构，促成了章邯等秦军统帅的投降，葬送了秦军主力。从刘邦入关的进展情况也可以看出，秦王朝的覆灭完全由于政治上解体。单从军事力量上较量，刘邦

连夺取一座中等城市也很困难，根本谈不上远征关中。但是，他进军沿途的秦王朝地方长官却是人人自危，各怀鬼胎，只求如何保住性命，无心抵抗。所以当刘邦一采取招抚为主的方针，发动政治攻势，局面顿时改观，各地大都望风归顺，进展十分迅速。不妨说赵高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有利于农民起义军推翻秦王朝。

等到秦二世三年八月，以刘邦、项羽为主力的农民起义军进逼关中时，赵高哄骗秦二世的“关东盗无能为”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他只好请病假不去朝见秦二世，二世派人责问赵高，赵高害怕被杀，便把他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和弟弟郎中令（皇宫警卫队长）赵成找来策划政变。他们借口捕贼，让阎乐领兵 1 千多人来到皇宫，通过赵成为内应驱散宫廷警卫，抓住了秦二世。死到临头的秦二世竟然提出什么“愿得一郡为王”、“愿为万户侯”直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种种愚蠢可笑的要求，当然全都落空，被迫自杀。赵高于是召集朝臣宣布秦二世罪状，并说：秦本来是王国，始皇统一天下改称皇帝。现在六国都恢复了，秦只保有关中一隅，还是恢复称王为好。于是打算拥立公子婴为秦王。但是赵高是靠秦二世而上台的，他这样把秦二世当作替罪羊抛了出来，岂能遮掩得过？几天工夫，公子婴便设法诱杀赵高并夷其三族，野心家阴谋家终归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遭到应得的惩罚。不过，风雨飘摇的秦王朝经过这一番折腾更是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

刘邦的军队在公元前 206 年占领秦都咸阳。公子婴只当了 46 天秦王，刘邦的军队便首先到达霸上（今陕西西安东南），子婴请求投降。有人建议把他杀掉，刘邦说：楚怀王所以

派我攻关中,就是认为我能宽大处理问题。现在敌人已服罪投降,杀掉不好。于是接受其投降,把子婴交官吏看守起来等候处理。刘邦进入咸阳,看到秦宫中华美的陈设,漂亮的妇女,以至金银珠宝猎狗骏马等等享乐的东西成千上万,就想住下来快活一番。樊哙批评他说:您是想夺取天下,还是想当个富翁?我看这些奢华的东西正是秦王朝灭亡的祸根。希望您赶快回军霸上,不要在秦宫停留。刘邦恋恋不舍,哪里肯听。张良也说:正因为秦朝皇帝这样胡搞,您才能来到这里。如果您一来又喜欢这一套,那就是帮着坏人干坏事了。“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您应当听从樊哙的意见。刘邦这才把宫室府库一一查封,回到霸上军营中。

回营后,刘邦又召集父老集会,公开宣布:诸位受秦王朝严酷的法令迫害多年了!我国诸侯有协议,先进关中的就在关中称王,我应当为关中王。我同诸位只约定法律三条:“废除秦的严刑苛法,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我这次来是为父老们除害的,绝不会“侵暴”,请大家不用害怕。我现在驻军霸上,是等待诸侯联军到达后共同商定善后处理办法。这就是著名的“约法三章”。于是他派遣使者配合秦王朝原有地方官吏把这些意思通告各地,秦地民众听了非常高兴,争先恐后地奉献牛羊酒食劳军。刘邦又推辞不接受,说是仓库储积很多,军队不缺供应,不要破费大家。民众更加喜欢,唯恐刘邦不能留在关中当王。这些正确的政策措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同时,有远见的萧何在进入咸阳后,又先把秦丞相府的律令图书收集起来,这些做法,对以后楚汉相争的胜败都有重要意义。

二、楚汉相争

函谷争夺

刘邦在西征中，遇到的都是秦的地方守军，所以没有象项羽率领的北部军那样，与秦军的主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刘邦的军队直到进入咸阳的时候也只有 10 万余人，他之所以能用这点兵力就长驱直入，一路上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就打到秦的首都咸阳，正是因为项羽在巨鹿击败和歼灭了秦军的主力，才给他创造了这样的有利条件。项羽不服气他首先进入咸阳也就是这个原因。

刘邦进入咸阳后，一位姓解的儒生向他建议说：“关中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地形也有利于攻守。听说章邯已率秦军投降项羽，被封为雍王，就要王关中。他们来了，关中恐怕你就王不成。为了占有关中，你应急派重兵占领函谷关，不让项羽的军队进关，然后再征发关中兵以增强力量，就可以拒项羽于关外，关中就是你的地方了。”刘邦听了他的建议，就派兵去镇守函谷关。

项羽在新安活埋秦降卒 20 万后，就直奔函谷关而来。刘邦派来守关的军队，发现项羽的军队后，就紧闭关门，不让项羽的军队入关。

项羽见关门紧闭，派人一打听，知道刘邦已破咸阳，推翻了秦的统治，函谷关的守军正是刘邦所派。项羽见刘邦公然敢拒自己于关外，十分愤怒。他知道函谷关十分险要，正面强攻

会延误入关的时间，就派英布率领一支小分队，由小道绕到关后，突然从关后发动袭击，前后夹攻刘邦在函谷关的守军，很快就攻占了函谷关。

项羽的军队入关后，就再也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急行军至咸阳郊区的戏下，驻军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项王营村），和驻军霸上的刘邦形成对立之势。

项羽消灭刘邦镇守函谷关的军队，这是项羽和刘邦之间对立的起始，也是他们之间进行军事斗争的开始。在项梁领导反秦斗争时，经常派刘邦和项羽配合起来进行军事行动，他们之间合作得很好，成为反秦斗争的战友。以后奉楚怀王之命，一个率军北上救赵，一个率军西征，从总的战略上说，这两支军队在反秦斗争上也是密切配合的。可是秦的统治推翻不久，这两支反秦斗争的主力军队一接触，马上就变友为敌，成为新的敌对力量。

如果刘邦不听解生的建议，不派兵去镇守函谷关，刘邦和项羽就不会发生敌对的军事行动吗？其实，不然。因为它只可能延缓他们之间的对立，而不可能消除这种对立。推翻秦的统治之后，谁是未来王朝的统治者？刘邦和项羽作为当时两支最大的军事力量，谁也不会甘心于服从对方的指挥，他们必须经过一番军事和政治上的较量后，胜利者才有可能成为新的王朝的统治者，而失败者也才能退出历史的竞争舞台。所以即使刘邦没有派兵镇守函谷关，项羽在进到咸阳之前没有与刘邦发生军事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不能缓和或消除，迟早会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除非刘邦放弃争夺天下的念头，甘愿臣服于项羽。刘邦当然是不会放弃他的政治抱负而屈从于项羽

的，所以刘邦与项羽之间的斗争，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刘邦派兵镇守函谷关，只是提前触发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可是刘邦既然接受解生的意见，派兵去镇守函谷关，为什么又没有派得力的将领率领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甚至在关内外的一些军事要地都没有驻兵把守呢？这说明刘邦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思想上是犹豫不定的。

从刘邦进入关中后的一系列措施看，他是想占领关中，解生的意见正合他的口味。可是他也知道，从当时的力量对比看，他想把项羽拒之关外，还做不到。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他才一方面派了一支军队去驻守函谷关，但并未派重兵把守，使得项羽能一攻就破关。

刘邦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既然知道无法抵抗项羽入关，就不应该派兵据守关口。过早地挑起与项羽的矛盾，这对处于劣势的刘邦是不利的。刘邦在占领咸阳后，为了安全上的需要，当然可以派一支军队去镇守函谷关。在项羽来到关门后，如果打开关门对项羽表示欢迎，就可能不会发生以后的鸿门宴，刘邦与项羽矛盾的爆发可能延缓或推迟，从而刘邦也就能取得更加有利的斗争环境和条件。

曹无伤是刘邦的左司马，就听说项羽对刘邦不满，要发兵进攻刘邦时，为了给自己找后路，就想暗中巴结项羽，取得项羽的好感。

当时项羽有兵 40 万，号称 100 万；刘邦虽然自称有 20 万人马，实际上只有 10 万。曹无伤估计，如果项羽和刘邦打起来，刘邦肯定敌不过项羽，为了趁早讨好项羽，求得项羽对自己的理解，以后项羽能封自己官职，就偷偷派人去对项羽说：

“刘邦想当关中的王，让投降的秦王子婴为相；秦朝的珍宝都归他所占有了。”

曹无伤的话更激怒了项羽，这时范增也趁机劝项羽说：“刘邦在山东的时候，贪财好色，没有大的政治抱负；可是他进入关中后，一反常态，秦朝的大量珍宝，他一点儿也没有动；秦宫中的数千美女，他一个也没有要。从这个变化看，他已经立下大志，想当皇帝。现在他羽翼尚未丰满，要尽快对他发动攻击，消灭他的力量，千万不可失去这个时机。”项羽接受范增的意见，下令连夜给将士们开饭，准备天一亮就进击刘邦。

项羽的叔父项伯，年轻时因为杀人，逃到张良处，曾受到张良的保护，所以一直很感激张良。他见项羽连夜备战，准备第二天攻打刘邦，担心在刘邦那里的张良跟着刘邦受害，就连夜偷偷跑到张良那里，告诉他项羽要攻打刘邦的情况。项伯估计刘邦打不过项羽，为了免于受害，劝张良连夜跟着自己逃走，不要跟着刘邦送死。

张良一听项伯的劝告，十分吃惊。他觉得刘邦对自己不错，在他危急的时候逃走，太不够朋友。张良就对项伯说：“我受韩王命令跟着刘邦反秦，现在刘邦危急，不告诉他一声而自己逃走，太不够义气。”于是张良马上去见刘邦，把项伯讲的情况报告给他。

刘邦听了张良讲的情况，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他问张良：“这该怎么办呢？”张良反问他：“你真想背叛项羽吗？”刘邦老实回答：“解生对我说，派兵守住函谷关，不要让项羽入关，我就可以在关内称王。我是听了他的话才干的。”张良又问：“你自己考虑，能敌过项羽吗？”刘邦反复考虑了很久才回

答说：“敌不过项羽。可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张良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请你去见项伯，说明你并没有背叛项羽之意，不知他信不信。”刘邦又问：“你怎么与项伯认识的？”张良说：“我们在秦朝时就是好朋友。有次项伯杀了人，是我救了他。现在有急事，所以特意来告诉我，怕我受害。”刘邦又问：“项伯与你比谁的年纪大？”张良说：“项伯比我大。”刘邦说：“你把项伯请进来，我要以兄长的礼对待他。”

张良出来请项伯去见刘邦。项伯因为是偷偷来关照张良的，怕见了刘邦后张扬出去，项羽知道了对自己不利，所以不愿见刘邦，但张良硬是带着他去了。刘邦见了项伯，对他很恭敬，以兄长礼对待，向他敬酒祝寿，还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项伯的儿子为妻，两人结为亲家。

刘邦与项伯客套了一番交情后，就向他表白自己的心意说：“我进入关中后，安定吏民，封存府库，什么东西都没有敢动，就是等候项羽进关后处理。之所以派兵去把守函谷关，目的并不是抗拒项羽，而是防备其他的盗贼。我日夜都在盼望着项羽的到来，哪能反对他呀！请你代我向项羽言明，我决不会背叛他。”项伯觉得刘邦说的很诚恳，就相信了他的话，并表示愿意向项羽转达他的意思。可是项伯觉得如果刘邦不亲自向项羽解释，还是难于消除项羽对他的误会，所以他向刘邦建议：“明日一早来拜会项羽，亲自向他说明情况。”刘邦答应了。

项伯连夜又从刘邦那里返回鸿门，找到项羽，把自己会见刘邦的情况向他作了报告，转达了刘邦的意思，还帮着刘邦对项羽说：“如果刘邦不先攻击关中的秦军，你能这么顺利地进入关中吗？刘邦在反秦斗争中有大功，你出兵攻他是不义之

举,不如解除误会,还是与他和解为好。”项羽这时显得很没有主见,他听了项伯的一番话后,就相信了刘邦,决定第二天不再出兵打刘邦。

从当时军队的数量和战斗力来看,刘邦远不是项羽的对手,所以项羽出兵打刘邦,刘邦十有九会被击败,甚至可能溃不成军,再也形不成一支力量。如果是那样的话,项羽分封之后与他对抗的,就不再是刘邦,而是其他的力量了。只是因为项伯与张良的私人交情,项伯连夜采取了一些个人的行动,他的行动是违反当时的军纪的。可正是这一违纪的偶然行为,消除了迫在眉睫的一场大战,才使刘邦的力量得以保存下来,成为项羽日后的主要劲敌。

这场战争的消除虽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从刘邦与项羽来说,也有一定的必然因素。刘邦的最大优点是能屈能伸,当他估计到形势对自己不利时,可以做出低三下四的屈辱可怜样子,以取得对方的同情。在这次事件中,他一听到项羽打自己,而自己又不是项羽的对手时,他可以马上降低身份,对项伯献各种殷勤,争取项伯的同情;接着又冒可能被项羽扣留或杀头的危险,亲自去拜见项羽,以求得项羽的信任。而项羽是一个在性格上没有主见的人,容易感情激动,也易于轻信人言,改变自己的主意。他听了曹无伤的话,马上就要发兵打刘邦;听了项伯的话后,又立刻改变了打刘邦的决定。项羽在性格上的这种不坚定性,与刘邦的善于随机应变一接触,项羽就会因为轻信刘邦的花言巧语而受骗上当,而刘邦却可以利用项羽的不坚定性,投其所好,轻而易举地改变项羽的决定。刘邦与项羽在性格上的这种不同反差,是导致刘邦以弱胜强的

一个重要心理原因。

项羽自恃功高，要主宰天下，便派人向楚怀王请示。楚怀王坚持“如约”，即“称先入关中者王之”，触怒了项羽。于是，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将他远徙江南，都于郴县（今湖南郴县）。

公元前 206 年二月，项羽称王诸事安排停当，遂以“灭秦定天下者”自诩，大搞起裂土分封。他自立为西楚霸王，以梁、楚九郡作为自己的领地，都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并凌驾于其它诸侯王之上。

与此同时，项羽分封 18 个诸侯王，分王各地。他首先撤毁楚怀王与诸将约，不让刘邦据有关中，而将他改封为汉王，使之统辖巴、蜀、汉中一带，都于南郑（今陕西汉中）又将关中地区三分其地，立秦降将章邯为雍王，统辖咸阳以西，都于废丘（今陕西兴平南）；立秦长史司马欣为塞王，统辖咸阳以东至黄河，都于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立秦都尉董翳为翟王，统辖上郡，都于高奴（今陕西延安北）。这三人分王关中，称为“三秦”，以便阻止刘邦东进。

此外，立魏王豹为西魏王，统辖河东，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立申阳为河南王，统辖河南部分（三川郡一带），都于洛阳（今河南洛阳东）；韩王成封号不变，统辖原韩国部分地区，都于阳翟（今河南禹县）立司马卬为殷王，统辖河内，都于朝歌（今河南淇县）；徙赵王歇为代王（今山西北部）；立张耳为常山王，统辖原赵国，都于襄国（今河北邢台附近）；立英布为九江王（今安徽、江西一带），都于六县（今安徽六安北）；立吴芮为衡山王（今河南、安徽、湖北一带），都于邾县（今湖北黄冈

北);立共敖为临江王(今湖北地区),都于江陵(今湖北江陵);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都于无终(今河北蓟县);立臧荼为燕王,都于蓟县(今北京市);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都于即墨(今山东平度济东南);立田都为齐王,都于临淄(今山东临淄北);立田安为北王,都于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

项羽分封大功告成,以为从此高枕无忧,便回彭城去了。然而他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一些诸侯王的不满,一场诸侯之战,重新开始了。

火烧咸阳

鸿门宴后,项羽认为刘邦已经归服,自己理所当然地已成为反秦力量的主宰。于是,刘邦进入咸阳后没有敢干的事,他毫无顾忌地去办了。他带领自己的大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咸阳,放纵士兵进行烧杀抢掠。他杀了秦降王子婴和秦的全部宗室家族,对秦统治者进行了报复。他把秦宫室里的珠宝和后宫的美女据为己有,然后放了一把大火,全部烧了秦的宫室。大火烧了3个月才熄灭。

除了珍宝和美女外,他对秦的一切都很反感,都存在报复的心理,都想将它们毁掉。经过他的这一番烧杀,繁华壮丽的秦都咸阳,就变成了一片废墟。这时有人出来劝项羽说:“关中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东有函谷关,南面武关,西临散关,北隔萧关,四周都以山河为塞,退可以守,进可以攻,是建都称霸的好地方。”可是这个意见提得太晚了,经过项羽的一番报复性的烧杀抢掠,这时的咸阳已经残破不堪,富饶的关中也已非昔日。

项羽活埋了 20 万秦降卒，又在咸阳一带大肆烧杀抢掠，关中的父老兄弟当然对他很反感。这时有人说：“人们都说楚国人象猕猴，性情暴躁不定，不能久著冠带，项羽果然是这样，他长久不了。”这个话传到了项羽的耳朵中，他很忿怒，找到了说这个话的人，把他杀了。

项羽觉得关中的百姓对他持敌视的态度，虽然关中富饶，他却不愿久留关中，因思念故乡，于是决定离开关中，东归故乡。他对别人说：“一个人富贵了，如果不回到家乡，就象夜里穿着绣花的衣服行走一样，谁也看不见，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项羽愿意不愿意留居关中，这本来是他个人的一种趋向。但是由于他不愿意留在关中，又对秦统治者的一些遗物采取了报复性的毁灭态度，结果将秦统一全国后集中在咸阳一带的大量经济和文化的财富，毁于大火，这对中华民族经济和文化的积累和发展，无疑是一个不可挽救的重大损失。特别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后，一些古代的文化典籍在民间流传已经很少，但在秦宫室和政府机构中，仍有大量的保存。如果项羽对咸阳秦的遗留物品，采取稍为克制和宽容的态度，不去有意用大火加以焚毁，就会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到了汉初开国之时，也就不会因为寻找和恢复一些古籍，要凭老儒靠记忆而口授，费那么大的劲，又给后世研究和校阅古籍造成那么大的困难了。所以项羽对咸阳的烧杀抢掠，不管是从政治上争取秦人的支持，还是从经济和文化的延续发展上，都是做了一件绝大的蠢事，对他自己和后世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烧绝栈道

项羽分封完之后，就要各个诸侯王去自己的封地就国。刘邦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分封，不想去就国，但又迫于项羽的威力，暂时还无法与项羽对抗，又别无其他出路，只得去巴、蜀、汉中一带就汉王的封位。他任命萧何为丞相，带着自己的部下和亲信，从霸上出发，向汉中一带进发。

刘邦这时有 10 万大军，项羽为了限制刘邦的力量，只允许他带 3 万人马。可是刘邦的亲信和部下很多，他们都愿意跟随刘邦去汉中，还有一些楚国和各路诸侯中敬慕刘邦的人，也主动表示愿意跟他去，所以跟随刘邦去汉中就国的远远超过了项羽限定的 3 万人。

由关中进入汉中、巴、蜀一带，道路很难走，刘邦选择了由杜县（今陕西户县东）南下入蚀中（今陕西洵河上游）越过秦岭进入汉中平原的路。张良因为要随韩王成去就国，所以不能跟随刘邦到汉中。但张良对刘邦依依舍不得离开，一直把刘邦送到褒中（今陕西城固一带）。张良临别时，刘邦送给了他很多珠宝，张良后来都转送给了项伯。

到了褒中，刘邦一再请张良不要再远送，张良只得与刘邦告别。临别前他向刘邦建议说：“你去汉中的路上，经过不少栈道，都是交通险要之处。你应把所过的栈道都烧绝，一方面可以防止项羽或其他人的军队再进入汉中；另一方面也可以示意项羽，你并无再返回来的打算，使项羽不再对你有所警惕。”刘邦接受了张良的意见，把所经过的栈道都烧毁了。消息传到项羽那里，他就开始放松了对刘邦的戒心，刘邦因而得以安心

在汉中、巴、蜀一带蓄积力量。

栈道是秦岭山脉中一些险要的地方，人们难以通行，就旁凿山崖，铺以木头板梁，人工修筑的通道。刘邦把这种栈道的木制板梁烧毁，就可以断绝入汉中的通路。所以烧绝栈道，只是暂时迷惑项羽的缓兵之计。

项羽分封之后，一些不满分封的诸侯王，不去就国而反叛项羽，使项羽一开始就处在被动之中。而项羽的主要对手刘邦，却老老实实地去封地就国，还按照张良的意见，边走边烧绝栈道，以转移项羽的视线。这是刘邦的高明之处。

因为分封之后，项羽最注意的当然是刘邦的动向。刘邦如果不去就国，项羽马上就会集中力量对付刘邦。现在刘邦不但去就国，而且烧绝栈道以表示无归意，表面上服从项羽的分封，这就可以转移项羽对他的注意，使项羽误以为刘邦并无与自己争天下的意图，因而对刘邦失去警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刘邦达到了麻痹项羽的目的。

其实，刘邦去汉中就国，本身就起到了消除项羽对他敌意的作用，张良的建议烧绝栈道，只是进一步强化了对项羽的影响。即使刘邦不烧栈道，只要他去汉中就国，项羽也不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因为项羽一到彭城，他已无暇顾及远在汉中的刘邦了。

韩信拜将

刘邦到了南郑后，因为部下的将士大多数是山东一带的齐国和楚国人，他们不服这里的水土，又思念故乡，情绪很不稳定，一些人常聚会在一起齐唱家乡的歌曲。一些士兵不愿再

跟着刘邦呆在南郑了，纷纷逃亡，跑回了自己的家乡；将领逃亡的也有数十人。韩信见此情形，十分着急，就向刘邦建议说：“项羽分封有功的诸将为王，而独封你来南郑这个边远的地方，这是对你的报复。你的将士都是太行山以东一带的人，他们日夜思念返归故乡，你利用将士们这种思乡的情绪，可以所向无敌，建立大功。等到天下安定，人们都想安居乐业生活的时候，就再也难组织起这么一支能战的军队了。你应当赶快决策东下，与项羽争天下。”韩信这时只是刘邦部下的一名治粟都尉，他的话没有引起刘邦的重视；韩信觉得跟着刘邦在南郑没有前途，也就随着别的将士逃亡了。

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市）人，自幼因为家贫，倍受人欺辱。项梁率起义军渡淮河时，韩信带着一把剑参加到项梁的起义军中，是一个无名小卒，一直未受重用。韩信曾多次向项羽献计策，都未被采纳，所以韩信对项羽很不满。刘邦去就汉王时，他听说刘邦很重视人才，就叛项羽而随刘邦到了南郑。他曾犯法当斩，刘邦的亲信夏侯婴恰好路过，韩信对夏侯婴大喊：“刘邦不是想争天下吗？为什么要杀我这样的壮士！”夏侯婴停下来问了他几句话，觉得韩信很有才干和见识，就救他不死，并向刘邦推荐，当了治粟都尉。这是一个专管后勤粮草的小官，刘邦还未认识到他的才干。

刘邦的丞相萧何曾与韩信交谈过几次，认为韩信是一个奇才，很佩服，他曾几次向刘邦推荐加以重用，都未被刘邦所接受。萧何一听说韩信也逃走了，怕刘邦失去这一奇才，来不及向刘邦报告，马上亲自去追赶。有人见萧何向将士逃亡的方向赶去，不了解真相，就急忙向刘邦报告说：“萧丞相也逃走

了。”萧何一直是刘邦的左右手，深到刘邦的信任。刘邦去南郑就汉王位，也是萧何出的主意。刘邦料想不到现在萧何也逃走了，这无疑对刘邦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和打击。刘邦觉得萧何太不够朋友了，所以听到萧何逃走的消息，心里十分愤慨。

过了两天，萧何回来了，他去拜见刘邦。刘邦一见萧何，心里十分高兴，外表又装出很愤怒的样子，责问萧何说：“你为什么也要逃亡呢？”萧何回答：“不是我逃亡，我是去追赶逃亡者。”刘邦又问：“你追谁去了？”萧何答：“韩信。”刘邦一听是追韩信，又火了，骂萧何说：“将领逃亡的已经有数十个，你一个也没有去追赶过；你说是去追韩信，怎么会让人相信呢！”萧何趁机又向刘邦推荐韩信说：“别的逃亡将领，都是普通的才干，容易得到，唯独韩信，在我们这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才。你如果想长期当汉王，就用不着韩信这样的人才；如果要争天下，没有人比韩信更值得依赖了。请你决定自己到底想走什么路，然后再决定用不用韩信。”刘邦说：“我当然愿意东进而争天下，哪愿意长久呆在这里呀！”

萧何看见已见成效，就趁热打铁地说：“你既然决心东进争天下，如果能重用韩信，就能留住韩信；如果不加以重用，韩信迟早还会逃走的。”刘邦见萧何这么推重韩信，就向萧何保证说：“好，我听你的话，这就任命韩信为将。”萧何认为刘邦虽然下决心要任命韩信为将，但并未充分认识韩信的價值，所以又说：“你下决心要任命韩信为将，虽然你认为已经给他很高的地位，够重用他的了，但我认为你这样做还是留不住韩信。”刘邦又提高一步说：“那任命他为大将呢？”萧何认为火候已到，就拍案说：“你有这么大的气魄，太好了！”

刘邦为了向萧何表示自己重用韩信的诚意，就想说到做到，马上派人把韩信请来，任命他为大将。萧何见刘邦任命一个大将这么草率，说明他还没有充分认识韩信的可贵价值，就阻止他说：“你的缺点是对人傲慢无礼，不太尊重人才。现在任命一位大将，就象召唤一个小孩一样，这么不严肃从事，韩信仍然会认为你并没有看重他，这正是韩信之所以要逃走的原因呀！你如果真心诚意认为韩信是个大将之才，不可多得，就应选择一個良辰吉日，亲自斋戒，设立坛场，用隆重的礼节拜韩信为大将。这样韩信才会认为你看重他，一心一意为你效力，再也不离开你。”

于是刘邦令将士们清理出一片空旷的场地，用土筑成一个高坛，通知大家说准备拜大将用。一些有功的将领听到要拜大将，人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所以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去参加。到了拜大将的那一天，刘邦沐浴斋戒之后，到拜大将准备好的坛场，很隆重地把韩信请上坛台，宣布任命韩信为大将。别的将领一听，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有想到会是韩信。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治粟都尉，并没有立下多大的战功，平时也未露出有什么才华。刘邦为什么一下子看中了他，拜为大将呢！

举行完拜大将的仪式后，刘邦请韩信上坐，向他请教说：“萧丞相一再向我推荐你，说你很有才干，不知将军有什么高明的计谋，可以供我采用？”韩信感谢了刘邦对自己的任命后，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反问刘邦：“你东进争夺天下的对手，是不是项羽呀？”刘邦点了点头说：“当然是项羽。”韩信接着又问：“你自己敌得过项羽的勇敢强悍吗？”刘邦想了想回答说：“不如项羽。”韩信听到刘邦敢于直说自己的弱点，十分高兴。

他对刘邦说：“我也认为你在这些方面不如项羽。但是我曾经当过项羽的部下，对他有所了解，请你听听我所知道的项羽为人，你就会增强战胜项羽的信心。”

韩信详细对刘邦分析了项羽的以下弱点：

第一，项羽勇敢善战，打起仗来，一声呼喊，能吓得敌人不战而栗，但是他却不能重用好的将帅，所以他只是一个勇敢的战士，而不是一个好的统帅。

第二，项羽对部下很慈爱，说话和气，待人有礼貌，很关心部下，遇到有人生病，总是问长问短，把自己吃的东西分送给病人，如果病死了，他会很悲痛。可是对有功劳的将领，应当封赐爵位时，常常是印信都准备好了，就是拿在手中舍不得授人。所以他只是在小节上能关心和爱护部下，在大的政治上并不能关怀他们，可见他是一个没有政治远见的人。

第三，项羽虽然分封诸侯，称霸天下，但他不居关中这样的要地，反而去建都并不十分重要的彭城；他又背弃了楚怀王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而分封了一批自己的亲信，因为分封不公平，造成了诸侯间的矛盾；各个诸侯见项羽把义帝赶到江南，他们也仿效他的做法，驱逐其主人，自己占领好的地盘称王。所以项羽的称霸，不可能持久。

第四，项羽的军队虽然很多，但纪律不好，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了百姓的不满。他见百姓不支持，就用武力强制，施行高压政策。他虽然名义上称霸全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天下民心，得不到百姓的支持。所以他现在是表面上显得很强大，实质上很脆弱。

韩信上述对项羽的分析，实际上是指明项羽个人虽然勇

悍善战，但得不到部下的支持，所封诸侯也跟他离心离德，更得不到百姓的拥护，所以是不难战胜他的。

韩信在刘邦承认自己弱点的基础上，又用对比的方法，分析了刘邦的长处。认为他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就可以用己之长对敌之短，最终战胜项羽。

韩信把刘邦的长处，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刘邦应一反项羽之道，广招天下武士，发挥他们的才能，充分予以信任；虽然个人不如项羽勇悍，但依靠大家的力量，还有什么不可攻克和战胜的地方。

第二，以天下的城邑，分封给有功的将士，不要象项羽那样舍不得分封和赏赐，那样你的将士就都会佩服你，听从你的命令和指挥，都肯为你打天下卖命。

第三，你的将士都是太行山以东的人。都很思念故乡，想打回老家去。如果能充分利用大家的这一思归故乡的情绪，把大家团结起来，就会战而无敌、败而不散。

第四，项羽在关中分封的 3 个王，都是秦的降将，他们率领秦兵镇压反秦斗争好几年，杀害了无数起义的将士和百姓，又欺骗秦的士兵投降了项羽，结果 20 万秦的士兵在新安被项羽活埋，唯独他们 3 个人不但无事，还被封为王，秦的父老兄弟认为他们出卖了秦的士兵，换取了自己的富贵，所以对他们恨之入骨。现在项羽虽然强封这 3 个人为王，但秦的百姓并不支持他们，他们的地位极不巩固，容易将他们击败。

第五，你入武关之后，军队的纪律一直很好，对秦百姓秋毫无所犯，又废除了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得到了秦百姓的拥护，都愿意你王关中。而且根据楚怀王之约，你本来应当王

关中，这个关中的百姓都知道。项羽不封你王关中，反而失约分封你到汉中去，关中百姓无不对此失望，恨项羽的不公正。你只要率兵东进，关中一带用不着费很大的军事力量，就可以传檄而定。

韩信的上述分析很符合当时的实际，他既指出了刘邦的不足，又看到了刘邦的长处。只要刘邦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攻击项羽的短处，刘邦就有战胜项羽的可能。韩信的这一正确分析，对正在犹豫苦闷中的刘邦来说，无疑是吃了一剂兴奋剂，所以刘邦十分高兴，自认为了解韩信太晚了。他马上按照韩信的计策，部署做东进出击的准备。

其实韩信的 analysis，并没有出人意外的见解，他只不过进一步论证了刘邦东进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强化了刘邦东进的决心。因为在汉中不能久留，必须尽快东进关中，否则刘邦的力量将会溃散，这是刘邦集团中上下一致的看法。但是什么时候东进，东进有没有取得胜利的把握，这在刘邦集团中却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将士的逃亡，就说明有些人再也等不得拖延了。刘邦和萧何等人，当然看出了这一点，但他们顾虑项羽力量的强大，拿不定出兵东进的主意。韩信的 analysis，只是使刘邦尽快地下定了马上出兵东进的决心。从时机上来说，当时的选择是恰当的。如果再拖延，刘邦的力量可能会进一步涣散，关中 3 个王的力量会得到加强，因而迅速占领关中地区就可能不那么容易。如果关中的 3 王得到项羽力量的支持，刘邦不能马上占领关中，再和项羽对峙也就相当困难了。

拜韩信为大将，这是刘邦东进的序幕。张良已经告别刘邦随韩王成去就国，而萧何、曹参等人又不善于军事，刘邦当时

正缺乏有深谋远虑的将才，韩信的被发现和重用填补了这一空缺，对刘邦以后的军事行动有重大的意义。萧何那么重视和向刘邦推荐韩信，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他深知自己不是将才，而刘邦身边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尽管在韩信的将才尚未经过实践验证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显然具有很大的冒险性，但在当时不冒险就难以迈出第一步。

三秦之战

三秦战役发生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八月，刘邦率军进袭中原，击破雍王章邯军的抵抗；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即告降服。刘邦胜利平定三秦，顺利达成其称王关中的战略目的。

项羽与刘邦鸿门相会后，分封诸侯，立刘邦为汉王。建都于南郑。刘邦没有当上关中王，十分恼怒，欲与项羽一决胜负。周勃、灌婴、樊哙等将领极力赞成刘邦起兵与项羽决战。具有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萧何，清楚地了解楚汉力量相差甚为悬殊，项羽正处于兵锋鼎盛之时，若贸然与项羽决战必然百战百败，自取灭亡。所以他极力反对立即决战，主张刘邦先就汉王位，经营巴蜀，整军备战，待力量强大之后，再夺回关中，进而与项羽争夺天下。萧何对刘邦说：“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萧何这种战略上暂时退让，以避楚军锋芒的建议，终于被刘邦接受。于是刘邦忍气吞声入汉中地区就汉王位。项羽为削弱刘邦实力，尽量减少刘邦军的数量，后经张良重贿项伯，并由项伯从中斡旋，项羽才勉强允许刘邦率兵 3 万去巴蜀。于

是刘邦便于汉元年四月前往汉中，萧何、张良等一起随行。不久，刘邦即送张良返回韩国，当刘邦与张良在褒中分别时，张良劝说汉王刘邦烧毁栈道，以向项羽表示永远不再东向的意图，达到麻痹项羽和关中诸王的目的。

刘邦一入汉中，即抓紧时机整军备战，积极扩充实力，储备作战物资，为东进关中准备各方面的条件，其中很重要的是物色了像韩信这样的优秀军事统帅。秦岭山脉雄踞于渭水以南、汉水以北的整个地区，高度由西向东逐渐降低。西部高度大约在 3000 米左右，成为高原状；东部高度逐渐降至 1000 米左右。秦岭和巴山间有汉中平原。这个平原从今勉县到洋县，东西长约 80 公里，南北宽约 10 数公里，汉水流经其间。由汉中进入关中主要的进军路线有三条：

褒斜道：历来称之为北栈道，为秦惠文王派兵取蜀之道。南口称“褒”，在汉中褒城北 10 里。北口称“斜”，在眉县西南 30 里。

傥骆道：其中有大的弯曲道路 40 里，凡 94 盘。南口称“傥”，在洋县北 30 里。北口称“骆”，在周至西南 120 里。

子午道：谷长 330 里，即古之蚀中。汉王往南郑，从杜南入蚀中即经过此道，通过后，放火烧毁之栈道即指此路。

历代南北征战大都以褒斜为主要路线。傥骆和子午两道为次要通路。汉王这次进军如走进入汉中时的老路，那么，首先遇到的严重问题，就是要与章邯主力军战斗。是否能够一举歼灭章邯的雍军，没有绝对把握。如果塞、翟援军达到，就会更加陷于被动不利的局面。新任汉军统帅的韩信，对此已做了深思熟虑的思考，因而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战略，进而决

定：派出部分兵力，明修烧毁的栈道；主力经褒斜以西故道，袭击陈仓再由陈仓向东进攻。

汉军由南郑向关中进军战略，为明修栈道，迂回故道，暗渡陈仓，奇袭关中。曹参、樊哙为先锋，韩信与刘邦率领周勃、灌婴等为本队。为保障长期作战的胜利，刘邦让丞相萧何留守巴蜀，筹集军粮器械，保障前方的供给。

刘邦为隐蔽自己东进关中的作战意图，在送别张良时，即赋予张良麻痹项羽的任务。张良见了项羽说，汉王烧了栈道，决无东返之心。待韩信攻取三秦后，张良又致书项羽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这种周密的东进作战策划，使刘邦军占据了明显的战略优势。

项羽分封章邯为雍王，目的就是堵塞汉军北进的道路，塞王、翟王只不过起支援雍王的作用。雍王章邯将自己军队的主力集结于首邑废丘。在宝鸡、咸阳等地各配备强有力部队，担任对汉军北上堵击的重要任务。三秦军没有统一的作战统帅部，雍军在统帅章邯统率下，担任抗击刘邦军的主要作战任务。塞、翟两年担负支援任务。

汉高祖元年八月，汉军由南郑出发，统帅韩信改变通过“褒斜道”进军路线，转向故道，迂回雍军侧后。曹参指挥前头部队排除雍军抵抗，攻克故道城。汉军通过故道要隘，势如破竹，迅速推进到陈仓附近。陈仓遭到汉军的突然袭击，雍王章邯才感到形势严重，准备立即出战。塞、翟两王也作了支援雍军的相应准备。章邯率军驰援陈仓，汉雍两军于陈仓附近展开交战，章邯军以轻车列阵，汉军樊哙率部猛冲，一举攻破章邯军。雍王军首战失利，分向废丘和好畤两方面撤退。韩信判明，

往废丘撤退的为雍王章邯所率的雍军主力，退往好畤的为雍将章平指挥的一部。废丘为雍国首都，章邯久历征战，废丘城不容易迅速攻拔，若时日持久对军心士气都有影响；好畤为废丘战略侧翼，互为犄角可呼应支援，同时也可等待塞王、翟王援军到达。章平虽然也是能征惯战之将，但兵力不大，如能攻克好畤，废丘就更加孤立。于是汉军决定缓攻废丘，把进攻重点指向好畤。对三秦可能到来的援军只派出一部警戒兵力。汉军分道前进，曹参军追击章平军，于好畤城南发生战斗，章平战败，退守好畤城待援，汉军随即围攻好畤城。当汉军正围攻好畤之时，司马欣派其将军赵贲率军驰援废丘，董翳军也向泾水地区急驰。章邯得到援军后，沿渭水西进，与汉军战于壤乡（今陕西武功东南）附近地区，两军经过激战。三秦军大败，章邯只得率败军再退守废丘。当汉军与三秦军大战时，曹参留周勃军担任对好畤围攻，立即率所部前往迎击塞、翟军，击破三秦军后，复又转向好畤。此际樊噲军也转进到好畤与曹参等部会师。韩信赶到后，统一指挥对好畤的围攻战。樊噲率部奋勇先登，汉军其他各部，蜂拥登城。章平难以力战，被迫撤出好畤，向北地方面撤退，汉军进占好畤城。

曹参以樊噲率部担任围攻废丘，抽出所属部队进攻咸阳。雍军驻咸阳的赵贲和内史保等部起而应战，曹参击破其抵抗攻占咸阳，进驻景陵。支援废丘的塞王司马欣派主力军反攻景陵，经过激战，被汉军击破。章平等率军向漆败退，曹参挥军追击。此时章平军得到章邯及翟王所派援兵的加强，于漆地反击曹参军，曹参军几乎出现力不能支的局面，正在危急之时，周勃率援军赶到。周勃军北攻漆，击破章平、姚卬部，西定汧陇，

还军攻克郿和频阳后，即率军参加对废丘城的围攻战。

灌婴军对塞国首都栎阳进攻。塞王司马欣以主力援雍失败，同时，也由于缺乏备战措施，无力应战，只得向汉军投降。

靳歙军击破陇西方面雍军，平定陇西所属各县。

酈商军击破雍军别将周类据守的乌氏、枸邑、泥阳，进而平定北地郡所属各县，在攻克北地时，俘获了雍军大将章平。

汉军分道进展，兵到上郡，翟王董翳无力对抗，向汉军投降。三秦属地基本平定，汉军转移于对废丘的围攻战。

雍王章邯退守废丘，奋力作战，汉军久攻不下，顿兵坚城。此时汉军在关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形势的发展使汉王刘邦感到必须迅速向东急进，以夺取更大的胜利。但雍国首都又不能不留强大军队继续围攻，以免发生意外，于是，刘邦迅速调整了军队部署。韩信统率强有力部队继续担任对废丘的围攻，刘邦统率部分兵力出关扩展胜利。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六月，废丘城攻守战已经历时 10 个多月，章邯雍军相当顽强，不采取特殊措施，难以攻克。这时汉军东进又出现重大挫折，几乎全军覆没。汉王刘邦回到新占领的塞国首都栎阳，废丘城仍然在章邯军手中。刘邦与韩信为着巩固关中根据地，急于迅速结束废丘城的战事，决定采用引渭水灌城，乘水攻城的战术。樊噲掘开渭水河堤，引水冲击城垣，城墙崩溃，汉军乘势攻进城内。章邯见汉兵进城势不可挡，乃自杀。废丘攻克，雍国属地全部平定。

项羽杀韩王成

韩王成曾协助刘邦的西征军，他的丞相张良又跟随刘邦

进入关中。项羽分封时虽然仍封韩王成为韩王，但认为他是刘邦的人，就以他无战功为名，不放他归封地，而把他带到彭城，先废为侯，后来干脆把他杀了。

项羽杀了韩王成后，听到刘邦占领关中的消息，就封原来秦的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令郑昌为韩王，要他去占领韩地，以抗拒刘邦的东进。刘邦派韩的太尉韩信（与刘邦授大将的韩信不是一个人，后来被刘邦封为韩王），率兵击郑昌，郑昌战败投降。因为韩王成已被项羽所杀，刘邦就立韩信为韩王。

张良与刘邦在褒中告别分手后，就随韩王成到了彭城，他对项羽说：“刘邦去汉中就王时，烧绝了栈道，决心不再东还了。”又把他得到的齐国和赵国联合反对项羽的书信送给项羽，对他说：“齐国和赵国想联合起来消灭项羽。”刘邦占领关中后，他又对项羽说：“刘邦只想如楚怀王约定的那样，得到关中，他不会再东进了。”张良千方百计地想转移项羽的注意力，让他产生主要对手是齐国而不是刘邦的错觉，以减轻刘邦的压力。

项羽是一个易于感情激动的人，他不认为这是张良的挑拨离间计，是在故意庇护刘邦，反而上了张良的当，果然认为齐国是自己的主要对手，集中力量先平息齐国的叛乱，因而为刘邦的发展争得了时间。

张良没有随刘邦到南郑，而随项羽到了彭城，是为了忠于韩王成。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后，他认为自己没有再留在彭城的必要，而且已受到项羽的猜疑，所以就逃出彭城，从小道偷偷跑回刘邦处，成为刘邦身边的重要谋士。这时刘邦已全部占领了关中。

张良是刘邦的忠实支持者，这一点项羽在鸿门宴上应当已经看得很清楚。可是项羽只认为韩王成是刘邦的人，不让他回到封地，还把他杀了。而却轻信张良的一些话，上了他转移目标的当。这说明到这个时候为止，他还没有接受范增等人认为刘邦是他的主要竞争敌手的估价，因而一再在对待刘邦的问题上，做出错误的决策。没有充分认识刘邦的野心和力量，这是项羽一再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杀韩王成对项羽来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项羽如果认为他是刘邦的亲信，当时可以不分封他为王，就是分封以后才发现他是刘邦的亲信，不让他回封地，在彭城将他控制起来也可以，何必非要杀他。张良是忠于韩王的，项羽只要不杀韩王成，他就不会回到刘邦那里，成为刘邦身边的谋士。而项羽杀了韩王成，不但把张良推向刘邦的身边，而且失去了一批韩王成的支持者。这对项羽来说，只能造成自己的孤立，并不能达到削弱刘邦势力的目的。

项羽击田荣

田荣是项羽分封后，首先起兵反对项羽的。齐国紧邻楚国，项羽又受到张良说的刘邦不会再东进的欺骗，所以项羽在齐、汉、赵等国纷纷背叛的情况下，决定首先解决齐国的问题。

项羽出兵击齐前，要他最信得过的九江王英布，亲自率军来参加战斗。但是这时英布已经不那么听从项羽的指挥，他借口自己身体不好，只派几千人的军队，由别的将领率领，去敷衍项羽的命令，项羽因此对英布很不满意。

项羽亲自率大军讨伐田荣，田荣在城阳（今山东菏泽市

东)列队迎战,田荣战败,退守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因为田荣一贯好战,不关心百姓的疾苦,所以百姓都很痛恨他。平原的百姓趁他战败之机,将他杀了。

田荣得不到齐国百姓的支持,项羽本可以利用齐国百姓对田荣的不满,在击败田荣之后,安抚齐国的百姓,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从而稳定在齐国的统治。但项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反而以胜利和征服者自居,不分青红皂白,在齐国的地方到处烧杀抢掠,活埋田荣投降的士兵,虏掠他们的妻女,因而激起了齐国百姓的不满和反抗。

田荣的弟弟田横,利用齐国百姓对项羽的不满,把各地反抗项羽的百姓组织起来,收集溃散在各地的士兵,组织起几万人的军队,又占据城阳反抗项羽。这部分齐国将士,因为受到过项羽军队的残害,又得到齐国百姓的支持,所以个个都拚命守卫城阳,项羽的军队久攻不能下。

这时刘邦的军队乘虚攻入项羽的都城彭城,项羽被迫留下一部分军队继续进攻城阳,自己率主力军回撤。田横趁项羽主力军撤退,消灭了留在齐国的项羽军队,并全部收复了齐国失去的城邑。

田横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自己为相,齐国的一切事情,都是田横说了算。齐国在田横的专权下,国力日趋衰落。

项羽出兵击齐,从当时的整个形势看,并不是最坏的选择。他如果采取速决战,击败田荣后,马上安抚百姓,另立一个亲近自己的人为齐王,然后立即撤兵,再对付其他的背叛者,也是一个上策。它既可作出一个对待和处理反叛者的榜样,也警告其他的背叛者,又不会陷入齐国的战场,这一点项羽当时

完全可以做到。但项羽的报复心太盛，他击败田荣后，还想报复一下齐国的百姓，结果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持久战的困境，造成了刘邦乘虚攻入彭城的后果。他击齐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助长了刘邦的气焰。这是他与刘邦的斗争中，第一次大的失利。

从项羽分封后，诸侯王之间很快就发生了混战，破坏了项羽设置的政治格局来看，他的这次分封是失败的。分封的破坏者，首先是项羽自己。项羽一方面尊楚怀王为义帝，很快又把他杀了，这就是对自己原来行为的否定；项羽分封了韩王成，可又不让他去封地，接着又降为侯，很快又把他杀了，这也同样是对自己的否定。义帝和韩王成都没有什么力量，在当时都构不成对项羽霸主地位的威胁，项羽即使对他们不喜欢，也可以延缓一段时间再作处理。可他迫不及待地首先向这些弱者开刀，否定了自己的分封，这说明他自己就不相信那种分封的格局。

项羽分封之后，汉、赵、齐、燕等几个最有实力的封国，都很快就发生了战乱，这说明分封制已不是稳定天下政局的最佳选择。这其中固然有分封的不合理造成的混乱，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分封的基础是实力的平衡，在彼此实力没有限制，而且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力量能加以调节的情况下，各个封国的实力在发展中会互有涨落，这是使这种制度得不到平衡的内在因素。所以分封制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就是摒弃了分封中的不合理因素，它也必然会发生动乱。这在战国时期已经充分反映出来，秦始皇建立集权的专制制度，就是为了纠正和解决这个问题。但他集权过分，把它变成了一个暴政，因而

又走向了反面，引起了天下更大的动乱。项羽重新推行分封制，是想借历史的现成方案，解决秦始皇集权所导致的暴政问题。这当然是一种最省力简便的办法，但却是一种落后的政治制度。它不但没有解决集权过度所产生的问题，反而退回到集权前分封制所带来的混乱局面。

公元前 205 年十月，刘邦举兵东出函谷关，河南王申阳不战而降，他的封地置为河南郡。接着，又派韩襄王孙信领兵攻打韩地，韩王郑昌在阳城（今河南方城东）兵败投降，刘邦立信为韩王。与此同时，又先后攻取陇西和北地，章邯的弟弟章平，也成了汉军的俘虏。同年三月，刘邦自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渡过黄河，魏王豹向汉军投降。之后，汉军又攻取河同，活捉殷王司马卬，将他的封地置为河内郡。刘邦攻取殷地，项羽非常愤怒，以至要将楚军都尉陈平杀掉。陈平害怕，就从小道渡河，逃至修武（今河南获嘉），投奔刘邦去了。刘邦一见如故，拜陈平为都尉，与其同车共载，让他临护诸将。

刘邦在数月之间，先后夺取关中、河南、河内等战略要地，并与汉中、巴蜀连成一片，成为汉军东下的大后方。

为了使东进无后顾之忧，刘邦苦心经营关中地区。他重新占领关顺以后，下令将过去秦的范、圃、园、池改为耕地，允许人民耕种；规定蜀汉人民支援前线的，可以免除两年租税；从军的关中人可免除徭役一年。这些措施满足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要求，又有利于支援前线和恢复发展生产。刘邦还在关中实行大赦罪人，到关外安抚百姓的措施，更加广泛地争取人民的支持。后来，他又命令萧何和太子刘盈留守关中，制订法令及各项政策，建立巩固的封建统治秩序，使关中成为支援战争

的强大的后方。在四年的楚汉战争中，关中人民运输粮饷，补充士卒，源源不断为前线提供大量兵源和军需，这是刘邦所以能打败项羽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再说项羽相信齐、赵要合力灭楚，于公元前 205 年正月，率主力北上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企图灭掉田荣兄弟，然后再回师对付刘邦。田荣闻讯，立即将兵迎战，双方在城阳展开激战，最后田荣兵败，逃至平原（今山东平原南），被平原人民杀死。田荣死后，项羽再立田假为齐王，并率师北攻，至于北海。楚军一路焚烧城郭房屋，坑杀田荣降卒，虏掠妇女老弱，以至所过多所残灭，因此遭到人民反抗。项羽在政治上的失败，恰恰为刘帮在军事上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当楚军在齐地焦土之时，汉军已渡河南下，东进彭城了。

彭城之战

陈平投降刘邦

陈平是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东）人，从小家穷，但长得魁伟，又好读书，很有学问。陈胜起义后，他投入魏王咎的军中，被任命为太仆，几次给魏王提建议，魏王听不进。有人还向魏王说他的坏话，他觉得跟着魏王不会受到重用，就逃离魏王，投奔到项羽处。因为随项羽入关有功，赐爵为卿。

在刘邦暗渡陈仓的时候，殷王司马卬也反叛了项羽。项羽封陈平为信武君，让他率领在项羽军中的魏王旧部下，去进击殷王，迫使殷王又归顺了项羽。陈平因为平叛殷王有功，项羽

就任命他为其部将项悍的都尉，并赐金 20 镒。

不久，刘邦占领了关中后，又进攻殷王，殷王投降了刘邦。殷王的投降刘邦，本来也是被迫的。但项羽却认为，殷王原来的归顺就是假的，是陈平欺骗了他，要杀陈平及其部下。陈平听到这一消息，就封存好项羽赠他的金钱和印信，派人送还项羽，自己带着一把剑和简单的行李逃亡了。

陈平在修武（今河南获嘉县）找到刘邦，托他的老朋友魏无知向刘邦推荐，去拜见刘邦。刘邦同时接见了陈平等 7 个人，并一起招待他们吃饭。饭吃完后，刘邦对大家说：“请大家回住处休息吧！”陈平很想与刘邦单独谈一谈，向他提些建议，他一听刘邦要送客人，就对刘邦说：“我有重要事情要单独向你讲，过了今天就晚了。”刘邦听说陈平有不能过当日的重要事情讲，就请他留下来谈。

陈平很善于抓问题，他一谈就吸引住刘邦，使刘邦对他发生了好感。谈完后刘邦问陈平：“你在项羽那里做什么官？”陈平回答：“都尉”。于是刘邦当天就任命陈平为都尉，监护各个将领，负责自己的卫队。这个消息传到各个将领中后，大家议论纷纷，都很不平。他们觉得陈平只不过是项羽逃亡的部下，还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能力，刘邦就把他当成亲信使用，要他监护军中一批老将领，太不公平了。但刘邦认识到了陈平的才干，他听到大家的议论，并不以为然，反而更加信任陈平了。

刘邦的老将周勃和灌婴看不惯陈平的被重用，就在刘邦面前说陈平的坏话：“陈平外表看起来虽然很魁伟，但未必有才华。听说他在家里的時候，和他的嫂子不干净；到了魏王那里，魏王不采纳他的建议，就跑到项羽处；项羽也看不上他，才

又逃到我们这里。你现在这么重用他，让他率领你的卫队，可是他对于部下，送他钱多就待你好，送他钱少就刁难你。可见陈平是一个反复无常、贪得无厌的乱臣，希望你对他要提高警惕！”

刘邦听了他们的这些话，心里对陈平也产生了猜疑，就叫来陈平的引见人魏无知，问他有没有这种事。魏无知直爽地回答说：“有。”刘邦质问：“那你引见时为什么说他是个贤人呢？”魏无知解释说：“我说的是他的能力，而你问的却是他的行为。有高尚道德行为的人，对你取得战争的胜利若无帮助，他现在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现今你在和项羽争天下，我给你推荐的是有奇谋大计的人，他的计策有利于你战胜项羽就行了，你管他和嫂子的关系及接受贿赂干嘛呢？”刘邦听了，觉得魏无知的話很有道理，他现在急需用的是能帮他战胜项羽的人，在其他方面不应对之苛求。

刘邦为了释去对陈平的猜疑，证实魏无知的話，就把陈平找来，直接对他说：“你先在魏国，不中意又跑到楚国，现在又从楚国跑到我这里，一些人对你这样的反复产生了疑心。”

陈平知道刘邦的一些老部下因为刘邦重用自己，而对自己很嫉妒，所以在刘邦面前散布了一些流言蜚语，已经影响到刘邦对自己的信任，现在刘邦问起来，正好作些解释。因此，他向刘邦表白说：“我离开魏王，是因为他不听取我的建议；我又离开项羽，是因为他只信任自己的亲属，他所重用的不是项氏子侄，就是妻子的亲属，并不重用有才干的人。我在项羽那里时，就听说你很重用人才，所以我又离开项羽，投奔到你这里。我只身而来，来的时候身上未带分文钱财，我如果不接受部下

送的一些钱，怎么生活呢？你如果认为我的计策还有可用之处，我愿意为你效力；如果认为并无可用之处，大家送的钱财都还在，我愿意全部拿出来送给官府，请你放我离开这里。”

陈平的解释，并没有回避部下送钱财的事实。刘邦听了，觉得陈平讲的也有道理，因而解除了对他的猜疑，更加信任他了。刘邦觉得陈平这样的人才不可多得，但过去对他的生活照顾不够，因此厚送他一笔钱财，请他谅解自己的不周。

刘邦经过这次对陈平的考察，觉得应对他更加重用。于是，任命陈平为护军中尉，负责监护全军的将领。大家见刘邦对陈平这么信任，也不敢再讲陈平的坏话。陈平也以自己的才能，逐步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成为刘邦的一名得力助手。

陈平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从他接受部下送的钱财看，在战争时期他的缺点表现得还很突出，因为爱财的人很容易被敌人所利用和收买。但是陈平也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他的一些建议对刘邦取得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如何使用这样的人才上，魏无知对刘邦的分析是很有认识价值的。

魏无知把一个人的德和才分离开来评价。他认为陈平和嫂子的关系不正常，接受部下的钱财，这都是属于一个人道德品质范围内的事。可是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再高，在战争时期也未必有多大的用处。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是用道德去感化敌人，而只能用计谋击败敌手，所以才能比道德更为重要。陈平有战胜项羽的才能，但虽然在道德行为上有缺点，为什么就不能重用他呢？

陈平对接受部下的钱财，又有自己的看法。他来到刘邦处时，把项羽送的钱财都退回了，自己分文未留。而当时的军队，除了利用战争可以抢掠外，并无正式的薪俸。一个人要生活，没有钱财是不行的。所以陈平认为自己接受部下送的钱财，是理所当然的事。

刘邦对这件事的处理，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他一开始听到别人对陈平的议论，自己也产生了猜疑。他先把对陈平了解的魏无知叫来，向他询问陈平的情况。魏无知没有为朋友掩盖缺点，但他全面分析和评价了陈平，谈了自己对陈平缺点的看法。魏无知对陈平的分析，合情合理，所以得到刘邦的认可和理解。刘邦接着又把陈平叫来，当面向他讲了大家对他的意见。陈平没有否认和隐瞒事实的真相，他承认自己接受过部下送的钱财，但讲明了自己接受的理由。

刘邦经过对魏无知和陈平的当面对质和调查，对陈平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他没有责怪陈平的所作所为，而是理解了他的困难和处境。刘邦厚送给陈平一笔钱财，一方面当然是表示过去对他了解和关心的不够，另一方面也是要他今后再也不要接受部下的钱财。

刘邦听到别人说陈平的坏话，然后经过自己的调查，又与陈平当面亮了底，最后终于进一步认识了陈平。他不但没有不重用陈平，反而对陈平更加信任，让他监护全部将领。这说明刘邦在认识和使用人才上，是有很高的气量的，这是他战胜自己对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邦占领彭城

刘邦在稳定了关中一带的统治后，就于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率领塞王、翟王、河南王、魏王、殷王等5诸侯的人马，合计56万的大军，浩浩荡荡地东进讨伐项羽。大军在经过外黄的时候，又有彭城的3万人参加，军队人数达到了近60万。

当时项羽率主力军正在东部与齐国的军队作战，后方彭城一带很空虚。当他听到刘邦率大军东进的消息，思想上轻敌麻痹，认为刘邦一时攻不到彭城，想用速决战击败齐国后，再回击刘邦。可是由于他在齐国的残暴政策，引起齐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在城阳久攻田横不下，结果刘邦乘虚一举攻占了彭城。

刘邦占领彭城后，为自己取得的巨大胜利所陶醉。他没有想到，攻占彭城并没有消灭项羽的主力，对项羽在齐国的力量失去了警惕。各路诸侯兵纷纷在彭城抢掠财宝和美女，将领们也整天饮酒宴会，庆祝自己的胜利。他们被已经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占领了彭城就等于击败项羽，根本没有再把身在齐国的项羽放在眼里。

刘邦从彭城的败逃几乎丧命

项羽的军队到了萧县，看来刘邦并不知道，因为他没有相应地采取防范措施。

项羽率军一早从萧县出发，虽然受到刘邦军队的一些零星阻击，但中午就到达了彭城。刘邦率诸侯军仓促应战，这支

军队虽然比项羽的军队多近 20 倍,但都是些乌合之众,身上又都带着不少劫掠的财宝,当然敌不过项羽的这支精兵。所以一接战,刘邦军就大败,溃不成军。

刘邦的军队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匆忙从彭城撤退,因为号令不一,大家争相逃命,在抢渡彭城附近的谷水和泗水时,被项羽军拦击,死亡 10 多万人。刘邦的军队再向彭城南部的山区撤退,项羽的军队追到灵壁(今安徽宿县西北)东的睢水上,趁刘邦军仓促渡河时加以阻击,刘邦军队又大乱,互相在水中踩死挤死者不计其数,有 10 余万具尸体把睢水堵塞,河水为之不流。

项羽把刘邦围困在睢水旁。刘邦的残兵败将,士气十分低落,没有斗志,人人只顾逃命,处境十分危险。这时突然刮起一阵西北狂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拔树倒屋,伸手不见五指,围困刘邦的项羽军一阵混乱,刘邦趁机带领数十骑突围而出,向北逃到自己的家乡沛县。

刘邦率军西征的时候,他的父亲、妻子和儿女一直留在沛县老家。刘邦暗渡陈仓,占领关中后,曾派部下薛郢和王吸出武关,想让他们去沛县迎接自己的亲属。项羽得知后,派兵在阳夏(今河南太康县)阻击,薛郢和王吸未能到达沛县。

刘邦在彭城战败逃出后,想顺便路过沛县,和家人一起西逃。可是他家里人听到刘邦在彭城战败的消息,早已逃离家乡,刘邦未能找到。事有凑巧,刘邦在家乡未能找到自己的亲属,却在逃亡的路上正好碰到逃出家乡的儿子刘盈和女儿鲁元,刘邦喜出望外,就让他们上车与自己一起逃亡。

这时项羽的骑兵发现了刘邦逃跑的踪迹,就在后边穷追

不舍。刘邦座车的马跑得已经疲乏，眼看后边的敌人就要追上，刘邦急了，就把儿子和女儿推下车，想减轻车的重量，好让自己一人逃脱追兵。

给刘邦驾车的是他的同乡夏侯婴，他不忍抛下这两个孩子不管，就下车又把他们抱上来。刘邦更急了，怕追兵赶上，想再把这两小孩推下车。夏侯婴一面赶车，一面用手紧抱着这两个孩子，责怪刘邦说：“现在虽然很危急，敌人未必能追上，为什么要推他们下车不管呢？”刘邦这时只顾自己逃命，根本不考虑这两个亲生骨肉的安危，见夏侯婴护着这两个孩子不让推，几次拔剑要杀夏侯婴，都被夏侯婴巧妙地躲过。

后边追赶刘邦的项羽部将是丁固和赖萑，由于刘邦的车重马乏跑不快，很快就追上了刘邦。刘邦和夏侯婴下车与他们短兵相接，交手恶战。刘邦渐渐敌不过丁固，就对丁固说：“你我都是好样的，为什么要互相厮杀，非要分出胜负来呢？”丁固听了，认为刘邦很看得起自己，不忍心再追杀刘邦，就引兵而去，刘邦因而得以脱险。这样，夏侯婴终于救出了刘邦的两个孩子，并与刘邦一起逃脱了项羽的追兵，总算捞到了活命。

夏侯婴因为救刘邦的子女有功，后来很得到吕后的信任。她赐给夏侯婴一处豪华的住宅，是皇宫北面的第一家，说“这样才靠得近”。

刘邦离开沛县西征时，留自己的朋友审食其在家乡照顾父亲和妻子儿女。刘邦在彭城战败，审食其怕项羽的军队报复，带着刘邦的家属外出逃亡时，因为兵荒马乱，与刘盈和鲁元失散。刘盈和鲁元碰上刘邦，虽然几被抛弃，但在夏侯婴的帮助下，总算逃出了虎口；而审食其带着刘邦的父亲和妻子，

本想走小道去找刘邦的军队，结果不巧，反而遇上项羽的军队，成为项羽的俘虏。项羽把他们作为人质放在国中，准备以后作为和刘邦讨价还价的砝码。

刘邦在彭城战败后，原来临时组织起来的反项羽联盟很快瓦解了，一些投降和归附了刘邦的诸侯王，这时纷纷背叛刘邦，投降了项羽。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离开刘邦跑到项羽那里，殷王司马卬战死，齐、赵、燕等国也抛弃刘邦，与项羽结为盟友。刘邦这时处境困难，十分孤立。

彭城之战是刘邦和项羽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交锋，项羽先败后胜，刘邦先胜后败。双方经过这一次交锋，才直接认识到对方的力量，从此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主要敌手，双方全面展开了争天下的斗争。失败的教训，使他们在战术上都变得谨慎，不敢再轻视对方，因而战斗也更加持久和残酷了。

韩信定赵降燕

击魏王豹

彭城之战刘邦失败后，魏王豹跟随刘邦退至荥阳。这时他看到刘邦失败后的狼狈相，认为刘邦再也无法振作起来，就产生了背叛刘邦投向项羽的心意。他要设法摆脱刘邦的监视，就借口回家探视亲属的疾病为名，回到封地。他一渡过黄河，就在河上设防，背叛刘邦，投降了项羽。

刘邦对魏王豹的叛变，十分重视。因为魏地正好在荥阳战线的侧后方，如果项羽与魏王豹联合，前后夹攻他，其处境将会更加困难。

刘邦这时抽不出兵力对付魏王豹，想用和平的方法加以解决。他把酈食其找来说：“我派你去找魏王豹，设法慢慢劝说他不要背叛我，如果你的劝说成功了，就在魏地给你万户的封邑。”

酈食其到了魏王豹那里后，就按照刘邦的意思，劝说 he 不要投降项羽。魏王豹很感谢酈食其的忠告，但他对刘邦十分反感，不愿再与他结盟。他对酈食其说：“人生一世，如日影过壁，很快就完了。刘邦对诸侯和群臣，没有一点儿上下的礼节，常把我们当成奴隶一样的随便谩骂，我实在受不了他的这种对待，一辈子也不愿再见到他。”

酈食其劝说魏王豹无效，就返回荥阳，如实向刘邦作了报告。刘邦听了当然很生气，不得不抽兵做进攻魏王豹的准备。他在派酈食其到魏王豹那里做使者时，就让他一方面劝说魏王豹投降，一方面做些调查研究的工作，以备对魏王豹用兵时参考。

这时他准备对魏王豹用兵了，就问酈食其说：“魏的大将是谁？”酈食其答：“柏直。”刘邦听了马上心中有数地说：“他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我派韩信为大将，他不是对手。”又问：“谁是骑兵的将领？”酈食其回答：“冯敬。”刘邦对冯敬很了解，对酈食其说：“他是秦将冯无择的儿子，虽然人品不错，可无战斗经验，他敌不过灌婴。”接着又问：“步兵将领是谁？”酈食其回答：“项它。”刘邦说：“他更不是曹参的对手。从魏王豹这几个将领的组成上看，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于是刘邦任命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击魏。

从刘邦与酈食其的交谈中，可以看出刘邦对魏的将领非

常了解,知道他们谁有什么长处,谁有什么缺陷,因而在配置伐魏的统帅时,能针锋相对,以自己将领的长处制敌将的弱点,所以对战争才有必胜的信心。这反映了刘邦用兵的特点,也是他由弱变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韩信在出兵之前,也和刘邦一样,找来酈食其了解魏国将帅的情况。他听到魏王豹不用有战争经验的周叔为大将,而却用无经验的柏直,心里就有了对敌之招。

柏直估计,刘邦的军队会在最近的渡口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渡黄河,所以将主力军布置在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一带。韩信见柏直把主力部署在蒲坂,就故意在临晋放置船只,设置疑兵,做出准备从这里渡河的样子,以迷惑魏军。柏直侦察到韩信在临晋的动静,更坚信他会在临晋渡河,因而加强了在蒲坂的戒备,而却放松了对其他渡口的警惕。

韩信见柏直的主力仍在蒲坂,就将主力军埋伏在夏阳(今陕西韩城县),找来一批木桶做渡河工具,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偷偷渡过黄河,突然袭击安邑。

魏王豹毫无准备,见敌军突然来袭安邑,惊慌失措,仓促应战,兵败被俘。韩信把魏王豹送到荥阳前线的刘邦处,因为魏王豹表示悔过,刘邦为了团结他,就把他留在荥阳,没有杀他。后来刘邦逃出荥阳后,守城的周苛、枞公认为:“背叛过的魏王,难以与他一起守城”,就把魏王豹杀了。

韩信消灭了魏国后,就按照刘邦的意图,在其地设置了河东、太原、上党 3 郡。

这时韩信向刘邦建议,拨给他 3 万人马,北伐赵、代、燕,东击齐,南绝项羽的粮道,从侧面牵制项羽的力量,以减轻荥

阳战场的压力。刘邦同意了他的计划，派张耳为其助手，带领 3 万人马开始了北伐的行动。

大败赵军

韩信击败魏王豹后，陈余令夏说率兵至阼与（今山西和顺县），设防抵抗韩信军的北上。韩信率 3 万北伐军，首先在阼与击败代兵，俘虏了夏说。

陈余听到夏说战败被俘，就将赵国的 20 万大军，屯聚在军事要地井陉口（今河北井陉市），准备迎战韩信的 3 万军队。

陈余的谋士、广武君李左车看到陈余的军事布阵是出击的战法，就向他建议说：“韩信渡过黄河后，俘虏了魏王豹，又在阼与擒获你的丞相夏说，屡获胜利。现在又有张耳做他的助手，他对赵国的情况比较了解，不可轻敌。韩信想乘胜利之师，一举攻下赵国，此时他的士气很盛，不可挡其锋。”

李左车接着分析自己的有利形势说：“我常听人说：‘千里之外运粮，士兵必有饥色；现打柴草烧饭，士兵一定吃不饱。’现在韩信的军队远离后方，它的粮食供应一定很困难。井陉这个地方，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成列，交通很不方便，它有利于我们据守。”

李左车提出不同于陈余的战斗部署：“我请你拨给奇兵 3 万人，从小路上出其不意地绕到韩信军队的后方，切断他的供应；你挖深沟筑高壁，坚守不战。这时韩信前不能战，退不得还，就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我再率兵不断骚扰他的后方，使他在当地掠夺不到吃的东西，这样用不了 10 天，就可杀了韩信和张耳。”

李左车知道陈余很自负，难于听进别人的意见，所以一再向陈余强调说：“请你好好研究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韩信和张耳的俘虏！”

陈余是一个儒生，自认为懂兵法，可并不会用兵。他常常吹嘘说，正义之师绝不采用诈谋奇计取胜。他听不进李左车的正确意见，还对他讲兵法说：“兵法上有言：‘十倍于敌人，就可以包围他；比敌人多一倍，就可以打败他。’”韩信号称有兵数万，实际上只有几千人的作战兵力；他又是行军千里来战，军队已很疲惫。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我们都不敢正面迎击，以后如果遇到比他强大的军队，还怎么再迎战呢！那样人们都会说我是一个胆小鬼，都轻视我，敢来进攻我了。”

李左车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陈余接受。陈余仍按照自己的部署迎战韩信。

韩信派出去的间谍，打听到了李左车的建议，韩信听了十分担心，深怕陈余按李左车的意见部署战斗，使自己陷入被动。后来间谍又报告说，陈余没有接受李左车的意见，韩信才放下心来，敢于带兵进入井陘口。

韩信在距井陘口陈余阵地 30 里的地方，安营扎寨，让军队休息。半夜时，选轻装骑兵 2 千人，让他们每人带一面赤色的旗帜，从小道偷偷进入靠近赵军的山间隐蔽起来，不让赵军发现。韩信向他们布置任务说：“明天我军与敌交战时，要假装战败向后撤退，这时赵军必然倾巢而出追击，你们马上冲进赵的军营，拔去赵的旗帜，换上我们的赤旗。”

韩信接着又传令全军，要大家鼓足士气，迎接战斗，并说：“大家先吃点小吃，等今天击败赵军后，再会餐。”各位将领听

了，皆不以为然，随口答应说：“好，等着会餐！”

韩信又向部下动员说：“赵军已先占据了险要的地势，构筑了工事。他们没有看到我军大将的旗鼓之前，是不肯轻易攻击我军的先行部队的，因为怕我们遇险而退。为了使敌人相信我军绝不后退，我们要派出一支万人组成的先行部队，进入敌人能看到的的地方，做背水而战的布阵。”当韩信的这支军队进入阵地后，赵国的军队见他背水布阵，断了自己的退路，都认为他太不懂兵法，大笑不止。

天亮以后，韩信树起大将的旗帜，敲着战鼓，向井陉口赵军的阵地进发。陈余见到韩信的大将旗鼓，认为其主力已到，就打开营门，全军出击，与韩信的军队接战。战斗了一会儿后，韩信的军队假装不敌，抛弃了旗鼓，退入原来部署的背水阵地，与阵地上的军队联合，继续抵抗赵军。

陈余见韩信的军队不敌，退入背水阵地，认为他们已陷绝境，就倾营而出，争抢韩信军队抛弃的旗鼓，以便立战功。

韩信的军队退入背水阵地后，因为军无退路，所以都作殊死战，继续勇敢地抵抗赵军的进攻。这时韩信隐蔽在山中的 2 千轻骑兵，等到赵军的营垒空虚，都出来争立战功之机，突然飞快驰入赵的军营，拔掉赵军的全部旗帜，树立起刘邦的赤色旗 2 千。

在与韩信军队的战斗中，一部分赵军见韩信的军队都殊死抵抗，一时还难于消灭韩信军，就准备撤回营垒，休息一会儿再战。可是当他们返回自己的军营时，却突然发现军营中四处都树立着刘邦的赤色旗帜，不觉大惊失色，以为韩信的军队已占领军营，俘虏了赵王及其将帅，因而全军大乱，纷纷夺路

逃走,以求活命。赵国的将领一再试图把军队整顿好,虽然杀了一些要逃走的士兵,也无法制止混乱的军队。

在背水阵地作殊死战的韩信军队,见2千骑兵已按计划占领了赵军营垒,赵军已陷入混乱,就趁机里外夹击赵军,赵军大败,陈余在泚水(在今河北柏乡县)被杀,赵王歇被俘。韩信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陈余听了他的意见,胜败还很难说。所以在清理战场时,韩信下令不可杀害他,如果有人把他活捉了,可得千金的奖赏。有人果然捉到了李左车,缚着他来到韩信的军帐中。韩信见李左车活着,很高兴,亲自为他解了缚,请他东边坐上座,自己在西边下坐陪着,象对待老师一样,很尊敬李左车,希望他能为自己服务。

战斗结束后,诸将领都来到韩信处,向他汇报战果,并庆贺战争的胜利。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有的将领对韩信的战法不解,就向韩信请教说:“兵法上有‘背靠山陵,前依水泽’的话,可是今天你让我们背水列阵,还说破赵军以后会餐,我们当时都认为这是违背兵法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是竟然取得了胜利,这是什么战术呢?”

韩信知道部下还不理解他的战法,就向大家解释说:“这种战法在兵法上也有记载,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兵法上不是说过:‘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话吗?我们的军队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战斗力并不强。对于这样临时组合的军队,如果不把他们置之死地,退无后路,人人就不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作殊死战;如果把他们部署在有退路的生地,大家一遇危险,就会四散逃走,我还能用他们

打仗吗？”

众将领听了韩信的说明和解释后，才知道了韩信用兵的意图，大家都十分佩服，同声说：“你想得很周到，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项羽听到韩信占领了赵国，就屡派骑兵渡过黄河攻击赵地。韩信和张耳不得不率兵往来各地救援。项羽进入赵国的军队，因为得不到后援和当地人民的支持，都被韩信和张耳击败。他们逐步巩固了在赵国的统治后，就抽出一部分精兵，支援了刘邦在荥阳一带的前线。

为了巩固赵国的统治，韩信向刘邦建议，封张耳为赵王。

燕国不战而降

韩信消灭了赵国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如何进行，他向被俘的李左车请教。他对李左车说：“我准备北攻燕国，东伐齐国，不知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李左车是败兵之将，深知自己所处的地位，哪敢在韩信面前发挥议论，所以辞谢说：“亡国的大夫，不可以再进图存；战败的将军，不可以再谈勇敢。象我这样战败做了俘虏的人，哪有资格再商量大事呢！”

韩信并不认为李左车是败兵之将，他的被俘是由于陈余不听他的正确意见造成的，所以韩信向他解释说：“百里奚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虞国人，虞国被灭亡后，他到了秦国，帮助秦穆公称霸诸侯。他并不是在虞国时愚笨，到了秦国就变得聪明了。关键是当权者用不用这个人才，听不听他的意见。假如陈余肯听你的建议，我打不胜这一仗，也可能已经当了俘虏。”

韩信并不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李左车，他诚恳地对李左车说：“正因为陈余不听你的意见，我才有幸能见到你，恭听你的建议。我这是真心实意向你请教，请你不要再推辞了。”

李左车听了韩信的话，觉得他确实是一片诚心待己，因而向他推心置腹地建议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所以人们常说：‘狂妄之人的话，贤者也会从中得到教益。’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但我愿意谈出来，供你参考。”

李左车接着开诚布公地对韩信说：“陈余并不是草包，他很有才干，曾经指挥打过不少胜仗。可是一次战争的决策错误，仍免不了战败被杀。”李左车并没有因为陈余不听自己的意见而战败，就全盘否定陈余。他仍然肯定陈余的才干，但有才者只要有一次决策失误，也有可能身败名裂。

李左车接着分析韩信的处境说：“你率军渡过黄河后，俘虏了魏王豹，活捉了代相夏说，不过 10 天的工夫，就在井陉口击败赵国的 20 万军队，杀了陈余。你的军威所至，已经名闻海内，威震诸侯，大家对你都很害怕，这是你现在的优势，但是你的军队经过连续的战斗，已经非常疲惫，难于再进行大的战斗。如果你率领这些疲惫之众，攻燕国坚守的城市，显然会力不从心。那时你想迅速攻下，可是力量又不足，必然会旷日持久地对峙下去，粮食供应必然会发生困难。”

李左车认为，只要一举不能攻下燕国，韩信就会陷入困境。因为“燕国的力量较弱，你一下子攻不下来，齐国就会受到鼓舞。他们两国必然会联合起来对付你，那样反而促进了敌人的合作，对刘邦战胜项羽的大局很不利。所以你攻燕伐齐的战略并不高明，它是以你的短处，击敌人的长处，后果未必如你

想的那么好。”

韩信听到李左车否定了自己攻燕伐齐的计划，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他也不能留兵在赵，不采取军事行动呀！于是他赶紧问李左车：“那该怎么办才好呢？”李左车说：“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按兵不动，进行休整。在赵国境内，采取措施，扶植生产，安抚百姓，巩固统治。然后在去燕国的路上，部署军队，做出要发兵攻燕的样子。再派一使者，拿一封劝燕国投降的信，以武力相威胁，燕王必然会投降。燕国投降之后，你的军队也休整好了，再派人去警告齐国，齐国也会不战而降。就是齐国不降，那时再带兵伐齐，就是齐国有再高明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救齐了。”

李左车最后归结说：“兵法上有先虚张声势，随后再以实力相加的战法。你现在要趁胜利之师，四处虚张声势，迫使敌人屈服。如果他不投降，再以实力相加不晚。你只要这么办，我想取燕败齐不会有困难。”

韩信听了李左车的分析，觉得他讲得很对，比自己原来想的要高明，于是就按照他的设想，先派兵在燕国的边界上虚张声势，然后派使者劝燕国投降。燕王在韩信的威迫下，果然如李左车的预见，不战而降了。

韩信接受李左车的意见，对燕国采取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相结合的办法，没有费一兵一卒之力，就迫使燕国投降，这是继击败赵国之后在军事上又取得的一大胜利。从政治影响来说，它的意义绝不亚于击败赵国的胜利。

韩信灭齐

汉高祖三年(前 204 年)冬十一月至秋九月,韩信和张耳二人率军定赵下燕之后,楚汉双方在荥阳、成皋一线的争夺战达到高峰,汉军屡遭惨败,形势十分危急。韩信和张耳一面亲统赵军南下驻屯修武(今河南获嘉),与荥阳成皋成犄角之势,并确保河内(今河南焦作地区)之安全,一面则往来救赵,抵挡项羽所派出的渡河攻赵的奇兵。

当年七月,刘邦在成皋惨败后,渡河逃至小修武,在天明时分自称汉使者,驰入韩信军中,夺韩信之军归自己指挥。刘邦深感楚军正面攻势之猛烈,必须开辟新战场以牵制楚军。而此时,开辟新战场的最好方略,莫如攻下齐国以威胁楚之后方。而且,如果汉军攻齐,楚军势在必救,这样,荥阳、成皋一线战场的压力就可减轻。因此,刘邦一面令张耳守备赵地,并继续征赵地兵增援荥阳、成皋防线,一面又拜韩信为相国。让他和曹参、灌婴等将领率赵军剩下的部队进攻齐国。齐王田广和相国田横得知韩信将率军来攻,立即调集齐国全部兵力 20 万人准备迎战,而派华无伤、田解二人为将,率军进驻历下(今山东济南)。

刘邦部署已定,回到荥阳前线,谋士酈食其向刘邦请求到齐国去劝说齐王降服刘邦,刘邦同意了,立即派酈食其前往齐国。酈食其到齐国见了齐王后问:“大王知天下之所归吗?”齐王说:“不知道。你说天下何所归?”酈食其说:“归于汉。”齐王问:“先生为什么这样说?”酈食其说:“汉王在诸侯之前先入咸阳。项王背约而王汉王于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知道后,

举蜀、汉之兵以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死；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服城池，即以其城封降服该城的将领为侯，得到财物也用来分给将士，与天下同其利，因而英雄豪杰都乐为汉王效力。项王有背约的名声，又杀害义帝，背恩负义，对别人的功劳记不住，对别人的错误却忘不掉。打了胜仗将士们却得不到赏赐，攻下城邑而得不到封赏，不是项家的人就掌不了权。所以，天下有人背叛他，有才能的人怨恨他，而都不肯为他效力。所以，天下之大局以汉王胜利而告终，这是可以坐而等待的。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出井陉，诛成安君（陈余），这些都不是人力所及，而是靠上天的福佑。如今，汉王已据有敖仓的粮食，断绝成皋之险要，坚守白马之津（在今河南滑县东），杜太行（指太行山）之阪，距飞狐之口。此种形势，天下人谁最后降服，谁必然最先灭亡。大王赶紧先投靠汉王，齐国可以保全，否则，危亡可立而待之。”齐王田广认为有理，便答应了酈食其，派使者到荥阳去和汉连和。使者走后，齐王认为汉军不会来攻，便减撤了驻扎在历下的齐军的警备，和酈食其每天在宫中饮酒作乐。

这时，韩信已率军进至平原（今山东平原南），准备渡河。刘邦事先并未将酈食其说齐之事通知韩信。此时，韩信得到齐已经与汉连和的消息，便准备停止军事行动。范阳（今河北大名）人蒯通恰于此时在平原活动。蒯通是当时最卓越的谋士之一，他想促成韩信独立，从而形成与楚汉三国鼎立之势，然后进图天下。因此，他去找韩信，劝韩信说：“将军受汉王之诏击齐，而汉王又单独派使者使齐国连和，是不是有诏令让将军停止进攻呢？将军为什么不行动呢？而且，酈食其只是一个策士，

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率数万之众，作战一年有余才下赵五十余城。当大将数年，难道还比不上一个竖儒的功劳吗？”蒯通的激将法果然有效，韩信认为有理，便率步骑数万，在平原津渡河。这时，齐军虽然仍旧屯驻在历下，但因与汉连和而撤除了警备。韩信遂乘机突然袭击，击溃了这支齐军主力，然后急速进攻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齐王田广和相国田横见汉军突然攻来，认为酈食其欺骗了自己，便下令烹杀了酈食其。于是，齐国君臣上下都仓皇逃走，各不相属。齐王田广逃往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相国田横逃往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守相田光逃往城阳（今山东即墨西南），将军田既率败兵退据胶东（今山东平度东南）。齐国全国崩溃。

韩信袭破临淄后，马不停蹄，立即遣军向东追击。他一面派灌婴骑兵追击田横，至博阳而击败田横的骑兵，攻克博阳，田横败走嬴下（今山东莱芜境），一面派左丞相曹参攻取济北郡（治今山东长清南）各城。齐王田广见局势危急，不得不向楚王项羽求救。此时，项羽正率军在魏地回击彭越和刘贾所率汉军，听说韩信袭破齐国，而且将南下攻楚，便遣将军龙且，亚将周兰和留公（陈留县令）率军救齐，军队号称 20 万。龙且率军向城阳（今山东莒县）和琅玕，与齐王田广会合，准备进击韩信。韩信闻龙且所率楚军到达，也立即调回曹参、灌婴等部，布置在潍水以西地区，准备迎击。在兵力上，龙且的齐楚联军占有明显优势。当龙且和齐王田广商议进击韩信时，有人向龙且建议说：“汉军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军据本土作战，军队容易败散。不如深沟高垒不战，而让齐王派出信使招那些被汉军攻破的城邑。这些城邑听说齐王尚在，楚军又来援救，必

然反汉。汉兵在二千里之外作战，齐地城邑又都反抗他们，他们连粮食都得不到，故可以不战而降。”龙且却不以为然，反驳说：“我十分熟悉韩信的为人，容易对付。而且率军救齐，不战而让敌人投降，我有什么功劳？如今战而击败他们，可以得到齐地的一半，为什么不打？”于是，龙且便率军进于潍水的东岸（今山东高密西），摆开阵势，韩信则率军在潍水西岸布阵。这时是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十一月。

韩信因汉军兵力少，为将敌军一分为二，以争取决战兵力的优势，便在夜里令人做了1万多条布囊，里面装上沙子，做成沙袋，用它们堵塞了潍水的上流，然后率军涉水进攻龙且军。龙且出军迎击，韩信佯装不胜，率军败还。龙且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韩信是个胆小鬼！”说着，立即率军涉水追击。韩信等龙且军一半渡过河时，便派人扒开了堵塞潍水的沙袋。于是，上流之水奔腾而至，将龙且军冲为两段。韩信见状，立即率全军猛烈反击，大败楚军。龙且被杀，周兰等被擒。潍水东岸的齐楚联军见龙且已死，便闻风溃走。韩信又立即率军渡水追击，追至城阳，楚军全部投降，遂擒杀齐王田广，田光等人也都被擒。至止，齐楚联军全军覆没。韩信又派曹参进击胶东，擒杀田既。田横闻齐王田广已死，便自立为齐王。韩信又派灌婴率军击败田横，田横被迫逃至梁地，投靠彭越。于是，齐地全部平定。刘邦从而取得了对项羽在战略上的绝对优势。

韩信平定齐地后，便派人向刘邦请求封自己为齐之假王。这时，正值项羽军围困刘邦于荥阳之际，刘邦听完韩信来使的请求后，立即大骂道：“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谋士张良、陈平见刘邦怒，急忙踩了一下刘邦之足，并

悄声对刘邦说：“现在形势对汉军十分不利，阻止韩信当王恐发生变故，不如将计就计，就立韩信为齐王，以便使他安心防守齐地。”刘邦领会了张良、陈平的意思，随即又改口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应当成为真王，何必要做假王”。于是即派张良去齐立韩信为齐王并征发韩信之军进攻楚。

韩信率劣势之军，继平定代、赵、燕地之后又在短短数月之内平定齐地，特别是潍上战役一战而歼灭龙且 20 万之众，并斩杀了项羽大将龙且。韩信之名已威震天下，韩信的势力，在刘邦、项羽之间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项羽急派盱眙人武涉去韩信处游说，劝韩信背汉并与楚合作。

蒯通说韩信

汉高祖四年（前 203 年），韩信在潍水之战中击败楚军、杀龙且，平定齐地以后，直接从北面对项羽形成了威胁。项羽此时因战略上的失误，尽管打了不少胜仗，却也疲于奔命，已成强弩之末，刘邦已形成了对项羽的战略上的绝对优势。因此，项羽感到十分忧虑，力图挽回这种颓势。而挽回颓势的唯一办法，便是策动韩信叛汉，从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按当时的形势，楚汉双方的成败，全部在韩信一人身上。韩信若叛汉而自立，则天下三分，势同鼎足；韩信若向汉击楚，则项羽必然失败；反之，韩信若向楚击汉，则刘邦必然灭亡。项羽在分析形势之后，决定派盱眙人（今江苏盱眙东北）武涉前去劝说韩信，劝他叛汉自立。武涉劝韩信说：“天下人共苦于暴秦已经很久了，这才相与戮力攻秦。秦已灭亡，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以休士卒。如今，汉王又兴兵而东，侵入别人的分地，夺取别人的土

地。破灭三秦之后，引军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攻楚国，其意非尽吞天下所有诸侯而不罢休。汉王的性命入项王之掌中有好几次，项王可怜他，让他活下来。然他一得脱身，便总是背叛盟约，进攻项王，不讲信义成这个样子。如今，足下虽然自认为和汉王交情深厚，为他尽力用兵打仗，但最终还是为他所擒。足下所以会有今日，全因为项王还在世。现在楚汉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投汉王则汉王胜，足下投项王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下一个灭亡的便是足下。足下和项王过去有过交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而王之呢？放弃这个机会，一定要跟着汉王进攻楚王，作为一个智者难道是这个样子吗？”韩信听了，认为不对，道歉说：“我在项王手下做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用，所以才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给我数万之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所以我才会有今天。人家十分信任我，我却背叛人家，这是不祥。就是死了也不能改变！请您为我多谢项王的好意。”

武涉见韩信不听，只好怅然离去。他走后，著名辨士，齐人蒯通又到了韩信的军中。蒯通知道天下之权在韩信手中，想用奇特的策略打动韩信，使用相面相人之法劝韩信说：“我曾经学过相人之术。”韩信问：“先生的相人之术怎么样？”蒯通回答说：“人之贵贱在于人所生就的骨法，人的喜怒哀乐则在人的容貌气色；人的成功失败在于人做什么样的决断，以这些互相参照，可以万无一失。”韩信说：“好。那么你相相我怎么样？”蒯通说：“从你的面部看，你位不过封侯，而且以后危险不安；而从你的后背看，实在贵不可言。”韩信问：“这是什么意思？”蒯通说：“天下刚发难之时，英雄豪杰建号一呼，天下之士云合雾

集，鱼鳞相杂，燄至风起。当这样的時候，人們所忧虑的只在灭亡秦朝而已。如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实在数也数不清。楚人起自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胜席卷，威震天下。然而，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近西山却不能再前进，已经有三年了。汉王率数十万之众，距守巩（今河南巩县）、洛（即洛阳一带），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连打败仗，丢荥阳，伤成皋，又奔至宛、叶之间，可以说是智勇俱困。锐气在险要的关塞前受挫，而粮食在内府中耗尽，天下百姓疲劳之极、怨恨之极，茫然不知所倚。在我看来，不是天下之圣贤，就不能平息天下之祸乱。当今汉王、项王两主之命运悬在足下你的手中，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我愿披腹心，输肝胆，效上愚计，只恐怕足下不能用我的计策。足下若真能听我的计策，则最好是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没有敢先动的。以足下你的贤能英明，又有那么多军队，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路。依顺百姓的愿望，西向而为百姓请命，则天下人闻风而响应，谁敢不听？分割大的，削弱强的，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归服而归德于齐。据齐国故地，占有胶东、泗水之区，以仁德怀诸侯，深拱辑让，则天下之君王令相率而朝于齐。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深思熟虑之。”

韩信说：“汉王待我非常好，用他的车载我，用他的衣服衣我，用他的饭食养我。我听说，坐别人的车子要载别人的患难，穿别人的衣服要怀别人的忧虑，吃别人的饭食要为别人的事而死，我怎么能见利而忘义呢？蒯通说：“足下你自以为和汉王关系好，想建立万世之基业，我认为你错了。当初，常山王张耳

和安成君陈余为平民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来，因为张廪、陈泽的事情，二人互相怨恨，常山王背叛项王，奉项婴之头而逃归汉王。汉王借给常山王军队，使其率军东下，杀成安君陈余于泚水之南，头足异处，最终为天下人所耻笑。这二人之相交，可以说是天下人最好的，然而最后却自相残杀，这是为什么？因为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如今，足下想以忠信而和汉王结交，怎么也不能像张耳、陈余那样的要好，可相冲突的事情，却比张廪、陈泽的事情大。所以，我认为足下肯定汉王不会危害自己是错误的。大夫文种和范蠡让就要灭亡的越国生存下来，让勾践成为霸主，功名已立，自身却死的死，亡的亡。田野里的野兽被打完了，猎狗就要被宰掉吃了。以交友而言，你和汉王的关系不如张耳和陈余；以忠信而言，你比不上大夫文种和范蠡对越王勾践。这几个人就足以作为借鉴了。愿足下深思熟虑。我听说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我谈一下足下的功略！足下涉过西河（指黄河），俘虏魏王，擒获夏说，引兵东下井陘，杀成安君陈余，占领赵地，威服燕地，平定齐国，又南败楚人之军二十万，东杀龙且，西向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如今，足下戴震主之危，挟不赏之功，归于楚，楚人不敢信任；归于汉，汉人震恐。足下凭着这些想往哪里去呢？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我为足下感到担心。”韩信道歉说：“先生先不要讲了，我会考虑的。”

过了几天，蒯通又劝韩信说：“多听而获得各种信息是办事的必要条件；多计议盘算是办事的基本方针。听的太多而又计算失误却又可以久安，实在是少有之事，一听便知其好坏对

错，十不失一二、这样的人不能用言语去打乱他的思想；细心盘算而知道孰轻孰重，这样的人你说再多的话也没有用。跟在别人的后面当仆人，便不可能当万乘之主；守着担石之禄而舍不得丢弃，便到不了卿相之位。所以，知道了就应该决断，疑惑只能坏事，追究细枝末节而忘天下之大数，心中非常明白却又不肯付诸行动，这是万事的祸害。所以说：‘猛虎之犹豫，还不如蜂蚕之致螫；骐驎骏马之踟躅，还不如弩之安步缓行；孟贲的狐疑不前，还不如庸人匹夫一心要达成目标。虽然有尧、舜那样的智慧，却沉吟闭口而不言，那还不如聋子哑巴的随手指挥’。这些话的意思，是贵在能够实行实干。功业很难成就却容易败坏，时机难得却容易失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愿足下认真考虑这些话。”韩信听了，仍然是犹豫不决，不忍背叛刘邦，又自认为自己功劳很多，汉王刘邦最终不会把齐国从自己手中夺去。于是，他便谢了蒯通，把蒯打发走了。蒯通见韩信不听自己的良言相劝，又怕以后因此招来祸患，便假装得了疯病，当起了巫师。

韩信不听蒯通之言，最终还是招来了杀身之祸。而刘邦却借韩信之力，铲除了项羽这个最大的敌人。之后，他便把刀子对准了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

荥阳突围

刘邦在荥阳的守军，主要靠取敖仓的粮食来支持。刘邦虽然筑甬道保护与敖仓间的交通，但由于项羽军的一再进攻，甬道被切断，刘邦在荥阳的守军因粮食供应发生困难，难于再坚持下去。刘邦觉得守住荥阳已无望，被迫向项羽提出停战讲

和，条件是以荥阳为界，荥阳以西归刘邦，荥阳以东归项羽。

这时项羽的军队远离后方，供应也很困难，再加上军队连续作战，将士都很疲劳，所以项羽想暂时接受刘邦的条件，以求得休整的机会。但是范增坚决反对，他认为：“不趁刘邦现在陷入困境之机将他消灭，留下大患，以后必然会后悔莫及。”这时陈平还未使用反间计，项羽仍很尊重范增的意见，所以没有同意刘邦的议和条件，项羽继续急攻荥阳。

刘邦在荥阳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他的部下纪信怕荥阳失守后刘邦被俘，就向他建议说：“现在形势很危急，荥阳难于再守住。请你让我装扮成你的样子，好去欺骗项羽的军队，你可乘机从小道突围出去。”

陈平在夜里组织了2千女子，让她们都穿上军装，从荥阳的东门出城，假装成是要突围的军队。项羽的军队以为刘邦要突围逃走，就从四面来围攻这2千娘子军。这时纪信打扮成刘邦的样子，坐着刘邦专用的马车，以黄绸缎为车盖，车的左边还树立了一个象征权力的牦牛尾巴，对项羽的军队大声说：“城中的粮食吃完了，我是刘邦，要向项羽投降。”项羽的将士不辨刘邦的真伪，听说是刘邦出城投降了，都高兴得呼喊万岁，拥到东门外观看刘邦投降的场面。刘邦趁项羽的军队都跑到东门外欢呼胜利，西门的项羽守军松懈之机，率领数十骑从西门偷偷地跑出来，在项羽军队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逃到了刘邦的另一个据点成皋。

项羽的士兵把要投降的假刘邦带到项羽那里，项羽一看才知道不是刘邦，受骗上当了。项羽质问纪信：“刘邦在哪儿？”纪信知道这时刘邦已逃出荥阳，就如实地回答项羽说：“刘邦

早已逃出了荥阳。”项羽恨死了这个假刘邦，就把纪信活活烧死了。

刘邦逃离荥阳时，命令周苛、枞公和魏王豹等人率残兵继续死守荥阳。刘邦走后，周苛、枞公认为：“魏王豹在彭城之战刘邦失败后，曾投降了项羽，在现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恐他再背叛刘邦，不可信任。”因而两个人决定，杀了魏王豹，以消除后患。

刘邦逃走后，周苛、枞公当然更难以守住荥阳，不久就被项羽攻破，周苛和枞公被俘。项羽认为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为刘邦死守荥阳，很尊敬他们的这种精神。项羽很想收买他们为自己出力，就对周苛说：“你如果肯投降，我就任命你为上将军，封3万户。”周苛是刘邦的亲信，他不肯投降项羽，反而骂他说：“你如果不向刘邦投降，也会当刘邦的俘虏。你不是刘邦的对手，我怎么会投降你呢？”项羽见周苛不肯投降，就煮杀了周苛，杀了枞公。

荥阳的失守，是刘邦彭城之败后，再一次大的失利。荥阳被项羽占领后，刘邦设置的荥阳、成皋防线，破了一大缺口，函谷关就暴露在项羽的兵锋下，危及了关中的安全。

这时再次出现了有利于项羽的军事形势，他或者可以乘胜再集中主力围攻成皋，全部粉碎刘邦的荥阳、成皋防线，然后再进攻关中；或者留少量的军队牵制成皋的守敌，而集中主力西攻函谷关，迫使刘邦的关中后方发生震动。

可是项羽并未充发利用占领荥阳后的这一有利形势，在军事上采取主动的行动。而是滞留在荥阳，受刘邦军事行动的牵制，被动地采取了一些行动，因而未能扩大攻下荥阳的战

果。

从战术上来说,项羽是善于采取长驱直入的军事行动的,他救赵和攻齐都是用的这种战术。可是为什么在攻下荥阳之后,他不乘胜攻取函谷关,长驱直入关中,采取挖刘邦老窝的战术呢?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因为项羽的后方长期不稳,战线又长,军队的供应一直是个大问题。他勉强攻占了荥阳,这时刘邦虽然处境很困难,项羽也已精疲力竭了。项羽这时再也无法采取大的军事行动,而只能应付一下目前的局势,所以显得被动。这是项羽迫不得已的事,他在明知刘邦处境很困难的情况下,准备接受刘邦的议和条件,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荥阳之战,刘邦在军事上的再次失利说明,项羽在军事上暂时还处于优势,刘邦在彭城之战失败后所处的劣势还没有好转,但双方都已精疲力竭,谁也无法再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基本进入军事上的相持阶段。在双方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谁能不断得到支援和补充,谁就可坚持得住;谁的支援和补充供应不上,谁就坚持不住,而最后被对方所消灭。军事的斗争已经变成政治和经济实力的拚搏,局部的军事胜利不能扭转整个的战局。由于项羽的后方不稳定,供应线又长,越是坚持的时间久,就越暴露了自己的缺点。结果是项羽虽然在荥阳之战中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他的实力和后劲已在逐步走下坡路;而刘邦虽然在军事上再次失利,可他的后方稳固,前线能不断得到支援和补充,所以不但实力未下降,反而逐渐得到增强。因而双方长期对峙的结果,逐渐有利于刘邦而不利于项羽。刘邦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坚守不战,想用时间来拖垮项羽;项羽则进不能,退又不甘,只得坚持下去。寻求战机。

陈平智设反间计

怎样削弱项羽的力量，孤立项羽，这一直是刘邦考虑的问题。酈食其分封六国的建议不可行，还有什么别的可行的办法呢？有一天刘邦问陈平：“现在天下纷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项羽，使天下安定下来呢？”陈平分析了刘邦和项羽在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和优劣后，提出了使用反间计，以制造项羽与其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从而孤立项羽，削弱项羽力量的办法。

陈平认为，项羽很尊敬和爱护部下，所以很多廉洁好礼的有为之士，都投归了项羽。但是项羽对有功之士，舍不得赏赐爵邑，所以一些重名利的人，又离他而去。

陈平如实地分析了刘邦的优缺点，认为他动不动就谩骂人，对部下缺少尊重和礼貌，所以一些自尊心强的廉洁之士，不愿投靠刘邦。但是刘邦却舍得赏赐有功将士爵邑，所以一些追名逐利的无耻之徒，多投奔了刘邦。

陈平把项羽和刘邦的优缺点对比之后认为，如果能去掉两人的短处，把两人的长处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就可以很快平定天下。可惜刘邦的本性是不善以礼待人，这个缺点一时难以克服，所以不能争得廉洁之士的支持。但是项羽的主要谋士，也不过是范增、钟离昧、龙且和周殷几个人，他们与项羽的关系也不是无隙可乘。

陈平认为，项羽心胸狭小，易信谗言。只要刘邦肯拿出数万金，进行反间活动，就可以离间项羽与这几个主要谋士和亲信的关系，使他们互相起疑心，彼此发生矛盾，项羽就会孤立起来。这时刘邦再以兵攻之，项羽因为内部不团结，互相不信

任,就会抵消力量,必然会失败。

刘邦听了陈平的分析,虽然对他的缺点毫无保留地揭示出来,可刘邦并不因而恼怒,而是认为陈平讲得很有道理。于是他决定拿出4万斤黄金,交予陈平,任由他进行反间活动使用,不必向他报告具体的使用原由。陈平本是一个爱财之人,这点刘邦对他十分了解。现在交给陈平4万斤黄金,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任由陈平使用,这对陈平是个极大的信任,所以陈平极力完成反间的任务,以报答刘邦。

陈平离间的第一个对象是项羽的大将钟离昧。他偷偷用金钱收买项羽军中的人为间谍,要他们在项羽军中传播:钟离昧的功劳很大,但项羽不分封他为王。他心中不服,打算投降刘邦,共同消灭项羽后,分王项羽的领地。这一流言传到项羽的耳朵里后,他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轻信了这一谣言,对钟离昧起了疑心,再也不重用他了。钟离昧是当时公认的将才,项羽不用钟离昧,等于自己砍掉了一只手臂,陈平的反间计取得了成功。

陈平离间的第二个对象是范增。当项羽的使者来到刘邦处时,陈平布置招待的人员,一开始故意拿出规格高的豪华饮食之具,当他们见到项羽的使者后,假装惊讶的样子说:“我们以为是范增的使者,原来是项羽的使者!”又把拿进的豪华饮食之具撤走,改用破旧的餐具招待项羽的使者。项羽的使者回来后,就把这个情况如实地报告了项羽。项羽不加分析地认为,范增与刘邦有勾结,因而对他起了疑心,不再看重范增的建议了。

当时项羽正在围攻荥阳,范增认为荥阳是刘邦在第一线

的关键据点，应当集中兵力尽快攻下荥阳，这样刘邦的前线就会瓦解。项羽不信范增的话，并未抓紧时间趁刘邦在荥阳防线尚未巩固之机，集中力量攻取荥阳。他怀疑范增的建议，是让他上刘邦的当。

范增见项羽对自己起了疑心，不信任他，非常伤心。因为他从跟随项梁开始，就一心一意帮助项氏叔侄夺取天下，也一直受到他们的尊重和信任。现在项羽受了反间计，不再信任他了，他觉得再留下来也没有多大用处，就找到项羽说：“天下的形势已经基本定下来，请你今后自己好好努力吧！我老了，希望告老还乡，死在故土！”

项羽对范增的要离去，并未作任何挽留。范增在盛怒之下，离开了项羽。由于心情忧郁，还没有走到彭城，背上就长了痈疽，不治而死。

陈平的反间计，在钟离昧和范增两个人身上，取得了成功。钟离昧和范增都很忠于项羽，范增因为项羽的猜疑，气愤而死；钟离昧在项羽失败后，投靠到自己的老朋友韩信处。韩信怕自己收留钟离昧引起刘邦的不信任，钟离昧知道后不愿牵连朋友，在韩信面前自杀。他们两人都长期追随项羽，为项羽出谋献策，立下了不少功劳。项羽本应该了解他们对自己的忠诚，不应轻信流言，对他们发生怀疑。可是项羽却猜疑他们，上了陈平反间计的当。

陈平对龙且的反间，看来未起作用。因为后来韩信攻齐国时，项羽曾派他率军支援齐国，兵败战死，这说明项羽仍对他很信任。周殷后来攻英布入九江时，被刘贾和英布诱降，这也可能与陈平的反间计有关。

广武对话

刘邦再次占领成皋以后，为了控制敖仓的粮食，就驻军敖仓西面靠近黄河的三室山上的广武。项羽解了守荥阳的钟离昧之围后，也驻军荥阳西面，与刘邦在广武的军队相对峙。

这时彭越在项羽的后方又活跃起来，攻城略地，切断项羽的粮食运输线，使他的军队难于再和刘邦持续对峙下去。项羽很想找一个能尽快解决战争的办法，这时想到了在他手中的刘邦的父亲和妻子。

彭城之战后，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就成了项羽的俘虏，项羽一直没有处理他们。这时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迫使刘邦投降，项羽就想到了在他们身上做文章。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放在一个很高的肉案子上，派人对刘邦说：“你如果不马上投降，我就要把你父亲杀了。”

刘邦从小就与父亲的关系不好，他父亲经常指责他不务正业。他见项羽以他父亲相威胁，不但没有设法救他父亲，反而毫不以为然地回答项羽说：“我和你都受楚怀王之命攻秦，并互相约为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想吃你父亲的肉，做好以后希望也能分给我一碗吃。”

项羽听了刘邦对他父亲毫无情义的回答，很忿怒，就想杀了刘邦的父亲作为报复。项伯怕杀了反而加深彼此的仇恨，就劝项羽说：“天下到底谁胜谁败，现在还很难断定。争天下的人，都不会顾及家属而舍弃取得天下的志向，所以虽然杀了刘邦的父亲，也不能迫使刘邦让步，反而会增加彼此的仇怨，还是不杀为好。”项羽听从了项伯的劝告，刘邦的父亲才保住了

性命。

一计不成，项羽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就是与刘邦进行个人的决斗，以决定双方的成败。他派人向刘邦挑战说：“因为我们两个人争天下，造成这几年战乱不休，生灵涂炭。我现在向你挑战，两个人决斗，看谁是胜利者。天下不要再因我们两个人的争雄，百姓跟着受苦受难了。”刘邦听了项羽的挑战，觉得很好笑。项羽是一代勇士，刘邦当然斗不过他，也不会与他进行个人的决斗，就回答项羽说：“我只和你斗智，不愿和你斗力。”

项羽见刘邦不敢与他进行个人的决斗，就令部下的一个壮士站出来，一再向刘邦的军队谩骂挑战。刘邦有一个射术很高的楼烦（今山西神池县一带）骑士，等到项羽的壮士第三次挑战时，刘邦令他射杀了这一壮士。

项羽见自己的壮士被射杀，怒不可遏，亲自披甲持戟全副武装上阵向刘邦挑战。楼烦骑士见项羽军中又出来一个壮士，他不知道就是项羽，正要向他射箭时，项羽对他怒目而视，楼烦骑士一看，十分害怕，手发抖，眼不敢看，射不出箭来，赶忙跑回军营里，不敢再出来。

楼烦骑士一直很勇敢，刘邦对他的这种反常表现很奇怪，就派人打听原因，有认识项羽的对刘邦说，项羽亲自出马来挑战了。刘邦听了也大吃一惊，他亲自到前线阵地一看，果然是项羽。

于是，刘邦和项羽这两个争夺天下数年的死对头，就在广武的前沿阵地，彼此进行了对话。

刘邦当面质问和数落了项羽的 10 大罪状：

第一，我与你都受楚怀王之命，出兵进击暴秦，有约在先，先入关中者王之。你为什么负约，不让我王关中，而王我于蜀汉？

第二，你为什么要假托楚怀王之命，杀了宋义，自己代他为上将？

第三，你救了赵国之后，已完成了楚怀王给你的任务，就应该向楚怀王报告请示，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为什么擅自带领诸侯兵入关？

第四，楚怀王有令在先，要反秦起义军入关中后不要暴虐，以争取秦百姓的支持。你为何烧毁了秦宫室，掘了秦始皇墓，把大量钱财据为己有？

第五，秦王子婴已经投降，你为什么还要杀了他？

第六，你为什么在新安用欺骗的办法，活埋了秦的投降将士 20 万，反而重用镇压和屠杀反秦起义军的秦降将，分封他们为王？

第七，你的亲信分封的都是好地方，而改封原来的王到坏地方，新的封王驱逐旧的封王，互相不服，这不是要造成混乱吗？

第八，你把义帝驱逐出彭城，自己在那里建都，又夺了韩王的封地，合并了梁、楚的地方，为什么自己独占了这么多的地盘？

第九，义帝是大家拥立的，你为什么偷偷派人在江南把他杀了？

第十，你是义帝的臣，而却杀了主子；敌人已经投降了，你还把他们杀了；你想当霸主，可处理事情不公平；对于制定的

盟约，你不守信义。你的所作所为，不是已经失去天下人的信赖了吗？

刘邦指责完项羽的 10 大罪过后，才明确回答不与项羽进行个人决斗的原因是：“我举义兵与各路诸侯共同反对你，是为民除害，并不是个人之间的仇恨。我指挥这批你看不起的刑余罪人，就可以打败你，把你杀了。我用不着亲自与你决斗！”

不知项羽是不善于言辞，还是理屈词穷，两个人在广武军阵前的这场对话，变成了刘邦单方面的指责和质问。

项羽听了刘邦的这些指责，当然心里很不舒服。

当刘邦在阵前滔滔不绝地指责项羽的时候，项羽暗中布置埋伏下强弩，趁刘邦不备，弩箭射中了刘邦的胸部。强弩劲力大，胸部是要害，刘邦怕部下见自己胸部受伤，影响军队的士气，急中生智，就假装射中的是脚，扞脚大叫说：“我的脚中了项羽的伏弩！”立即从阵前退下来。

刘邦受伤很重，卧床不起。张良怕因此而动摇军心，就强使刘邦起床，装出伤不重的样子，出来慰问军队，以安定士卒的情绪，防止项羽趁机进攻。

刘邦本来胸部受伤就很重，又强行起床到各个军营去慰劳军队，使伤势更加重了。因为在广武前线不好养伤，就回到成皋。在成皋经过一段休养，伤势基本痊愈后，就回到了关中，处理了一些后方的问题。

刘邦只在关中的栌阳停留了四天。他设酒宴慰问后方的父老，征求他们的意见，决定凡在前线战死的士兵都要给他们做衣服、买棺材，送回家乡安葬。随后，他就带领萧何在关中征发的一些新兵，又匆忙返回广武的前线。

鸿沟为界

当刘邦从关中率领一批新兵返回成皋前线时，北貉（居住在今东北一带的少数民族）和燕也派来了支援的骑兵。这时彭越在项羽的后方又往来袭击他的运输线，韩信也从齐国向项羽的后方发动进攻，项羽在前线的军队兵疲粮尽，处境非常困难。

刘邦抓住这个机会，向项羽展开了政治攻势。他先派陆贾到项羽处，以请他释放自己的父亲和妻子的名义，试探项羽的口气，项羽没有答应。但陆贾已经探明了项羽军情的虚实和他个人的心情。陆贾回来向刘邦报告后，刘邦又选派善于口才的一位姓侯的儒生，去劝说项羽和解。

从项羽的性格来说，他当然不甘心接受未击败刘邦的任何和解；但从他当时的处理来说，已经再无力量继续与刘邦在荥阳、成皋一带对峙下去了。要么等待刘邦击败自己，要么接受刘邦提出的暂时妥协，项羽只能从中进行选择。项羽虽然有宁死不屈的性格，但他当时还是认清了形势，接受了刘邦提出的暂时的和解和妥协。

刘邦提出以鸿沟（在荥阳东南 30 里，是秦始皇时开凿的一条引水渠）为界，东面归项羽，西面属刘邦，刘邦和项羽中分天下的条件，项羽接受了。

项羽释放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他们在彭城之战刘邦失败后，就被项羽作为人质扣留，现在刘邦全家才得到了团聚。当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回到刘邦军中时，大家兴高采烈，庆贺刘邦全家的团圆，士兵都高呼万岁。

项羽释放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后，就率军东归，这时刘邦也准备率军回关中休养。可是张良和陈平劝刘邦说：“现在我们已占有大半个天下，各路诸侯又都归附和支持我们。而项羽兵疲粮尽，孤立无援，处境困难。这正是消灭项羽的最好机会。如果不借这个机会击败项羽，等到项羽的力量恢复过来后，就难打败他了。现在不趁机击败项羽，就等于是养虎，给自己留下了后患。”

刘邦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就首先破坏了自己提出的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的和平协议，越过鸿沟追击项羽。刘邦与项羽在新的战场上，重新开始了争夺战，暂时的妥协与和平未能实现。

固陵之败

汉五年（公元前 202 年）冬十月，刘邦尾追项羽东撤的军队到达阳夏（今河南太康县）南，就停止前进。他已派人令韩信和彭越率军来这里会合，共同进攻项羽。可是刘邦在这里左等右等，也不见韩信和彭越率军来会合。项羽见刘邦的军队停滞不前，知道他是等别的军队来会合，不敢单独与自己决战。项羽趁刘邦畏缩不前之机，回军反击刘邦，两军在固陵（今河南淮阳市北）一战，刘邦大败，不得不坚壁据守，等待援军。

刘邦单靠自己的力量，暂时还无法战胜项羽，可是援军又不来，刘邦再次陷入困境。他问张良：“韩信和彭越不按时来会师，我们又不敌项羽，你有什么办法呢？”张良说：“项羽即将被消灭，韩信和彭越都立了大功，可是他们还没有得到封地，当然不会来会师了。你如果能分封天下，给他们以封地，马上就

会来会师；如果不分封，他们来不来就很难说了。”

张良接着分析说：“你虽然已封韩信为齐王，但韩信很清楚，这并不是你的心意，所以他追随你的信心还不坚定。彭越攻占了原来梁国的地方，原先你为了照顾魏豹，只任命彭越为魏相。现在魏豹已死，可你并未尽快封彭越为王。”

怎么个分封法呢？张良建议说：“韩信家在楚国，他家乡观念重，想得到故乡为封地。你如果把陈县以东至海岸，都分封给韩信；把淮阳以北至谷城，都分封给彭越，让他们各自去为自己的封地而战，打败项羽就容易了。”

刘邦听了张良的话，才恍然大悟。他马上派使者去韩信和彭越那里，按张良的意见，割地分封他们为王。韩信、彭越果然回报说：“我们这就马上出兵击项羽。”于是韩信从齐国，彭越从梁地，很快就率大军来固陵与刘邦会师，大大增加了刘邦的力量。

这时，刘邦派到项羽后方进行骚扰活动的刘贾，也南渡淮河围攻寿春（今安徽寿县），又占领了城父（今安徽涡阳县西北）。刘邦听说项羽的大司马周殷对项羽不满，又派人诱降了周殷。周殷叛项羽后，以舒县（今安徽庐江县）的兵力攻占了六县（今安徽六安县），帮助刘贾占领了九江郡，迎接英布返回九江王的封地。接着，刘贾、英布、周殷又合军北上，从侧翼配合刘邦对项羽的攻势。

刘邦在固陵的失败，说明虽然项羽的军队已很疲惫，但刘邦的军队士气也并不高，如果项羽与刘邦的军队单独作战，刘邦未必能战胜项羽。

刘邦的军事优势，不在主战场上，而是他争取了一批诸侯

王的支持，又派出兵力深入项羽的后方，从侧翼和后方打击了敌人。项羽虽然在主战场上一直未处劣势，保持着主动进攻的优势，但他在其他的非主要战场上，特别是在后方的防御上，却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他的支持者纷纷投靠刘邦，自己的处境愈来愈孤立。所以在固陵刘邦虽然战败，还可等待援军；项羽如果战败，则将孤立无援，只能走向更大的失败。

可是刘邦的支持者也并不可靠，韩信和彭越没有按刘邦的要求及时派兵与他会合，结果他吃了败仗，就说明刘邦与他支持者的联盟还很脆弱。这时如果项羽比刘邦早一步，分封韩信和彭越为王，给他们更多更大的权益和地位，是否能把他们争取过来，起码让他们保持中立呢？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因为项羽派武涉去争取韩信时，只是给他讲了形势，并没有针对韩信贪名自负的特点，给他以更高的名和利，所以韩信才不为所动。这时如果项羽给韩信以很高的名利和地位，也可能暂时会使韩信犹豫不定，从而向刘邦讨更高的价。彭越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当时刘邦还没有封他为王，如果项羽给他一个封王，彭越也可能以此与刘邦讨价还价，暂时不会出兵支持刘邦。

可是当时项羽没有采取争取和拉拢韩信和彭越的任何行动，而却让刘邦去做了。这可能是与项羽报复思想严重，而又过于迷信武力有关。他对韩信击杀了自己的亲信大将龙且，彭越一再骚扰自己的后方，当然恨之入骨。他不愿争取和拉拢他们，而是想寻求机会，率兵将他们击败后，进行报复。这种狭隘的军事报复思想，限制了项羽在政治上应该采取的一些行动，从而愈来愈孤立了自己。

垓下之围

刘邦等到韩信、彭越、项布等援军到达固陵后，就对项羽发动了攻势。项羽的军队退守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被刘邦的军队所围困。他兵少食尽，外无援兵，处境十分困难。

项羽这时只有不到 10 万的军队，而韩信就率军达 30 万。刘邦让韩信为前锋，韩信的部将孔熙和陈贺为左右军。刘邦居阵中，周勃殿后。韩信先率军向项羽进攻，战斗不利，暂时退却。这时孔熙和陈贺率左右翼的军队又向项羽军进攻，项羽军迎战不利，韩信趁机率前锋军又反攻，项羽军战败，只得坚壁据守垓下。刘邦的军队借助自己数量上的优势，将项羽的军队重重包围起来。

刘邦为了动摇项羽的军心，找了一批会唱楚国地方民歌的将士，让他们夜里在军营中大唱楚歌。项羽听到四面皆楚歌的声音，十分吃惊。他自问：“难道刘邦已经全部占领了楚国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楚人唱歌！”项羽被四面的楚歌声所感动，夜里起来在军帐中独自饮酒解闷。

项羽有一个喜爱的美人姓虞，常跟随在他身边；有一匹骏马名骓，是他常骑坐的。这时美人虞姬和名马骓，都在他身边，他听到四面的楚歌声，看着自己喜爱的美人和名马，心情十分悲痛，就自编自唱了一曲慷慨悲壮的楚歌。歌词是这样的：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反复唱了几遍这首自编的歌，虞姬也和唱了一首自编的歌。歌词是这样的：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虞姬唱完这首歌，就在项羽面前自杀而亡。项羽抚摸着虞姬的尸体，痛哭不已。左右的随从，听到项羽的歌声，都起来了。他们目睹了这幕悲痛离别的场面，都暗暗哭泣，不敢看项羽痛不欲生的样子。

项羽对自己的处境虽然很绝望，但他绝不是一个束手待擒的英雄，他还要为自己的命运去拚搏，去战斗。他骑上自己的名马骓，带领能跟随他战斗的骑兵 800 多人，夜里偷偷地从南部突围出来。到了天明的时候，刘邦的军队才发现项羽突围了。刘邦让骑将灌婴率 5000 骑兵去追击项羽。

项羽突围渡过淮河后，还剩下 100 多名骑兵跟着他。到了阴陵（今安徽淮南市东），迷失了道路。他们向一个田夫问路，这个田夫不知是出于对项羽的反感，还是不知道他是项羽，欺骗项羽说向左走。照他指的路走下去，结果陷入大泽中，行动很困难，所以被灌婴的骑兵追上。

项羽退出大泽后，带领部下东去，到了东城（今安徽定远县）时，只有 28 个骑兵还跟着他，而灌婴的数千骑兵这时已经追上来。项羽估计自己难于逃脱追兵，就停下来对他的 28 个部下说：“我起兵反秦到现在已经 8 年，身经 70 余战，阻挡我前进的没有一个不被攻破，我所要攻取的没有一个不被征服，从来没有吃过败仗，所以才得以称霸天下。可现在我竟被围困在这里，这是上天要亡我，不是我打不胜的罪过。现在固然只有死路一条，但我愿再次快速决一死战，斩一敌将，断一敌旗，突破敌人的包围。让你们好知道，并不是我不能打胜仗，而是

上天要灭亡我。”

项羽说完，就让仅存的 28 个骑兵，分为四队，组成一个方阵，灌婴的骑兵将他们围了数重。项羽对部下说：“我为你们斩一敌将。”他下令 28 骑向四面驰出，约定到山的东部合为三处。项羽大呼驰下，灌婴的骑兵都被吓得连连后退，项羽趁势杀了一名敌将。

这时杨喜为灌婴的骑将，他见项羽杀了一名自己的战友，就愤而追杀项羽。项羽回头怒目斥之，杨喜人马俱惊，跑了数里才镇定下来。

项羽的骑兵在山的东部会合为三处，灌婴的军队不知项羽在哪一处，就把三处都包围起来。这时项羽又飞驰而出，斩了灌婴的一名都尉，杀了几十个骑兵。

项羽把分在三处的骑兵会合在一起，损失了两名骑兵，还剩下 26 骑。他对部下说：“你们看，不是我不能打胜仗吧！”剩下的 26 名骑兵对项羽的勇敢善战十分佩服，他们齐声说：“正象你说的那样。”

乌江自刭

项羽虽然只剩下 26 名骑兵跟着自己，但凭着他的勇敢，又从东城突围，向东南方向退至长江边的乌江（在今安徽和县北）。他想从这里渡过长江，就可以摆脱追兵，再以江东为据点，图谋再起。

他正在找船的时候，乌江亭长听说项羽战败，很可能从这里渡江，已准备好一条船在这里等他。他见项羽果然来到这里，就驾船迎着项羽说：“江东虽然不算大，但也有土地千里，

人口数十万，足以称王。这里现在只有我这条船，请你赶快乘船渡江。刘邦的追兵到了，他们找不到船，渡不过江去。”

项羽这时突然又改变了渡江的打算。他可能觉得在乌江亭长面前，自己乘船逃跑，有失自己的尊严，所以笑着对这位亭长说：“上天要灭亡我，我何必还要渡江逃命呢！我率领八千江东子弟渡江而西，参加反秦斗争，现在没有一个人跟着我回来，即使江东父老兄弟可怜我，仍然拥戴我为王，可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呢？就是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说出来，我自己心里会不感到惭愧吗！”

项羽接着对这位亭长说：“你是一位长者，我很感谢你的好意。这匹马我已经骑了五年，他是一匹好马，能日行千里，跟着我出生入死，没有打过败仗。我不忍心杀了它，把它送给你，请你好好养着它。”

项羽把他的名马骓送给乌江亭长，亭长带着马驾船渡江后，他就徒步持短兵器与追兵接战，一连杀了追兵数百人，他自己也受伤10余处。这时他看见刘邦的司马吕马童也在追兵中，吕马童曾是项羽的部下，后来背叛项羽投降了刘邦，项羽就指着他说：“这不是我的老朋友吕马童吗？”吕马童因为过去项羽对他很好，可他背叛了朋友，现在见到项羽觉得很惭愧，就背过脸不敢正视项羽，对旁边的王翳说：“他就是项羽！”

项羽已经无力再作最后的挣扎，他当然也不愿做敌人的俘虏，就对这些刘邦的追兵说：“我听说刘邦悬赏千金，要购买我的头，还要封万户侯。现在我把头给你们，你们可以拿着去立功，成全了你们的心愿吧！”项羽说完，就拔剑自刭而死。

离项羽最近的王翳，见项羽自杀了，马上过去割取了他的

头。别人也为了立功，争夺项羽的尸体，互相践踏、彼此残杀者有数十人。最后，杨喜、吕马童、吕胜和杨武，各争得一块项羽的尸体。他们 4 个人再加上取得首级的王翳，因为追杀项羽有功，后来都被刘邦封为列侯。

项羽 24 岁时，跟随叔父项梁起兵反秦，勇敢善战，屡立战功，成为推翻秦统治的一名主要将领。这位叱咤风云，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却在与刘邦争天下中，由优势转为劣势，最后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自刭而死，时年仅 31 岁。

第二章 西汉王朝 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汉初巩固和 加强大一统王朝统治的措施

刘邦对异姓王暂时的妥协,使他顺利登上了皇位。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即帝位于汜水(今山东曹县附近)之阳,定国号“汉”,史称“西汉”或“前汉”。这位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就是历史上的汉高祖。

刘邦即位之后,最初建都于洛阳;不久采用齐人娄敬之说,将都城迁往关中。娄敬针对汉初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提出迁都关中以防患未然。刘邦征求臣僚们的意见,多数大臣主张建都洛阳,只有谋臣张良持异议。张良着眼于汉初异姓王拥兵自重的政治形势,认为洛阳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地,而关中沃野千里,三面有天险可以固守,一面可以东制诸侯,进可攻而退可守。这就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

之国”(《史记·留侯世家》),从而支持娄敬迁都的建议。于是,刘邦即日西入关中,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汉王朝迁都长安,固然占据了秦中天险,然而汉初民心未集,社会依旧动荡不安。刘邦迁都刚刚两个月,叛乱事件就相继发生。高祖五年(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起兵叛乱,刘邦亲自率军征讨。最后臧荼兵败被俘,刘邦立卢绾为燕王。接着,原项羽的部将、颍川侯利几,也举兵叛乱。刘邦再一次将兵亲征,击破利几的反叛。不仅如此,那时的汉王朝面临着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其中如重建新的封建统治秩序;恢复极度凋敝的社会经济;抗击北部匈奴贵族的骚扰;以及异姓王势力的存在等,构成了汉初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它们直接关系这个新生封建王朝的生存和巩固,迫使西汉统治者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些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

一、郡国并行 混合政体

汉初的社会形势错综复杂,刘邦即位伊始,首先着力于健全汉家制度。它们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礼仪等项制度。这是建立西汉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步聚。史称“汉承秦制”,其实并不尽然。汉初各项制度,既承袭秦制,又变革秦制,以适应汉初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政治制度方面,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这是一种郡县制和封国制相结合的混合政体,与秦朝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有明显的区别。根据这种混合政体,汉王朝分别由中央行政机构、地方郡县两级组织,以及各诸侯王国三部分组成。皇帝是最高

的统治者。皇帝之下,中央的行政机构,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即汉代人统称的“三公”,执掌行政、军事、监察诸职。三公之下,又设“九卿”,分管各项政务。三公九卿成为首脑机构,发挥国家职能的中枢作用,并向皇帝负责。

汉初因袭秦制,以丞相为最高行政长官,但设置情况有变化。秦朝原来设左、右丞相,刘邦即位,改置丞相一人,由萧何出任此职。高祖十一年(前196年),萧何与吕后谋杀淮阴侯韩信有功,再次受封,丞相更名为相国。惠帝五年(前190年),相国曹参死后,又恢复丞相原名,置左右丞相二人,以右丞相为尊。文帝二年(前178年),再改置丞相一人。

丞相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实际权力很大,是朝政方针的主要决策人之一。汉初翦灭异姓王,丞相萧何不仅参与决策,又是具体执行者。惠帝及吕后时期,汉王朝推行无为而治的大政方针,起决定作用的是相国曹参,还有后来的左丞相陈平。不仅如此,丞相有权荐任官吏,诛杀犯官,受理郡国计簿,以至于谏止帝命,抵制皇帝诏令等等。汉惠帝死后,吕后要立诸吕为王,右丞相王陵当面回绝,抵制吕后之命。丞相不仅权重,而且地位极尊。汉武帝以前的丞相,多由开国功臣出任,无一不位居列侯。皇帝对于丞相,有的甚至殊礼倍加。萧何任丞相时,刘邦给予“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史记·萧相国世家》)的礼遇。萧何病重之时,汉惠帝亲临探视,连继任丞相的人选,也征询萧何的意见。

因丞相政务繁重,汉初设立丞相府,协助处理各种政务。丞相府设长史二人,总领诸曹事务,各曹职务则由掾属主管。

太尉职掌政事,汉初不常设置。太尉一职或置或废,大都

与征伐或时局有关。汉文帝三年(前 177 年),罢太尉官,归属丞相,其职务由丞相兼任。如这年五月,匈奴大举入侵北地(郡城今甘肃庆阳西北),即由丞相灌婴率军还击。此后太尉一职,省官达 20 余年之久。直到景帝三年(前 154 年),七国叛乱发生,太尉职衔又恢复了 4 年时间。

太尉虽然职掌武事,但是没有调兵之权。太尉统率军队,必须有皇帝的符节,才可以行使职权。它的属吏很少,或者不置官属。

御史大夫在行政上,是丞相之副,协助丞相处理朝政事务。其职掌监察百官,举劾不法;主管律令秘籍,制诏转达;以及审核计簿等。它的官秩相当列卿,但是职重权大,地位远在列卿之上。它作为皇帝的高级近侍,汉初许多国军事大事,往往由御史大夫承办。如韩信攻齐,刘邦派御史大夫灌婴将郎中骑兵东属韩信,破齐军于历下,实际上灌婴同时也起到了监韩信军的作用。陈豨谋反时,刘邦率军亲征,御史大夫赵尧随军平叛。刘邦晚年,御史大夫周昌奉命左迁(贬秩)为赵相,以保全赵王如意免遭吕后的迫害。御史大夫不仅执行上述特殊使命,也处理某些重大的朝政事务。如景帝初年,汉朝与匈奴和亲,办理此事的,就是御史大夫青翟。后来,又是御史大夫晁错提出削藩之策,举劾袁盎受吴王财物案。在西汉时期,御史大夫的职权,大有逐步扩大之势。

御史大夫的主要属官有两丞,即御史丞和御史中丞。其中御史中丞又称为御史中执法,主要职守掌兰台图书秘籍,监察郡国吏治,接受公卿奏事,举劾公卿违法行为等,是御史大夫所属的重要官员。御史大夫一些职掌,即由御史中丞具体执

行。

“三公”之下的“九卿”，包括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等，与秦制相比较，它们的名称和职权有变化。

太常，秦朝称奉常，汉初曾几次更改名称。西汉建立，叔孙通制订朝仪，刘邦命令他出任此职，即称太常。惠帝时恢复奉常旧名，至景帝又改称太常。太常职掌宗庙礼仪，文景立博士，武帝兴太学，也属太常管辖。

郎中令，掌禁中侍卫皇帝诸职。属官有大夫，掌论议；有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谒者，掌宾赞受事。汉代郎官多由高官子弟充任，又是皇帝的近臣，因而由郎出补的地官吏不在少数，是当时仕进的重要途径。

卫尉，掌宫廷守卫之职。主守护宫门，在宫门内设庐舍屯兵宿卫，夜徼宫中等。景帝时，曾一度更名为中大夫令，不久又复称卫尉。

太仆，掌舆马。包括宫廷车马、皇帝舆驾仪式、朝廷马政，都属太仆管辖。景帝时期，边郡设苑养马，多至数十万匹，即由太仆属官掌管。

廷尉，掌刑辟。汉初对刑狱审判曾规定，凡郡县刑狱不能决断的，移交廷尉决断，可见它是最高司法官。景帝时，改名为大理。

典客，掌诸侯王、少数民族入朝事务，主接待、礼仪等；又接待郡国上计吏。景帝时，更名为大行令。

宗正，掌皇帝亲属事务。

治粟内史，掌谷货，即主管全国财政。如赋税钱谷收支、各

地贡物调度等。景帝时,更名为大农令。

少府,掌皇帝财政。如管理山海池泽之税,供给皇帝之需。其属官繁多,机构庞大。

“九卿”之外,还有中尉掌京师治安;将作少府掌治宫室,景帝时更名将作大匠;典属国掌少数民族事务;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时更名都尉;等等。

总之,汉初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基本沿袭秦制,但是名称及其职权有所变化。到汉武帝时期,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加强,职官制度的变化就更大了。

汉初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也如同秦朝推行郡县制。郡设郡守,主管一郡的民政,如劝民农桑、征收赋税、司法治安、选举孝廉、典郡兵事、属县吏治等。景帝时,更名为太守。

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秦朝设监御史监察诸郡。汉初废御史监郡之制,至惠帝时,始派御史监京师之地(三辅);但文帝时,又以丞相史监郡。²⁰余年制度两改,表明它在汉初并非定制。

秦朝设内史掌治京师,汉初仍承袭秦制。景帝时,分置左、右内史。内史为京师地方长官,但是官秩相当列卿,比一般郡守高。

郡之下为县、乡。县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职掌一县民政。又设县尉,主县内治安、征发戍卒等。还设县丞,协助县令、长,又掌司法。乡设三老、嗇夫、游徼。

然而,汉初全国大约 54 个郡,由汉朝中央直接统辖的有 15 郡。它们是:河东郡、河南郡、河内郡、云中郡、广汉郡、南阳郡、南郡、汉中郡、巴郡、蜀郡、陇西郡、北地郡、上郡、上党郡、

内史郡等。这 15 郡不包括许多公主列侯的食邑,其余 39 郡则分封为诸侯王国。这就是说,汉初虽然因袭秦朝的政治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推行郡县制,但是它只在汉朝中央直接控制的部分地区实行,而全国半数以上地区则实行诸侯王国制,所以封国制在汉初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关于汉初的封国制,将在后面专节介绍。

在法律制度方面,汉初制度《汉律》,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刘邦初入关,与民约法三章,成为汉代立法之始。虽然三章之法蠲除烦苛,但是它已不能适应汉初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萧何摭摭秦法,在秦《六律》基础上,加以补充修订,增加《户律》、《兴律》、《囹圄律》三篇,合成《汉律》九章。《九章律》的内容,包括《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囹圄律》等。《九章律》保留秦法某些酷刑,因此在惠帝、吕后、文景时期,曾对它进行过增删。《汉律》经过不断增补、修订,其内容也日趋繁杂。

在军事方面,汉王朝建立了新的军制。与汉初政治制度相适应,军队分为京师之兵和郡国之兵两种。京师的屯兵又分南军和北军,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领。卫尉统率的南军,由朝廷直属各郡征调来的卫士组成,人数大约 2000 人左右,主要任务是守卫皇宫,出充皇帝的随从。他们分散驻守,没有营垒,因在北军之南,所以称“南军”。中尉统率的北军,多由三辅地区选调的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组成,人数有数万人之多,主要任务是防守京城长安。因其营垒在未央宫之北,所以有“北军”之称。

郡国之兵指地方军队,由应役男子组成,统领于郡守尉或

诸侯国中尉。每个成年男子在应役期间，必须服兵役 2 年。地方军队的兵种，可分为材官（步兵）、骑士（骑士）、楼船（水兵）三种。这些不同兵种的军队，是根据地区特点而建立的。朝廷遇有军事需要，随时可以向各地征调。

上述刘邦在政治、法律、军事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目的在于恢复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汉王朝先后颁行一些有利于恢复社会生产的法令。

二、休养生息 重农抑商

西汉初期，经过秦的残暴统治和长期的战乱，到处呈现一派残破的景象，甚至出现千里沃野空无一人的状况。有一次，刘邦途径曲逆（今河北完县东），见到那绝无仅有的城楼，对随从臣僚感慨地说：“多么壮观的县城呀，我走遍天下，只有洛阳和曲逆了！”其实，当时曲逆破坏相当严重，户口由秦朝时期的 3 万户减为 5000 户，锐减 $5/6$ ，但刘邦却赞叹不已，可见其它城邑大多成了一片废墟。

那时由于人口散亡、土地荒芜，社会经济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西汉王朝建立之初，连皇帝用的马车，竟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将相往往只能乘用牛车。

汉初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刘邦迁都关中时，开始暂居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不久萧何建成未央宫，刘邦见宫阙壮丽，指责他不该在这时修建宫室。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国家财力匮乏的缘故。汉初经济形势的严重性，与汉王朝存亡息息相关，迅速恢复极度凋敝的社会经济，是汉王朝面临的迫切

问题。为此,刘邦即位不久,立即颁行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诏令。

第一,罢兵归农。高祖五年(前 202 年),刘邦颁布军队复员令。根据这项法令,凡复员的军吏卒,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赋徭。爵位在第七等公大夫以上的,皆令食邑,优先分配田宅;爵位在第七等以下的,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这项罢遣军吏卒归家的法令,使一部分有高爵(第七等爵公大夫)的军吏卒,得到了食邑和田宅的封赐,转化成为新的军功地主,从而扩大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大批遣归农村的一般士卒,则转向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经济。

第二,动员流亡之民回乡。根据诏令规定:凡因战乱而逃亡山泽之间,在国家户籍上未加登记的流民,“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汉书·高帝纪》)。这类逃亡之民,成份比较复杂,既有原来秦朝的地主,也包括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复故爵田宅”的结果,使逃亡的自耕农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同时对原有地主的身份、田宅的确认,又扶植和保护一些地主的经济。这对于稳定封建秩序,发展农业生产都是有利的。

第三,增加农业劳动人口。汉初因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增加农业劳动力,是发展生产的关键。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奴婢,有的因各种原因,继续被迫卖身为奴。奴婢的大量存在,不论属生产性奴婢,还是非生产性奴婢,都使汉王朝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减少,也不利提高奴婢积极性。因此,释免奴婢是增加农业劳动人口、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途径之一。刘邦即位那年,诏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汉书·高帝纪》),即恢复他们自由民的身份。

此外,汉初又以奖励生育,作为增加劳动人口的另一途径。高祖七年(前 200 年),刘邦诏令“民产子”,可以免除徭役 2 年,以资鼓励。

第四,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汉初继承秦的“上农除末”的农本思想,对工商业采取抑制的办法,以保证西汉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刘邦下令不许商人穿用丝织品、乘车辆,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规定商人与奴婢一样,每年必须加倍交纳人头税,对商人行实重税的政策。此外,还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准入仕,则进一步从政治上打击商人,限制商业的发展。汉初所实行的抑商政策,为的是防止农业劳动力流散,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上述这些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扶持和发展地主经济,一是使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结合,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巩固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西汉继秦之后,以农为立国之本,只有发展农业生产,社会治安有了保障,封建统治秩序才能巩固。而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又为汉王朝提供更多的财源,这是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根本出路。所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汉初一项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汉王朝还建立周密的户籍制度,作为对农民征派赋税和徭役的根据。汉初的赋税主要有如下几种:

田租:或称田赋。汉初田租的征收率为十五税一,比秦朝有所减轻,后来曾一度提高田租率。田租是根据所占有土地的收成,向私人征收的土地税,因此减轻田租的税率,更加有利于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同时,对减轻自耕农的负担,鼓励开垦荒地,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田租之外,还要缴纳刍藁,是一种

附加税。

口赋：包括算赋、口钱两种。这是按人口数征收的人头税。汉初恢复人头税，规定年满 15 岁至 56 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要向官府缴纳 120 钱为一算，称为算赋。汉代算赋的征收并非固定不变，有时它作为一种经济手段，以一倍甚至数倍加以征收。如上述对商贾、奴婢，以及超年限未婚女子的特别加征，就是例证。

口钱是对未成年儿童征收的人头税。凡 7 至 14 岁的男女儿童，每人每年要缴纳 20 钱。

汉代以每年八月作为征收口赋的时间。届时地方官吏还要核对人口数，区分年龄大小之别，以便按户登记造册，进行征收。

献费：指汉初地方郡国，每进进奉朝廷的贡钱。这是一项沉重的赋税负担，开始没有定数，地方官吏往往随意征收，人民不堪其苦。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刘邦诏令各地按所辖地区人口数计算，每人每年缴纳 63 钱。

更赋：更赋问题，今无定论。史籍有关更赋的记载，见于西汉中期以后。据载这是一种短期徭戍的代役钱，凡不去戍边的，每人每年出钱 300 交官府，称为过更。这种过更钱的数目由官府规定，又是除戍者之外，每人必须交纳的代役钱，因而逐渐形成一项新的赋税。这就是更赋。更赋始于何时，史无明载。

汉代农民还有徭役、兵役的负担，当时人统称为力役。凡成年男子到傅籍年龄，都要开始承担这两种力役。汉初傅籍年龄，史无明确记载。高祖二年（前 205 年）五月，刘邦屯守荥阳，

“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汉书·高帝纪》),当时似有傅籍年龄的规定。《汉仪注》称,民年 23 开始服役,56 岁免役;三国时人如淳也说,汉律定为 23 岁傅籍,但都没有指明始于何时。景帝二年(前 155 年),定为 20 岁傅籍。唐人颜师古认为,这是变更汉初制度,旧法为 23 岁。看来汉初傅籍的年龄,或许是 23 岁,即使如景帝定为 20 岁,也比秦朝晚了 3 年,武帝以后即定为 23 岁。

三、剪灭异姓诸侯王

长乐宫中室斩韩信

韩信被封为楚王,衣锦回到家乡。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韩信,这次回来,找到常送他饭吃的洗衣妇,送给千金表示感谢;找到后来不再给他饭吃的下乡南昌(今江苏宿迁县西)亭长说:“你是个小人,不能始终做好事。”也给了他几个钱;又找到那个让他从胯下爬过的少年,指着他对部下说:“这是个壮士。他侮辱我的时候,我不是不能杀他,而是杀之无名,所以才忍耐至今。”还给了他一个中尉的官。

韩信为了在家乡显示自己的威风,常常带着一支很大的卫队和仪仗队,到处耀武扬威,巡行县邑。

项羽的大将钟离昧是伊庐(今江苏连云港市西)人,与韩信从小就是好朋友。项羽失败后,钟离昧就逃到韩信处。刘邦与钟离昧曾在荥阳一带交过战,刘邦吃过他的苦头,所以很恨钟离昧。他听说钟离昧藏在韩信处,就下令要韩信把他捉拿交

来。韩信置之不理。

刘邦本来对韩信就十分不放心，正好这时有人上书报告韩信谋反。刘邦不知道怎么处置好，就征求一些主要将领的意见。这时一些将领立功心切，纷纷请战，建议刘邦“马上发兵，把这小子捉拿回来，易如反掌。”可刘邦深知韩信的厉害，征服他并不容易，所以对一些将领的请战，并未表态。

刘邦知道陈平一贯沉着冷静，考虑问题周到，就问陈平的意见。陈平先不表态，而是反问：“各位将领有什么意见？”刘邦说：“他们主张马上发兵征讨。”陈平又问：“告发韩信谋反的事，外边有人知道吗？”刘邦回答：“没有。”陈平再问：“韩信知道吗？”刘邦回答：“他还不知道。”

陈平了解到告发韩信谋反的消息还没有传出去，心中就有了数。但是他没有先谈自己的意见，而是问刘邦：“你的兵比韩信的兵强吗？”刘邦如实回答说：“不如韩信。”陈平又问：“你的将领中指挥作战有比韩信强的吗？”刘邦又老实回答说：“没有赶上韩信的。”陈平这才总结说：“你的兵不如韩信精，将不如韩信强，可你还准备举兵讨伐韩信，这不是促使韩信叛乱吗？你这样做，我很为你的处境担忧。”

刘邦急了，忙问陈平：“你有什么好办法呢？”陈平说：“古时候天子经常借巡猎为名，与诸侯相会。南方有一个云梦泽（在今湖北沙市一带），你假装是去游云梦泽，要各地诸侯到陈县聚会。陈县在韩信封地的西界，韩信听到你巡游而至，必无戒心，要亲自到郊外去迎侯你。到时你只需一名武士，就可以将他捉拿。

刘邦觉得陈平的意见很高明，就派使者去通知各地的诸

侯，说他要南游云梦，要他们都到陈县聚会。刘邦到陈县时，韩信果然上当，亲到郊外迎接刘邦。刘邦早已布置好武士，见到韩信，马上轻而易举地就将他捕捉，缚起来载在后边的车中。韩信大叫：“天下已经平定，就应当杀了我吗？”刘邦说：“你叫喊什么呢？你叫喊就说明果然要反了！”就让武士将韩信的两只手反缚起来，关在囚车中。刘邦用陈平之计，没有费力就把韩信捉住了。

韩信开始接到刘邦要游云梦的通知，心里也是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他想发兵反抗，但考虑自己并没有让刘邦抓到什么反叛他的把柄，刘邦不一定不信任自己；他想去迎接刘邦，可想到刘邦多疑善猜，本来就对自己不放心，到时又怕被刘邦轻而易举地就擒拿住自己。

韩信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有人劝他说：“刘邦不是对你藏匿钟离昧不满吗？你只要杀了钟离昧，拿着他的人头去拜见刘邦，刘邦一定会很高兴，不会怀疑你对他的忠诚。”

韩信也觉得，如果刘邦有什么对自己的不满，就是他藏匿了钟离昧。可是杀了钟离昧去见刘邦，又太对不起朋友了。他请来钟离昧，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钟离昧一听韩信的话，当然很生气，就对韩信说：“刘邦之所以不敢以武力对付你，是因为我在你这里。如果你想杀了我向刘邦讨好，我一死，你也很快就会亡于刘邦之手。”钟离昧说完，大骂韩信不够朋友，就在韩信面前自刭而死。

韩信拿了钟离昧的头在陈县迎接刘邦，自认为这样就会取得刘邦对自己的谅解，可是他完全没有估计到刘邦此行的目的，正是要寻找机会捉拿他。所以韩信一见刘邦，刘邦并不

管他是否带来了钟离昧的头，而是立即将他擒拿。

韩信被捉拿后，后悔上了刘邦的当。他自言自语地说：“果然如人们常说的那样：‘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定，刘邦用不着我了，所以要杀我。”

刘邦并没有拿到韩信谋反的真凭实据，他还不肯贸然杀了韩信，怕激起韩信部下的反抗，引起其他诸侯王的震动。所以回到洛阳后，刘邦只是免去了他的楚王封号，降封为淮阴侯。

韩信知道刘邦捉拿他的原因，是害怕他的才能。他在洛阳，等于被刘邦软禁，整天呆在家里，心里闷闷不乐。他看不起刘邦这一伙新贵，不愿与出身低贱的周勃、夏侯婴等人为伍，所以常常借病不朝见刘邦。有一次韩信有点事去找樊哙，樊哙对他很尊敬，仍以对待楚王的礼来迎送，并一再表示：“大王肯来看臣，对臣是莫大的荣幸！”可是韩信根本看不起樊哙，他出了樊哙的大门后笑着说：“我现在竟然与屠狗卖肉的樊哙为伍了！”

刘邦虽然害怕韩信造反，但他深知韩信的聪明才智，将韩信在洛阳控制起来后，他还经常找韩信研究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有一次，刘邦与韩信讨论了各位将领的长短处后，突然问韩信：“你看象我这样的人，能带多少人马？”韩信直言说：“你不过是个只能率领 10 万人马打仗的将才。”刘邦反问：“你呢？”韩信说：“有多少人马，我能统帅多少，多多益善。”刘邦听了韩信这么吹牛，贬低自己，就笑着反问：“你有多多益善率军的本事，而我只有率领 10 万人马的能力，可你为什么反而被我擒拿住了？”韩信听出刘邦在生气，马上转弯说：“你不善于

用兵,但善于用将,这是我被你擒拿的原因。而且你是代表了上天的意志,不是人力所能胜的。”刘邦听了韩信的解释,怒气当然也就消了。

陈豨原是韩信的部将,后来随刘邦讨伐燕王臧荼有功,被任命为赵相国,负责在代郡(今山西代县一带)守边防,陈豨临上任前,去向韩信辞行。

韩信见陈豨来看他,很高兴。韩信让左右退下,拉着陈豨的手在庭院中来回散步,犹豫再三,才看着天感叹地对陈豨说:“你信得过我吗?我想跟你谈点心里话。”陈豨见韩信欲言又止的样子,知道韩信必有大事相告,就诚恳地对韩信说:“你放心讲吧,我很愿意听从你的意见。”

韩信见陈豨还信得过自己,就开诚布公地对陈豨说:“你要上任去据守的代郡,集中了天下的精兵,而你又是刘邦很信任的大臣,如果有人向刘邦报告你要反叛他,刘邦一定不会相信;可是如果再有人报告,刘邦就会对你发生怀疑;第三次如果有人再告发你,刘邦必然会深信而发怒,亲自带兵去讨伐你。万一到了那个时候,我在首都响应和支持你,你就可以战胜刘邦,取得天下。”

陈豨十分佩服韩信的才干,对韩信的话深信不疑。他听到韩信支持自己,就对韩信说:“你放心吧!我一定按照你的教导去执行。”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陈豨果然起兵反对刘邦,刘邦听了陈豨造反的消息,就对部下说:“陈豨曾做过我的使臣,我很信任他。代郡是重要的边防之地,我才封他为阳夏侯,以赵的相国驻守代郡。现在他背叛了我,代郡的百姓不会支持他,我

要亲自带兵去讨伐。

刘邦率军讨伐陈豨，要韩信跟着他去，韩信借口有病谢绝了。等到刘邦走后，他偷偷派人向陈豨传讯说：“你已经起兵反对刘邦，我们在首都协助和支持你。”

韩信在首都怎么支持陈豨呢？他与家臣合谋，准备在半夜假传诏令，赦免各个官署的奴徒，把他们组织起来袭击留守首都的吕后和太子，占领首都后再与陈豨联合进攻刘邦。韩信的计策准备就绪后，就派人与陈豨联系，确定采取行动的日程。

韩信的一个部下叫乐说，他得罪了韩信，韩信把他关起来准备杀他。乐说的弟弟从他哥哥那里听到了韩信的计谋，为了救他哥哥，他把韩信准备谋反的计划报告了吕后。

吕后听了大惊，她想召问韩信，又怕他的部下趁机发动叛乱。吕后没有了主意，就急忙把萧何叫来商量。萧何听后也很吃惊，因为韩信是自己极力向刘邦推荐的，他怕韩信造反牵连到自己，就向吕后建议：假传有人从前线回来，报告刘邦已打死陈豨的消息，要群臣进宫祝贺，趁机捉拿韩信。萧何还怕韩信借病不去祝贺，亲自去欺骗韩信说：“这么大的喜讯，你虽然有病，也应当勉强一下，不去庆贺不好。”

韩信认为萧何一直对自己不错，他不会骗自己，就上了当。当他一进了宫中，就被吕后事先埋伏的武士所擒，马上把他缚至长乐宫的钟室，斩了韩信。韩信被擒拿后，知道必死，自叹说：“我后悔不用蒯通的计谋，现在反而受了吕后的骗，这不是天意吗！”

刘邦率领讨伐陈豨的大军到了邯郸，见陈豨不守这样的军事要地，大喜说：“陈豨不据守邯郸，反而设防漳水，这说明

他不懂兵法。”又打听到陈豨的将领多商人出身，就对大家说：“我有对付陈豨的办法了。”于是他就偷偷派人以重金收买陈豨的部下，陈豨的不少部下经不起刘邦的利诱，纷纷投降了刘邦。陈豨的叛乱，很快就被刘邦平息。

刘邦击败陈豨回长安后，才听到韩信被处死的消息。他一方面很高兴，为他除掉一个心腹之患；另一方面又很可惜，可惜失去了韩信这样有才干的人。他问：“韩信临死的时候，说过什么话吗？”吕后说：“韩信悔恨没有听蒯通的话。”

刘邦听到蒯通曾劝过韩信谋反，就十分恨蒯通。他对吕后说：“蒯通是齐国有名的一个辩士，我要下令把他捉来杀了。”

蒯通很快就在齐国捉到了，将他传送至长安，刘邦亲自审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出主意教韩信造反呢？”蒯通没有回避问题，直接干脆地回答说：“是，我曾经劝韩信谋反过。可是他听我的意见，结果被你杀了全家。如果他当时听了我的建议，你现在还能把他杀了吗？”刘邦听了蒯通直爽的回答，当然很忿怒，就下令把他活活煮死。

蒯通见刘邦听了他的话很生气，马上就要杀他，赶忙喊叫说：“唉呀！你杀了我很冤呀！”刘邦怒责说：“你教韩信谋反，杀你有什么冤？”蒯通解释说：“秦朝末年，为了推翻秦的暴政，天下群雄并起，大家都在争天下。当时我在齐国，只知有韩信，而不知道你刘邦。狗咬尧舜，并不是尧舜不仁，而是因为他不是狗的主人。当时天下像你一样，想当皇帝的人很多，只因能力不够没有当成皇帝。你现在当了皇帝，能把这些人全杀了吗？”刘邦听他说得有理，就下令把蒯通放了。

汉初三杰中，萧何和张良一直没有兵权，只有韩信一直率

军与项羽作战。韩信在破赵后，刘邦曾在修武突然夺过他的一次兵权；击败项羽后，又在定陶夺过他的一次兵权。刘邦当皇帝后，没有按固陵失败后的许诺，封韩信为齐王，而改封他为楚王。韩信领兵在外，刘邦对他一直存有戒心，这一点韩信不是不清楚。韩信既然无心反刘邦，那么刘邦称帝之后，他就应当主动解除自己的兵权，以释刘邦之疑。可他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当楚王后，带兵巡行，搞了很多仪仗队，以显示自己的威风。这样当然会引起刘邦的警惕和不满，因而首先收拾的功臣就是韩信。

夷彭越宗族

陈豨叛刘邦，刘邦亲自带兵征讨。兵至邯郸时，刘邦见陈豨兵盛，就派人通知彭越，要他带兵来参战。彭越可能是不愿参加这种内部的互相残杀，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就派人对刘邦说自己有病不能亲自来，只派他的部下率兵来到邯郸。

刘邦见彭越没有亲自来，认为在关键的时候彭越不支持自己，很不高兴，就派人去指责彭越。彭越害怕刘邦产生误会，想亲自去向刘邦解释，他的部将扈辄劝说：“你一开始不亲自带兵去，受到指责后又要去亲自解释，我估计你去了就会被刘邦擒拿，不如就此机会发兵反对刘邦。”彭越没有听从扈辄的意见，又不敢去向刘邦亲自解释，只有继续装病。

彭越的太仆（管车辆马匹的官）犯法，彭越要治他罪，他就跑到刘邦处，告发彭越与扈辄准备谋反。刘邦派人偷偷到彭越那里，趁彭越不备，把他捕获并囚送洛阳。经过司法部门对彭越的审讯，认定他确实与扈辄议论过谋反的事，他虽然没有同

意谋反,但也没有告发扈辄,这等于包庇谋反者,根据当时的法律,要判处死刑。刘邦认为他在反对项羽的斗争中立有大功,就赦免了他的死刑,只废为普通的百姓,流放到蜀的青衣县(今四川名山县北),由当地官吏监护生活。

彭越在军队的押送下,从西安出发去青衣,走到郑县(今陕西华县),正好在路上碰到吕后。她是从西安出来准备去洛阳的。彭越向吕后哭诉自己无罪,不想远去青衣,愿意回到故乡昌邑。吕后答应了他的请求,让他先随自己一起去洛阳。

到了洛阳,吕后对刘邦说:“彭越是一个壮士,作战很勇敢,现在要把他流放到蜀的青衣,这不是留下个后患吗!我路上碰见他,已经带他到洛阳,不如就在这里把他杀了。”

刘邦同意了吕后的意见后,吕后就让她的舍人复告彭越想回昌邑谋反,再由廷尉王恬开上报,请求杀彭越全家。刘邦同意后,遂夷彭越宗族。彭越本来想求吕后宽赦自己,他没有想到吕后比刘邦更残酷,反而送了全家的性命。刘邦擒拿韩信后,还让他在首都为侯,不忍心杀他;而擒拿了彭越,却要流放他到四川,随后又听吕后的意见把他马上杀了。这说明刘邦很重视韩信之才,对彭越就无所谓了。

彭越被杀后,刘邦下令有敢为彭越收尸祭奠者,一律将他抓起来问罪。栾布与彭越从小就是好朋友,他后来当了燕王臧荼的将,刘邦镇压燕王叛乱时被俘,彭越向刘邦求情,将他赎回为自己的大夫。彭越被杀时,他正受派使齐,等他回来,彭越已被杀,他到彭越的尸体旁,向他哭着报告使齐的经过,被官吏逮捕,报告了刘邦。

刘邦骂栾布说:“你想和彭越一起造反吗?我已禁止人们

收彭越的尸体，唯有你还敢去哭他，你要与他一起谋反已经很明白，马上给我将他煮杀了。”

正要将栾布举起来投入沸水中时，栾布回头对刘邦说：“请你让我说几句话再死不迟。”刘邦问：“你有什么话？”栾布说：“你彭城之败后，被困荥阳、成皋间，项羽之所以不能西进，是因为彭越在项羽的后方，采用游击战术，骚扰了项羽的供应，牵制了项羽的兵力。那时彭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支持项羽，你就会失败；他与你联合，项羽就陷入困境。在垓下之战时，如果没有彭越出兵支持你，项羽不会败亡。现在天下已定，你封彭越为王，他想将王位传之万世，并不想反你。你让彭越出兵，他因病不能亲自带兵，你就怀疑他对你不忠。你并没有掌握他谋反的证据，只是随意编织罪状，就把他杀了。你这样做，有功之臣人人会自危，对你并不利。现在彭越已死，我也不愿活着，请你煮杀我吧！”

刘邦听了栾布的话，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而且证明他是一个忠义之士，于是下令释放了栾布，并任命他为都尉。栾布指责刘邦的话是对的，他也只是敢在临死前才对刘邦讲这样的真话。他讲了真话，不但没有触怒刘邦，反而得到了刘邦的谅解，免他一死，予以重用，这是栾布所没有想到的。可也正是在这个方面，证明了刘邦大政治家的风度和气魄。

顺利解决了彭越问题，是刘邦继解决了韩信的问题之后，在消除割据势力上取得的第二个胜利。作为当时对刘邦的皇帝位子威胁最大的两个势力，刘邦均没有动用武力，只用计谋加以解决了，这对刘邦在建立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的道路上，是重要的一步。这一步解决了，以后的路就好走了。

讨伐英布

韩信被杀后，英布心里就很害怕。后来刘邦又杀了彭越，按当时的规矩，凡是谋反者被杀后，都要把他剁成肉酱，分送给各个诸侯，以示警告。彭越的肉酱送到英布那里时，他正在打猎，见到彭越的肉酱，心里十分恐慌，怕自己以后也会落得个这样的下场。英布想，诸侯王中势力最强大的是他和韩信与彭越，现在刘邦已经收拾完韩信和彭越，下一个就轮到他了。英布为此，在军事上做了防备，他偷偷让部下把军队集中起来，进入战备状态，并派人到邻郡探听动静，以便能提前作出反应。

英布有一个爱妾得了病，她去看病的那个医生家与英布的中大夫贲赫住在对门。贲赫听到她数次到医生家看病，为了通过她讨好英布，就去送了厚礼，还陪同在医生家饮酒。

英布的这位爱妾病好后，有一次在旁边侍候英布，和他拉起家常，赞誉贲赫的为人。英布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他一听爱妾说贲赫的好话，就起了疑心，问她：“你怎么会认识贲赫呢？”这位爱妾自认为心中无愧。就把在医生家认识贲赫的经过全对英布讲了。英布一听她与贲赫在一起饮过酒，就怀疑他们之间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贲赫听说英布怀疑他与其爱妾私通，十分害怕，就装起病来，不敢去见英布。这更加深了英布对他的怀疑，英布就想捉拿他问罪。

贲赫听到英布要捉拿他的消息，就连夜逃到长安，向刘邦告发英布要谋反。英布发觉他逃走后，赶忙派人去追，没有能

追上。

刘邦看了贲赫告发英布谋反的报告，不知怎么处理好。他征求萧何的意见，萧何分析说：“从现在的情况看，英布还不会谋反。是不是贲赫与英布有私仇，贲赫想诬陷他。请你先把贲赫抓起来，然后再派人到英布那里，看一看英布有什么反应，再决定处理的办法。”

英布没有追到贲赫，认为他逃到长安后，一定会报私仇，向刘邦告发自己偷偷在军事上戒备的事；接着刘邦的使者又来，虽然说刘邦把贲赫抓了起来，但使者处处调查和探问情况，说明刘邦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他接受韩信和彭越的教训，决定先发制人，杀了贲赫全家后，起兵公开反对刘邦。

英布的公开反叛，说明贲赫的告发是正确的，刘邦就释放了贲赫，并任命他为将军。

英布以勇敢善战闻名于当时，他反叛后，刘邦召集各位将领集会，问他们说：“英布反了，你们有什么对策吗？”这批将领都是行伍出身，只会领兵打仗，并不懂政治，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发兵讨伐这小子，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夏侯婴虽然是赶车的出身，但这时已经有点政治头脑，他回到家里，就把自己的老朋友薛公叫来，把英布反叛的事对薛公说了。薛公以前当过楚的令尹，对问题常有独到的看法，他对夏侯婴说：“英布当然应该造反。”夏侯婴反问：“刘邦割地分封英布为王，给他这么高的地位和权力，他为什么还要谋反呢？”薛公说：“韩信、彭越和英布，他们三个人功劳相同，地位相等。可韩信和彭越都先后被刘邦借故杀了，英布估计自己也不能幸免，所以必然会谋反。”

夏侯婴把薛公的意见告诉了刘邦，并对刘邦说：“这个人很有头脑，常能出奇计，你可亲自找他谈一谈。”

刘邦召见了薛公，并征求他对处理英布的意见。薛公回答说：“英布谋反是意料中的事，并不奇怪。现在要看英布是什么个用兵法，如果他用上计，则山东一带很快就会被他占领；如果他用中计，双方会形成对峙的局面，一时难败难分；如果他用下计，你就不必担忧，很快可以平定他的叛乱，高枕而卧了。”

刘邦问：“什么是上计？”薛公说：“英布东取吴（在今江苏苏州一带），西取楚（在今江苏徐州一带），占领了齐（今山东济南一带），再攻取鲁（今山东曲阜一带），然后用外交手段争取燕（今北京市一带）、赵（今河北邯郸一带）归附，这样太行山以东的地方，就都不属于你的了。”

刘邦赶忙又问：“什么是中计？”薛公回答说：“英布东取吴，西取楚，占领了韩（今河南许昌一带），攻取了魏（今山东菏泽一带），就有了敖仓的粮食，成皋这样的险要之地，到那时候，谁胜谁败就很难说了。”

刘邦再问：“什么是下计？”薛公说：“东取吴，西取下蔡（今江西九江一带），依靠越（今福建、广东一带），英布自己坐镇长沙（今湖南长沙一带），这样你就可以高枕无忧，很快可以平息这场叛乱。”

英布的淮南王封地，都六县，包括九江、卢山、衡山、豫章诸郡，他起兵后向外发展，东必取吴，西北必取楚（下计中的上蔡亦属楚地）。问题是他占领了吴、楚后，下一步如何发展？薛公认为上计是东取齐鲁，先占领了东部富庶的地区后，再联络

燕、赵，从东、南、北三面，迫使刘邦退守关中；中计是先取韩、魏，占领了中原地区这块咽喉地带后，就切断了刘邦与齐、鲁的联系，然后与刘邦在函谷关一带对峙；而下计则是占领了吴、楚后，以南方一带为根据地，不再北上西进，形成一个割据的力量。下计只想割地据守，不积极采取战略的主动，当然不足取。上、中两计，从当时的情况看，上计可能遇到的阻力会小一点，因为刘邦在齐、鲁没有重兵，但等到英布拿下齐、鲁后，刘邦肯定会在韩、魏之地部署重兵，英布再向西推进也很困难；而中计却可在刘邦尚未部署重兵防守中原地带的时候，一举占领了中原一带，迫使刘邦退守关中，所以中计并不比上计差。

刘邦听了薛公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他问薛公：“英布会采取哪种计策呢？”薛公回答：“选择下计。”刘邦不解，反问薛公：“英布为什么不用上、中计，而采用下计呢？”薛公分析说：“秦末英布是一个在骊山为秦始皇修墓的刑徒，现在一下子富贵为王。他并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只是为个人的利益着想，不会考虑百姓利益，更不会有长远的打算。所以英布起兵后，一定首先考虑的是保护自己在南方的封地，不会积极向外发展，因而必取下计。”

刘邦听了薛公的话，认为他说的很符合英布的实情，于是封薛公为千户，立刘长为淮阴王，自己亲自率兵讨伐英布。

刘邦这时身体不好，常卧病不起。他本来想让太子刘盈率兵去击英布，可是当时戚夫人的儿子赵王正在与刘盈争太子的地位，有人对刘盈的舅舅吕泽说：“太子率兵，打了胜仗对他无好处；打了败仗，则会危及他的地位。而且去打英布的各位

将领，都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人，他们哪会听从太子的指挥，打败仗的可能性很大。你应马上请吕后趁机向刘邦哭诉：‘英布是天下的猛将，善于用兵，而你的将领过去都是一起反秦起家的，他们哪能听太子的话。而且英布听到是太子将兵，必然会无所顾忌，向西进击，那时我们的处境就困难了。你现在虽然身体不好，但只要卧在车上，指挥诸将，他们就不敢不卖力。这样你虽然苦一点，可也是为妻子着想呀！’”

吕泽听了觉得很对，马上连夜去见吕后，吕后找机会按这个意思向刘邦哭诉，刘邦听后说：“我也在考虑，派太子将兵怕不行，只有我亲自率兵去了。”

英布起兵的时候，对他的部将说：“刘邦已经老了，身体多病，讨厌带兵打仗，必然不会亲自带兵来，他下面的将领，可怕的只有韩信和彭越，可是他们都被刘邦处死，其他没有什么可怕的将领了。”他没有估计到，刘邦会亲自率兵来讨伐。

英布起兵后，果然如薛公所预料的那样，东击荆，西攻楚。刘邦在陈县以计捉拿楚王韩信后，就将其封地一分为二：将淮河以东的 52 城封其从父兄刘贾为荆王；将淮河以西的 36 城，封他的弟弟刘交为楚王。

荆王都吴县，当英布的军队来攻时，刘贾与战不胜，退至富陵（今江苏洪泽县），被英布所击杀，他的军队投降了英布。楚都在彭城，英布接着率军渡过淮河，进攻刘交。刘交好读书，有艺术修养，但不会带兵打仗。当英布的军队攻到，他不集中兵力据守或反击，反而把兵力分为 3 军，分别驻守在徐县、僮县（今东苏泗洪县）一带，准备互相救援。这时有人向刘交建议说：“英布善于用兵打仗，大家本来就害怕他，你这样分散兵

力,使部下更感到势单力薄了。兵法上说,诸侯率兵在其本土打仗,士兵容易逃散。你把军队分为3部,英布只要击败1部,其他两部就会不战而散,哪里还能互相救援呢!”刘交不听,仍主观地将兵力分为3部,想出奇兵制胜。英布在徐县和僮县的交界处,击败了刘交的一部,其他两部果然不战而逃散。刘交只得率残部退守薛县。

英布乘胜继续西进,与刘邦率领的军队在会甄(今安徽蕲县西)相遇。刘邦在出发前,发上郡、北地、陇西(在今陕西、甘肃、宁夏一带)的车骑和巴蜀(今四川一带)的材官(地方骑兵)共3万多人,作为皇太子的卫队,驻军霸上,以巩固后方。他自己则征发各路的诸侯兵,又大赦死罪以下的犯人,都让他们从军,以带罪立功。刘邦就是率领着这样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去迎击英布的。

英布的军队在击败荆王和楚王后,士气很高涨,而刘邦率领的军队却是临时组编的乌合之众,其战斗力当然比不上英布。刘邦很高明,他深知自己军队的缺陷,所以没有急于和英布作战,而是先据守庸城(今安徽宿县西),等到了解了英布军队的作战部署后,再决定采取的战术。

刘邦观望了英布军队的布阵,发现他和项羽的战术一样,心中就有了击败他的办法。因为他和项羽长期对垒作战,对破项羽的阵法早有经验。

刘邦在视察阵地时隔阵望见了英布,就遥问英布:“你何苦要造反呢?”英布回答得很干脆:“想当皇帝。”刘邦听了十分愤怒,大骂英布不是东西,你也配当皇帝,遂发兵进攻英布。

英布军队不敌战败,率残军撤退过淮河。刘邦令部下追

击，英布几次回战都不利，结果带着剩下的百余人残兵败将，逃到江南。

长沙王吴芮在起兵反秦时，因为很看重英布的勇敢，把女儿嫁给了英布。这时吴芮已死，他的儿子成王臣继位。英布是他的姐夫，他听说英布战败，就派人向英布说，他愿与英布一起，逃亡到越。这是成王臣为讨好刘邦，设置下的一个圈套，英布没有发觉，就到番阳（今江西波阳县东）找成王臣。成王臣布置部下，将他在番阳布兹乡的农民田舍中杀了。英布起兵反刘邦也失败了。

刘邦消灭英布的反叛，这对巩固他的统治地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英布之后，虽然仍发生过几次大的叛乱，但从力量的对比和地位的重要性上来说，已经远远比不上英布，所以也都很快平息了。

韩王信投降匈奴

韩王信改封到太原郡后，与北方的匈奴势力相接触。这时匈奴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势力强盛，他见韩王信兵屯马邑，就率军将他围困起来。韩王信难于抵抗，一方面派人向刘邦求援，另一方面又几次派人向匈奴求和。

刘邦接到韩王信的求援信，看到他没有坚持抗敌的决心，怕他向匈奴求和，就一方面组织援兵，一方面写信给韩王信说：“作为一个将领，有必死之意，就难以勇敢对敌；无必生之心，又难以专心领兵对敌。匈奴进攻马邑，你的力量足以坚守，等待援军的到来。你处在前线要地，现在形势虽然很危急，但如果你能坚守马邑，尽到自己的职责，援军随后就到，你不要

害怕。”

韩王信看了刘邦的信，知道刘邦对自己不满，又怕向匈奴求和的事被刘邦发觉，因而就以马邑投降了匈奴，与匈奴联兵进攻太原。

刘邦听到韩王信投降匈奴的消息后，就决定亲自率军去击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两军在铜鞮（今山西沁县南）相遇，刘邦杀韩王信大将王喜。韩王信败走匈奴，与其将曼丘臣和王黄等人，立赵王的后裔赵利为赵王，继续反对刘邦。

汉十一年春（公元前 196 年），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又进到参合（今山西阳高县），刘邦派柴武率军反击。在未接战前，柴武为了争取韩王信，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邦很宽厚，过去在与项羽争天下时，诸侯虽有叛亡，只要改正了，回到他这里来，仍然会恢复原来的封号，并不杀害。这一点，你是很了解的。你是因为被匈奴打败才不得已而投归匈奴的，并没有大的罪过，请你赶快悔过自省吧！”

韩王信很了解刘邦反复无常的性格，知道再投归刘邦，刘邦绝不会轻易饶过他，所以他很客气地给柴武回了一封信，回绝了要他改过投降的劝告。他在回信中说：“刘邦把我从一个不为人知的普通将领提拔起来，封我为王，我很感谢。但是我在荥阳保卫战中，没有战死，而被项羽所俘，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刘邦的事；匈奴进攻马邑，我不能坚守，以城投降，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刘邦的事；现在我成了刘邦的敌人，率军与你决胜败，这是我第三件对不起刘邦的事。我有这三件对不起刘邦的罪过，而请求刘邦原谅我，这不是自己找死吗！我逃亡到山谷中，求得匈奴的支持，正是因为思念故乡，非要打回老家去

不可。”

双方已无妥协的余地，柴武就指挥军队强攻参合，韩王信抵挡不住，参合被攻破，柴武杀韩王信，胜利而归。

韩王信的势力在刘邦分封的几个异姓诸侯王中，是比较小的一个。但他的封地在边疆要塞，接近匈奴的势力，很容易得到匈奴的支持来反对刘邦。而当时的匈奴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正图向外扩展，所以很容易与韩王信结合起来，成为反对刘邦的一支力量。

刘邦还没有与匈奴的势力接触过，对匈奴的力量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轻易就率大军挺进，结果被匈奴大军包围，如果不是陈平的奇计，几乎被匈奴所俘。

韩王信的力量，如果得不到匈奴的全力支持，本来比较容易平息。后来柴武的参合之战，比较容易地击败并杀死了韩王信，就说明了这一点。但韩王信的叛乱，引来了匈奴这一支强大的力量，这却是刘邦所预料不到的。所以刘邦从平城返回长安后，对如何解决匈奴问题，就成为他日夜思虑的中心。

当时匈奴有骑兵 32 万，汉朝主要是步兵，显然在军事上不是匈奴的对手，刘邦在白登之围中已经吃过此亏。怎么办呢？刘敬去过匈奴，在白登之战前，又向刘邦提出过正确的意见，刘邦自然要问他了。刘敬认为：“天下初定，将士都不愿再打仗，不宜用武力解决。”可是不用武力，又有什么办法呢？刘敬提出，把刘邦的长女嫁给冒顿单于为妻，再厚送嫁礼，双方结为亲戚，时相往来，就可以消除威胁，彼此长期友好下去。刘邦同意了这个办法，但吕后自己只有此一女儿，不愿远送到匈奴，坚决反对。最后只得从家人的女儿中，选了一个冒充是刘

邦的长女，嫁给了冒顿单于。这是汉朝与匈奴和亲的开始。

韩王信并无多大的实力，但由于他的力量处在汉朝与匈奴这两个敌对政权的中间，他希望依赖匈奴的力量来反对刘邦，所以他的叛乱就具有新的意义。匈奴当时的力量正在发展和上升的时候，冒顿单于也想一试汉朝的力量，苦于没有机会。韩王信的投降匈奴，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与汉朝较量的良机，所以他抓住这个机会，在白登之战中显示了自己的实力。

当时匈奴并不想与汉朝大规模交战，所以在白登向刘邦显示了自己实力后，就又主动网开一面，让刘邦突围，双方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就结束了这次对峙。这样结束这次战争，对匈奴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对刘邦却是一场深刻的教训。

从平息韩王信的叛乱中，使刘邦认识到了匈奴力量的存在和强大，它的意义远比平息了韩王信的叛乱有更重要的价值。它对后来整个汉朝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平定张敖叛乱

张耳被封为赵王后，不久死去，由他的儿子张敖继立为赵王，他娶鲁元公主为王后，成为刘邦的女婿。

刘邦在解了白登之围，从前线返回长安时，路经赵国。张敖亲自迎送刘邦，以女婿对岳父的礼对待。刘邦却并不尊重这个女婿，他屈膝而坐，十分傲慢，一点儿也不把张敖看在眼里。

张敖对此倒无所谓，可他的相贯高、赵午等人，见此十分生气。他们都是张耳的朋友，是张敖的长辈，见刘邦这么怠慢

他，他还对刘邦十分有礼，都认为张敖太软弱。他们对张敖说：“天下群雄并起，有才能者自立为皇帝，刘邦有什么了不起！你对他这么恭敬，而刘邦却对你粗暴无礼，我们看不惯，非把刘邦杀了为你出这口气不可。”

张敖十分软弱无能，他听了贯高等人的话，非常害怕，马上把手指咬破发誓说：“你们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父亲被陈余赶出国，得到刘邦的支持才得以复国。刘邦对我家的功德，子孙万代也不能忘。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刘邦给的，怎么能反对刘邦呢？请你们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贯高等人素知张敖胆小怕事，他们听了张敖的话后，¹⁰几个人在背后商量说：“我们把杀刘邦之事向张敖说了，是自讨没趣。张敖身为赵王，不忍背叛刘邦。我们是出于义愤，不愿他受刘邦的侮辱，所以才想杀刘邦，为什么非要连累张敖不可？我们独自行动，如果杀了刘邦，功劳归张敖；如果未杀成而事败，独自承担罪责，不要牵连张敖。”

第二年，刘邦在击韩王信于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后，返回长安。当他路过柏人（今河北内丘县东）时，贯高等人认为他会在那里留宿，就在他要住的房子中设置隔墙，预先让刺客藏在隔墙中，等待机会刺杀刘邦。

刘邦那天也是命不该死，当他路过柏人的时候，想在那里留宿，他问部下：“这里是什么地方？”部下回答：“柏人。”刘邦听后说：“柏人？就是迫人，这个名字太不好听。”所以决定不留宿而去，贯高等人的部署未能实现目的。

贯高杀刘邦的阴谋，被他的一个仇人得知，就报告了刘邦。刘邦下令把张敖、贯高等人都抓起来，押送长安审理。参

与贯高阴谋的 10 几个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准备自杀。贯高骂他们说：“谁让你们自杀？张敖没有参与阴谋，现在他也被捕了。你们全自杀，谁能证明张敖没有参与阴谋？”

张敖被槛车押送往长安治罪时，他的一些部下想陪同前往。刘邦下命令，张敖的部下谁敢跟张敖来长安，就要把他全家都杀。田叔、孟舒等 10 余人，不怕全家被杀头，都穿着罪犯的衣服，以张敖家奴的身份，跟着张敖的槛车到了长安。

贯高到了长安，就对狱吏说：“杀刘邦的阴谋，都是我们干的，张敖一点也不知情。”审问他们的官吏，认为他们在庇护张敖，所以对他们用了种种酷刑，个个都体无完肤，但都没有供别的话。

吕后看在女儿鲁元公主的面上，一面向刘邦求情，说他是我们的女婿，不会干谋反的事。刘邦怒斥吕后说：“假如张敖杀了我，占有了天下，女人有的是，还缺你的一个女儿！”

审问贯高的官吏，把拷问的情况报告了刘邦，刘邦听后说：“真是一个壮士！谁和他过去认识，可以私人朋友之交问一下实情。”中大夫泄私说：“他和我是同乡，过去认识。他是一个以名义为重，不轻易许诺别人事情的人。”

刘邦让泄私拿着自己的特许命令，到监狱中去见贯高。贯高在酷刑后，正躺在竹制的床，泄私到了床前，他勉强抬头看了一眼说：“你是泄公吧！”泄私先与他说了一些久别未见的家常话，然后问他张敖是否参加了刘邦的阴谋。贯高说：“爱自己的父母妻子，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我家 3 族都将因之而被处死，难道张敖比我的 3 族还亲吗？因为他实在没有参与谋反，杀刘邦的阴谋是我们几个人密谋的，与他无关。”贯高具体地

向泄公讲了他们密谋的前后经过,说明了张敖不可能参加的原因。

泄私把贯高讲的情况向刘邦报告后,刘邦认定张敖不知贯高等人的阴谋,就释放了张敖,但也没有再让他当赵王,而是封他为宣平侯。

刘邦对贯高的为人做事很敬佩,他虽然曾想谋杀自己,但刘邦还是赦免了他的罪。当刘邦让泄私去告诉贯高,已释放张敖,并赦免了他的罪时,贯高问:“张敖真无罪释放了吗?”泄私回答:“是。”贯高听了很高兴,泄私接着对他说:“刘邦很敬佩你的为人,也已经赦免了你的罪。”贯高严肃地回答说:“我之所以身受酷刑而不愿意死,就是为了证明张敖没有参与谋反。现在张敖已无罪释放,我的责任已经尽到,死了也没有遗憾。我作为刘邦的臣下,有谋杀主上之罪,还有什么面目再为刘邦服务呢!就是刘邦赦而不治我死罪,我心里还能不惭愧,再活着吗?”贯高自己切断颈动脉而死。

贯高自杀后,他忠贞不二的名望,很快就传遍全国。刘邦想到,不怕杀全家,随从张敖来长安的还有10几个人,他召见了这些人,发现他们都很很有才干,刘邦的左右没有比得上他们的人。刘邦发现了这批人才很高兴,都任命他们为郡守和诸侯王相。

赵王张敖比起韩信、彭越、英布、陈豨、卢绾和韩王信等人来,当然有所不同。他即使参与了谋杀刘邦的阴谋,因为他是刘邦的女婿,吕后在极力为他说情,又有贯高等人把谋杀的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也不会被处死。但刘邦却借机废了赵王位,消灭了一个潜在的反叛者。

卢绾叛降匈奴

韩信、彭越和英布的叛乱，有些是刘邦为了及早解决问题，有意激化了矛盾而造成的，刘邦早有思想准备，而卢绾的叛乱却是他未预料到的。

卢绾与刘邦是同乡，他们两家为世交。卢绾的父亲和刘邦的父亲是好朋友，卢绾和刘邦为同日所生，以后又同时上学，成为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密友。刘邦年轻的时候，因为犯法不敢回家，卢绾常给他照顾。刘邦起兵后，卢绾也一直跟在他身边，出入其卧内，两人无所不谈，是刘邦最亲信的人。

刘邦平定了燕王臧荼的叛乱后，就封卢绾为燕王。这是他所分封的异姓王中，唯一自己信赖的人。陈豨叛乱后，刘邦率兵到邯郸击陈豨，卢绾从东北面出击，配合了刘邦的军事行动。

陈豨起兵后，感到在军事上很孤立，就派人去与韩王信原来的部将王黄、曼丘臣勾结，想通过他们求得匈奴的支持。

卢绾听说陈豨想勾结匈奴，就派使者张胜去匈奴，想告诉匈奴说，陈豨的军队已战败，希望匈奴不要支持他。这完全是忠于刘邦的一片好心。

张胜到匈奴后，碰到原来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他逃亡在匈奴，原来就认识张胜。臧衍对张胜说：“你之所以被卢绾重用，是因为你对匈奴的情况了解。燕国之所以能存在下来，是因为各路诸侯一再反叛刘邦，战争一直未断。现在你为了燕国的利益，想尽快消灭陈豨，可是陈豨被消灭后，也就该论到燕国了，到那时你就会变成刘邦的俘俘。你为何不让燕国暂缓攻

击陈豨，而使陈豨与匈奴联合呢？到时如果刘邦的力量能战胜陈豨，他也要依靠燕的力量，使燕王长期存在；即使刘邦处境危急，燕国也可以平安无事。”

臧衍的这番话，显然是在挑拨卢绾与刘邦的关系，但张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就在没有与卢绾通信息的情况下，偷偷请匈奴和陈豨派兵攻击卢绾。

卢绾突然受到匈奴与陈豨的进攻，他怀疑是张胜投降了匈奴，勾引匈奴兵来进攻自己。他当然很痛恨张胜的这种背叛行为，就上报刘邦，要杀张胜的全家。

刘邦对卢绾的报告还未答复，张胜就回到了燕国，把实情告诉了卢绾，说明他让匈奴出兵攻燕，是为了叫卢绾借机撤回打陈豨的军队，以保存实力。卢绾这时才恍然大悟，可他已向刘邦报告了张胜叛变，要杀他全家。为了保护张胜，卢绾赶紧又向刘邦送了一个假报告，说明勾结匈奴的不是张胜，从而开脱了张胜的罪责。

卢绾又派张胜出使匈奴，让他使用离间计，挑拨匈奴和刘邦的关系；又派范齐到陈豨处，偷偷让他对陈豨表示自己的支持，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刘邦平息了陈豨的叛乱后，他的一个投降的部将向刘邦报告说，卢绾曾派范齐到陈豨那里，与陈豨密谋过。刘邦派人要卢绾来长安，亲自质问有无此事，卢绾害怕，借病不敢去。刘邦又派审食其和赵尧去请卢绾，了解他有什么病，调查一下他是真有病还是装病。卢绾更加害怕，藏起来不敢见刘邦派来的人。他对其亲信说：“不是刘姓封王的，现在只剩下我和长沙王了。过去杀韩信和彭越，都是吕后出的主意。现在刘邦生病，

吕后掌权，她专门想找借口，杀害异姓王和大功臣。”

卢绾为人胆小怕事，他的一些部下认为他难成大事，怕跟着他受牵连，纷纷逃亡了。有人为了讨好刘邦，还把他背后的话偷偷告诉了审食其和赵尧。审食其和赵尧认定卢绾是装病不敢去见刘邦，并有反叛的迹象，他们回到长安后就如实向刘邦作了报告。

这时正好有匈奴人来投降，降者报告了张敖作为卢绾的使者，在匈奴与之勾结的情况。刘邦听后大怒，高声叫喊说：“卢绾果然也反了！”

这时刘邦已经病得很重，他最知心的朋友卢绾的反叛，对他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他自己不能带兵去平叛，就让樊哙以相国的身份，率兵去击卢绾。樊哙带兵走后，有人向刘邦报告说，有一天在宫中举行宴会时，樊哙准备带兵杀刘邦的爱妃戚夫人和他的儿子赵王如意。

戚夫人是刘邦在定陶时娶的妃子，她年轻貌美，一直得到刘邦的爱宠。刘邦晚年的时候，认为立的太子刘盈过于软弱，不象自己的儿子，所以想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但一直受到吕后势力的极力反对。

樊哙是吕后的妹夫，在立太子问题上，当然是坚决支持吕后的。从樊哙的性格上看，他有可能建议过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以消灭太子的竞争者。他没有这样做，可能是吕后怕激起大的冲突，没有同意。刘邦对樊哙当然是了解的，他知道樊哙会干出这种事来，所以听了这个报告，就大怒说：“樊哙看到我病重，是希望我快点死吧！”

刘邦本来对樊哙就存有戒心，但由于樊哙一直对他忠心

耿耿，找不到收拾他的机会。现在自己病危，樊哙就要采取粗暴的行动对待自己的爱妃和儿子，自己死后谁还能控制得住他，因而决定在自己死前除掉樊哙。他把陈平叫来商量，陈平给他出了一个计策。

他觉得陈平的计策既不影响平息卢绾的叛乱，又可除去樊哙，因而同意按计进行。他把周勃叫到床前对他说了陈平的计谋：“你和陈平骑快马到前线，向樊哙宣布我的命令，由你代替樊哙率军去平息卢绾叛乱，由陈平在军中立即斩樊哙。”

周勃和陈平接受刘邦的命令，赶往前线的樊哙军营。他们两人在路上商量说：“樊哙是刘邦的老朋友，立下不少战功，又是吕后的妹夫，他和刘邦的关系非同一般。刘邦一时气愤要杀他，恐怕气消后他会后悔。不如把樊哙抓起来后，押送到长安，由刘邦自己处理他。”

陈平和周勃到了樊哙的军营时，就起土为坛，要樊哙来听刘邦的诏令。樊哙当然不会怀疑刘邦会派他们来抓他，而以为刘邦有什么新的军事布置，所以未加任何防备，就去听候诏令。樊哙一到，陈平和周勃就下令把他的双手缚起来，对他宣读了刘邦的诏令后，关在槛车里押送长安，而由周勃率军讨伐卢绾。

刘邦在讨伐卢绾前，曾向燕国的百姓发布命令说：“卢绾是我的好朋友，我爱他就如同爱我的儿子一样。听说他与陈豨勾结谋反，我不相信，就派人叫卢绾来长安询问。卢绾装病不敢去，这说明他心里有鬼。燕国的官吏和百姓没有罪，为了鼓励你们起来反对卢绾，凡燕国官吏俸禄在六百石以上者，我各

赐他们升爵一级。跟随卢绾谋反的人，只要现在离开他，不再参与叛乱，我赦免他们的罪，同样加爵一级。”刘邦的这一诏令，从政治上分化瓦解了卢绾的力量，使他更加陷于孤立。

周勃代樊哙为帅后，连败卢绾军，直追至长城脚下。卢绾这时只剩下数千骑兵，他听到刘邦病危的消息，就想刘邦的病如果由危转安，也可能他会一时高兴，想到两人过去的情谊，而赦免他的罪，自己再到长安亲自向刘邦谢罪，还会得到刘邦的谅解。当他听到刘邦病死，吕后当权，赦免他的罪已无望后，就投降了匈奴。匈奴单于冒顿封卢绾为东胡卢王。卢绾因为常受匈奴人的侮辱，一年多后就病死在匈奴。

陈平押着樊哙的槛车还没有到长安，就听到刘邦病死的消息。陈平怕吕后和她的妹妹吕嫪怪罪自己，就先留下槛车，自己赶往长安，在路上碰到任命他和灌婴率 10 万大军守荥阳的命令。陈平听完命令后，没有去荥阳，而是赶忙去了长安，进宫向刘邦的遗体哭奏前事。吕后听了，很受感动。她对陈平说：“你一路辛苦了，回家休息吧。”陈平怕去守荥阳，樊哙到后与他的妻子吕嫪在吕后面前说自己的坏话，自己无法辩解，因而向吕后请求，希望留在长安。吕后听了他的话，就任命他在长安当郎中令，协助孝惠帝处理政务。所以后来虽然吕须一再说他的坏话，陈平都平安无事。

樊哙的槛车随后到了，因为刘邦已死，吕后当政，樊哙又恢复了原来的爵邑。

四、剪灭诸吕

惠帝“仁弱” 吕后专横

刘邦死后，于同年五月，刘盈即位。这就是汉惠帝。

刘盈登位之时，年仅 17 岁，堪称少年天子。吕后因儿子称帝，也被尊为皇太后。然而，刘盈生性懦弱，与其说他称帝，毋宁说吕后擅权。

吕后在政治上发迹，是始于诛杀异姓王，即所谓“诛大臣多吕后力”（《史记·吕太后本纪》）。从此她参预朝政，策划阻止刘邦废太子，左右讨伐英布的军事部署，干预刘邦身后将相人选的安排，以及培植亲信党羽等等。

刘邦一死，吕后的野心，大白于天下。她深知要执掌朝政，诸将是最大的障碍。当时刘邦尸骨未寒，她不仅拖延四天不秘不发丧，还背地里磨刀霍霍，准备将朝中诸将斩尽杀绝。吕后与审食其合谋：诸将在高帝时，就不满足做臣下的地位，如今再来侍侯少主，不统统族灭他们，天下就不得安宁。酈商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去见审食其，指出现在陈平、灌婴将兵 10 万守荥阳，周勃统兵 20 万定燕代。一旦他们知道高帝死了，诸将都被诛灭，必将连兵进攻关中。到那时候，大臣内叛，诸将外反，国家灭亡，指日可待。吕后因迫于形势不利，只好罢手，终于避免一场流血事件。

然而，这不过是暂时的退让，吕后夺取朝政大权的计划，依然没有丝毫改变。在刘邦死后不久，她违背刘邦的诏令，释

放被捕的樊哙，并恢复爵位和食邑。这是吕后背弃刘邦原定方针的信号。

果然，吕后屠杀诸将未成，便转向诛灭戚氏母子，迫害“诸刘”了。惠帝即位仅仅数月，吕后执掌生杀予夺大权，对她最痛恨的戚夫人，还有赵王刘如意，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加以杀害。她下令囚禁戚夫人于永巷（宫中监狱），又派人召赵王如意入朝。但是，使者接连三次前往赵国，都被赵相周昌顶了回去。周昌出任赵国丞相，是在刘邦提出更易太子之后。当时由于吕后与戚夫人水火不容，赵王如意年仅 10 岁，刘邦担心身后赵王不能自全，便用符玺御史赵尧的主意，改派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周昌为人刚直，吕后以及一些大臣，对他无不敬畏。周昌身负刘邦重托，当吕后派使者召赵王入朝时，他果然严词拒绝。

使者回报，吕后大怒。她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先将周昌召回长安。吕后一见周昌，立即横加责问，为何不遣赵王入朝。那神气，与当年跪谢周昌，形同两人。然而，吕后对周昌确实“敬惮”三分，周昌如此忤逆女主，居然没有遭到任何的报复。从此周昌称病不朝，三年后就默默死去。

周昌奉召回长安，那位乳味未脱的赵王，就没有主心骨了。吕后再派使者召他入朝，赵王乖乖地投奔陷阱去了。幸好刘盈深知太后居心不善，就亲自到霸上迎接他。刘盈将赵王接到宫里来，连吃饭睡觉都在一起，使母后无法下手。这位生性软弱的少年天子，此时公然挺身而出对抗专横的母后，其勇气与其性格确实判若二人。

刘盈企图保护赵王，但是暗箭难防。一天早晨，乘刘盈外

出射箭之机，吕后派人将赵王毒死。这个皇家幼童在宫廷的争权斗争中，终于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吕后杀了赵王，又残虐戚夫人。她断了戚氏的双手，砍去双脚，挖掉眼睛，烧灼耳朵，又逼她喝哑药。最后，还把她扔进猪圈里，称之为“人猪”。几天之后，吕后召刘盈去参观，当知道她是戚夫人时，刘盈不禁放声大哭。他承受不了精神的刺激，竟被吓得卧病不起，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刘盈派人对吕后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史记·吕太后本纪》）从此他纵酒淫乐，不再过问朝政。朝中一切大权，都由吕后独揽。

接着，这位汉家女主，又对“诸刘”下毒手。她对待其他诸侯王，手段同样残忍。齐王刘肥的遭遇就是一例。惠帝二年（前193年）十月，齐王刘肥到长安朝岁。按照汉家惯例，惠帝在禁中举行家宴，招待齐王刘肥。刘肥为曹氏所生，论年龄比刘盈大。刘盈以兄长之礼相待，结果引起吕后大怒。她令侍者斟了两杯毒酒，摆在齐王面前，要他向吕后敬酒。刘肥刚刚举杯，不料刘盈陪着，也拿起一杯酒。吕后见此情景，连忙夺过刘盈的杯子，把酒倒在地上。刘肥觉得奇怪，不敢再饮，便佯装几分醉意，告辞离去。事后一打听，方知是毒酒。刘肥更加害怕了，担心无法离开长安。于是，他用齐内史的计策，将城阳郡献给鲁元公主，才免遭杀身之祸。

吕后对“诸刘”的迫害，是继诛杀异姓诸侯王之后，为把持朝政大权而采取的另一重大步骤。这种迫害一直延续到吕后临朝称制期间，从而使汉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日趋尖锐化。虽然吕后诛杀朝臣没有得逞，但是她的所作所为，却在

朝廷中投下了一层阴影。朝中许多臣僚，有的遁世避祸，有的隐忍退让。一时，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一种极不正常的气氛，过去十分活跃的大臣，这时大都销声匿迹，甚至于放纵不羁。

那位足智多谋的张良，曾几何时，与刘邦纵谈天下事。刘邦晚年，他曾经表示要放弃人间事，到世外桃源当神仙去，但是他终究没有成为神仙。刘邦死后，张良从此销声匿迹，不问朝政达 6 年，后来就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刘邦的另一位重臣萧何，一向遇事恭谨，晚年就更加谨小慎微。刘邦死后不久，萧何患病，惠帝前往探视。惠帝问他：“相国百岁之后，谁可以替代你？”萧何心中有数，却回答说：“皇上比我更了解臣下。”惠帝又问：“曹参怎样？”萧何说：“皇上能用他，我死而无恨！”

曹参与张良、萧何不同。惠帝即位时，他还在齐任相国。曹参在齐国实行无为政治，与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吕后临朝 诸吕封王

惠帝七年（前 188 年）八月，刘盈继位 7 年后，这位“宽仁之主”终因吕后虐杀戚氏母子，就在忧疾中死去，时年 23 岁。

惠帝死后，因刘盈无子嗣位，吕后怕大臣有变，遂立少帝。这位汉家女主嗜权成性，还在惠帝即位之时，就搞重亲联姻。她以鲁元公主的女儿，即惠帝的外甥女，立为惠帝的皇后。不料张皇后无子，又取后宫美人子，立为惠帝的皇太子。这位冒名顶替的太子，在惠帝死后一个月，终于被抱上皇帝的宝座。

那时候,由于小皇帝年幼,因此吕后临朝称制,主持朝政。

吕后称制伊始,首先排斥朝中老臣,封王吕氏宗族。这是巩固吕氏政权的需要。为了立诸吕为王,她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右丞相王陵直言不讳,认为高帝与群臣刑白马为盟,立过“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誓约,如今封王吕氏是违背誓约的。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此相反,他们特为吕后寻找根据,声称高帝平定天下,封了刘家子弟为王;现在太后称制,想封吕家弟兄为王也完全可以。罢朝之后,王陵对陈平、周勃的言论不满,当面责问他们。陈平回答说:“在朝廷上当面争论,我不如你;保全刘氏天下,定刘氏之后,你也不如我。”一语道破了陈平的谋略。

为了扫清封王诸吕的障碍,吕后临朝称制仅两个月,首先罢去王陵右丞相的职务,表面上迁官为少帝的太傅,实际夺了王陵的相权。王陵一气之下,称病不朝请。于是,吕后以陈平为右丞相,以审食其为左丞相。但是,审食其不管丞相职事,主要监管宫中,职如郎中令,朝廷一些事务都由陈平决断。

陈平迁为右丞相,论职务比左丞相为尊,但是他的处境艰难,情况并不比王陵好多少。尤其吕后的妹妹吕嬃,因陈平曾经奉命逮捕樊哙,对此她一直耿耿于怀。吕嬃几次谗害陈平,迫使陈平不得不放纵酒色以避祸。陈平无所事事,吕后更加高兴。这位足智多谋的右丞相,表面上还保留着职务,实际上已经无法行使丞相的职权。

朝廷中位居要职的,还有御史大夫赵尧。赵尧当年为了保护赵王刘如意,曾经为刘邦出主意,因此引起吕后的忌恨。她以此为罪名,罢去赵尧御史大夫的职务,由任敖充任此职。

吕后排挤老臣，既控制了南北军，又实际掌握了丞相、御史大夫等行政权力。至此一切朝政大权，事实上由吕后独揽。

吕后在控制朝政之后，即开始封诸吕为王。首先被封的，是两个死人。一是追尊其父吕公为宣王，一是追封长兄吕泽为悼武王。很显然，封死人为王，是为了封活人。这不过是为吕氏宗族封王做准备。

为了进一步掩人耳目，吕后在封王吕氏之前，先封惠帝几个名义上的儿子为王侯。刘强立为淮阳王，刘不疑立为恒山王，刘山等三个封为侯。他们都是以后宫子充数的。同时，又派大谒者张释暗示大臣，请立诸吕为王。于是，吕泽的长子吕台封为吕王，以齐国的济南郡为吕国。这场封王诸吕的闹剧，帷幕就这样拉开了。但是，吕台封王几个月后，就死了。接着，恒山王刘不疑，也一命呜呼。因此，吕后更立襄成侯刘山为恒山王，改名义。

高后四年（前184年），少帝逐渐长大，而且知道自己的身世，就扬言将来要报仇。吕后知道后，立即将他幽禁在永巷中，声称少帝有病，先废了他，后来又杀了他。同年五月，立恒山王刘义为帝，再次改名为弘。四年之中，吕后立两个少帝。

为了加快封王诸吕的步伐，吕后先后杀了三个诸侯王。首先被杀者，是赵王刘友。

刘友原封淮阳王。惠帝元年（前194年），吕后毒死赵王刘如意，迁刘友为赵王，以吕家的女儿为王后。这是吕后为控制刘氏诸侯王而搞的另一种联姻。但是，刘友不满这种联姻，引起王后的嫉恨，遂向吕后进谗言。高后七年（前181年）正月，赵王奉召来长安，吕后派兵包围他的官邸，不供给赵王食物，

最后活活饿死。这是死于吕后手中的第二个刘氏诸侯王。

继刘友之后，梁王刘恢，也被迫自杀了。赵王刘龙死后，梁王刘恢改封为赵王，以吕产为梁王，刘恢对此心怀不乐。为了控制刘恢，还以吕产之女为赵王后。刘恢的行动受到监视和限制，在他徙封赵王四个月之后，终于在悲愤中被迫自杀。于是，吕后废其嗣，封吕禄为赵王。同年九月，燕王刘建死，又封吕通为燕王。

吕后临朝称制以来，一面杀刘氏诸侯王，一面封诸吕为王，又封吕家六人为列侯。吕后的所作所为和诸吕擅权用事，引起了朝中大臣不满，使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朱虚侯刘章杀吕家的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刘章是齐王刘肥的次子。高后二年（前186年）五月，刘章被封为朱虚侯，以吕禄之女为妻，宿卫。刘章对吕后排挤刘氏，非常气愤，乃寻机报复。有一次，刘章入侍燕饮，吕后命令他为酒吏。刘章请以军法行酒，得到吕后准许。这时，吕氏有一人喝得酩酊大醉，正要避酒逃去的时候，刘章立刻追上他，毫不犹豫地拔剑立斩，然后回来向吕后报告说：“有一人避酒逃亡，我按军法杀了他！”吕后及左右见此情景，无不为之大惊。这是吕后左右政局10余年来，诸吕首次遭遇的公开挑战。它预示汉廷与诸吕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

诸吕谋变 周勃安刘

刘章斩杀吕家的人，拉开了诛灭诸吕的序幕。一场翦灭吕氏集团的斗争正在酝酿着，而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陆贾。

惠帝即位后，陆贾目睹吕后专横，企图封王诸吕，背弃白马盟约。他自度不能争之，乃称病居家，过着貌似闲适、其实未尝安闲的生活。当吕后立少主称制，诸吕擅权用事的时候，许多大臣忧心忡忡，一时没有什么好的对策。有一天，陆贾到陈平处拜访，见他心情沉重，当即道破他内心深处的忧患，就在于诸吕和少主。于是，陆贾指出当此天下危难之时，将相和谐的利害关系。他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谐，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史记·酈生陆贾列传》）陈平接受陆贾的劝说，与太尉周勃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陈平送给陆贾的钱财，陆贾都用来游说汉廷公卿，加以陆贾为陈平出了许多主意，终于打乱了诸吕作乱的谋划，使吕氏的阴谋未能得逞。陆贾所做的这一切，不久在诛灭诸吕的斗争中，显示了它的作用。

高后八年（前180年）七月，吕后病重，不久就死了。她临终之前，命令吕禄居北军，吕产居南军，并告诫他们：高帝平定天下，曾与大臣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现在吕家封王，大臣愤愤不平。我死后，皇上年少，恐怕大臣有变，一定要据兵保卫皇宫，不必送丧，不要为人所制。这表明吕后背弃白马盟约，乃是预谋夺取刘氏的政权，反映诸吕正陷入孤立的境地。诸吕在政治上的虚弱，预示他们将面临最后失败的结局。果然，吕后死后不久，齐王刘襄首先起兵，准备诛杀诸吕，然后自立为帝。

事情是这样：吕后死后，吕禄为上将军，吕产为相国，他们聚兵长安，妄图发动政变。当时齐王刘襄的弟弟刘章，以吕禄的女儿为妻，从中得知这一消息。刘章派人将吕氏的阴谋密告

刘襄，要他发兵进攻关中，刘章和刘兴居（刘章之弟）为内应，以便诛灭诸吕而立刘襄为帝。

齐王按照刘章的计谋，正准备发兵西攻，却遭到齐相召平的反，召平派兵包围王宫，中尉魏勃用计又反包围齐相府，召平最后被迫自杀。于是，刘襄举兵西攻吕国的济南，表示要诛灭诸吕集团。

吕产得知刘襄发兵西进，便派大将军灌婴东向迎击。灌婴进军至荥阳，即留兵屯守，按兵不动，准备与刘襄及诸侯联合，共诛诸吕。刘襄闻讯，立即将军队撤回齐国西界，共同商量联合行动。

与此同时，在长安的周勃、陈平和刘章等，也相应采取行动。这就形成内外夹攻的局面，使诸吕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诸吕既担心周勃和刘章内反，又害怕齐楚联军的进攻，顾虑灌婴在前线倒戈。因此，他们对作乱关中，就更加犹豫不决了。但是吕禄和吕产牢牢控制南军和北军，周勃无法进入军中调兵，这就给粉碎诸吕阴谋作乱带来很大的困难。当时周勃与陈平合谋，利用酈寄和吕禄的交情，派人胁迫酈寄的父亲酈商，迫使酈商劝吕禄交出将印。诸吕对此意见不一，他们一直犹豫不决。只有吕禄对酈寄深信不疑，还时常跟他一起出去游猎。吕氏见此情景，怒火中烧，大骂吕禄说：“你身为上将军而放弃兵权，吕氏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九月的一天，郎中令贾寿从齐国回来，把灌婴联合齐、楚诛诸吕的事，告诉了吕产，并催他赶快入宫，以便控制局势。这些话被御史大夫曹窋听见，他立刻将消息转告陈平和周勃。

当时周勃闻讯，想抢先入主北军，却无法进入。在这关键

时刻，一方面周勃得到符节令纪通的帮助，持节假传皇上的命令而进入北军；一方面周勃又让酈寄和典客刘揭欺骗吕禄，声称皇上命令太尉守北军，要吕禄交出将印，以免遭致灾祸。吕禄信以为真，果然将北军交给周勃统领。周勃到达北军驻地时，立刻行令军中：“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汉书·高后纪》）话音刚落，只见军中皆左袒。这支宫廷的卫戍部队，终于被周勃夺回。当时还有南军，仍然掌握在诸吕手里。于是，陈平派刘章去帮助周勃。周勃命令刘章监军门，又领曹窋告诉卫尉，不许让吕产进入殿门。

吕产不知吕禄已经交出北军，便入未央宫企图发动政变。他刚到殿门，就被拒之门外，正在那里徘徊。这时，周勃让刘章率千余人，入宫保卫少帝。刘章进入未央宫时，见吕产正在庭中，当即领兵追击，并杀之于郎中府吏厕中。

接着，刘章进入长乐宫，杀死长乐卫尉吕更始。诸吕其余的男女成员，也都被一网打尽，宣告这个集团彻底的灭亡。

在粉碎诸吕的政变阴谋中，周勃与陈平所作的贡献，诚如陈平对王陵所说的，在于“全社稷”和“定刘氏后”，王陵确实不如他们。由于诛灭诸吕集团，汉初的政局才得以稳定，并为汉文帝继位，以及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场斗争中，周勃固然是“安刘”的主将，陈平和刘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周勃与陈平所以能联合行动，应该说功劳在于陆贾。所以司马迁说：“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史记·陆贾列传》）。

诛灭诸吕之后，谁来继承皇位，成为大臣争论的问题。有人主张立齐王刘襄为帝，因为他是高帝的长孙，可以继承汉家

的皇位。但是琅邪王刘泽首先反对,主要理由是齐王的母亲“恶戾”(凶横),应该吸取诸吕祸乱天下的教训。看来诸吕擅权谋乱,使汉初大臣心有余悸,选择外戚便成为皇位继承的重要条件,然而这个问题终两汉之世,却一直没有解决。最后,琅邪王刘泽及一些大臣认为,代王刘恒的母亲乃“君子长者”(《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刘恒本人又是高帝的儿子,而且是在世诸子中最年长的,由他继承皇位最为理想。

大臣们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使这位安分守己的诸侯王,尤其感到事情来到突然,一时竟不知如何应付这意外的事件。

第二节 西汉王朝的盛世景象

一、文景之治

文帝刘恒是高帝刘邦庶子,他的母亲薄姬不受宠爱,因而也免遭吕后嫉恨。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仅仅8岁就被立为代王,封国在今山西中部,当时属偏僻边区,远离政治中心,与汉廷的权力斗争没有多少牵连。正由于这样一种比较超脱的地位,才使他得到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功臣集团和琅邪王刘泽、宗正刘郢等刘氏宗室的一致赞同,越过觊觎帝位首先起兵声讨诸吕的齐王刘襄而坐享其成。他确乎是在臣民欢迎

拥戴之下，正大光明地当了皇帝。这就使他在政治上处于优势，能够坚持原则驾驭群臣。加上他深明君道，很有政治才能，他的统治不仅为汉王朝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在 2000 多年的封建政治史上也颇具特色。因而被旧史家称颂为可以同西周的成康媲美的治世，誉为封建帝王中的一位明君。

文帝继续奉行汉初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首先是注意修改苛酷的刑罚，以松弛一下秦王朝遗留的过分紧张的政治局势，适当缓和专制政府对民众压迫的程度，企图培植一种比较安宁平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文帝元年曾废除一人犯罪，父母家属连坐的法令。二年废除诽谤妖言罪。十三年又废止割鼻、断足等残害肢体的肉刑，代之以笞刑。但由于开初规定笞刑的最高额多至 500，“或至死而笞未毕”，人已经打死了刑数还未满额。名义上在减轻刑罚，实际上受刑而死的人反而更多。景帝发现这一问题后，进一步加以改革，把最高限额减为 200，还规定了竹板的尺寸大小，只打臀部，每名罪犯限定由一个差人行刑，中途不许换人，这以后受笞刑的人才得保住性命。文帝又规定罪犯服劳役有一定的刑期，凡不逃亡而服刑期满的，可免为庶人。改变了自古以来“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至”的传统制度，这是爱惜和保护社会劳动力的一项重大改进。文帝晚年由于方士新垣平装神弄鬼欺骗被查觉，恢复了连坐族诛的酷刑，但除谋反大逆罪以外，其他罪犯还是没有实行连坐法了。加以文帝君臣强调教化，量刑宽大，断案比较审慎，嫌疑不能判定的案子多从宽处理，所以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据说一年只有几百件，社会治安几乎达到了儒生们理想的西周盛世的

水平。这同秦王朝末年“圉圉成市，赭衣半道”的残酷景象适成鲜明对比，也正是“文景之治”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

文帝还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一再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他一方面恢复古代的“籍田礼”作出带头种田的姿态以鼓励农耕，另方面还多次减免田租，有时减一半，有时全免。口赋和徭役也减少2/3。又还裁减首都部分警卫部队，压缩皇室的马匹调去资助政府的驿站，还曾赦免官奴婢为庶人，以及赏赐孤寡老人等。

文帝所以能够不断减轻租赋徭役，关键在于他有效地控制了政府开支。他在位23年中，没有新建宫室苑囿，还经常撤消旧有的苑囿，将土地赐与贫民。有次他打算修一座露台，工匠造预算说是要花费百金。他听了便说：百金是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啊！我享用先帝留下的宫室都感到不配而羞愧，还修露台干什么！马上作罢。他平时节省宫廷生活费用，修建陵墓也不用金银贵重物品殉葬，只用些陶器，建筑也尽量省工。临死时下遗诏说，天下万物有生就有死，不必过于悲伤。丧事一切从简，还将宫中大部分美女放回家。除了自身带头节约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保境安民的原则，尽量避免用兵作战。当时将军陈武等建议出兵，恢复秦王朝时疆土。文帝却说：打仗是凶险的事情，纵使能够获胜，损耗也很大，民众受不了。我只希望边境保持和平安宁，好处就很多了，暂且不必考虑用兵攻取。他曾派陆贾出使南越，通过交涉折服了割据南方自号“武帝”的赵佗，使他纳贡称臣不再扰边。又采纳晁错的建议，移民充实北部边区，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力量。由于他采取守势，努力减少军事活动，这样就使得人民的徭役负担大大减轻，有可

能安心生产,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粮食价格降到 10 多钱 1 石,全国呈现一派和平繁荣景象。

当张释之向文帝提出一些建议时,文帝曾要求他:“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即是说不用讲一些大话空话。要谈就谈当前具体可行的意见。于是张释之就向他讲秦汉的事情,秦所以失败汉所以成功的经验教训,讲了很多,文帝听得挺高兴。后来也还常向他询问秦政的流弊。不难看出,文帝这一系列政策,正好是与秦王朝的作为处处相反的。显然他是正确地吸取了秦始皇和秦二世奢侈浪费、穷兵黩武、严刑峻法引起农民革命以致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他接受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宣称“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先民后己”,认为作为皇帝应当办好民众的事情,先要考虑民众,使他们安居乐业。这当然不可能真正作到,但同秦二世公开宣扬当皇帝就是只图自己纵情享乐,也的确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政治思想。因此,同秦朝堵塞言路的作风相反,汉文帝比较能鼓励臣民发表意见,大小群臣提出建议他都能认真听取。讲得对的就嘉奖,错误的采纳就算了,也不追究责任。有次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冯唐当面指责他不能选任良将,他当时虽然生气地离开了,事后却又把冯唐找来仔细询问并立即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处置。汉代学者认为,这正是汉文帝突出的优点。

景帝大体上继承这一套政策,也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他下诏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到地广人稀地区去从事垦殖。正式确定田租税率为 1/30,比过去减少一半。又规定男子 20 岁开始服徭役,比过去推迟几年。这些都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由

于文景这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代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和繁荣。尽管政府不断减轻租赋，国家仍然积聚了大量财富。到武帝即位之初，京城的府库装得满满的，钱库里串钱的绳子年久朽断，铜钱散落遍地无法清点。太仓的粮食旧的未用完，新的又储进，装不下只好堆在仓外以至朽坏。民间普遍养马，田野布满马群，民众聚会都骑乘健壮的牡马，有谁使用牝马的甚至不得与会。这同汉王朝初建时那种窘困现象是完全不同了。

但是，这也只是地主的天堂，农民仍然生活在困苦中。文景奖励农耕多年，但到景帝末年仍不得不承认农业经常歉收，人民没有吃的而死亡，许多农民生活困难而流离失所，使他很感到困惑不解。其实，这是由于汉代轻田租的政策，对于拥有大量田土的地主最为有利，实际上鼓励了他们兼并土地的活动。就连王莽也指出：政府只收 $1/30$ 的田税，地主却收 $5/10$ 的地租，富的更富，穷的更穷。所以汉代学者认为：豪强地主占有广大田地，政府收取他们 1% 的田税，他们却剥夺农民 $2/3$ 的地租，政府少收税的恩惠都被豪强地主独占。文帝减轻田税，受益最大的还是豪强地主。当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就是在兼并小农的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而脆弱的小农必然破产分化也是无可避免的客观经济法则。文帝时晁错曾为小农算过一篇细帐，指出他们终年劳累而总是入不敷出，为应付灾荒年成或官府临时苛派就不得不陷入高利贷罗网，以至于“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从而破产流亡。所以，通过对封建社会盛世的标本——文景时期繁荣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生产恢复发展的成果，总是首先落入统治阶级及其政府手中；而

劳动人民所能得到的好处，则是微乎其微的。

二、平定七国之乱 加强中央集权

公元前 154 年，吴、楚、胶西、赵、济南、菑川、胶东等七个封国，同时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刘濞下令全（吴）国，凡 62 岁以下，12 岁以上的男子，一律征发当兵，可说是倾巢而出了。进兵之前，吴王刘濞与部下讨论进军计划，提出过不同的方案，但进攻西汉都城长安的目标，则都是明确的。可以看出，参加叛乱的诸王，尤其是吴王刘濞，已经下定决心颠覆中央政权。

刘濞等人深知发动叛乱难服人心，就很狡滑的使用两面派手法，打出了“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他们把攻击目标集中到晁错一人身上，说他离间“刘氏骨肉”，而他们起兵，也只是清除皇帝身边的坏人，以“安刘氏社稷”，并非反对皇帝。很明显，这是企图用攻击晁错的障眼法，掩盖其进攻中央的真实目的。

刘邦分封子弟造成郡国并立的政策是时代的错误，就从巩固刘家天下来看，它虽然能收到暂时的效益，却种下了长远的祸根。文帝时贾谊就指出，当时齐楚等国已各传子孙三代，与皇家亲属关系日益疏远，感情淡薄。半独立的王画同集权的皇朝在各方面存在许多矛盾，相互猜忌，各怀疑惧，叛乱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他认为王国太强大就好从人患了肿病，一条小腿粗如腰，一根指头粗如腿，怎么能够指挥屈伸呢？所以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主张尽封诸王子弟，使大国分

为尽可能多的小国，“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中央才容易控制。另方面他又建议文帝把自己的亲儿子安排到要害地区建立大国以便拱卫皇室，说明他还是没有从根本体制上认清问题实质。但是文帝却采纳了机谊的意见，把太子的同母弟刘武封为梁王，都于战略要地睢阳（今河南商丘），拥有 40 多县富庶地区。又尽封齐悼惠王子 6 人为王，分齐国为济北、菑川、胶东、济南、胶西、齐等六国。

当年刘邦在击灭英布后，封其侄刘濞为吴王，都吴（今江苏苏州），拥有江东 53 县，盛产铜、盐，国富民强。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发生冲突被误伤致死，刘濞从此怨恨不朝，图谋叛乱。由于文帝优容礼遇，暂时没有发作。景帝好位，晁错用事。晁错认为，诸王国太强大威胁皇室，应当绳之以法，抓住他们的过失以削夺国土作为惩罚，逐步减弱其势力，才能提高高皇权，安定国家。尤其是吴国蓄谋叛乱多年，更应当严惩。他也估计到这样作可能激起变故，但是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既然是祸，迟发作不如早发作。景帝采纳他的意见，先后削夺赵国的常山郡，楚国的东海郡以及胶西国的 6 个县。最后在下令削夺吴国的会稽郡和豫章郡时，景帝三年（公元前 154 年）正月，吴王刘濞带着发兵判乱。他纠合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等六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亲率吴楚联军 20 多万人西征。胶西、胶东、济南、菑川等国合兵围攻仍然忠于汉王朝的齐国，赵国也暗中勾结钩奴，起兵反叛。一时黑云压城，长安城中的高利贷者认为东方战事胜败难知，竟不肯贷款给从军东征的列侯封君，好象汉中央政权已经命在旦夕了。

在吴楚七国声势汹汹的进攻面前，景帝也动摇了。他听信晁错政敌袁盎的谗言，以为牺牲晁错、退还削地可以换来和平，便授意丞相庄青翟等诬告晁错不忠，把他骗到长安东市腰斩，还残暴地杀害其全家老小。当然这种手法不可能解决诸王国同皇室的矛盾，只不过暴露了景帝的张皇失措，“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真正是亲痛仇快的一件蠢事。所以当袁盎等以接受条件杀了晁错而去吴国谈判求和时，刘濞却自称“我已为东帝”，拒不接见而把袁盎扣押起来。正如当时人指出的，刘濞处心积虑几十年筹备叛乱，哪里只是为了一个晁错？晁错主张削地不过给他提供一个借口而已。景帝不得已，只好决心讨伐。他派太尉周亚夫率主力反击吴楚联军。周亚夫奉命率30万大军东征，深知楚军历来剽悍矫捷，战斗力强，很难轻易将其打败。因而向汉景帝建议说：楚国之兵剽悍勇捷，难以很快战胜它，我们应该舍弃梁国，尽量以梁地拖住敌人，并切断敌人运送粮草的道路。这样就可以使敌兵疲粮尽，战而胜之。汉景帝同意周亚夫的策划，以大将军窦婴驻军于荥阳，控制荥阳一带战略要地，阻止吴楚联军西进。周亚夫自率主力向吴楚联军进击，并以另一部兵力向齐、赵等地进攻。

太尉周亚夫率军东走，当进至灞上时，赵涉对周亚夫说：“吴王刘濞一向豪富，长期以来搜罗亡命之徒，现在他知道将军即将东出函谷关的动向，必定会在崤山、渑池之间的险要处设置间谍伏兵。用兵贵在神速秘密，将军何不从这里向右进军，经蓝田、出武关，迂回而至洛阳，这样只不过多用一两天的时间，便可直入洛阳的武库，到后敲击战鼓，诸侯发现汉军到达，一定会以为将军是从天而降。”周亚夫遂按照赵涉的建议，

率领部将安全到达了洛阳。周亚夫这时高兴地说：“七国叛乱战起，我坐驿车到达这里，没想到会这样安全。现在我控制了荥阳，荥阳以东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周亚夫进至洛阳后，便立即派兵搜索崤山、渑池之间地区，果然抓到了吴王派出的伏兵。于是，便请赵涉当护军。

周亚夫军至淮阳，周亚夫的父亲周勃的故客邓都尉向周亚夫建议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罢极，破吴必矣。”周亚夫很高兴地采纳了邓都尉的建议。周亚夫遂率主力军向东北进军，进占了昌邑，并在昌邑筑垒坚守。这时吴楚军加强围攻梁国，由于周亚夫拒绝派兵支援梁王，梁王便派人上诉于汉景帝。汉景帝诏命周亚夫救援梁王，亚夫仍坚壁不出，只派弓高侯韩颓当等率轻装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出淮泗口，切断吴楚联军的后路，绝其粮道。梁王命中大夫韩安国和张羽为将军，以韩安国坚守城池，张羽出战，使吴军受到一些挫折和损失。吴军欲向西进军，但无法突破梁军的防守，吴楚联军胶着于坚城之下，往日的锐气大失，为求速战速决，便转而进攻周亚夫军，两军相遇于下邑，吴楚联军企图寻找汉军主力决战，但是周亚夫仍坚持坚壁不战。吴楚联军由于粮食供应断绝，士卒饥疲不堪，吴王刘濞多次组织部队向周亚夫军挑战，周军拒不应战，吴楚军采取佯攻汉军阵地东南角，实际主攻西北角的战术。周亚夫识破了吴楚军的企图，便加强了西北角的防御，当吴楚军猛攻西北角时，周亚夫军已严阵以待，吴楚军最后的攻击失败，加上士卒疲劳饥饿，

于是开始溃乱，吴王刘濞决定率部队撤走。二日，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吴王刘濞丢弃部队，仅率数千人乘夜逃窜。楚王刘戊见大势已去，被迫自杀。周丘自感吴楚联军无力向西北发展攻势，遂退往下邳，途中病死。吴王率军渡江，退守丹徒，再退走东越，以东越兵万余人，并收聚其残兵，企图重振军威。汉军派人买通了东越，使东越以劳军的名义诱骗吴王刘濞出营，将吴王斩杀。至此，声势浩大的七王之乱的主力军吴楚联军，即告全部失败。

济南、胶东、胶西、菑川等诸王和赵王，按照与吴王刘濞的协议，也同时起兵于齐地和赵地。济南、胶东、胶西、菑川等四王起兵后，首先进攻齐王刘将闾军于临淄。齐王本来也预定要参加七王之乱，可能后来觉得事情不妙，退出七王反叛的行列，畏罪而自杀。临淄被围困3个月未被攻破。这时进击齐地的汉军在将军栾布的统率下，与弓高侯韩颓当的援军合兵一处，向围攻临淄四国之军进攻，将四国之军击破，各败退回本国。

在胶西王阴谋叛乱之前，诸大臣即劝阻胶西王不要起兵叛乱，他们认为在胶西为王已经很不错了，吴王虽然与胶西约定，事成之后，平分天下，但那也是后患无穷。胶西王不听。待兵败退回胶西后，始知后悔已晚。胶西王太子刘德还想再战，打算战败之后，逃入东海。但胶西王刘卬觉得已无任何取胜的希望，遂自请向汉军韩颓当军投降，韩颓当向刘卬展示景帝的诏书：“王其自图”。刘卬看后，自叹说：“如卬等死有余罪。”即自杀身死，太后、太子也皆死。胶东王渠、济南等王兵败后也自杀。酈寄率军进攻赵地，进展也比较顺利，赵王之军节节败退，

最后退守都城邯郸，郾寄军包围邯郸城近 10 个月，后城破兵败，赵王刘遂自杀。这样，七王之乱遂全部被平定，汉军胜利地结束了昌邑战役。声势浩大的吴楚七国之乱，前后仅 3 个月时间就全都失败了。这充分证明人民是拥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所以野心家苦心准备了几十年，到头来几个月就统统垮台了。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汉王朝的威望大为提高，景帝趁势加强集权，严格控制王国。他规定诸王不得治理国事，仅能衣食租税。又减少王国官员，降低其品级，并统统由皇帝任命。此后皇朝的力量得以逐渐渗入王国内部，使它的独立地位日益动摇。到武帝时继续加强控制，诸王国名存实亡，由于分封而引起的割据叛乱问题这才终于解决。

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汉武帝（公元前 156 年——公元前 87 年），名叫刘彻，景帝之子，是汉朝第五个皇帝。他 7 岁当太子，16 岁继帝位，71 岁死去，在位 50 多年，占了整个西汉王朝 1/4 的时间。

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汉帝国达到了它强盛的顶点。许多封建史学家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汉武帝个人的“雄才大略”。

汉兴 60 余年，实行黄老之治，坚持休养生息，封建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中央集权下统一的局面正在得到巩固和加强。历史为汉武帝提出了任务，也为他提供了条件，使他在历史舞台上作出了有声有色的演出。

汉武帝加强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大权集中在封建朝廷,而封建帝王又把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汉武帝当小皇帝的时候,是由他的祖母窦太后当权。武帝 20 岁,窦太后死去。武帝母亲王太后的同母弟田蚡做了丞相。因为有王太后的支持,田蚡也很想专权。一天,田蚡向汉武帝奏事,推荐了一大批重要官员。武帝沉着脸问田蚡,“你准备任用的官员完了没有?我也打算用几个人!”从此,田蚡只好遇事少管。汉武帝把朝廷的一切大权,都揽在个人手中。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继续解决藩国问题。经过“七国之乱”,各地封国受到很大的削弱。但到武帝时,有些封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势力仍然不小。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建议的“推恩”办法,把原来只由长子袭爵的诸王国,改为可以分封其他子弟做侯国。按照汉制,这些侯国不再受原王国管辖,而直接由各地的郡来管辖。这样一来,各个王国越分越小,势力越来越弱,自然无法割据地方,对抗朝廷了。

与此同时,汉武帝还利用种种借口来剥夺各个诸侯国的爵位。比如,汉武帝规定每年八月会诸侯于祖庙中,诸侯必须出金助祭,如果有的诸侯国“金少”、“色劣”,就要夺爵。因这被夺爵的就有 100 多人。据统计,汉朝初年因功封侯的有 140 多人,到武帝太初年间,就只剩下 5 人了。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另外一个重要措施,是建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武帝前,朝廷大臣多为功臣或功臣子弟。一般官吏也多出于豪门权势之家。到了武帝,大量提拔地

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充当中央和地方官吏，以加强忠于个人的政治力量。汉武帝还设立“太学”，通过“太学”来培养和选拔官吏。

另外，汉武帝还通过所谓贤良策试，从地方选拔忠于自己的人才。比如董仲舒和公孙弘，就是通过贤良的策试，而被选拔重用的。

总之，汉武帝为了从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手是继续削弱可能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诸王国势力，另一手是加强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官僚制度。汉武帝所建立的这种封建官僚制度，一直为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仿行沿用。

汉武帝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又把财经大权集中在朝廷。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封建史书上记载，当时朝廷里放的钱长期不用，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食多到仓库里放不下，堆在露天里，任其腐烂。但是，在汉武帝执政初期，许多财经大权，却仍然掌握在地方大地主大商人手中。为了把财政经济大权掌握到朝廷手中，汉武帝采取了以下重要措施。

第一，统一币制，朝廷铸钱。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曾经实行过一些统一货币的政策。但到了汉初，地方诸侯王以及巨商豪强，都可以自行铸钱。豪强役使贫民，开采铜、锡矿，用铅、铁杂入铜内，铸劣钱牟暴利。汉武帝改用五铢钱，统一货币，严禁私铸。据《汉书》记载，为了制止地方私铸，汉武帝杀了私铸的人几十万，自首免罪的有百多万，可见，这是一场多么残酷的斗争。

第二，盐铁专卖。冶铁、煮盐和铸钱，这是当时最大的三项财源收入。汉高祖代秦立汉，为了取得地方豪强的支持，三大利都允许民间私营，最大的盐铁商积财多至万金。汉武帝时对外用兵，急需开辟财源，采用各种办法敛钱，却无法从盐铁商人手中取得。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 3 人为理财官，禁止民间私自治铁煮盐，并在全国设铁官 40 多处，盐官 30 多处，对盐铁实行官营专献。由此朝廷增加了巨大收入。

第三，“算缗钱”。缗钱就是商人的本钱，算缗钱就是向商人征收的财产税。具体办法大致有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2 千钱征收一算，即 120 钱；二，手工业资本税率较商业资本减半；三，商人的车每辆征税二算，普通人的车每辆征收一算。商人的资本由商人自报，如有以多报少，就要没收财产，罚令守边一年。当然富商大贾不会不进行反抗，汉武帝又鼓励“告缗”，就是对商人所报不实的，可以向政府告密。这样，汉武帝没收了商人“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

第四，“平准均输”。就是运输和贸易实行官营。汉武帝在各郡设均输官，在京城设平准官。均输官在地方负责收购和运输货物，平准官则收罗各地的货物，调剂有无，平抑物价。平准均输设立的第一年，汉武帝出外巡游，花的钱都是从平准均输收入中得来的，其中，仅赏赐用的绢帛就有 100 多万匹，可见收入之高。

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许多进步措施一样，这些经济措施，加强了封建朝廷的统治力量，削弱了地方豪强和某些与朝廷关

系不大的一部分商人的势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但是,人民却从中得不到多少实际利益。相反的,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如盐铁专卖,价格昂贵,质量低劣。而平准均输,运输货物时所用人工,实际上作为徭役,加到了农民头上。

中央集权的加强,封建经济的繁荣,再加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加强了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使汉武帝时的西汉统治,十分强大。这就使汉武帝手里有了足够的力量,来解决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匈奴问题了。

匈奴贵族对边地的侵扰进犯,是西汉成立以来,始终未能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汉初,匈奴骑兵一度深入到离长安几百里的地方,严重威胁了汉朝的安全。汉高祖亲自率领 30 万大军去攻打匈奴,大败而归,本人差点做了匈奴的俘虏。从此,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汉朝统治者都采用妥协退让的办法,每年送去大量财物,以求暂时的安宁。但匈奴贵族由于利之所在,“大入则大利,小入则小利”,一直骚扰不断,每年被杀害和掳去的边地人口,都在 1 万人以上。

汉武帝时,反击匈奴的条件成熟了,经过 3 次重大的战役,汉朝终于打败了匈奴,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威胁。汉武帝又在边塞地区,大规模移民屯田,加固城塞,大力巩固胜利成果。为了对匈战争的需要,汉武帝又多次派人打通西域,使中原和西域各地文化、物产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同时,在武帝时期,汉朝廷还发兵灭南粤置九郡,击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和许多部落,设八郡。从而为促进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初步

基础。

汉武帝在位 54 年,进行了 50 年的大小战争。由于主要的战争,是为了反对匈奴贵族的侵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因之汉武帝是中国古代史上立有功绩的一个皇帝。

通过兴修水利来发展农业,以支持战争和供朝廷的巨大消费,这是汉武帝的重要政策。汉武帝在位时兴修的水利工程,其中有著名的漕渠、龙首渠、亢辅渠、白渠等。在瓠子口(在今河南濮阳县)堵塞黄河决口的工程中,汉武帝亲临现场,命“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大大减少水旱灾害,有利于农业的提高。此外,他任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改进农具,改进耕作方法,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但是,汉武帝发展农业生产,并非为了农民,而是为了统治阶级。在繁重的徭役和赋税制度之下,农民的生活十分痛苦。武帝享国日久,“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挥霍民脂民膏,十分奢泰无度。因而到他晚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在表面繁荣的背后,“百姓流离”,出现了上百万流民,出现了“民相食”的惨象。人民忍无可忍,不断举行起义,“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这一切都说明了,即使象汉武帝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杰出代表人物,我们也必须用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对他复杂矛盾的表现,作出正确的评价。

第三节 西汉王朝的衰亡

一、汉武帝晚年决策方针的转变

武帝广开边境、增设 28 郡、把汉王朝版图扩大一倍以上。他的开拓事业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成就之大都远远超过了秦始皇。与此相应，其军费支出之多和人民负担之重也同秦代十分相近。比如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卫青、霍去病大举深入进攻匈奴这一次战役，仅仅对有功将士的赏赐就花费 50 万金，相当于汉政府平常全年的总收入，其他军备损耗和粮草运输费用还未计算在内。而汉武帝前后用兵 40 多年，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军费之大实在难以想象。和秦始皇一样，汉武帝也喜欢巡游。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他北至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阅兵，向匈奴炫耀军威。南下登中岳嵩山。又东巡海上，至泰山封禅。再沿海边北上至碣石（今河北昌黎），转向西沿北部边郡经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折回长安。整个行程达 1.8 万里，沿途“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所费更远超过秦始皇。

在迷信鬼神、寻求长生不死仙药这方面，汉武帝也比秦始皇走得更远。他在《秋风辞》中写道：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作为皇帝，人间的欢乐他的确享尽了，唯一遗憾的就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老，他当然要千方百计企图补救。方士栾大骗他说：我在海外曾见到仙人，仙人认为我贫贱，所以不相信我，不给我仙方。皇帝要想得到仙药和炼金术，必须尊贵您的使者，和他结为亲属，以客礼相待，使他配得上和仙人交往，才能得到仙方。武帝便在数月之内，陆续封栾大为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又把长公主嫁给他，并以黄金 10 万斤陪送。最后还专门刻一方玉印，以对待宾客的仪式封他为天道将军，表示不把他作为臣属。这样完全满足了栾大的一切狂妄要求，才派他入海去寻求仙方，结果当然只是一场骗局。武帝虽然把栾大杀掉，但他仍还不断派遣不计其数的方士去求神仙，总是梦想其中某一个人也许能得到真正的成功。再加上这时广开边境，中外交通空前发展，远方奇珍异宝和各种高级奢侈品不断流入中原，更刺激了汉武帝无穷的贪欲。于是他大设苑囿，广修宫殿，陈设布置穷极豪华，优礼外国商人，招待赏赐无数。

这各方面的开支耗尽了文景以来的积蓄，武帝便推行各种新财经政策以扩大政府收入，号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是，正如当时人指出的：“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盐铁论·非鞅》）。财富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只能出于劳动人民的创造。武帝虽然名义上不曾增加正税，但是各种负担最后总还是要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从而迫使农民大量

破产流亡。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就达200万口,汉武帝也不得不承认是“官吏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官旷民怨,盗贼公行”所造成。发展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武装起义遍及南阳(今河南西南)、楚(今长江中游)、齐(今山东)、燕赵之间(今河北北部)等地,大股有数千人,小股也是好几百人。他们自立名号,进攻城市,夺取武库兵器,释放监狱囚徒,惩办地方文武官员。其余零星活动在乡村的更不可胜数。武帝派遣中央大员作为特使到各地征集军队残酷镇压,屠杀了成千上万起义者以及曾经供应他们饮食的农民,经过几年才抓住一些起义领袖。但是起义队伍却化整为零,分散到山林川泽结伙反抗,官军无可奈何。武帝于是颁布残酷的“沉命法”,规定凡不能及时发现起义农民或发现后捕杀不能达到规定指标的,地方各级主管官吏都得处死。谁知这样一来,地方小吏害怕被杀,发现农民起义也不敢上报;郡守、国相顾虑受牵连也不愿意小吏上报,相互蒙混,逃避罪责,农民起义却越来越多。

武帝晚年多病,便疑神疑鬼,甚至梦见数千木头人持杖要打他,惊醒后就觉得病了。因而认为他的病是臣下吏民行使魔法诅咒所造成的,当时称作“巫蛊”。于是派江充负责清查,他带领一名胡巫到各处挖掘木偶,一发现就说是行使魔法诅咒皇帝,严刑苦打成招。先后害死数万人,包括丞相公孙贺父子、武帝亲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武帝卫皇后的侄儿长平侯卫伉等显贵人物都被诛灭,没有人敢申诉冤枉。最后甚至挖掘到卫皇后以及皇太子宫中,宣称也发现了桐木偶人,诬陷他们也在进行诅咒。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皇太子被迫假传圣

旨捕斩江充，发兵攻占长安各要害部门，丞相刘屈氂只身逃跑。武帝此时在甘泉宫避暑养病，闻讯大怒，责令丞相刘屈氂发兵逮捕皇太子。两军在长安城大战了几天，皇太子兵败逃走，卫皇后自杀。其后不久，皇太子在外地被围捕时也自杀了，他的3子1女都同时遇害。武帝暮年遭此家庭惨祸，精神上自不能不受到损伤。第二年，丞相刘屈氂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也被指控从事巫蛊活动诅咒皇帝。刘屈氂被杀，李广利当时正统兵攻打匈奴，其家属也被逮捕审问。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投降了匈奴，所统帅的7万大军全军覆没。武帝一生多次大胜匈奴，最后却由于非军事的原因而遭此惨败，更引起他思想上巨大震动。后来他渐渐察觉所谓巫蛊活动多无实证，纯属江充等人制造冤案，于是反过来又诛灭江充全家。然而这对于巫蛊之祸造成的灾难又能有什么补益呢？

一连串的挫折促使汉武帝思考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征和四年（公元89年），他对大臣们说：我即位以来，办了很多错事，使天下民众忧愁穷苦，后悔也来不及了。今后凡是损伤百姓浪费财富的事情一切停办。丞相田千秋建议：方士谈论神仙的很多，但都没有明显的成绩，可以全部罢免放逐。武帝说：这个意见很好，便把方士都遣散了。其后他还常对大臣们谈到自己以前太愚蠢，受了方士欺骗。天下哪有什么神仙，都是虚妄妖言。只有注意饮食服药，大约可以减少疾病罢了。其时桑弘羊等建议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派遣戍卒和移民，构筑亭障，逐步扩建成控制西域的据点。武帝为此颁发了著名的“轮台诏”，对过去的征伐事业深表沉痛的悔恨之情。指出屯田轮台又将花费巨资，扰害百姓，宣称不愿意再听到这类建议。

确认当前主要的任务在于禁绝严刑暴政，取消苛捐杂税，努力农业生产；在军事上只须奖励养马以保持守备力量就行了。于是不再出兵而集中注意发展农业，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示将施政方针转移到休养生息使民众富足这方面来。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主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推广称为“代田”精耕细作方法，以及许多更为便巧的新农具，既省工力又能增产，受到各地农民普遍的欢迎。这样一来，国内政治形势便开始缓和。虽然武帝此时已是垂暮之年，来日无多，但是这一转变意义重大。尤其是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多年独断专行，创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也可以算得是事功彪炳意得欲从的了。长期处于这种优越地位而能主动检查自己痛改前非，一反几十年的传统方针，返回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正道，更属难能可贵。司马光曾经指出，汉武帝所作所为在很多方面都同秦始皇差不多，“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同他“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说“轮台诏”的颁行，不仅标志着汉武帝政策上的根本改变，更开启了“昭宣中兴”，媲美文景的西汉盛世。这是汉武帝明显超过秦始皇的突出优点，对汉王朝的历史命运也有重要影响的。

经过“巫蛊之祸”，武帝的皇后、太子和几个皇孙全死去了，其余几个儿子也都不大理想，所以武帝末年对于继承问题看来是迟疑不决的。直到临死前两天，他才宣布立8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同时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政，实际上把政权交给了霍光。司马光称赞武帝“顾托得人”是有道理的。象这样独掌大权几十年、曾经废立过皇帝，而却仍然能够尽忠皇室的大臣，前此只见于传说中商代的伊尹，在历史

上真有确切记载的便只有一个霍光。不仅在政治品德上霍光的忠诚值得信赖,在大政方针上霍光更能坚持武帝末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他多次减轻租赋徭役,不时赈济贫民,奉行汉文帝时行之有效的办法,节约政府开支,缓和严刑暴政,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起来。这样,流民又渐得返回故里,田地垦辟日益增多。宣帝时多次获得丰收,粮价降到5钱1石,政府竟要创设“常平仓”来收购丰年余粮,以免价格过低损害农民利益。武帝晚年严重的统治危机就此安然渡过,西汉晚期的大学者刘向甚至认为宣帝时政局比文帝时还要好,所以称为“中兴”。追本溯源,这种局面的出现应当说是武帝“轮台诏”开创的。

二、昭宣时代的政治经济

昭宣时代的政治

汉武帝死后,刘弗陵继位,这就是汉昭帝。因弗陵年幼,由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辅助幼主。但是,只过了一年多时间,金日磾病死,当时的朝政,实际上由霍光执掌。此后六七年间,汉廷内部政见分歧,又发生争权的斗争,政局一度动荡不安。

霍光是霍去病异母弟。汉武帝时期,霍光任为郎,又迁诸曹侍中、奉车都尉等。他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汉书·霍光传》),成为汉武帝心腹亲信。汉武帝临终托孤,霍光拥立幼主,成为汉家的“周公”。

然而，霍光受诏辅政，所执掌的汉家天下，已是一个经济凋敝、流民遍野的社会。自汉武帝末年以来，“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至汉昭帝继位四年，依然“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同上）。当时，贫苦农民不仅乏食，甚至连播种的种子，也得依靠官府借贷。武帝时期出现的数以百万计的流民，经过二十余年的时间，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成为汉廷面临的主要任务。针对这种情况，谏大夫杜延年曾几次提出“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汉书·杜延年传》）。霍光采纳他的建议，“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同上）。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汉廷诏举郡国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汉书·昭帝纪》），对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展开了讨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讨论罢除盐铁官营等项政策时，会议形成以桑弘羊为一方，以贤良文学为另一方的对垒，双方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桑弘羊在汉武帝时期，曾任治粟都尉及大司农十四年，参与制定盐铁官营诸项政策。他在辩论中为汉武帝的政策进行辩护，实质上还是主张继续奉行汉武帝的朝政方针；而贤良文学则指责这些政策的弊端，同时又提出当今之务在于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辩论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盐铁官营的问题。除了对武帝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互相论难之外，还涉及到当前政策转变等问题，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由于盐铁诸项政策关系汉廷财政问题，因此只取消酒的专卖，其余各项都没有罢除。

这次辩论反映汉廷内部政见分歧，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少

数朝臣,在社会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原有的思想主张。这是桑弘羊一贯的政治立场。还在汉武帝晚年,他不顾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继续主张屯垦轮台,结果遭到汉武帝拒绝。汉武帝根据当时的形势,对原来的政策作了重大的改变。但是,直到昭帝始元年间,桑弘羊依然没有改变原来的主张,不但政见与霍光针锋相对,而且不满霍光一手操纵朝政。因此,桑弘羊与上官桀及燕王旦通谋,卷入当时朝廷内部反对霍光的争权的斗争中去。

汉廷的争权斗争,始于燕王刘旦。汉武帝晚年,皇太子刘据、齐王刘闳先后死去。按照辈份而论,刘旦自以为应当立为太子,并上书要求到京师宿卫。刘旦觊觎帝位,引起汉武帝的不满。汉昭帝继位之后,刘旦与宗室刘长、刘泽等人勾结,阴谋发动兵变,推翻汉昭帝。事情败露后,刘泽等人被杀,刘旦幸免。但是,他的野心不死,又与上官桀结谋,企图翦除霍光,夺取皇位。

上官桀与霍光,本是联姻亲戚,因为争权发生矛盾。上官桀及其子上官安,遂与盖长公主、桑弘羊及刘旦通谋,告发霍光逾制擅权。当阴谋失败后,上官桀等又合谋杀霍光,迎立燕王刘旦,然后再杀刘旦,夺取皇位。但是,上官桀的密谋终于泄漏,汉昭帝命令丞相田千秋扑灭乱党。结果,上官桀父子及桑弘羊先后被杀,盖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也相继自尽。这场争权斗争即告结束。

霍光翦灭政敌之后,其地位越加巩固,政局也逐步趋于稳定。但是只过了六年,汉昭帝即因病死去。这位以孺子继统的帝王,在位十三年少有作为,却使霍氏家族乘机崛起,并开了

汉代外戚专权之先。皇位是由昌邑王刘贺继承。刘贺是个荒淫纵欲的昏君，继位不久，霍光等人即发动一场宫廷政变，将他废逐。于是，霍光迎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帝，这就是汉宣帝。

刘询是卫太子刘据之孙。巫蛊祸起，刘询的父祖及生母，都遭杀害。刚刚出世几个月的刘询，也被关押在狱中。原廷尉监丙吉怜其无辜，对他多加保护，并将他送交外祖母家抚养。后来，刘询被收养于后宫，直至十八岁继位。宣帝继位之后，为了改变昭帝时期的政局，采取了许多政治措施，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主要的有如下几项：

首先，清除霍氏集团。自汉昭帝以来，霍氏家族的权势不断扩大，严重地削弱了汉家皇权。霍光本人专制擅权，“政事壹决于光”（《汉书·霍光传》），以至于操纵汉家天子的废立。不仅如此，霍光的儿子霍禹、侄孙霍云皆为中郎将，霍云之弟霍山为奉车都尉侍中，两个女婿为东西宫卫尉，连外孙也都是中朝官，形成这个家族“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汉书·霍光传》）的局面。汉安天子无异是个傀儡，而霍光成了左右政局的“太上皇”，并紧紧地控制着中朝的军政大权。这是从汉武帝为加强皇权而控制中朝，到中朝权力转归朝臣把持的畸形发展。于是，霍家“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汉书·霍光传》），从汉廷到地方，吏治日益败坏。廷尉李种和王平，左冯翊贾胜胡，甚至车丞相的女婿、少府徐仁等，都因“坐逆将军（意）下狱死”（同上）。而使乐成小家子，却因得幸于霍光，官至九卿封侯。当时，朝廷官吏只听霍光的家奴冯子都、王子方等人的指挥，丞相之职有名无实。这种现象在宣帝即位之后，大有变本加厉之

势。当时，不但朝廷诸事皆先禀报光，然后上奏天子，而且连霍光的夫人，也干预朝政。她为了让小女霍成君代立为皇后，公然私派女医淳于衍毒死许皇后。地节二年（前 68 年），霍光临死之前，又提出封霍山为列侯的要求。宣帝无可奈何，即日告霍禹为右将军，接着又封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继续由霍氏控制中朝。竖年，当宣帝立许皇后的儿子为太子时，霍光妻大怒，又阴谋使霍皇后毒杀太子未遂。甚至宣帝安排御史大夫魏相入侍中朝，霍光妻也大为不满，并唆使家奴大闹魏相的府邸。霍氏专擅权柄，为所欲为，皇权再度受到挑战。

针对上述情况，宣帝为了稳定政局，进一步加强皇权，一面让霍山继续主管尚书事，一面又准许吏民奏封事，可以不通过尚书，令“群臣进见独往来”（《汉书·霍光传》），以打破霍家把持中朝的局面，使中朝权力逐步转归自己手中。这是对汉武帝以来的中朝体制所作的重要的改变。同时，又将霍氏家族的成员调离中朝，改任其它职务，并将他们执掌的兵权收归汉廷。这些措施引起霍禹集团的不满，他们阴谋作乱，准备发动宫廷政变，废宣帝而立霍禹为帝。地节四年（前 66 年），霍禹集团阴谋败露，霍云、霍山及范明友自杀；霍禹被捕后处以腰斩；霍光妻及其它亲属皆弃市；霍皇后也被废处昭台宫，霍禹集团被一网打尽。

第二，整饬吏治。诛灭霍禹集团之后，拔除了“危乱国家”的祸根，宣帝即着手整饬吏治，以便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在汉廷中央方面，宣帝时期，“上躬亲政，省尚书事”（《汉书·丙吉传》），以密切中朝、外朝之间的关系。本来尚书这一办事机

构，是武帝为了削弱相权而设的。汉宣帝亲自过问政事，减省尚书事，“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汉书·循吏传》）。这不仅使皇帝直接掌握朝政大权，又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又有实权的体制，从而发挥了丞相作为辅臣的作用。宣帝亲政后，丞相魏相“总领众职，甚称上意”（《汉书·魏相传》）。魏相死后，丙吉、黄霸、于定国等，先后继任为相。他们“总纲纪号令”（《汉书·黄霸传》），“居位皆称职”（《汉书·丙吉传》），既有职又有实权。宣帝时期的丞相，与武帝时期相比，境遇截然不同。他们善终其位，无一人被黜免，或者死于非命。所以班固说：“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汉书·魏相丙吉传》）。

在地方吏治方面，宣帝重视地方长吏的选任。他常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书·循吏传》）这是因为郡守、诸侯相等二千石官吏，对上要执行汉廷的方针政策，对下则直接治理吏民，其政绩如何关系封建国家的兴衰，所以被视为“吏民之本”（同上）。对新任命的刺史、太守、国相等官员，“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同上）。因此在宣帝时代，先后曾出现一些政绩显著的二千石官吏。如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为了稳定地方统治秩序，地方长吏一旦任用，一般不主张频繁调动。

对地方官吏的治理情况，经常派使者循行郡国，考察他们的政绩。如元康四年（前62年），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士”（《汉书·宣帝纪》）。五凤四年（前54年）又“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

狱，察擅为苛禁刻不改者”(同上)。对地方官吏的考察，“信赏必罚”。凡政绩优异者，汉廷通过下诏褒奖，增秩赐金，封官进爵等，对他们表示嘉奖。如王成为胶东相，在处理流民问题上，“治有异等之效”(《汉书·王成传》)，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黄霸任颍川太守，“治为天下第一”(《汉书·黄霸传》)，官至御史大夫，丞相封侯。又如朱邑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人为大司农”(《汉书·朱邑传》)。龚遂为渤海太守，因政绩显著，被擢为水衡都尉。

对一些违法失职的地方长吏，汉廷则予以惩办。如严延年先后曾任涿郡、河南太守，是一位号称“屠伯”的酷吏。他因“选举不实”，受到“贬秩”的处分。后来，又因“怨望诽谤政治”(《汉书·严延年传》)，被处以弃市之刑。再如，田云中为淮阳太守，也是一位“敢诛杀”的酷吏。因“吏民守阙告之”(《汉书·田广明传》)，民愤极大，同样被处以弃市之刑。

由于采取上述措施，“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汉书·循吏传》)，可见当时吏治情况有一定的好转。它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

第三，打击豪强。昭宣时期，地方豪强势力发展迅速，从京师以至于郡国，豪强大姓相互联姻，与官吏勾结为朋党；以收养宾客为奸利，甚而犯为盗贼，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豪强骄纵横恣，“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汉书·严延年传》)。民间流行的俗语说：“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同上)这种现象势必“乱吏治”，是社会治安的大害，因此，宣帝时期汉廷继续奉行武帝的抑豪政策，对于扰乱社会治安的地方豪强，进行严厉的镇压。如任命赵广汉为颍川太守，惩治郡中

的豪桀大姓。颍川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为恶作乱，二千石莫能擒制，赵广汉到任几个月，即诛杀原、褚首恶，郡中为之震栗，治安逐渐好转。

又如尹翁归为东海太守，县设记籍，亲自处理各种奸邪之事；收捕各县的黠吏豪民，案治其罪，严重者即处以死刑。鄒县大豪许仲孙，为奸猾，乱吏治，郡中苦之。尹翁归将他处以弃市之刑，其他豪猾不敢再犯禁。

再如严延年为涿郡太守，郡中大姓西高氏、东高氏使宾客肆虐抢掠，原郡吏以下皆畏避之。严延年派遣属吏分别审讯“两高”、深追其奸，诛杀各数十人。后来，严延年迁河南太守，“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汉书·严延年传》），赴任后豪强敛息，郡中清静。

第四，兼施德教。汉宣帝治国，“信赏必罚”（《汉书·宣帝纪》），“以刑名绳下”（《汉书·元帝纪》）。当时，太子刘奭针对杨惲、盖宽饶因言事刺讥而被杀，曾经提出“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同上）的建议，宣帝当即嗔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同上）！表面上，汉宣帝似乎更多地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其实当时尊神学化的儒学为德教的主要内容，利用“德教”加强思想统治的做法，比起武帝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即位伊始，即遣使者持节诏令郡国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汉书·宣帝纪》）。同年，还诏令郡国察举文学高第各一人。

元康元年（前65年）八月，又下诏：“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再次察举吏民“通文学（即经学），明于先王之术”（《汉书·宣帝纪》）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此外，他还选名儒俊材，

讲论六艺群书。当时的名儒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等，相继以儒术封官；刘向、王褒、张子侨则以文章显达。宣帝所任命的丞相，也多属经术之士。如韦贤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魏相明《易经》，有师法；黄霸当年与夏侯胜下狱，曾从夏侯胜受《尚书》于狱中；于定国官至廷尉，乃迎师学《春秋》，尤重经术之士。当时宣帝周围，集中一批谏大夫，即掌顾问应对的参谋，也多由儒生充任。许多朝政的谋议，法令的制订，都与他们关系密切。所以，宣帝时期，明经术的儒生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在汉朝的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日益显著。

不仅如此，为了兴《春秋》谷梁之学，宣帝几次诏选名儒讲授，前后十余年。甘露元年（前53年），又召名儒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汉书·儒林传》）。从此《谷梁》之学大盛。

甘露三年（前51年），又诏诸儒萧之、刘向、施雠、梁丘临、欧阳地余、林尊、周堪、张山拊、假仓、韦玄成、张生、薛广德、戴圣、闻人通汉等，讲论《五经》同异于石渠阁。这是一次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汉宣帝亲临决其同异，为统制思想文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与此同时，宣帝时又增立经学博士，如《易》有梁丘贺；《尚书》有夏侯胜、夏侯建；《礼》有戴德、戴圣；还有《春秋》谷梁学博士等。博士弟子员的人数，比昭帝时增加一倍，即由百人增至二百人，是武帝时期的四倍。因此宣帝之世，学者辈出，弟子无数，盛况远胜于武帝。这是儒学发展的转折时期，此后它作为汉家钦定的统治思想，就越加被神学化和偶像化了。

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宣帝利用儒学,施行各种形式的“德教”。如地节三年(前67年),为了表彰“孝弟”,特诏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汉书·宣帝纪》)。终宣帝之世,对鳏寡孤独的老者、三老、孝弟、力田的赏赐,几乎史不绝书。地节四年(前66年),又下诏说:“导民以孝,则天下顺。……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同上);五凤二年(前56年),又以“婚姻之礼……所以行礼乐”,诏令郡国“勿行苛政”(同上)。宣帝时代的“德教”,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而造成一种社会风气,以利于稳定社会秩序。

宣帝时代的政治,实行“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即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谋求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

恢复经济的措施

昭帝和宣帝时期,汉廷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恢复社会经济。经过汉武帝奢侈无度,长期用兵之后,造成了“海内虚耗”,经济濒临崩溃的绝境,无数流民转徙道路。它的影响直至昭宣时期,仍然是汉廷最棘手的社会问题。加上昭宣两朝,由于豪强地主肆意兼并土地,流民问题更加严重,以至局部地区社会矛盾尖锐。所以,昭帝继位以来,朝野屡屡提出“俭约宽和”、“安集百姓”的议论,正是针对这种社会状况而发的。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缓和社会矛盾,汉廷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轻徭薄赋。汉昭帝登位之后,即派钦差大臣巡行郡国,了解地方民情及吏治情况,并有减免赋税的办法,减轻农

民的经济负担。如始元二年(前 85 年)八月,因为蚕、麦歉收,下令免收当年的田租。元凤二年(前 79 年)六月,诏令郡国免收该年的“马口钱”,并允许三辅、太常郡以菽(豆)粟交纳赋算。元凤四年(前 77 年)正月,又免收当年及翌年的口赋;三年以前未缴更赋的农民,也一律免收。元凤六年(前 75 年)正月,三辅及太常两地谷价下跌,农民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最大,汉廷允许农民以实物(菽粟)交纳赋钱,以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元平元年(前 74 年)二月,又诏令减免口赋钱十分之三。在这些措施中,减免口赋和更赋,用实物代替赋钱,都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在汉代,算赋、口赋和更赋,是农民负担最重的赋税。这些措施体现了务在安民的方针。

汉宣帝继续奉行这一方针,对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抚恤更多。本始元年(前 73 年)五月,刘询继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本始三年(前 71 年)五月,因旱灾严重,令遭灾最重的地区免除租赋。本始四年(前 70 年)四月,许多地区发生大地震,对地震破坏最严重的郡国,下令免除租赋。元康二年(前 64 年)五月,又诏令疾疫严重的郡国,可免除当年的租赋。元康五年(前 61 年)三月,汉宣帝行幸河东,又免除部分地区的田租。五凤三年(前 55 年)三月,诏令减天下口钱。甘露二年(前 52 年)正月,令减收算赋钱,一算减三十钱。甘露三年(前 51 年)二月,又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此外,徭役是农民又一大负担。它不仅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因农民不愿服役,往往转为额外的经济负担。与武帝时期相比,虽然当时徭戍及力役之类相对减少,但是农民并非没有徭役负担,仅漕运一项所耗费的劳力就相当可观。自昭帝

以来,文献中有关减轻农民徭役负担的记载,屡见不鲜。这是当时实行“休养生息”方针的措施之一。如始元六年(前 81 年),减少向京师运送粮谷三百万石。元凤三年(前 78 年),因水灾民乏食,又停止受灾地区转漕四年。元平元年(前 74 年)二月,诏令“减外徭”,即减少戍边人数,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汉宣帝时,由于漕运所耗费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四百万斛,每年即需消耗六万人的劳力,因此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提出改进漕运的办法。五凤年间,他建议:“宜余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汉书·食货志》)汉廷采纳这一建议,果然使漕运力役大省。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关东一带漕运的徭役负担。

与此同时,耿寿昌还建议在边郡设常平仓,“谷贱时增其贾而余,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糴”(同上),以供给边郡之需,还可以减省转漕的劳力消耗。这是解决输边徭役负担的一项重要措施。

五凤四年(前 54 年),匈奴内附称臣,边塞平静无事,汉廷下令减戍卒十分之二,使徭戍负担大为减轻。

昭宣时期,由于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耕桑者益众”(《汉书·昭帝纪》),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当时贫民、流民数量很多,仍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抚恤贫民和流民。昭宣继武帝之后,“百姓流离”的状况,一直未见好转。这是导致封建统治秩序不稳的社会因素,汉家统治者无例外地对它倍加重视。汉武帝晚年所表示的忏悔,就是这股可以“翻船”的潜在力量冲击的结果。作为承统

的昭、宣两朝帝王，也诚惶诚恐，并寻求各种解决的途径。

昭帝时，对贫民实行赈济的办法，重在安抚。如始元二年（前 85 年）三月，曾派官员救济贫民，或借给粮食和粮种。几个月后，又下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汉书·昭帝纪》）。对遭受水灾的地区，则派“使者振困乏”（同上）。元凤三年（前 78 年），又“罢中牟苑赋贫民”（同上），将荥阳的吕牟苑分给贫民耕种。上述昭帝两次下达免除或减免口赋更赋的诏令，也是与抚恤贫民，不使流民数量继续增加有关。这些安抚贫民的措施，收到“流民稍还”的效果。

到宣帝时期，类似这种赈济贫民的诏令就更多了。如本始四年（前 70 年），因农业歉收，“遣使者振贷困乏”（《汉书·宣帝纪》）。又使丞相以下及京师诸署令丞，入谷输长安仓以“助贷贫民”（同上）。几年以后，又先后两次下诏，“所振贷勿收”（同上）。地节元年（前 69 年），下令“假郡国贫民田”（同上）；并借给粮食及粮种。两年后，又诏令“池籩未御幸者，假与贫民”（同上），即皇家禁苑、陂池允许贫民耕种。宣帝末年，两次减收算赋钱，同样与安抚贫民有关。

除了赈济贫民之外，宣帝时期对流民的抚恤，措施更加具体化。如地节三年（前 71 年）十月，诏令“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汉书·宣帝纪》），凡回归原籍的流民，由官府分给公田耕种；借给粮食及粮种；免除纳算赋和徭役等。这是自武帝以来，抚恤流民条件最优惠、措施最具体的一项诏令。与此同时，对抚恤流民政绩显著的地方官，则予以褒奖。前述胶东相王成，招抚流民成绩突出，流民自著名籍者，达八万余口之多。因此，汉宣帝特下诏嘉奖，王成俸秩序增至中

二千石，又赐爵关内侯，以鼓励地方官吏招抚流民。

第三、劝民农桑。昭宣时期，“以农桑为本”，对发展农业生产，比较重视。宣帝时期，所任用的地方长吏，有的注重劝民耕稼力田，所在地区农桑岁增，民得其利。如龚遂为勃海郡太守，“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汉书·龚遂传》）。又如召信臣任南阳太守，“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汉书·召信臣传》），并注重农田水利灌溉。对官家子弟游手好闲，不以田作为事，则加以斥责，甚至依法治罪。因此，“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汉书·召信臣传》）。地方官吏劝农政绩显著者，汉廷给予奖赏或升迁。龚遂后来迁为水衡都尉，召信臣则“数增秩赐金”（同上）。

此外，朝廷还派好农使巡行郡国，劝勉农桑，有的好农使甚至擢迁为高官。

总之，昭宣时期，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经过三十八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并未解决，土地兼并始终没有止息，农民破产自然不可避免。《汉书·食货志》叙述宣帝死后，元帝即位初年的情形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珠厓郡人民反，贾捐之上书谏止出兵镇压，曾经谈到当时关东的社会情况：“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因此他不主张用兵，建议“专用恤关东为忧”（《汉书·贾捐之传》）。上述情形是发生在汉宣帝死后一年。可见，这位被誉为汉家的“中兴”之主，经过二十五年的惨淡经营，所留给他子孙的“遗产”，依然是一幅民不聊生的“流民

图”！

上述社会现象的出现，其实并不奇怪。自汉武帝以来，由经营工商业起家的豪强地主，逐步取得政治地位，以至成为汉廷新的官僚；而官僚势家利用政治特权，攫取大量资财，不断兼并土地，或者兼营工商业，也是大豪强地主。这两者合流的趋势，在昭宣时期更加明显，并得到迅速的发展。如汉武帝时期，官至御史大夫的张汤，死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汉书·张汤传》）。但是，到宣帝时期，张汤的儿子张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汉书·张安世传》）张氏父子两代，前后五十年间，家业变化如此之大。很显然，张安世既是一位大官僚，又是兼营工商业、内治产业的豪强地主。又如宣帝时期，杨恽迁中郎将，后擢为诸吏光禄勋。其父杨敞在昭帝时，官至御史大夫和丞相。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汉书·杨恽传》），又“再受訾千余万”（同上）。从这些数字看，杨氏这个官僚势家，所积累的家资，数以千万计。杨恽失官后，“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又“通宾客”，“余贱贩贵，逐什一之利。”（同上），成了地方上的豪强地主。这种身兼官僚、豪强双重身份的人物，在昭宣时期，从公卿到地方属吏，几乎处处可见。如昭宣之际，京兆掾杜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汉书·赵广汉传》）。杜建既是一般官吏，又是当地豪强，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由于官僚强豪地主融为一体，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政治特权，其掠夺性就更加疯狂了。汉宣帝不可能触动他们根本的经济利益，因此他所实行的抚恤贫民及流民的

政策，充其量不过是修修补补的措施，所以他死后留下的依然是流民遍野。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宣帝中兴”，不过是史家的粉饰之辞，其所起的历史作用，只是延缓西汉王朝的败亡而已。

三、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

汉王朝从草创到全盛，经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到了元、成、哀、平时期，终于步入危机深重的末途。在这五十余年间，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使它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汉家皇权削弱，弄臣擅权，统治集团腐朽。从汉元帝开始，由于外戚、宦官擅权，政治日益腐败。元帝时，外戚史高凭借皇亲关系，官至大司马领尚书事，但是他只是充位而已。当时元帝的老师、前将军萧望之，还有光禄大夫周堪，更多地得到元帝的信用。史高为了把持朝政，便与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相勾结，排挤萧望之和周堪等人，形成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萧望之、周堪不满许、史外戚放纵，又痛恨宦官弘恭、石显擅权；而史高、石显则指责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为朋党，企图专擅权势，要求交廷尉查办。汉元帝昏庸无比，竟不懂交廷尉就是下狱治罪，使萧望之尝尽坐牢之苦。萧望之获释之后，虽然再度被起用，但是仍没有逃脱弘恭、石显的毒手，最后被迫自杀。汉元帝不亲政事，宦官专擅朝政愈演愈烈。弘恭死后，石显继任中书令，威权日盛。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等人，因曾经上书揭发石显之短，都

先后被罗织罪名处死，或者被罚作苦役。朝廷公卿群臣都怕他，而依附他的则封官晋爵。终元帝之世，实际的朝政大权，为宦官所把持。

到成帝时期，尊母后王政君为皇太后，以母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上台伊始，先剥夺石显大权，迁为长信中太仆，职掌皇太后舆马。不久，石显又被免官，迁回原籍，在途中不食而死。原来附和石显的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也都因罪而被罢官。从此朝政大权转入外戚手中。汉成帝荒淫无度，王凤把持朝政，王氏家族贵幸倾朝。河平三年（前 27 年），王凤的弟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同日封侯，称为“五侯”。王氏子弟封官的更多，几乎充斥汉廷各部门。郡国守相及刺史，也都是王氏亲属充任。大将军王凤专擅权柄，连汉成帝也畏惮几分。有人举荐刘歆有异材，成帝召取衣冠，准备拜他为中常侍。不料侍从官员惶恐不安，竟至连连叩头，力劝成帝请示大将军再办。最后王凤不同意，成帝竟不敢擅自任命。又如定陶共王来朝，成帝本想让他留侍京师，但是王凤从中阻挠，成帝只好与共王相对涕泣而别。王凤如此专擅朝事，京兆尹王章上书表示异议，结果遭到杀身之祸。王凤把持朝政十余年，他死之后，王氏其它成员仍继续控制朝政。

汉成帝在位二十七年，死后无子继嗣，遂由定陶王刘欣继位。这就是汉哀帝。从此，外戚除了王氏家族之外，又增加刘欣一系的丁家和傅家。外戚为了争权夺利，彼此矛盾重重，西汉政治愈加腐败。但是直至汉平帝时期，太皇太后王政君还活着，她的内侄王莽接任大司马一职，王氏家族依然控制汉家朝政。从元帝至平帝四朝，由于宦官和外戚擅权，使皇权大大地

削弱，西汉朝政如江河日下。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统治集团奢侈腐化的结果。

元成以来，奢侈之风，日甚一日。从皇帝、贵戚、公卿、到属僚，无不争于奢侈。汉元帝沉溺于声色，汉成帝以好色闻名，生活极其荒淫糜烂。当时皇室随武帝旧规，后宫多取女子不计其数。汉成帝甚至微行出游，将民间歌女召入后宫。贡禹曾经揭露，当时皇家的离宫别馆所费甚巨，官奴婢多达十万余人。他们“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汉书·贡禹传》）。皇室用的舆服器物，每年花费相当惊人。“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同上）皇帝不仅生前尽情挥霍，死后同样侈靡无度。宣帝死后葬杜陵，元帝为他安排守陵的宫人，达数百人之多。汉成帝即位时刚刚十九岁，只过一年，他就开始为自己营建陵墓。由于他不满意初陵的规模，后来又改作昌陵，结果治作五年未成，而“功费大万（亿）百余”（《汉书·刘向传》）。为此，汉廷大兴徭役，重增赋敛，搞得百姓财竭力尽。此外，对宠臣贵势的赏赐，数量极大。如汉元帝对于石显，所“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汉书·石显传》）。汉成帝对淳于长，“赂遗赏赐亦累巨万”（《汉书·董贤传》），赐给董贤的妹妹及其妻子各千万数。董贤被迫自杀之后，官府变卖他的家财，累计多达四十三万万。至于对外戚、一般官员的赏赐，数量也很多。

皇室奢侈挥霍，臣下竞相仿效。王凤几个兄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

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汉书·元后传》）王商不仅广建第宅，还穿长安城引泮水，注入第中大陂，用来行船作乐。王根甚至骄奢僭制，第宅中起土山渐台，竟仿照白虎殿构筑。至于公卿大臣、诸侯亲属、一般官员，以至地方富豪，“妻妾或至数百人”，“或畜歌者至数十人”。他们“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汉书·成帝纪》），侈靡之风相当普遍。

西汉后期，从皇家贵势以至公卿僚属，无不争相奢侈，形成一个腐朽的统治集团。他们依仗权势，攫取大量社会财富，以供恣意挥霍。其中疯狂地掠夺土地，刻剥细民，是他们占有财富的重要手段。

其次，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奴婢数量不断增加。一方面，西汉后期，大量经术之士、外戚、宠臣登上政治舞台，豪强地主势力有了新的发展。他们肆意掠夺土地，并得到皇帝的支持，使土地兼并迅猛发展。史载汉成帝“置私田于民间”（《汉书·五行志》），皇帝率先为自己广置地产，不仅反映土地兼并剧烈，也大大助长了土地兼并之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外戚和宠臣对公有土地的掠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汉成帝的舅父红阳侯王立，曾经勾结南郡太守李尚，强占垦辟的“草田数百顷”（《汉书·孙宝传》）。这些“草田”原是一些陂泽荒地，属少府的公有地，因假借无地农民耕种，大多已经开垦为耕地。又如哀帝时期，宠臣董贤通过皇帝的赏赐，占有公田二千余顷，数量相当惊人。

自从元、成以来，由于汉家统治者好儒，大量经术之士充斥汉廷各级机构，成为一批后起的新贵。从元帝到平帝，出任丞相的十三人中，以“儒宗”居相位者，就占了三分之二。其它

公卿、刺史、郡守、诸侯国相，以明习经学之士充任的，人数就更多了。这些新贵一旦取得高官厚禄，即依恃权势而巧取豪夺。如原来出身农夫之家的匡衡，其父“庸作以供资用”（《汉书·匡衡传》）。匡衡在宣帝时，以通晓经学而得官，但没有被重用。元帝即位之后，匡衡屡屡擢迁，官至丞相封侯。就是这样一位暴发的新贵，在所封乐安国，竟非法多占公田四百顷，侵吞田租一千多石。

这些新贵对土地的占有，表现得更加贪婪，张禹就是其中典型一例。汉成帝时期，张禹明习儒家经典，官至丞相封侯。他既是一个大官僚，又“内殖货财”（《汉书·张禹传》）。兼营工商业，具有雄厚的财力，张禹依仗权势，肆意兼并土地，“多买田至四百顷”（同上），都是关中泾水、渭水附近的良田。这样一位集官僚、商人、地主于一身的新贵，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兼备，自然最富于掠夺性，是西汉后期大豪强地主的典型代表。他们对于土地的掠夺，数量十分惊人。

另一方面，自元成以至西汉末年，又相继出现一批新的富商大贾，遍布于京师及郡国。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成都有罗裒；临淄有姓伟；洛阳有张长叔、薛子仲；京师有樊嘉、挚网、如氏、苴氏、王君房、樊少翁、王步大卿等等。还有许多中小商贾，“兼业专利”（《汉书·货殖传》），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这些富商大贾，拥有大量资财，少的数千万，多的达巨万（即万万）。他们“以财养士，与雄桀交”（《汉书·货殖传》），或勾结权贵，擅工商业之利。成都大商贾罗裒，以数百万的厚资，赂结曲阳侯王根、定陵侯淳于长。王根和淳于长则以其政治权力，支持罗氏的高利贷剥削，准许他“擅盐井之利”（同上），使罗氏一年获利

一倍。商贾与权贵相互勾结,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郡国富民,兼业专利,以货赂自行,……不可胜数”(《汉书·货殖传》)。这是西汉后期官僚、商人、地主结合的另一种形式。这些大商贾以权贵为靠山,用积累的大量资财“多规良田,役使贫民”(《汉书·陈汤传》),从而成为一批新的大豪强地主。当时在关东地区,土地兼并之风更加盛行,农民纷纷破产。

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土地集中的现象日益严重,占地数百顷甚至上千顷的豪强地主,在西汉末年并非个别现象。当时出现的大规模田庄,就是土地集中的产物。如南阳大豪强地主樊重经营的田庄,拥有土地三百余顷,还有一个五十平方米的陂塘,田庄里使用“童隶”劳动。而土地集中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农民丧失土地。他们有的变为佃户,受到豪强地主“什税五”的地租剥削。有的成为饥饿的流民,背井离乡,“相枕席于道路”,甚至因饥馑和疾疫而大批死亡。有的被迫嫁妻鬻子,沦为奴婢,使奴婢数量不断增加。乐昌侯王商的“私奴以千数”;元帝时的官奴婢就有十余万。当时官私奴婢数量激增,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处境悲惨,生活极其贫困。谏大夫鲍宣曾上书哀帝,以“七亡”、“七死”概括农民的苦状。“七亡”包括:“阴阳不和,水旱为灾”,“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亡(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部落鼓鸣,男女遮列”;“资贼劫略,取民财物”等等。“七亡”之外,还有“七死”。这就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亡(无)辜”;“盗贼横发”;“怨仇相残”;“岁恶饥饿”;“时气疾疫”等。鲍宣认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都是“公卿守相贪残”(《汉书·鲍宣传》)的结果。正是势

家豪强的贪残，使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后被迫奋起反抗了。

其三、农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改革时政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汉后期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到成帝时，终于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起义。

大约建始三年（前 30 年），有 繇宗率领的数百人，在关中南山（今陕西终南山）发动起义。他们依山阻击，断绝交通，处死官吏，使京师大为震动。起义军坚持一年多的斗争。

阳朔三年（前 22 年）六月，又有铁官徒申屠圣等一百八十人，在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起义。铁官徒即官营冶铁的工徒及刑徒。他们自称“将军，杀死地方长吏，夺取武库的兵器，起义扩大到九郡。汉廷为此兴师动众，派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前往镇压。

鸿嘉三年（前 18 年）十一月，在广汉郡（郡治今四川金堂），有郑躬等六十余人发动起义。郑躬原是重牢的囚犯，因“钳子”（带刑具的罪犯）劫狱，郑躬等被救后举义。他们攻打官府，释放囚徒，夺取兵器，自号为“山君”。一年之间，队伍发展到一万人，地区扩大到四县。汉朝调发广汉及蜀郡三万兵力，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永始三年（前 14 年）十一月，有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等十三人起义。他们杀陈留太守，自称“将军”，历时一年多。

同年十二月，又有山阳（郡治今山东金乡西北）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起义。他们攻杀吏员，释放囚徒，夺取武器，自称为“将军”。起义军坚持一年多的斗争，历经十九郡国，并杀死东郡太守及汝南都尉。

此外，在鄠县和南郡等地，还有一些小规模起义。

各地接连不断的起义，加深了汉王朝的危机，汉家国运将尽的舆论，在朝野更加流行起来。早在昭宣时期，有人对汉王朝的统治，已失去了信心。《春秋》家眭弘就是其中一人。他利用“灾异”现象，劝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汉书·眭弘传》），结果以“妖言惑众”罪被杀。后来又有盖宽饶，要宣帝学五帝禅让帝位，同样因“意欲求禅，大逆不道”（《汉书·盖宽饶传》），被迫自刎北阙下。

到成帝时，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改朝换代的议论，就更加盛行了。北地太守谷永借“灾异”之变，提出“天意”不私一姓，“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警告汉成帝改弦易辙，“厉精致政”（《汉书·谷永传》），“诸夏之乱”方可止息。与此同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认为汉家气运已尽，主张“更受命于天”（《汉书·李寻传》）。人们感到汉家统治岌岌可危，已经无法照旧维持下去了。

哀帝即位之初，面对汉王朝的危机，大司马师丹提出限田、限奴婢的建议，企图使汉家摆脱厄运。经过群臣讨论，汉廷具体规定：诸侯王、列侯、公主、吏民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以二百人为限，列侯、公主一百人，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有土地，不许做官。但是，这些规定触犯了官僚贵族的利益，遭到外戚丁、傅两家，以及宠臣董贤的反对，结果无法实施。汉王朝连缓和社会矛盾的细微兴革，也难以推行了，这正表明它已经腐朽到了极点。于是，汉哀帝乞灵于封建神学，采纳甘忠可的弟子夏贺良兜售“更受命”的主张，企图以改元易号换取“延年益寿”，同时使汉家统治延续下去。建平二年

(前 5 年),哀帝下诏改元,“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李寻传》),表示汉家“更受命于天”。但是这场“更受命”的骗局,并没有改变汉朝的厄运,也没有使哀帝“延年益寿”。只过了四年,这位名符其实的哀帝,便一命呜呼了。汉王朝危机深重,就在这关键时刻,曾一度退隐的王莽,再次被推上历史舞台了。

四、王莽改制

王莽的曾祖父是汉武帝时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的姑妈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成帝时,王家先后有 9 人封侯,王莽的 4 个伯、叔相继担任“大司马”大权几乎全归王家掌管,地方的高级官吏也几乎都是王家任用的人。王家当政 20 多年,形成了一个皇室以外最强大的政治集团。他们从皇帝那里获得大量的封地,同时掠夺了无数私田,各有成百上千的奴隶,还同大商人、高利贷者勾结起来,共同残酷地剥削广大劳动人民。

公元前 8 年,王莽接任他叔父“大司马”的职位。第二年,成帝死,侄子刘欣(哀帝)继位。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王莽一度失势。公元前 1 年,哀帝死,王莽东山再起,就同他的姑妈一起立了一个 9 岁的皇族当皇帝(平帝,公元 1——5 年在位),王莽掌握了实际政权。他一方面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重要官职,另一方面大封西汉的宗室和功臣的后代,取得上层豪强的拥护。他又扩充“太学”,修筑学舍 1 万多间,并在各郡、县设立学校,还征集通晓天文、军事、医学等各种专门知

识的儒生数千人到首都，以争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拥护。王莽还玩弄一些欺骗人民的手法，例如，公元 2 年发生旱灾，他“献出”钱 100 万、田 30 顷，“救济”灾民；还在首都造些房子给贫民居住，等等，以此来笼络人心。

西汉统治集团的成员看到他们的代表人物王莽，既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又善于搞些欺骗人民的把戏，所以他们大都拥护王莽，急急忙忙把他抬了出来。公元 5 年末，王莽毒死汉平帝；第 2 年，立了一个只有 2 岁的皇族（一般史书称他为“孺子婴”）做皇帝。王莽自己任“摄皇帝”，代行皇帝的职务。

拥护王莽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纷纷制造“谶”语、“符命”，说王莽应该当皇帝。王莽就以此作为他发动宫廷政变的合法依据。公元 8 年，王莽废掉了孺子婴，夺取了西汉政权，建立了短命的“新朝”。

王莽尊儒反法，咒骂秦始皇，他一上台，就着手改革制度，搞了许多复古的措施。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及广大农民纷纷沦为佃农、雇农和奴隶。因此，王莽的“改制”，首先针对着这两个问题。

公元 9 年，王莽下令把全国的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如果一家不满 8 个男子，而田超过一“井”的，要把多余的 land 分给无地的本族人或邻居。原来没有土地的人，可以按照商、周时代“一夫田百亩”的标准向政府领取。同时下令把私人所有的奴隶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把古书里记载的奴隶社会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度”，硬搬到封建社会来，这是一种复古的措施，完全违反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王莽虽然规定奴隶不准买卖，但是他动不动就把成千上万的所谓“罪

人”作为奴隶，扩大了奴隶的占有和使用，实际上是把残余的奴隶制度复活起来。这也是一种复古的措施，完全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土地和奴隶的买卖，是私有制社会发展中必然出现的情况，大贵族和大地主也根本不肯把多余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因此，这一复古主义的法令只是一张欺骗广大人民的空头支票罢了，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到公元 12 年，王莽只得放弃了这一“改革”。

为了限制豪商势力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分享商人的利益，增加朝廷收入，从公元 10 年起，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管”制度。“六管”是王莽政府垄断的 6 种经济事业，即盐、酒、铁（主要是农具）由国家专卖，货币由国家铸造，采取山林湖河的物资要向国家纳生产税，“五均”由国家办理。

“五均”，也称“五均赊贷”，是王莽举办的官营商业、赊贷，以及征收各种杂税的经济政策。政府在长安、洛阳、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临淄（今山东临淄北）、宛（今河南南阳）、成都（今四川成都）等全国 6 个大城市设立五均官。五均官的职责，名义上是为了平衡物价，防止大商人囤积居奇，实际上是收贱卖贵，从中取利。政府还经营赊贷，把钱赊给（不收利息）或贷给（月息 3%）贫民，目的在于抑制商人放高利贷；但是，借钱的贫民过期还不出，就要被罚作刑徒。政府主管的税收，范围很广，小商、小贩，以至医生、卖药的都要交税。

王莽借口“国用不足”，任用官吏不给“俸禄”（封建社会官吏的“工资”）。他又任命大商人做官去督察“五均六管”的执行情况。官吏和大商人互相勾结起来贪污舞弊、剥削人民。地方官把贪污和剥削所得的一部分送给中央的官吏，得到他们的

保护,更是无恶不作。王莽为了增加税收,垄断工商业而实行的“五均六管”,成了大小官吏贪污剥削的好机会,而一般工商业者,以至小商、小贩、城市贫民和农民就大受其害。

“六管”中,人民受害最严重的,要算国家铸钱这一项了。在王莽统治的 10 多年间,进行了五次币制改革,每改革一次,就铸造好几种新的钱币,以小换大,来套取民财。因此,每改革一次,小工商业者和农民就大量破产一次。豪强地主和富商则乘改换钱币的机会,私自铸造钱币。王莽用重法严禁,起初规定,私铸钱币的人处死,后来改为一家私铸,邻居五家都算犯罪,罚作官奴隶。甚至一家藏有铜和炭。就被认为私自铸钱,邻近的五家跟着倒楣。犯这种罪的,前后在 10 万人以上。他们被送到长安铸钱官那里作苦工。一半以上的人被折磨死了。

“六管”中还有一项,就是征收开采山林、江河、湖泊的生产税。失去土地无法生活的贫苦农民上山打猎砍柴,下江河湖泊捕鱼捉虾,也都受到剥削。正如当时的劳动人民所说的:出门去生产,所得的还不够交税;闭门家中坐,横祸会从有铜和炭的邻居家飞来。在王莽反动统治的剥削压迫下,劳动人民纷纷起来斗争了。

面临着农民大起义的威胁,王莽多次发动对国内兄弟民族的战争,以转移人民的视线;同时,借战争的名义,大肆搜刮民财。他把失去土地无法生活,随时都可能参加起义的劳动人民招募到军队里去,企图以此防止起义的爆发。公元 10 年和 19 年,他对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发动了两次战争,把二三十万军队驻扎在接近匈奴的地方(今山西、河北北部和内蒙等地),但并不出兵打仗,让这些士兵冻死、病死或饿死。公元

16年，在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中，王莽的20万大军，有百分之六七成的士兵饿死、病死了。王莽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遏止和削弱农民起义了。事实上，恰恰相反，起义正是首先从这些地区爆发，终于发展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农民大起义——绿林、赤眉起义。

五、赤眉绿林起义

西汉后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首先，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土地兼并越来越剧烈。汉成帝时，丞相匡衡本来就享有31万亩土地的租税，后来又扩占了4万多亩。成帝另一个大官僚张禹经常得到皇帝的赏赐，前后有数千万之多。他用这些钱买占民田4万多亩，都是泾水、渭水灌溉的肥沃好田。同时，西汉统治者政治黑暗，对农民的赋税剥削也越来越繁重。加上连年灾荒，农民死的死，逃亡的逃亡，再也无法生活下去。汉哀帝时的大臣鲍宣在一道上书里说，当时农民有“七亡（逃亡）”、“七死”。其中，“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兼并土地无止境）”是“一亡”，“县官重责，更赋租税”是“一亡”；“酷吏毆杀”是“一死”，“岁恶（灾荒年月）饥饿”是“一死”。它是西汉末年农民悲惨境地的生动写照。公元8年，外戚王莽篡夺汉朝刘姓政权，建立新朝。他企图通过实行复古“改制”，来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结果却使已经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了。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便爆发了。

公元17年，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连年灾荒，饥民们被迫到沼泽地里挖野草根充饥。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

由于能给饥民们调解纠纷，被推为首领。他们很快就聚集了数百人发动起义。南阳（今河南南阳）的马武、颍川（今河南禹县）的王常、成丹也率众来归。起义军攻打附近小的乡邑，数月间发展到七八千人。起义军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因此被称为绿林军。

与此同时，东方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公元18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领一百多人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不久转入泰山。周围一些小股农民起义军见樊崇作战勇猛顽强，都来投靠他。1年之间，起义军就发展到1万多人。接着，琅邪人逢安、东海（今山东郯城西南）人徐宣、谢禄、杨音发动起义，并率领几万人与樊崇会合。从此，这支起义队伍就在青州、徐州（今山东、江苏北部）一带攻击官府、严惩豪强。22年初，起义军击败王莽的官军，打死带兵的大将景尚，声势愈来愈大。

这一年4月，王莽派遣更始将军廉丹、太师王匡（与绿林军的王匡同名）率领10余万大军，前来镇压樊崇领导的起义军。樊崇等准备迎战。每个人都用赤色涂眉，作为起义军标记。从此，这支起义军就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和王莽军在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决战，大败莽军。王匡狼狈逃走，廉丹被起义军打死。无盐大战后，赤眉军在黄河南北纵横驰骋，队伍扩充到数10万人。王莽在东方的统治瓦解了。

正当赤眉军在东方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绿林军在南方也有了很大发展。公元21年，绿林军在云杜（今湖北沔阳西北）打败了前来围攻他们的官军2万多人，夺得全部辎重，乘胜攻占竟陵（今湖北省潜江西北），然后，退据绿林山。这时，起义队伍发展到5万多人，声势渐盛。第二年，绿林山一带发生

大瘟疫，起义军死亡过半，于是，绿林军决定分兵转移。王常、成丹率一路西入南郡（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率主力军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后来，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率千余人，响应新市兵起义，称“平林兵”。

在绿林、赤眉起义同时，还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等部义军，众约百万人，活动在河北各地。农民起义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

这时，一些地主阶级分子看到王莽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也纷纷招兵反对王莽。南阳大豪强刘缤、刘秀兄弟，在舂陵乡起兵。这是支地主领导的武装，在反王莽的战争中，暂时和新市平林农民军联合。公元22年12月，下江兵转战到河南，与新市兵、平林兵会师。23年一月，起义军在泚水（今河南泌阳县境）一战中，击杀了王莽的大将甄阜、梁丘赐。接着，又在昆阳（今河南南阳县南）击败王莽的大将严尤、陈茂军。经过这两次大胜，绿林军发展到10多万人。为了更好地统率各路起义军，2月，绿林军立刘玄为汉帝，号更始，建立政权。

绿林军建立政权后，派遣王凤、王常和刘秀攻下昆阳（今河南叶县）、并围攻宛城（今河南南阳）。起义军节节胜利，使王莽政权受到极大震动。王莽派遣王寻、王邑征集各地精兵42万，号称百万，向绿林军猛扑过来。

这年三月，王莽军队包围了昆阳。当时，王莽军围昆阳数10层，列营百数。城内起义军只有八九千人。莽军用冲车撞城，掘地道攻城，向城内密集射箭。但是，起义军顽强地坚守城垣，并决定由王凤、王常守城，由刘秀率13骑乘夜出城，到外地调集援军。援军到达后，便立即在离王莽军队四五里的地

方，列成阵势。与王莽军交锋；取得胜利后，乘胜前进，愈战愈勇。起义军无不以一当百。接着，由刘秀率敢死战士 3 千人，从城西水上猛冲王莽军的中军。杀死王寻。同时，城内起义军也乘势杀出，喊杀声震天动地。莽军大败，军官、士卒争相逃走，互相践踏。王邑只带了几千人逃回洛阳。昆阳之战，使王莽军主力损失殆尽，是推翻王莽政权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刘秀表现得勇敢善战，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为他利用农民革命的力量，在推翻王莽政权后，取得了有利的政治地位。

当昆阳决战前夕，更始元年五月，刘玄等已攻克南阳并建为都城。刘演的部将刘稷对刘演未当上皇帝不满，公开攻击刘玄并拒不服从调动，刘玄等抓住刘稷准备惩办，又遭到刘演的极力反对，于是刘玄便将刘演、刘稷一并处死。刘秀听到这一消息，考虑到自己处境危险，立即从前线赶回南阳请罪。他既不同刘演的部属交往，也不谈昆阳的战功，对刘演的被杀也毫无悼念表示，饮食言笑一如平常。刘玄觉得不便再加株连，便给他一个破虏大将军武信侯的官职，实际上被剥夺了军权。

昆阳大捷的消息一传开，全国闻风振奋。各地豪杰纷纷起来响应更始政权，杀掉王莽的地方官吏，自称“将军”，用更始年号，等待着刘玄的诏命。不过 10 天半月之间，王莽政权便号令不出都门了。更始元年八月，刘玄命王匡领兵北攻洛阳，命申屠建、李松领兵西取武关（今河南西峡西）进攻长安。这时，析县（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领导百多人在南乡起兵，而王莽政权的县宰正带兵数千在守备武关。邓晔派人去招降说：刘

家的皇帝已经登基，你还看不清形势吗？县宰请降，邓晔便接管了这支军队，自称辅汉左将军，向武关进攻，王莽政权的都尉也投降了。邓晔挥军北上，攻杀王莽的右队大夫（即弘农太守），占领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关中震动。王莽无计可施，大司空崔发建议说：古书上讲国家遇到大灾，就痛哭流涕来加以抵制，现在也应当哭告上天以求救助。王莽果然率领群臣到南郊祭天的地方，大讲自己历来所得到的祥瑞符命，最后仰天大呼：皇天既然授命于我，就应当显灵消灭众贼；假如是我不对，愿天降雷霆劈死我。于是捶胸顿足大哭，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又连连叩头。他还把自己的功劳写成告天的文书，让京城的儒生百姓聚会，早晚痛哭祷告，政府准备食品招待。凡是悲痛异常和能背诵告天文书的，都给官当，竟然有 5000 多人入选。

另一方面，王莽当然也还要组织武力进行顽抗。他任命了 9 名将军，率领近卫军精兵数万人往东迎敌，却先把他们的家属集中到宫内作为人质，赏赐也很菲薄，军队更无斗志。开到华阴（今属陕西），便被邓晔击败，6 军溃散，剩下 3 军退保京师仓。邓晔迎入刘玄派来的李松，联合进攻京师仓未得手，便在华阴休整。弘农小吏王宪经邓晔任命为都尉，率领数百人北渡渭河绕向长安进攻。这支小队伍却得到沿途民众热烈响应，长安周围属县各组织起数千人，自称汉将，包围了长安城。王莽此时已无兵可派，更赦免诸狱囚徒，分给武器，让他们饮猪血立誓效忠，叫史谡带领出城去抵挡。但这支军队刚走过渭桥便一哄而散，史谡只得空手回城。九月初，起义民众入城，王邑等虽然还在顽抗，各官府的人却都跑光了。城中少年朱弟等也

起来参战，他们拿起武器冲向宫廷，放火焚烧殿门。王莽在部分侍卫簇拥下逃到渐台，追来的群众把他包围了数百重，最后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王宪便自称大将军，统管进城的各路义军。3天之后，李松、邓晔等进入长安，申屠建也赶到了。他们认为王宪得到皇帝玺绶没有及时上交，又掳掠了很多宫廷妇女，使用皇帝仪仗，便把他抓来杀了。申屠建还宣称：长安周围的民众狡猾，共同杀害了自己的君主（指王莽）。这就使得附近属县人心惶惶，纷纷武装割据自保。申屠建等攻不下来，只好向刘玄报告，后来还是刘玄来到长安宣布大赦，才逐渐平定下来。

当王莽的脑袋传送到南阳时，王匡等已攻克了洛阳。更始元年十月，刘玄到洛阳，随即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进行招降安抚。东方农民起义军主力赤眉得到消息，主帅樊崇亲率将领20余人随使者到了洛阳。刘玄虽然封他们为列侯，但没有确定具体封国，特别是不懂得抓兵权的重要，对广大的赤眉军缺乏妥善安置，发生了逃散现象。樊崇等便迅速回到军中掌握住部队，并恢复独立行动，这一失策对更始政权造成了眼前的直接威胁。当时黄河以北有成百万分散活动的农民起义队伍，还有不少地方割据势力，需要慎重对待。经过磋商，刘玄决定派刘秀以代理大司马的名义渡河去镇慰州郡。虽然刘秀实际上是赤手空拳凭一个“钦差大臣”的名义去闯开局面，但在政治上却给他宝贵资本，后来得以发展为取代更始政权的强大力量。不过这两点当时显然并未引起陶醉在胜利中的刘玄及其大臣们的注意，他正忙于派人去长安整修宫殿。更始二年二月，刘玄自洛阳迁都长安，随后大封宗室功臣刘祉、刘赐、刘

嘉、王匡、王凤、王常、成丹、陈牧、廖湛、申屠建、李通、李轶等 10 余人为王，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大司马执政。刘玄威信不高，赵萌专权于内，李轶擅命于外，诸王又各自掌管赏罚大权，随意封官赐爵，使得地方上无所适从。这样就不能形成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以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逐渐丧失了政治威望。而刘秀却趁机以河北为根据地，镇压和收编了数十支起义军，发展豪强地主武装，积极为夺取农民的胜利果实作准备。

公元 24 年冬，赤眉军兵分两路，西攻长安。在西进途中，赤眉军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立了一个 15 岁的汉宗室刘盆子为帝。25 年 8 月，绿林军农民将领王匡率领一部分起义军与赤眉军会合，并在 9 月，联兵攻入长安。刘玄向赤眉军投降。

刘秀稳定了河北以后，即挥师渡河南下，进入今河南中部，展开与赤眉军等争夺天下的斗争。公元 25 年，在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的前后，刘秀也登基称帝，年号建武，沿用汉号、定都洛阳，史称东汉。赤眉军刚进入关中，刘秀就派邓禹率大军尾随其后，“以乘更始，赤眉之战”，坐收渔人之利。赤眉军进入长安后，由于关中地区的地主豪强隐藏粮食，聚众反抗，与农民军为敌，长安城中粮尽，使赤眉军遇到很大困难。第 2 年冬天，长安附近发生大饥荒，赤眉军不得不撤离长安。东归途中，赤眉军在宜阳（今河南宜阳西）遭到了刘秀大军的截击，全军覆没。

坚持 10 年之久的绿林、赤眉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推翻了王莽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第三章

东汉王朝的兴衰

第一节

“光武中兴”与明章之治

东汉光武、明、章三帝统治时期，是东汉的建立和发展时期。此时的统治者认为，西汉诸侯王的叛乱、王莽篡权和农民起义等社会政治事件均不能重演了，于是采取措施，限制诸侯王、外戚、功臣豪强势力的发展，以加强中央集权；释放奴婢、减轻赋税、兴修水利，以发展生产；提倡谶纬神学，将其揉进儒家思想中，以实行思想禁锢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备，社会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出现了“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的所谓兴盛的局面。

一、光武中兴

(1)统一全国。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并剿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天下并未统一,各地还存在不少的割据势力。其中较大的有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的刘永,琅琊(今山东诸城)的张步,东海(今山东郯城北)的董宪,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的李宪,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的卢芳,陇西(今甘肃东部)的隗嚣,河西(今甘肃西部)的窦融,巴蜀(今四川)的公孙述等。他们虽自立名号,但在同刘秀的对抗中又有一定的联系,东部以刘永为盟主,西部以公孙述为首领。刘永为西汉梁孝王八世孙,血统比刘秀还要“正统”,更始帝败后自称天子,据有二十八城之地,又号令张步、董宪等,专制东方,对东汉的威胁最大。因此,自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夏至建武六年二月,经过三年半的艰苦战争,刘秀才取得征讨刘永及其党羽的胜利,平定山东。同时,刘秀又派兵南征黎丘(今湖北宣城西北)的秦丰,西征南阳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南)的延岑、南郡(今湖北江陵)的田戎,秦丰被灭,延岑、田戎逃奔公孙述。此前,盘据今河北的彭宠也被人刺杀而死。这样,北自幽燕,东至齐越,南到荆襄,都统一起来。

对待西南和西北的割据势力,刘秀开始企图以诱降的办法解决之,但公孙述与隗嚣均不答应。继之又想割断他们之间的联系,然后各个击破之,结果也未能如愿。在平定了东方以后,刘秀乃决定以武力统一西北和西南。建武九年春,隗嚣死,其子纯继任为王。刘秀于是联络河西的窦融,双方发兵夹攻隗

纯。次年冬，隗纯降，西北平定。“得陇望蜀”，刘秀乘势大举发兵征讨公孙述。建武十二年冬，汉军攻破成都，公孙述被创而死，巴蜀平。至此，纷乱结束，全国基本统一起来了。

(2)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措施。东汉建立伊始，刘秀标榜要“中兴”刘氏家天下的统治。为此，他一方面要设法尽快恢复经战乱破坏而凋敝的社会经济，另一方面要废除王莽托古改制的一些做法，恢复和完善西汉时期的各项制度和政策。刘秀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具体的做法，就是所谓“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后汉书·循吏列传·序》)正是在这一近似“无为”的政治思想的指导下，光武帝刘秀实行了诸多恢复经济和加强集权的措施。

在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方面，刘秀主要实施了释放奴婢、精兵简政、减轻赋税的“度田”等法令政策。针对西汉中后期以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农民因破产而大量奴婢化，刘秀利用农民战争冲击奴隶制残余的有利形势，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连续六次下令释放奴婢和三次下令禁止杀伤奴婢。释放奴婢的范围包括王莽时没入官而不合法者，因贫困被卖为奴而要求离去者，因战乱被掳卖为奴者，被主人灸灼者等等。奴主如违令拘留不放者，以西汉“略人法”治罪；杀奴婢者不得减罪；残伤奴婢者按律论罪。另外，还废除奴婢射伤人的弃市律。刘秀的这些诏令，不仅缓解了奴婢问题，增加了农业劳动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而且也有很大的所谓“中兴”汉家的政治影响，有利于统一全国和稳定社会秩序。

实行“精兵简政”。所谓精兵简政，即指东汉初裁减官吏和

复员军队等。建武六年，刘秀鉴于战后人口锐减、吏职繁杂的实际情况，裁并四百余县，约相当于刘秀当时占有地县数的三分之一。又减省吏职十分之九，约减少数万名官吏。次年春，刘秀又大批省罢地方军队，这既减轻了徭役，又让大量的劳动力回到劳动生产中去。此外，刘秀还鼓励流民返乡生产，并把一些荒地、公田赐予贫民耕种。这些措施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赋税方面，东汉政权建立初期因要进行统一战争，国家财政很困难，刘秀不得不向辖区内农民征收“十一之税”。为了储备粮食，他还令军队大搞屯田。由于裁减官吏和复员军队节省了开支，而屯田又积储了军粮，于是刘秀在平定山东后的建武六年冬即下诏西汉租“三十税一”的制度。对农民剥削的减轻，也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真正得到好处的，还是那些“膏田满野”的豪强大地主。

为了掌握确实的田亩和户口数，便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征调徭役，并以此稍稍制豪强势力的发展，刘秀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令州郡检核田亩数和户口年纪，史称“度田”。豪强地主多抗拒检核。而惧怕豪强的地方官也不敢认真推行度田，或优待豪强大家，任其隐瞒土地、人口；或贪于贿赂，与豪强勾结起来侵扰贫民，把农民的房舍等也当田亩数上报充数。正如《后汉书·刘隆传》所说：“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兄呼。”刘秀以“度田不实”的罪名杀掉了十几个郡太守，想以此推动度田。不久，失去地方官庇护的豪强公开发动武装骚乱。《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曰：“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

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后来，刘秀采取镇压与分化瓦解相结合的办法，鼓励揭发和立功赎罪，对地方官也既往不咎，并把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往他处，以田宅安抚之。这样，度田事件才得以平息。此后，尽管豪强仍在隐瞒土地和户口，但官府一年一度的度田和案户比民制度还是坚持下来了。这既有利于赋税、徭役的征调，也打击了地方豪强，使其武装不敢再公开化了。

(3)完备专制体制。东汉初，跟随刘秀打过天下的功臣很多，其中因功劳较大得以在明帝时图像于南宫云台阁的被称为“云台二十八将”。而被封为列侯的有一百多人。为协调皇帝与功臣的关系，以加强皇权，刘秀采取了给功臣以优厚封赏而不给职权的办法。除任边将的人继续握有兵权和几个有吏治才能的人得参与政事外，多数功臣“增邑赏不任以吏职”（《后汉书·马武传》），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列侯食邑之地大者四县，小者数百户，少数超过西汉初的封赏。同时，对于外戚，刘秀也在经济上尽量优待，但在政治上“不得封侯与政”（《后汉书·明帝纪》），即不给外戚以尊位，不让他们干预政事。对宗室诸王，刘秀申明西汉“阿附蕃王之法”，不许他们交结宾客，蓄养党羽。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刘秀还下令捕杀诸王宾客，罪死者以千计。因此，当时人称：“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后汉书·朱浮传》）。

在“退功臣”的同时，刘秀采取“进文吏”的措施，即选任熟悉儒家经典和封建典章制度的儒学之士为官。他一方面重视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曾多方访求，重礼征聘。如不仕王

莽的汉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令卓茂被征为太傅,名儒伏湛被征为尚书。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提倡儒学,以培养统治人才。早在未完成统一的建武五年,刘秀就下诏设太学,置经学博士,为诸生传授经学。

在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方面,刘秀为加强皇权,采取了集权于尚书台的措施。东汉初年,号称三公的司徒、司空、太尉虽在名义上是宰辅,但以他们为首的外朝只是执行机构而已,实际权力掌握在中朝的尚书台。尚书台的长官为尚书令,禄秩由西汉的六百石增至千石;令之副为尚书仆射,秩六百石。尚书令、仆射之下有秩四百石的六曹尚书,分掌官吏考课、选举、土木工程、民族事务、诉讼、盗贼等政务。《后汉书·仲长统传》说:“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无所不统,俨然是皇帝直接指挥的朝中之朝。而辅政官员或皇帝的亲信,也要加上“录尚书事”的头衔才能参与中枢决策。

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刘秀在恢复西汉制度的基础上,主要实行了二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刺史权力。刺史不仅有固定的治所,而且举劾官吏不再经过三公派吏案验即可直接退免。刺史不再亲自到京师奏事,只是在年终派上计吏奏报一州政绩。随着权力的加强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刺史逐渐由监察官变成郡的上一级地方官;州也由监察区域转变为比郡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域。这一变化虽到东汉后期才算完成,但却是初期扩大刺史权力的结果。二是集军权于中央。建国不久,刘秀就撤内郡都尉之官,将兵权并于太守。建武六年,更因中央军力强大和山东已平定,即下令废除地方兵,让军人归民就农。地方每年一度的按期征兵操练的都试制也随之被取消。大

的战争必须依靠庞大的中央正规军,如南军、北军、黎阳营、雍营或边防军等。这样,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但是,因镇压人民反抗的需要,终东汉之世,内郡地方兵不可能全无,都尉之职也是旋废旋置。不过,地方兵缺乏正规的训练,战斗力较弱。末年,地方兵常在州牧、刺史等的率领下作战,终于酿成军阀割据之局。

二、明章之治

明帝、章帝继续奉行刘秀时期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并根据新形势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做法,使东汉王朝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等也较前有所发展,出现了较为兴盛的局面。

建武末年,严重威胁东汉王朝的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部匈奴请求内附,入居云中(今内蒙古托克的托东北)、西河(今内蒙古东胜)等地。从此,南匈奴助汉屯戍边境,汉以大量的财物馈赠之,关系和睦,边境安宁。但居于漠北的北匈奴不仅控制了西域等广大地区,而且经常侵扰汉的西北部边地,掳掠财物和人口。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利用北匈奴遭外部打击而部众离散的时机,派兵四路大举进攻驻兵屯田。后来,汉又一再打败北匈奴。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北匈奴五十八部降于汉。由于明、章时期对北匈奴的积极用兵,因此在和帝继位的次年(公元89年),汉能大败北匈奴,北匈奴二十余万人降汉。汉军出塞三千余里,在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此后,北匈奴或降或西迁,故地也被鲜卑族

占据了。

明帝进攻北匈奴的目的既是要解决边境的安宁，也是想恢复与西域的交通。于是汉在取得伊吾卢地的次年，即恢复西域都护的建制，并进军车师，置戊、己校尉，分别领兵屯田于车师前、后部，以防卫匈奴并监护西域诸国。同时，又派班超率三十六人使西域南道诸国。班超在西域经营三十年（公元73—102年），重新恢复了内地与西域的关系和中西交通，为巩固西部疆域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政治上，明帝、章帝继续采取光武帝的压抑外戚和宗室诸王的措施。为了不让外戚干乱政治，明帝令阴、邓等外戚家相互纠察，发现问题即严加惩处。第五伦在章帝时说：“梁、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诛之。自是洛中无复权威，书记请托一皆断绝。”（《后汉书·第五伦传》）即使是平素恭谨的窦融，也因“子孙纵诞，多不法”（《后汉书·窦融传》），而被明帝免官家居。章帝时，皇后的哥哥窦宪以贱值强夺明帝女沁水公主园田，章帝深责之，并骂曰：“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后汉书·窦宪传》）对宗室诸王，明、章二帝不仅重申光武帝的不许结交宾客之法，而且严厉打击违法者。明帝初，同母弟广陵思王荆使巫诅咒，有司奏请诛之，荆被迫自杀。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楚王英被告结交方士，造作图讖，招聚奸猾，图谋不轨，明帝废楚王英。次年，英自杀后，明帝又穷治楚王之狱，被牵连而遭屠戮、系狱或迁徙的诸侯、外戚、官吏与豪强以千数，章帝时，阜陵质王延也因图谋不轨，被贬为阜陵侯，食地也被削减为一县。

经济方面，明、章二帝在继承刘秀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当

时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兴修水利、赋民公田的有力措施。西汉末年,黄河决口,河道南移,河水灌入汴渠,淹没数十县,泛滥近六十年。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明帝用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等人,率士卒数十万人修治黄河、汴渠,堵塞了黄河决口,疏通河道,立水门控制水流量,使黄河、汴渠分流。从此,数十县荒废的土地得到耕种。此后,800余年,黄河未再改道,没出现过大的水患。工程竣工后,明帝还下令将滨渠下田赋与贫民,不许豪强独占其利。章帝时,王景为庐江(治今安徽庐江西南)太守,率吏民修复芍陂(今安徽寿县境内),垦田倍增,境内由是丰给。又张禹在徐县(今江苏泗洪南)开蒲阳旧陂,垦田四千余顷。亩收两三斛,年获谷物百万斛以上。在遇水旱、蝗虫、牛疫等自然灾害或其他情况时,明、章二帝还常下令把荒土、公田分赐贫民,或贷给粮种、器具,或免收租税,以鼓励救灾和发展生产。这些政策的实行都对发展社会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史称明帝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后汉书·明帝纪》)这虽是溢美之词,但也多少反映点东汉兴盛的实际情况。据应劭《汉官仪》(《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统计:明帝末年比光武末年增加了150余万户、1300余万口,而章帝末年较明帝末年又增加近200万户、约1000万口。史籍中东汉总的垦田数和户口数比西汉末年少些,恐怕与豪强地主隐瞒田地和依附人口有关,不能看作是实际情况。

明、章二帝还大力提倡儒学,以培养统治人才和加强思想统治。明帝不仅广召名儒,有时还亲自给儒生们讲授经学。永平九年(公元66年),明帝还为外戚樊、郭、阴、马四姓子弟立

学校，置《五经》师授业，号“四姓小侯”之学。又大兴郡国之学，广开待宦之途。章帝更是仿效西汉宣帝，召集群儒，在白虎观开会，讨论经义，将阴阳五行和谶纬神学揉进今文经学，更进一步使儒学神秘化。

三、东汉农业、 手工业、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东汉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铁制农具的改进，牛耕技术的推广，以及重视兴修水利。东汉时，农业上广泛使用铁制铧犁，可分由大、中、小三类，在使用上有不同的用途。铧犁的形制有所改进，更利于起土深耕。

牛耕在中原地区，已经普遍使用。一般多用二牛抬耨挽拉，有的地方已使用一牛挽犁，反映牛耕技术有了改进。东汉初年，牛耕技术逐渐向边远地方推广，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水利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东汉初年，各地特别重视兴修陂塘，以利灌溉。如光武帝时，南阳太守杜诗修治陂地，广拓土田。章帝时，又有下邳国相张禹主持修治蒲阳陂。顺帝时，会稽太守马臻领导修建镜湖，等等。

当时兴修河渠也相当普遍。东汉初，任延改任武威太守后，因河西缺少雨水，“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后汉书·任延传），使农田得以灌溉。

明帝时，永年十二年（公元 69 年）王景与王吴再次奉命共

修汴渠，他们动用 10 万人，修渠筑堤，疏决壅积，建造水门，仅用一年时间完成。从此，这条从荥阳（今河南荥阳）到千乘（今山东博兴北）海口，长达千余里的大渠不再溃决为患，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农业村为主的民户也在不断增加。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人口总数为 2100 万。元兴元年（公元 105 年）人口总数已达 5325 万余人。大约增加了 1 倍多。

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而发展。冶铁技术发展起来。如建武七年（公元 31 年）杜诗任南阳太守，乃“造作水排，铸为农器”（《后汉书·杜诗传》）。南阳是汉代冶铁中心，杜诗总结当的经验，发明并推广“水排”鼓风技术。这种利用水利鼓风的技术，显然大大提高了效率，因此“用力少，见功多”（冈上书）反映东汉初的冶铁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冶铁技术的提高，为炼钢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生产的炒钢（熟铁），经过锻造，即可制成优质的兵器。

东汉的纺织业，主要有丝织、麻织及棉织等类。齐鲁的冰纨绮绣，自然是著名的织物。民间生产绢、帛之类的织品，非常普遍。北方生产的麻布，也在北部边远地方推广。如汉桓帝时，崔寔任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太守，即在当地推广种植大麻技术，并教以纺绩技术。

江南的纺织业，多以生产麻、棉织物为主，而且品种甚多。桑蚕织物的生产，在东汉初南传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不如北方普遍。但越布成为朝廷的稀有物，作为贡品入献朝廷。

“蜀锦”也是著名的织品。南方适于种植苧麻，是生产麻布的主要原料，麻布成为人民的普通织品。西南哀牢少数民族，所生产的“兰干细布”精美如同绫绵，即属于苧麻织品。南方边远地区，有棉布生产。

造纸业是东汉新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元兴元年（公元 105 年），蔡伦献上所造的纸，受到和帝的称赞。从此蔡伦造纸的方法得以推广，人们将这种纸称为“蔡侯纸”。东汉中期造纸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从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麻纸得到证实。这种纸，质地细薄均匀，结构比较紧密，纸上写有文字（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此外，东汉的漆器、煮盐等手工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商业的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各地的商品市场也相继发展起来。商品交换甚为活跃。为了便于商品流通，建武十六年（公元 40 年），东汉政府统一货币，恢复使用西汉的铁钱。当时京师洛阳地处中原，交通方便，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西汉时期的大商业城市，长安、临淄、番禺、成都、苏州等，商品交换储存依然活跃不衰，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城市。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发与发展，一些新兴的商业城市相继出现。如丹阳（今安徽小丹阳）、豫章（今江西南昌）、徐闻（今广东海南）、合浦（今广西黄南）等。

第二节

东汉中南期的社会危机

一、地方豪强势力的急剧膨胀

西汉中南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导致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史籍中有不少西汉末年地方豪强活动的记载，他们多率宗族、宾客和家兵，或聚众据险自保，或待机渔利，或追随刘秀及其他割据武装争权夺利。刘秀本人及其集团的骨干就多是南阳和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东汉建立后，贵族豪强多藉权势侵占田地、多蓄奴婢。如刘秀的儿子济南王康占田八百顷，蓄奴一千四百余人。而散居名郡县的地方豪强不少还拥有武装，号称兵长、渠帅。他们不仅疯狂兼并土地，而且武断乡曲，威福自行，权势甚至胜过官府。时人杜林说：“小民负县官（皇帝），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后汉书·五行志》注引《东观书》）可见，东汉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和豪强势力猖獗的问题。这对东汉统治的稳固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刘秀想以“度田”的办法限制豪强势力的发展。度田事件后，豪强武装以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着，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西汉中南期出现的豪强地主田庄迅速发展起来。东汉一代，大地主田庄“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仲长统《宣言·理乱篇》，见《后汉书》本传）很多豪强虽兼营工商业，但主要进是

以田庄经济形式剥削农民，世代称雄一隅。豪强地主田庄除拥有大片土地外，一定范围内的山林川泽也常为其侵占。如光武外祖樊重家的田庄，内有“樊氏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水经注》卷三十一）；东汉后期的中常侍苏康、管霸也“固天下良田美业、山田湖泽”（《后汉书·党锢列传·刘祐传》）。山林川泽的私有化，是豪强地主田庄和土地私有制高度发展的结果。

从东汉后期崔寔的《四民月令》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豪强大地主田庄的大概情况。首先，大田庄基本是一个“闭门成市”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其生产以满足内部需求为主来组织。按照时令节气，农民在田庄主的指挥下从事各种农副业生产。农业方面有多种谷物、蔬菜、瓜果、竹木、药材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工副业有樵采、渔捞和家畜的饲养，以及养蚕、缫丝、织布、染色、制衣鞋穿着、制药、酿造酒醋、打造农器具、制酱等等。

其次，田庄主对农民的剥削是苛重的。农民除缴纳百分之五十的地租外，农闲还要为庄主修沟渠、房屋等，甚至充当家兵保卫庄园，忍受田庄主的超经济剥削。但因田庄多是聚族而居，剥削对象为贫苦的宗族、亲戚和宾客，其中又以宗族成员为主。田庄主打着同宗、姻亲的幌子，在一定时节按亲疏关系的不等“赈赡贫乏”，“存问九族”，对依附农民施些小恩小惠。这样，宗族关系掩盖了阶级剥削，使田庄主能更有效地控制和奴役依附农民。

再次，大地主田庄还拥有私家武装。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或八、九月寒冻将临时，庄主驱使部分青壮年农民充当部曲、家兵，让他们“缮五兵，习战射”，“警设守备”，随时防御农

民在饥寒之时铤而走险，袭击豪强的田庄。从考古发现看，出土的东汉时期的壁画或陶制宅院、楼阁模型，很多带有护沟、垣墙、角楼、警楼、飞桥等，上有持械家兵守卫着。五十年代，在四川天回山崖墓出土了衣着和佩带武器都完全相同的农夫俑和武士俑，表明依附农与家兵身份的一致性。这些发现均反映了东汉豪族地主田庄的实际情况。

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商品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使东汉王朝的经济势力遭到削弱。同时，豪强地主私家武装的存在和发展，在统一国家还较强有力时，它还能起维护地方封建秩序的作用。但一旦统一国家的统治濒于崩溃，社会秩序混乱时，它就很快成为公开的地方割据势力。所以，东汉末年会聚然出现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二、外戚宦官争权

外戚、宦官之争是东汉王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

外戚是指皇帝的母族、妻族，即太后、皇后的家系。东汉时期，皇室的嫁娶，不出世家大族，外戚又常是其中最有力度的家族。所以，外戚集中地代表了上层豪强地主的政治利益。当年幼的皇帝即位，母后临朝时，她照例委任自己的父兄处理政事，让他们担任大将军并参录尚书事等要职，总揽军政大权。而外戚一旦攫取到最高统治权力，便父子兄弟一门数侯，宗族宾客遍布州郡，贪婪地搜括财货，鱼肉百姓。

宦官是宫廷中侍奉皇帝及其后妃的人。这些人大都出身

微贱，不过是供帝王役使的家奴。但东汉和帝之后，多为女后临朝，把秦时设置的专管侍从皇帝，出入宫廷，应对顾问的“侍中”、“常侍”等官职，改为宦官充任。这样一来，他们因为能经常接近皇帝，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实际上掌握了很大权力。特别是当幼小皇帝成年之后，要亲自执政，必然与专权的外戚集团发生矛盾。皇帝想恢复权力，只有依靠这些身边最亲近的宦官，去发动宫廷政变。宦官在翦除外戚势力的斗争中立了功，自会受到皇帝信用，以致权势日重。这批暴发户，一旦控制了最高统治权力，同样广树党羽，提拔自己的家人亲戚，网罗一批下层豪强和失意官僚，派到外地做官。外戚宦官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层豪强和下层豪强，中央皇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

公元 88 年，汉章帝死，和帝即位，东汉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就从这时开始。和帝年仅 10 岁，窦太后临朝听政，依靠他的哥哥大将军窦宪掌权，窦家一门兄弟，并居要职。当时窦宪“威权震朝廷”，他想要办什么事情，只消指令太尉启奏，对内再和太后知会一声，“事无不从”，朝臣们也就无不望风承旨。东汉以来，外戚能这样全面控制朝廷，还是初见。过了几年，和帝稍大，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决心加以铲除。公元 92 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逼迫窦宪兄弟自杀，窦家宗族宾客全部免官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官居大长秋，宦官从此开始直接参与政事。这是外戚、宦官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和帝死后，邓太后立生下一百多天还在襁褓中的殇帝即位。殇帝 2 岁夭折，再立 13 岁的安帝。邓太后临朝，邓鹭兄弟又出面把持朝政。邓太前一死，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便与安

帝合谋废逐邓氏。安帝起用皇后的哥哥阎显等掌管枢要，形成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这说明宦官集团在排斥旧的外戚集团时，可能与新的外戚集团达成妥协，至少可暂时相安无事，但随着时日推移，新的冲突无可避免。

公元 125 年，安帝死于巡游途中。皇后、阎显秘不发丧，他们赶回京城，定策扶立幼童北乡侯为帝，由阎太后临朝。阎显得势后，就把原来安帝宠信的宦官下狱处死，独揽了大权。

但是，不几个月，北乡侯病死，另一批宦官孙程等 19 人杀阎显，拥立被废的太子 11 岁的济阴王做皇帝（顺帝）。这 19 人都被封为列侯，宦官势力反而进一步得到发展。

顺帝阳嘉四年（公元 135 年），汉顺帝以皇后父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永和六年（公元 141 年）梁商死去，顺帝又任命梁商的儿子梁冀为大将军执政。梁冀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历任执金吾、河南尹等官职，一贯横行不法。这样一个无德无才的纨绔子弟却要世袭执政大臣的高位，情况就比西汉末年的王氏还更不如了。3 年后顺帝去世，其子冲帝年仅 2 岁，于是梁太后临朝听政，她的哥哥大将军梁冀掌握大权。一年后冲帝又死去，梁太后与梁冀共谋迎立质帝，年仅 8 岁，当然还是梁氏掌权。一年以后，由于梁冀过分骄横引起质帝反感，有次在朝会时，他看着梁冀说了句“此跋扈将军也”，对这位大将军的凶暴表示不满。这句话使得梁冀又恨又怕，他便支持左右在食物中放毒，害死了年仅九岁的小皇帝。梁冀又和太后商议，在宦官曹腾等支持下，否定了公卿大臣会议主张迎立年长贤明的清河王这一正确意见，拥立他们正准备选为妹夫的蠡吾侯，是为桓帝。桓帝即位后，便娶了梁冀的另一妹妹为皇后，梁氏

的威权更为显赫了。

梁冀身为大将军主持政事，内有皇太后、皇后两个妹妹坐镇宫中，许多宦官都是他安置的亲信，皇帝实际上处于他的监视控制之下，连生命安全都在他掌握之中，根本不能有所作为。外面朝廷百官升迁，都得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政府部门报到任职，除了几个尸位素餐圆滑世故的老官僚象司徒胡广等人装点门面，实权都控制在梁氏徒党手中。太尉李固、杜乔由于不肯附和梁冀都被诬陷处死、陈尸街市。吴树出任宛县县令，拒绝梁冀的嘱托，诛杀了在当地贪残害民的梁家宾客。后来他升任荆州刺史，赴任时到梁府辞行，梁冀公然以毒酒款待，使他一出门就死在车上。土财主士孙奋富有而吝啬，梁冀送他 4 匹马，向他借 5000 万钱。士孙奋舍不得，只给了 3000 万。梁冀大怒，便告诉地方官员，说士孙奋的母亲原是梁家管库房的婢女，偷窃了“白珠 10 斛，紫金千斤”而逃亡。于是把士孙奋弟兄抓起来拷问，都死在狱中，把他们的家财 1.7 亿多万全部没收。桓帝曾命令公卿大臣商议如何给梁冀以特殊礼遇，有关部门提议：在朝见皇帝时的礼仪方面，比照西汉第一位功臣萧何；扩大他的封邑为 4 县，比照东汉第一位功臣邓禹；赏赐金钱衣服车马府第等财物方面，比照西汉中兴功臣霍光群臣大会朝时为他特设单独的席位，凌驾于三公之上；并把这些待遇向全国公布，定为永久的制度。梁冀却觉得这样的对待过于菲薄，很不高兴。

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在生活上更是骄奢淫佚。各地贡献皇帝的珍异贡品，上等的都先送梁府，其次的才给皇帝享用。他大肆修建豪华的住宅园林，象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又在

首都附近开辟猎场，逶迤千里。在河南城（今洛阳）西边设置兔苑养兔，周围绵延数十里，征发吏民修建了几年才完成。于是通知各地交纳活兔子，在毛上作出标记，谁伤害了要判死刑。曾经有一个西域来的客商不知禁令，误杀一兔，牵连处死的竟达十多人。他公开违背东汉以来的禁令，掠取良民为奴婢多至数千人，还称之为“自卖人”。梁氏一门前后有 7 人封侯，妇女封君（相当于侯）的也有七人，有 2 人为大将军执政，出了 3 位皇后，6 位贵人（次于皇后的妃嫔），取公主的 3 人，其他文武大官 57 人，掌权 20 多年，拥立了 3 位皇帝，是东汉外戚中最为突出的。

梁冀专权已有近 20 年，威行内外，百僚侧目，天子拱手，不得有所亲与。汉桓帝心中十分不平。和熹皇后从兄之子郎中邓香之妻宣生了一个女儿叫猛。邓香死后，宣改嫁给梁纪（梁冀妻孙寿之舅）。孙寿因为邓猛长得很美，就将邓猛引入宫中，被封为贵人。梁冀想认邓猛为自己的女儿，便改邓猛姓梁，又怕邓猛的姐夫邴尊从中阻拦，便派人刺杀邴尊，还想杀宣。宣家和中常侍袁赦家是邻居，梁冀派去的刺客登上袁赦家的房子，准备跳到宣家去，被袁赦发现。袁赦鸣鼓聚众以告宣。宣知道后，赶紧跑到宫中告诉了汉桓帝。汉桓帝听后大怒，乘着上厕所的机会，独呼小黄门史唐衡，问道：“朕左右的人（指宦官）都有哪些人和外舍（皇后之家，即梁家）有矛盾？”唐衡回答说：“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悺和梁不疑有矛盾；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经常私自愤恨外舍放纵横暴，只是口不敢道而已。”于是，汉桓帝把单超、左悺召来，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专朝，迫胁内外，公卿以下，从其风旨。如今朕想诛杀他们，你

们以为如何？”单超等回答说：“梁冀兄弟确为国之奸贼，早该诛杀；然臣等劣弱，未知圣意如何。”桓帝说：“若是这样，你们暗中去筹划。”单超等说：“图之不难，但恐陛下腹中狐疑。”桓帝说：“奸臣危害国家，当伏其罪，有何可疑？”于是，召徐璜、具瑗等，五人共定计划，汉桓帝咬单超手臂出血为盟。单超等说：“陛下今计已决，就不要再提此事，免得他人怀疑。”

桓帝和单超等人图谋虽然秘密，但还是走露了一些风声。梁冀心中怀疑单超等人，便于延熹二年（159年）八月丁丑日，未经桓帝允许而派亲信中黄门张恽入禁中直宿卫，以防单超等人。具瑗见状，立即敕吏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为名，将张恽抓了起来。汉桓帝御前殿召诸尚书入，发其事，派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官吏皆手执兵器，守卫省阁，收集符送至省中，派具瑗将左右厖、虎贲、羽林、都侯剑戟士，合1000余人，与行隶校尉张彪共同包围了梁冀的家，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回梁冀大将军绶，徙封梁冀为比景（交趾，即今越南中部）都乡侯。梁冀及其妻孙寿见大势已去，当天都自杀了。梁不疑、梁蒙在此之前已经死去。将梁氏、孙氏中外宗亲下狱，不论老少，皆弃市处死。其他所牵连到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被处死者数10人。太尉胡广、司徒韩续、司空孙郎等人皆坐阿附梁冀，不卫宫阙，止于长寿亭，减死一等，免为庶人。梁冀的故吏，宾客被免黜者达300多人，朝廷一下子空了下来。当时，因为事情突然发生，使者交驰，公卿措手不及，失其常度，官府市里鼎沸不安，过了几天才安定下来。百姓知道梁冀被诛，莫不称庆叫好。抄了梁冀的家财之后，朝廷进行斥卖，得钱30多亿，用这笔钱以充府用，减天下租税之半。又散梁冀所建园囿

以利百姓。

单超等 5 人发动政变诛灭了梁氏，开头还是得到全国官民赞许的，甚至被夸奖为张良、陈平的计谋，伊尹、霍光的功勋。但是他们上台之后，单超封为新丰侯，食邑 2 万户，徐璜等 4 人也都封侯，各食邑万多户。五人同日受封，世称“五侯”。此外又还封宦官侯览、赵忠等 8 人为乡侯，从此朝政被宦官掌握，政治更加腐败混乱。他们的宗族亲戚被派到地方上担任刺史、太守，贪赃枉法，榨取民财，同盗贼完全一样。比如侯览的哥哥侯参出任益州刺史，对辖区内家财富足的人就诬陷罪名，抓来杀掉，没收其财产装入腰包，前后累计达到亿万数。其后被太尉杨秉弹劾，押送到首都来审查，半路上畏罪自杀。京兆尹检查他的行装，居然还有 300 多车，全是金银锦绣珍玩，多得数不清。侯览自己霸占别人的住宅多达 381 所，良田万多亩。又新建府第 16 座，都是亭台楼阁，画栋雕梁，仿照皇宫的模式。他家的宾客仆从，在地方上为非作歹，侵扰百姓，劫掠旅客，地方官稍加干涉，反被罢官。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下邳李家被拒绝，他就出任下邳县令，公然率领吏卒到李家把姑娘抢走，用箭射死，埋尸县衙。当徐宣的暴行受到其上级黄浮的惩处时，徐璜就找桓帝告状，黄浮竟被判刑服劳役，是非完全颠倒了。这样一来，民间愤怒地咒骂说：“一将军死，五将军出”，纯粹是以暴易暴。无法忍受的老百姓纷纷反抗，“起为盗贼”。

三、陈蕃窦武谋诛宦官的失败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县北）人，自幼有清

世之志而为人所奇。汉桓帝年间，陈蕃步入仕途，先拜为尚书令，迁大鸿胪，因白马令李云抗疏谏争，惹怒桓帝，李云下狱，陈蕃为救李云而上书皇帝，结果被免归田里。后桓帝又起用陈蕃，初拜义郎，数日迁光禄勋。陈蕃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指出宦官专权对朝政的危害，而陈蕃也因此时有得罪宦官而被免，尔后又被起用。汉桓帝死后，窦太后摄政，因感于陈蕃对窦氏成为皇后立有大功，而重用陈蕃，拜为太傅，又封为高阳乡侯，与大将军窦武同心协力对付宦官。

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安丰戴侯窦融之玄孙。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窦武的长女被选入掖庭，桓帝以为贵人，拜窦武为郎中。同年冬，汉桓帝想立田贵人为皇后。陈蕃认为田氏出身卑微，而窦氏则名门望族，所以坚决反对立田氏为皇后。桓帝不得已，就立窦氏为皇后，窦武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食禄5000户。延熹九年（166年）冬，窦武又被拜为城门校尉。窦武为官，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偶得两宫赏赐，也全部散发给太学诸生。桓帝之时，国政多失，宦官专横，窦武忧虑而上书谏帝，应多所作为，扼制宦权。桓帝驾崩，无嗣，而立解渚亭侯宏为帝，即汉灵帝。灵帝拜窦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灵帝即位以后，不论定策功，更封窦武为闻喜侯。窦武既已辅助朝政，因武常有诛翦宦官之意，而太傅陈蕃正好也素有此谋，二人遂合谋而诛宦官。

窦太后临朝之初，因陈蕃有功，政事无论大小，皆委托陈蕃。陈蕃与窦武同心协力，调理朝政，征召天下名贤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皆列于朝廷，与其共参政事。于是天下之士，没有不延颈向往太平盛世的。而这时汉灵帝的乳母赵娆及诸

女官，旦夕在太后左右，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共结朋党，阿谀奉承太后，逐渐取得太后的信任，于是太后数次发出诏命，对曹节、王甫等有所封拜。陈蕃、窦武对此非常疾恶。因而陈、窦共会朝堂，陈蕃私下对窦武说：“曹节、王甫等，在先帝时就操弄国权，把持朝政，而使海内浊乱，如不诛杀他们，以后必难有所图。”窦武以此深有感而同意陈蕃的意见。陈蕃大喜，就以手推席而起。窦武于是召引同志尚书令尹勋等共定计策。

这时发生了日食之变，陈蕃对窦武说：“过去萧望之困一石显，何况现在相当于石显的数十倍之势呢！陈蕃以八十岁之年龄，欲为将军除害，今可借日食之变斥罢宦官，以塞天变。”窦武就禀告太后说：“依汉族事（汉时例的一种），黄门、常侍但当给事宫廷内部门户，主要掌管近署财物（少府新掌中藏衬、尚书、内者诸署）；而现在让他们（宦官）参与政事，并任予重权，控制朝廷，专为贪纵横暴。天下匈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应该对他们全部或诛或废，以清朝廷。”太后说：“汉初以来，依其故事，世代都有宦官，但当诛其有罪者，怎么能把所有的宦官全部废弃呢！”这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但专制禁中，窦武先拘收管霸及中常侍苏茂等，皆处以死刑。窦武又数次禀诛曹节等，太后犹豫不定，于心不忍，故事久不废。陈蕃又上疏说：“今京师嚣嚣，道路喧哗，都说侯览、曹节、公乘（秦时爵名，以爵名为姓氏）听，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娆）、诸尚书结党谋乱天下。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一朝群臣如河中之木，漂浮东西，因怕危及爵禄而敢怒不敢言，更不敢有所为。陛下今不急诛此曹等人，必生变乱，倾危国家政权，其恶果难以估量。臣原出示证章以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之疾恶。”太后

没有采纳陈蕃之言。

建宁元年(168年)八月,太白犯房四星中之上将(房四星为明堂,是天子布政之宫,也有四辅,第一星上将,第二星次将,第三星次相,最后之星即上相),入太微(天子之庭)。侍中刘瑜平素善观天文,观此恶迹,遂上书皇太后说:“依此天象,查对占书,载曰‘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希望尽快预防之。”刘瑜又写信给陈蕃、窦武,认为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应该速断大计。于是陈蕃、窦武以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窦武奏免黄门令魏彪,而以自己的亲信小黄门山冰代替魏彪,派山冰奏收长乐尚书(窦太后临朝时设置,以掌奏下外朝文书众事)郑飒,押送北寺监狱。陈蕃对窦武说:“应该把郑飒立即杀掉,何需再进行审核!”窦武不以为然,不从,令山冰与尹勋、侍御史祝瑁共同审讯郑飒,而案连及曹节、王甫。山冰、尹勋郡奏逮捕曹节等人,派刘瑜内奏皇太后。

九月,辛亥,窦武出宿而归府。典中书者先把此事告诉乐部五官史(主管太后宫中五个女尚书),朱瑀盗走窦武的内奏并将它发布出去,大骂着说:“禁中之官有放纵者,自可诛杀,而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都要遭受如此灭族的罪名!”又因此大呼说:“陈蕃,窦武禀太后要废除皇帝,实为大逆!”朱瑀因此于当夜召集平素比较亲近且健壮之人如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17人,歃血共盟,预谋诛杀窦武等人。曹节也禀奏皇帝说:“外间情势急迫,请出御德阳前殿。”说得皇帝拔剑踊跃,并让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棨(古代官吏出行时用来证明身份的东西,用木制成,形状像戟)信,关闭各个禁门,召集尚书官属,胁以白刃,用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到北寺狱,逮

捕尹勋、山冰。山冰心有怀疑，不受诏书，王甫杀了山冰，并杀了尹勋；救出郑飒，还兵劫走太后，夺取皇绶。曹节又令掌守门户者守南宫。闭门断绝复道（洛阳南宫、北宫有复道相通），派郑飒等持节及侍御谒者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受诏书，驰入步兵营，与其兄的儿子步校尉窦绍共同射杀使者。召集北军五校士兵数千人屯居都亭（洛阳都亭），并向军士下达命令说：“黄门、常侍反叛，有尽力平叛杀敌者封侯重赏。”陈蕃闻难，率官属诸生 80 多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又到尚书门，并振臂大呼说：“大将军精忠卫国，黄门反叛，为何却说窦氏不道呢！”王甫这时出来正好与陈蕃相遇，听到陈蕃这一番话，而斥陈蕃说：“先帝新弃天下（灵帝刚刚即位），山陵未成，而窦武有何功绩，却兄弟父子连封在侯（窦武的儿子机封渭阳侯，武兄之子绍封鄂侯，绍之弟靖封西乡侯）！又饮酒作乐，多取掖庭宫人，旬日之间，家财巨万计，大臣若此，难道是尽忠吗？陈蕃为宰辅，却相互附益阿党，这样为贼人辩护。”王甫让剑士捕陈蕃，陈蕃拔剑呵叱王甫，面色更加严厉。王甫遂抓陈蕃，押送北寺狱。黄门从官骑士踢着陈蕃说：“你这老不死的妖怪！看你还能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当日就把陈蕃杀掉。这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征还京师，曹节等以张奂刚到，不知事情原尾，就捏造诏书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张奂率 5 营士兵讨伐窦武。天微明时，王甫将虎贲、羽林等兵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北宫南掖门），与张奂等合兵一处，已而悉军阙下，与窦武对阵。王甫兵势渐盛，让其士兵大声向窦武的士兵呼喊：“窦武反叛，而你们都是禁兵，应当保卫宫廷，为什么要随窦武反叛呢？先投降者定给厚赏！”营府兵（五营校尉府）平素就畏

惧服中官，于是窦武军士开始有归降王甫的，从早到吃午饭时，窦武军基本上全投降。窦武、窦绍逃走，各军追击围攻他们，后窦武、绍皆自杀，被梟首洛阳都亭；同时收捕宗亲宾客姻属，全部处以死刑，以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全被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贲中郎将河间刘淑、故尚书会稽魏朗，说他们与窦武是同谋，因而也皆自杀。迁皇太后于南宫，徙窦武家属于日南；自公卿以下曾为陈蕃、窦武新举荐者，以及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议郎勃海巴肃，当初曾与窦武等同谋。曹节等人不了解真情，因而巴肃就只被禁锢。后来曹节查知此事，就要把巴肃逮捕归案。巴肃自己到县衙门。县令见到巴肃，即解去巴肃的印绶。县令欲押巴肃一同前往，巴肃说：“为人臣者，有预谋不敢隐瞒，有罪就更不敢逃避刑罚，既然已经承认自己是同谋，那么又怎么还会逃避刑罚呢！”巴后来遂也被杀掉。

曹节后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朱瑀、共普、张亮等6人皆列侯，11个人为关内侯，于是形成小人得志，士大夫皆气丧而被压的局面。

陈蕃、窦武等合谋诛宦官，结果却反被宦官所诛，并株及家族姻属，悲惨之至，从此也足以看出宦官势力之强盛决非少数人所能扭转。

在混乱中，宦竖们稳握朝纲，连皇帝也变成手中的傀儡，任其摆布了。以致灵帝竟多次不知羞耻的声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连主奴关系也被颠倒了。公元189年灵帝死，14岁的皇帝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密谋召边将董卓进京，谋杀宦官。结果，宦官提前下手，矫太后诏，诳杀了何进。与何进同谋的士族豪强袁

绍发兵进攻，尽杀大小宦官 2 千多人。董卓从凉州赶来，又赶走袁绍，废少帝，杀何太后，另立汉献帝。从此，地方军阀主宰了政权。随着皇权的衰落，寄附其上的外戚、宦官，也就自然瓦解，同归于尽。但是，腐朽黑暗的东汉王朝，也只剩上一个躯壳，名存而实亡了。

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经济恶性膨胀，各个不同集团之间互相攘夺，这是外戚宦官斗争不已的根源。同时，专制主义皇权高度发展，为外戚与宦官代行天威，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东汉时期除去前期的两三个皇帝外，都是年幼即位，大的 10 多岁，小的不过两三岁，很容易被外戚玩于股掌，而后又被宦官包围控制。因此，东汉后期一百余年间，不断出现的外戚与宦官互相倾轧，像走马灯一样的轮流专政，绝不是偶然的。

当然，不管是谁在专政，都同样的残忍贪暴。这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同豪族地主集团所共有的阶级本性。宦官集团是以暴发户的姿态出现，常常更加贪婪。中常侍侯览曾夺占民田 100 多顷，住宅 381 所。他的哥哥益州刺史侯参，搜括的金银锦帛等财物，装满了 300 多车。在外戚、宦官轮番掠夺之下，人民饱受灾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不能不起来反抗了。黄巾起义发动起来以后，统治阶级自己也承认，“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 10 常侍多放义兄、子弟、婚亲、宾客，据州郡，辜椎（搜括）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至为盗贼。”这是外戚、宦官专权的必然结果。

四、党锢之祸

东汉后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对宦官专政，被罢官禁锢，甚至株连杀害。这次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和帝以后，东汉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桓帝即位后，借用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冀诛灭。此后宦官集团又起来操纵朝廷大权达 30 年之久。这些宦官，广树党羽，到处安插亲信，“兄弟姻戚，皆案州临郡”，而且放肆地搜刮百姓，虐害士民，被形容为“与盗贼无异”。这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官僚们痛恨宦官垄断政权，影响到他们的禄位；一般士人也怨恨宦官广植亲私，而妨碍了他们的仕途。尤其使他们恐惧的是，宦官的残暴黑暗统治，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会严重威胁封建秩序，造成整个政权的覆亡。为了自身的利禄，也为了拯救阶级统治的危机，他们要求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

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 3 万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们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核，裁量执政”，讨论政治，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这种风气，被称为“清议”。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士人的支持，官僚们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称这些官僚与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不轨，准备严厉打击压制。于是，造成了前后两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 166 年(即桓帝延熹九年)。当时司隶校尉(负责纠察京师百官及附近各郡官吏)李膺,敢于不避权贵,裁治不法,很受“清议”的推重。以前,曾因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当县令时,贪残无道,甚至虐杀孕妇,后来逃藏于张让家的活动柱子里,李膺便亲率部下,“破柱取朔”,按法杀掉了。因此,李膺与宦官结了仇,但他的声名却更高了。太学生标榜他为“天下楷模李元礼”。读书人能被 he 容接的,都引以为荣,名为“登龙门”。一时成了反对宦官乱政的核心人物。到公元 166 年,宦官党羽张成教唆儿子杀人,被李膺逮捕归案杀掉。宦官集团借端反扑,指使人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联系),共为部党,诽讽刺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蛊惑之下,桓帝大为震怒,通告各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布告天下。李膺被捕后,牵连陈寔等 200 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有在逃的,也要悬赏搜捕。一时之间,逮人的“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过了一年,经过尚书霍谡和外戚窦武的力争,桓帝意有所解,这批人才被赦归乡里,但是还要禁锢本地,终身不许作官。

第 2 次党锢之祸,开始于公元 169 年(灵帝建宁二年),一直延续了 10 余年,株连之广,也超过了前一次。大宦官侯览依仗权势,残害百姓,强抢民女,侵夺大量田宅。当时的山阳督邮张俭上书,告发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杀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侯览后来便唆使一个张俭同乡人,上告张俭与同郡 24 人连结为党,图危社稷。朝廷借此大捕党人,连同过去的著名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也一并构陷在内,一共“百余人,皆死狱中”。张俭则被迫逃往塞北避祸。后来在各地被诬

为“党人”而“死、徒、废、禁”的，达六七百人。

公元 172 年，窦太后死，有人在皇宫门口贴反宦官标语：“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大卿（大官）皆尸禄（白吃饭），无有忠言者”，揭露宦官专政的黑暗。被触痛的宦官集团，又滥施淫威，四出搜捕太学生 1000 多人。公元 176 年，宦官集团为了彻底镇压党人，怂恿汉灵帝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以至五服之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宦官集团罪恶黑手的打击面，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第 2 次党锢之祸，达到了最高潮。

“党锢之祸”，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从斗争的双方看，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宦官代表依权仗势而成暴富的新豪强；站在对立面的官僚，则多是久享声望的地方大族；太学生们则为依靠正途求取仕进的一般地主。在这场冲突中，另一部分豪强地主势力代表的外戚集团，出于争夺中枢大权的需要，也有时支持党人。这是外戚与宦官长期斗争的继续，因而把局势搅得更复杂了。

虽然这是一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但就当时来说，宦官集团长期的黑暗统治，已成社会矛盾激化的焦点。所以，一部分官僚和太学生，敢于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愿望的。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如李膺、范滂等人，其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他们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成员，他们反对宦官专政，不但作用有限，而且根本目的是要挽救封建统治危机。

正因如此，当黄巾起义爆发以后，汉灵帝便接受宦官吕强的建议，为防止党人与张角的农民军联合，主动“大赦党人，诛

徙之家，皆归故郡”。而这些党人，也由于阶级利益的制约，自动站到朝廷一边，有的还直接参加镇压起义，成了屠杀农民的刽子手。

五、羌、汉人民的反抗斗争

羌族的历史源流很早，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他们的记录。

汉代的羌族分布地区非常广阔，大体以西海郡（今青海）为中心，南到蜀郡、广汉郡（今四川西北部），东边到扶风（今陕西西部），北边到陕西、天水（今甘肃一带），西北则邻接西域。汉代时期的羌族，大部分过着游牧生活，与汉族杂居地区，有一部分从事农耕。羌族不但没有统一的政权，而且族类种属非常杂乱，各支之间互不统属，分合无定。他们是汉政权统治下的一个重要兄弟民族。

东汉初，汉朝把羌人徙置在水、陇西、扶风三郡（今陕西、甘肃一带）。内迁的羌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杂居在一起，从事农业生产，两族相互交往与融合，对于汉羌两族的民族团结和羌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东汉的郡县官吏和地方豪强却肆无忌惮地虐待羌人，残酷地搜刮、侵袭和奴役羌人。东汉统治者的压迫，激起了羌族人民不断地举行武装反抗。其中大规模斗争，共有 3 次。

公元 107 年（安帝永初元年）的夏天，汉安帝派遣骑都尉王弘强迫征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的羌人随征西域。羌人害怕远征无还期，走到酒泉时便相率逃散。汉政府命令各郡县发

兵邀击逃散的羌人，捣毁沿途羌人的房屋村落。羌族人民忍无可忍，被迫起而反抗。他们没有武器，“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多次打败汉朝的地方部队。这年的冬天，东汉王朝派遣车骑将军邓骘(zhì 至)，征西校尉任尚率兵5万前往镇压，也被羌人击败。羌族人民在斗争中，逐步联合起来，组成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众遂大盛”。于是开始向汉朝反攻，东指赵、魏(今山西、河南境)，南入益州(今四川大部分、贵州小部分)，攻杀汉中太守，打得“朝廷不能制”，东汉政权一时十分被动。

在羌族人民斗争高潮中，东汉的地方官吏强迫当地汉族人民内迁，以避羌人锋芒，防止汉、羌人民联合斗争。汉族人民与羌人长期和平相处，因此，“百姓恋土，不乐去旧”，不肯迁动。东汉政府下令，“刈(割)其禾稼，发彻(拆)室屋，夷(平)营壁，破(坏)积聚”，强制人民迁往内地，造成了流离失散，大量死亡。汉族人民在杜琦、杜季贡等人领导下，发动起义，与羌族人民互相响应，并肩而战，共同打击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直到公元118年，东汉政府才把羌汉人民的联合斗争，完全镇压下去。但是，已经糜耗军费达240余亿，致使“府帑空竭”，严重削弱了东汉政权。

公元140年，羌族人民第二次大规模斗争爆发。前一年，东汉王朝委派马贤为弘农太守，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这三个人“天性虐刻”，到任之后，“多所扰发”，引起羌族人民的反抗。公元140年(永和五年)夏，且冻、付难两部羌人首先发难，一鼓作气攻下金城。接着与西塞、湟中诸部羌人联合，大规模地进攻三辅，攻杀郡县长吏。汉朝派遣马贤率领五

六千骑兵前去镇压，在射姑山被打得溃不成军，马贤和他的两个儿子全都战死了。同时，羌族人民各部，分头攻打陇西、关中、北地等各地，烧园陵，杀官吏，此伏彼起，声势很大。东汉王朝每次都企图用武力镇压起义，但在羌族人民的强大攻势面前，汉军屡战屡败。当时内地又连年发生农民起义，东汉统治者内外交困，不得已只好对羌人采取剿抚并行的办法。羌人起义斗争直到永嘉元年（公元 145 年），一直持续多年，才被镇压下去。东汉政府又耗费了 80 余亿的战费。

羌族人民在公元 159 年，又掀起了第三次反抗斗争高潮。烧当等部羌人联合进攻陇右，后来，其他各部羌人先后起来响应，到处“覆没营坞”，打击东汉统治。东汉政府派遣段熲、胡閼等人，进行残酷镇压。羌族人民坚持斗争 10 多年，才最后失败。

东汉时期，羌人的反抗斗争前后共持续了五六十年。东汉统治者对羌人的残酷镇压和战争破坏，使西北地区残破不堪，人口也大大减少。但是，尽管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镇压，却始终没有能磨灭羌族人民的反抗斗志。184 年（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先零羌立即联合枪罕、河关等地的汉族人民响应黄巾起义，为推翻东汉统治者而并肩作战。

第三节 黄巾大起义

顺帝时，道人于吉以《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在今江

苏、山东一带传教，信徒众多，其中不少是贫苦农民。这一宗教即“太平道”。后来巨鹿人张角做了太平道的首领，他自称“大贤良师”，手执带杖，巡迴各地传教，让病人叩头思过，饮符水以治病。他和他的弟弟张宝、张梁在群众中宣传黄老道（太平道），医治疾病，招收门徒，四方民众扶老携幼前往投奔，信从的人非常多。张角于是派遣他的 8 名大弟子四出传道，辗转发展信徒，10 多年间，徒众达到数 10 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 8 州（今长江中下游以北直到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声势浩大，官府也有所风闻。灵帝光和四年（公元 181 年），司徒杨赐曾经指出：张角等遭逢大赦也不悔改，势力越更发展。现在如果下令州郡逮捕，恐怕增添骚扰，反会加速祸患的爆发。最好是严令地方长官选择区分流民，分别遣送回原籍。这样分散削弱了他们的党羽，然后再捕杀其首领就省力了。这说明太平道的基本群众乃是破产流亡的农民，狡猾的杨赐是打算釜底抽薪。然而造成农民背井离乡流亡四方寻求生路的根源，正在于腐朽残暴的东汉王朝那暗无天日的罪恶统治。这个政权只会制造出更多的流民，怎么能指望它来解决安置流民呢？所以杨赐这个主意在当时并没有实现的可能。两年后又有人惊呼：张角的党羽已经不计其数，风闻他们还曾潜入首都察看朝政，图谋不轨。地方官害怕追究责任，都不肯报告实际情况。应当公开下诏，以封侯重赏劝募捉拿张角等首领，地方官员敢于回避则与张角同罪。这就是妄图乞灵于重赏与严刑来武力对付，其实不过是统治阶级惯用的两手，未必有什么效用。加之昏庸糊涂的灵帝当时根本没有在意，这一建议也同样搁置起来了。

与此同时，张角却在积极部署准备组织起义。他把数十万信徒编组为 36 方，“方”等于是是一支独立的部队，大方有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有其首领。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宣传汉王朝天命已终，太平盛世即将建立，甲子年（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天下就太平了。他们计划由大方马元义先调集荆州、扬州的信徒到邳县（今河北磁县南）集中，并联络首都洛阳的信徒，约定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同时发动起义。正当起义按计划部署执行过程中，叛徒唐周向汉王朝上书告发，马元义被捕，在洛阳惨遭车裂。官府根据告密清查宫廷警卫以及洛阳民众，屠杀了太平道信徒千多人，并且通令冀州追捕张角等首领。在计划泄漏的紧急关头，张角当机立断，派人日夜兼程通知各方，在中平元年二月，7 州 28 郡 36 万多人同时提前起义，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其组织性纪律性是无与伦比的。起义军头戴黄巾作为标志，所以被称为“黄巾军”。由于他们人多势众，铺天盖地而来，象蚂蚁一样数不清有多少，所以又被诬蔑为“蚁贼”。他们到处焚烧官府，攻占城邑，吓得地方官纷纷逃跑，10 天半月之间全国响应，首都震动。

但是，纯朴的农民军在开始时毕竟缺乏政治军事斗争经验。起义发动之后，张角却未能控制全局，本来很有组织的太平道信徒，反而变成了分散活动的若干支队伍，各自孤军奋战，缺乏联系配合。当时，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率众兴起于巨鹿。附近的安平国（治信都，今河北冀县）、甘陵国（治甘陵，今山东临清附近）人民捕捉国王刘续和刘忠响应起义，冀州震动。广阳郡（治蓟县，今北

京)黄巾军一举攻杀地方长官幽州刺史郭勋和广阳太守刘卫,雄据幽州。在南方,波才领导的黄巾军活动在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彭脱领导的黄巾军活动在陈国(治陈县,今河南淮阳)和汝南郡(治平舆,今河南平舆北)。卜己领导的黄巾军活动于东郡(治濮阳,今河南濮阳县)。张曼成号称“神上使”,与赵弘等率领数万人起义于南阳郡(治宛县,今河南南阳)。扬州的黄巾军曾攻打庐江郡治舒县(今安徽庐江南),与太守羊续激战;戴凤领导的黄巾军也在安风(今安徽霍丘南)活动。在各地黄巾军奋起战斗时,还有“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在巴郡(治江州,今四川重庆)发动起义。北宫伯玉等领导羌胡汉各族人民在金城郡(治允吾,今甘肃永靖西北)起义,攻杀护羌校尉和金城太守。郃阳(今陕西合阳东南)人郭家等也在当地发动起义,焚烧官府,威胁附近3郡。这些起义和黄巾军互相呼应,掀起了全国性的武装斗争高潮。

在农民起义威胁到东汉政权的生存时,整个地主阶级暂时统一起来了,宦官、外戚、官僚士大夫立即捐弃前嫌,共同对付革命农民。中平元年三月,何皇后的哥哥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率近卫军官兵镇守洛阳,在洛阳周围函谷、伊阙等八关设置都尉,加强防卫。灵帝听从宦官吕强的建议,大赦天下党人,解除禁锢。通令全国各地修治城防,选择制造兵器,准备战守。灵帝还拿出宫中一些私财和马匹分赐将士,并号召公卿大臣捐献马匹弓弩。同时选派卢植北攻巨鹿张角,皇甫嵩、朱儁南征颍川波才。四月,波才击败朱儁,进围皇甫嵩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官军人少,在强大的黄巾军包围下惊恐万分。皇甫嵩看出波才缺乏作战经验,营房扎在草木丛中,于是乘夜晚风

大纵火烧营，波才失利。接着，曹操率领官军援兵赶到。五月，皇甫嵩、朱儁、曹操联合进兵，大破波才军，屠杀数万人。六月，官军追击波才于阳翟（今河南禹县），又乘胜攻击汝南彭脱于西华（今河南商水西），都取得胜利。这就使黄巾军丧失了进捣汉王朝心脏首都洛阳的有利地位。接着皇甫嵩被派去进攻东郡卜己。八月，在仓亭（今山东阳谷北）大战，黄巾军牺牲 7000 多人，卜己被俘。然后皇甫嵩又奉调北上进攻巨鹿张角亲率的黄巾主力。

原来卢植在三月领兵北进，张角初战失利，于是退保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卢植围攻数月不克，被撤职查办。灵帝改派董卓率精锐边兵进攻，却又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被张宝打得大败。约在此时，不幸张角病故，张梁领导这一部分黄巾军继续战斗。十月，皇甫嵩同张梁在广宗大战，黄巾军兵精将勇，官军无法取胜，皇甫嵩宣布闭营休战，等待时机。他看出黄巾军有些懈怠，便连夜部署军队，鸡鸣时发动突袭，激战整天，到黄昏时打败黄巾军，张梁牺牲，义军士兵被屠杀 3 万多，投河自杀的也有 5 万多人，焚毁辎重车辆 3 万多辆，妇女儿童全被掳掠，缴获不计其数。皇甫嵩还挖开张角的坟墓，剖棺戮尸，传送其头到洛阳。十一月，官军又在下曲阳围攻张宝，屠杀俘虏黄巾军 10 多万人，张宝也牺牲了。

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领导下，三月就击杀太守褚贡，围攻郡治宛县百多天。六月，张曼成战死。赵弘继起领导，队伍发展到 10 多万人，攻占了宛县。灵帝急忙派朱儁前来镇压，朱儁同荆州刺史、南阳太守等合兵反攻宛县 3 个多月，赵弘战死。韩忠继任统帅，他思想动摇，战败投降被杀。黄巾军余部推孙

夏为统帅继续抵抗，十一月，朱儁攻占宛县，杀死孙夏。统一起义的大股黄巾军就这样各自困守一隅，坐等官军逐个击破。东汉政权随即疯狂反扑，在各地大肆屠杀太平道徒党，一郡多至数千人。

但是，血腥的屠杀并不能吓倒革命人民。汉献帝初年（公元二世纪末），陶谦就指出：黄巾军人数众多，“殊不畏死，父兄殄殀，子弟群起，治屯连兵，至今为患”。可见在黄巾大起义的鼓舞下，各地人民前仆后继纷纷奋起反抗的英雄气概。主要的如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张牛角率众起于博陵（今河北蠡县南），褚燕率众万余人起于真定（今河北正定南），他们曾联合进攻巨鹿郡治瘿陶，战斗在张角的故乡。同时还有黑山、白波、黄龙、雷公、张白骑、李大目等十多支队伍，大股二三万人，小股六七千人，在这一带转战，后来联合为成百万人的大队伍黑山军，“渐寇河内，逼近京师”，一度威胁到汉政权的巢穴，前后经历了20多年才被朱儁、袁绍、曹操等陆续击败。中平五年二月，黄巾军余部郭大等在西河白波谷（今山西襄汾西）重举义旗，进攻太原、河东（今山西中南部）。四月，汝南葛陂（今河南平舆东）黄巾军攻占郡县。六月，马相在绵竹（今四川绵阳县）聚合数千人起义，杀死县令，自称黄巾军。他们迅速攻克广汉郡治雒县（今四川广汉），杀死益州刺史郗俭。旬月之间，进破蜀郡（治成都，今属四川）、犍为郡（治武阳，今四川彭山），发展到10多万人，马相自称“天子”。还派兵攻破巴郡，杀死太守赵部。十月，青州徐州（今山东东部）黄巾军又起，攻占郡县。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黄巾军也发展到上百万人，他们转攻兖州（今山东西南部），在东平（今山东东平东）击毙刺

史刘岱,后来被曹操打败收编。直到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 年),还有黄巾军杀死济南国(治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西)国王刘赧的记载,说明黄巾起义至少延续了 20 多年,给了东汉王朝致命的打击。

第四章 秦汉时期 全国性多民族统一的形成

第一节 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源远流长。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蚩尤部落到尧、舜、禹部落联盟,黄河、长江流域的各原始民族文化,有较大的发展。历史进入夏代后,夏族、商族和周族同四周一部分蛮、夷、戎、狄民族的长期融合,互相吸收,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素质,有着共同的精神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至春秋中期,华夏民族已在我国中原地区形成。在这个基础上,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着。当时华夏民族的共同地域以及政治、经济,均有较大的发展,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并趋于一致,出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局面。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适应这种历史发展的需要,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兼并六

国,建立了幅员辽阔、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并制定、颁发了一系列制度、法令和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措施,诸如废分封,立郡县,“使黔首自实田”,“车同轨,书同文,行向伦”,以及“修驰道”、“直道”,凿灵渠,筑长城等。这对于形成日后汉民族的共同地域,对于发展统一的封建经济,对于加强中央政权同地方的联系,对于开展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思想文化的交流,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等方面,实现了华夏民族的统一,为华夏族向汉族的转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王朝是汉族形成的开端。

秦王朝速亡,代之而起的汉王朝前后长达四百余年。由于“汉承秦制”,华夏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稳定的发展,完成了由华夏族向汉族的转化。至此,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形成了。与此同时,在汉族周围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羌、越等,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它们同汉族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互相依存,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为缔造光辉灿烂的秦汉文明,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发展

居于华夏民族四周的各少数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南越、西南夷、氐羌及西域各族,自秦汉以来,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有的还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组织,

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匈奴族

匈奴的族称 匈奴作为中国北方一支强大民族的族称，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是匈奴对本族人的自称。据《匈奴列传》记载，匈奴首领单于曾遣使致书汉文帝，书中有“天所立大匈奴单于，敬问皇帝无恙”、“皆以为匈奴”，“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等语，可知“匈奴”是其对本族人的自称。匈奴人又自称为“胡”，《汉书·匈奴传》载狐鹿姑单于致汉武帝书，书中有“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等语。因匈奴人自称为“胡”，故邻近各族亦称其为“胡”，如《汉书·西域传》中有“欲胡君”、“击胡君”等语。此外，汉人又有“东胡”、“西胡”之称。两汉时期，“胡”是匈奴的专称，“胡”与“匈奴”可能为一音之转。

匈奴的族源 关于匈奴族的族源，史学界的说法不一。《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王国维作《鬼方昆夷獫狁考》（载《观堂集林》卷13）认为：商周之间的鬼方、混夷、獫狁，西周时的獫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期的胡，皆为匈奴同种，实为一族。王国维的说法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梁启超、方壮猷、冯家升、佟柱臣等学者，皆撰文附和此说。持不同见解的有蒙文通，他认为鬼方、畎夷、荤粥、獫狁并非是匈奴，而义渠与匈奴始为同族（见《古代民族迁徙考》、《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黄文弼的《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则认为：鬼

方、荤、混夷皆为古人的羌族，林胡、楼烦、义渠才是匈奴的族类。此外，还有其他说法种种。由于有关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资料少而零散，各家对仅有资料的诠释又不相同，致使有关匈奴的族源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没有趋于一致性的看法。

匈奴的族属 关于匈奴的族属，国内外的学者曾文献资料，并采取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提出了匈奴属于蒙古族、突厥族、芬族以及斯拉夫族等四种说法。其中，以持有前两种说法者居多。这一问题的解决，除依据文献资料和比较语言学之外，还有必要借助于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以求逐步得出接近于实际的结论。

匈奴的社会经济生活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过着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生活。为求得丰盛的水草，匈奴族随着畜群四处迁徙，“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匈奴人的衣食住行，也多仰给于牧畜及与之有关的产品，即所谓“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匈奴族的食物，以畜肉、乳浆和干酪为主。他们以皮、革、裘为衣，用毡作帐幕房屋（即“穹庐”）其他如船只、铠甲，也有用皮革制作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除畜牧业外，狩猎业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即“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匈奴人从事农业，生产粮食。这种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依仗着丰盛的水草和适宜的气候，受自然条件制约较大。如遇大的自然灾害，往往导致畜死人饥。这就决定了匈奴族在长期的历史岁月中，游徙不定，“时大时小，别散分离”，时强时弱的特征。

战国中期，中原各国已普遍使用铁制生产工具。地下出土

文表明,匈奴族于战国末期已开始进入铁器时期。近几十年来在漠北诺颜山(原匈奴单于庭辖地)和其他地区所发掘的数百个匈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器,如铁镞、铁刀、铁剑、铁镰、铁铍和炼铁炉等文物,其年代在公元前三至一世纪。冶铁业和铁制工具,使匈奴社会的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

秦汉时期,匈奴的畜牧业有较大的发展。在匈奴族的庞大畜群中,马的数量和品种极多,其他如牛、羊的畜养,也非常繁盛。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击匈奴,仅在河南地(今内蒙河套志伊克昭盟一带),就捕获“牛羊百余万”。公元前124年,卫青出朔方、高阙(今内蒙临河县狼山山口)击右贤王,获牧畜数百万。公元前71年,汉与乌孙联合出击匈奴,获马、牛、羊、驴、橐驼等七十余万头。从几次重大战役捕获的匈奴牧畜头数来看,匈奴拥有庞大的畜群,畜牧业相当发达。

农业生产在匈奴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占有一定的地位。《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88年“会连雨雪数月,……谷稼不熟悉,单于恐”;又载公元前67年“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这说明随着铁农具的使用和为战争储备粮食的需要,匈奴族已相当地重视粮食作物的生产。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自公元前三世纪始,匈奴人已掌握了冶铁技术。炼铁炉的出土,是能够自行冶铁的证明。而铁制工具(如镰、铍)和兵器(如镞、刀、剑)出土数量和品种之多,说明冶铁和铁器制造在匈奴已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从出土刀、剑与汉式刀剑非常相信这一点来看,匈奴是从中原地区那里接受了铁器文化。在铜器制造业上,大批铜制器物如镞、刀、剑、马嚼、炉、炊具、勺、壶、鼎、钟、铃、镜、环以及铜

帽和铜马等的出土,表明铜器制造业不仅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而且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在陶器制造业上,匈奴的陶器自秦以来种类甚多,形制和花纹也比较复杂。木器制造是匈奴的又一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能制造穹庐、车辆、木循、棺槨和弓矢。其中,以弓矢的制造颇为精致、发达。公元134年,汉兵在车师附近掩击匈奴,获车千余辆;公元109年,汉兵在常山、中山一带击败南匈奴,亦获车千余辆,可见匈奴的制车业已相当发达。

在商业方面,由于匈奴人以畜牧业为主,农业居于次要地位,手工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产品仍远不能达到自给的程度。因此,需要用畜产品同汉族的农业和手工业品进行交换,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为此,匈奴非常重视与汉人互通“关市”,交换有无。这一时期匈奴墓出土的大批来自汉族的商品交换是相当频繁而且数量甚大。此外,匈奴还同乌桓族、羌族以及西域各族进行货物交换。

匈奴的社会结构 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自淳维(传说中匈奴的祖先)以至头曼(匈奴的第一个单于),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可知匈奴族很早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千余年来分合无常,很不稳定,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阶段。

匈奴自进入铁器时期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飞跃。铁器的使用,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生产品有了剩余,并促成了游牧经济从集体向个体的转化。特别是在冬季缺乏饲料的条件下进行游牧,小畜群比大畜群更易于管理饲养。于是,氏族集体放牧逐渐转化为个体家庭的分散游牧,出现了拥有

私有家畜的个体家庭。这种独立的小经济,使氏族组织日趋瓦解,贫富悬殊愈发明显。漠北地区公元前3—2世纪墓葬中陪葬品的丰盛和贫宪法,形成明显的对照。个体家庭经济虽已出现,但牧场和游牧地仍为氏族所公有,即所谓“逐水草迁徙……然亦各有分地”(《史记·匈奴列传》)。在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瓦解和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掠夺性的战争成了匈奴首领的经常性职业,即所谓“以战攻为事”。匈奴人的氏族公社,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即所谓“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西汉中期以后,匈奴同西汉王朝之间战争频繁。战乱逃亡,使原有的氏族组织时常遭到破坏,日趋瓦解,保存下来的只是氏族组织的外壳,即文献记载中所反映出来的氏族名称如韩氏、当于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氏族族外婚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存地,表明氏族组织的外壳依然存在,尽管氏族组织的内容和实质早已发生了变化。

畜牧业的发展,使照料畜群需要更多的人力。拥有畜群的主人,便利用战中的俘虏来牧养牲畜,于是便出现了奴隶阶层。《史记·匈奴列传》说:“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又说:“坐盗者没入其家”。匈奴的平民往往拥有奴隶,而贵族则拥有的数量更多。所谓“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同上),是说贵族死时竟用多达“数千百人”的奴婢来殉葬。据记载,从公元前129年至公元前120年的十年中,匈奴年年入侵汉王朝北部边境各郡,每次杀、掠“数百人”或“千余人”、“二千余人”、“三千余人”、“数千人”而还。截至汉昭帝时止,汉王朝被匈奴杀掠的吏民,至少在十万口以

上。如果把没收罪犯家属以为奴隶的数字计算在内,匈奴在西汉时所拥有的奴隶,可多达数十万人。匈奴人驱使庞大的奴隶人口为自己放牧、耕田或从事手工业生产,使之成为牧奴、耕奴和工奴,是匈奴社会畜牧业、农业以及手工业生产中的重要劳动力。匈奴的奴隶制随着频繁的对外掠夺战争,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拥有奴隶的匈奴士兵,他们平时也参加生产劳动,所谓“万余骑屯田”即是证明。在手工业中,制造弓箭、穹庐、陶器的工作,则大多是由匈奴人自己担任。

匈奴的军事首领通过频繁的掠夺战争拥有愈来愈多的奴隶和财富,地位和权力日益增高,并导致世袭王权的出现。

公元前 209 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使世袭权力作为一种制度而确立起来,冒顿单于在取得对各部落首领发号施令的独断专行权力之后,不断向邻近的部族用兵,控制了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内外,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在征服的疆土上,冒顿单于为保护急剧增殖起来的私有财富、镇压奴隶和被征服部族的反抗,对被征服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以漠北为中心的奴隶制政权。

新建立的匈奴政权机构分三个部分:单于庭(首领部)的辖地在匈奴中部,南与汉朝的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和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县一带)相对。左贤王庭(东部)的辖地在匈奴东部,南与汉朝的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县一带)相对,东连秽貊。右贤王庭(西部)的辖地在匈奴西部,南与汉朝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县一带)相对,西连月氏和氏、羌。

在匈奴政权中,单于是政府的最高首脑,总揽军政及外交

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诸大臣皆由贵族担任，世代相袭为官。左、右贤王是匈奴政权的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因匈奴尚左，所以左贤王是单于的继承人，常以太子充任。左、右贤王以下的左、右谷蠡王可在自己的驻牧之地建立政权机关（即“庭”）。左、右谷蠡之下，依次是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高级官员，皆世代相袭为官。——匈奴的各级政权机关，实质上是游牧性质的军事政权。各级官吏均为各级军事首长，统领或分领骑兵，指挥作战。所有成年壮丁，均被编为骑兵。从左、右贤王到左、右大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万骑（万骑长）之下各置‘千长’（千骑长）、百长（百骑长）、什长（十骑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中下级带兵官吏。

匈奴游牧性质的军事政权，其对外职能是掠夺和压迫邻近各族，统治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其对内职能则是压榨广大奴隶，维护社会秩序，“拔刃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保护奴隶主贵族的私有财产。此外，政府还负责向人民征税，即“课校人畜计”。这种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上的政权机关，虽然比较简单，但性质已属于不发达的奴隶制政权。这种政权性质，直到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一直没有大的改变。

匈奴的语言文字 据文献记载，匈奴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即“毋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史记·匈奴列传》）、“断狱听诉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后汉书·南匈奴传》）。文献中所载匈奴写给汉代皇帝的文书，都是汉人代笔用汉文书写的。匈奴族的语言，一般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一个语族，但究竟属于该语系的蒙古语族还是突厥

语族,至今尚无定论。由于匈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现存的匈奴语汇,都是两汉时期用汉语音译保存下来的,多是一些名词或专用名词,如:“匈奴”“胡”(匈奴族族称)、“单于”(最高首领)、“阏氏”(妻、妾)、“居次”(公主)、“撑犁”(天)、“孤深”(子)、“若鞮”、“鞮”(孝)、“屠耆”(贤)、“欧脱”(中立地带)、“逗”(冢)、“径路”(宝刀)、“服匿”(陶缶)、“橐囊”(“干酪”、“濡酪”(乳汁),如此等等。

匈奴的艺术 匈奴的民歌,优美动人。《史记·匈奴列传》索引引《西河旧事》中的一首民歌,歌词是: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得息;

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匈奴的音乐,已无从可考。从后人的诗歌和流行的乐器看,匈奴人有自己的音乐,这是没有疑问的。匈奴流行的乐器是胡笳和鞞鼓。《胡笳十八拍》中有“胡笳本自出胡中”、“鞞鼓喧兮从夜达明”等句。后来,胡笳传入中原地区,深为汉人所喜爱。

匈奴人的艺术,在题材上反映了他们的游牧和狩猎生活。诺颜山和漠北地区匈奴墓葬中,曾出土一些牛、马、鹿头形或体形及野兽相斗的毡毯、铜饰牌等物,栩栩如生。还有骨器上绘制的兽类图画,在铜器及铜饰件上的双鹿纹、双龙纹、以及几何纹等,都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珍品。

匈奴人的原始信仰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岁正月,诸小长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神鬼。秋,……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可见,匈奴在每年举行的三

次集会中,都有祭祀的内容。祭祀的对象是祖先、天地、鬼神。匈奴人对天地十分尊崇。故“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匈奴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认为是鬼神在起作用。匈奴人的祭祀,是为了求得天地、祖先、鬼神的保佑,避祸得福。为沟通天地鬼神与人的关系,匈奴人用“巫”(用跳舞的形式以降神的女子)来承担这一使用。胡巫所用的法术,通常是咒语。此外,胡巫还能够为人治病,又是匈奴人的医生。

匈奴人的婚姻形态 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匈奴贵族中很普遍,还保留着父兄死后妻其后母、群嫂的原始社会的遗风,即所谓其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人的服饰和习俗 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纵体”指不检束容止;“拖发”即是“披发”。在服制上则尚“左衽”,是北方许多民族在服饰和发型上的共同特点。在习俗方面,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有杀敌庆功的风俗,加“斩首虏赐一卮酒”,有相互扶助的风尚,如“战而扶輿死者”;还有“贵壮健、贱老弱”的习俗,即“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此外,还有盟誓时必须歃血的风俗。《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胡人之盟约,置酒人头骨中,饮以相诅,刻臂出血,杀牧歃血相与为信。”

秦汉时期的匈奴民族,地控我国北方的辽阔疆域,社会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建立了奴隶制政权,通用本民族自己的语言,有以游牧经济为特点的文化艺术、原始信仰以及其他诸多共同的习俗风尚。历史事实表明,匈奴在秦汉时期已迅速地发

展成为我国北方的一支具有共同的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强大民族。这支民族,在战国秦汉时期,同流入这一地区的大量外族人如东胡人、西[𠂔]人、月氏人、楼烦人、白羊人、浑庾人、屈射人、丁令人、鬲昆人、薪犁人、乌孙人、西域人、羌人和汉人杂居生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以匈奴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长期融合的结果,便形成了我国北方的强大民族——匈奴族。

二、乌桓、鲜卑族

乌桓族称 乌桓在公元前 200 年匈奴灭东胡以前,是东胡族的组成部分,与鲜卑同是东胡部落联盟中两个较大的部落集团。《史记·匈奴列传》说:“燕北有东胡、山戎”,《索隐》引服虔曰:“在匈奴之东,故曰东胡。”可见,乌桓族的中心区域在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乌桓作为族称,其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东胡族被灭后,一部分退居乌桓山,因山名为号,即“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后汉书·乌桓传》);另一种说法是,乌桓最初为部落大人之名,后引申为部落之名,即“桓之以名,乌号为姓”(《史记·匈奴列传》《索引》引《续汉书》)。乌桓山,一说即赤山(今赤峰市北的红山),一说为乌辽山。

乌桓的经济生活 乌桓族的经济生活,以游牧为主,其次是狩猎业和农业。即:“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后汉书·乌桓传》);“耕种常以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稞、东

墙。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藁米常仰中国。”（王沈：《魏书》）青稞即糜。乌桓的家庭纺织业，也是以动物毛革为原料的。《后汉书·乌桓传》说：“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毼毼。”刺韦即缝皮革为衣、为帐幕；文绣即绣花，毼毼即毡氍之类。

乌桓社会组织 在秦汉时期，乌桓仍处于邑落分社的组织形态。乌桓社会由大小部落组成，即“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则刻木为信”。这些“大人”是由部落成员推选出来的“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而且是“无世业相继”。乌桓虽然尚未出现世袭的权力，但部落联盟首领已拥有较大的权威，贫富分化对立现象开始出现。《后汉书·乌桓传》说：“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听出马、牛、羊以赎死；其自杀父兄，则无罪；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在乌桓的社会中，还残留着许多母系氏族社会的遗迹，如“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在氏族部落内部，妇女有较高的地位，“计谋从用妇人，唯战斗之事乃自决之。”在当时，乌桓人尚未进入阶级社会，即“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同上），邑落公社成员都参加生产劳动，不存在着人剥削人的现象。

至东汉末年在乌桓人的邑落公社中，乌桓“大人”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特权、军事特权和法律上的特权，已不参加生产劳动。乌桓大人的公选制度，已转变为世袭制，“大人”已成为脱离公社成员的首领。邑落内部的主要财产如牧场、山林、湖泊，仍为公社所有；一部分耕地向私有转化，而马、牛、羊等畜

产则为各家族或个人所有。乌桓人的公社，又是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组织，邑落的首领称“小帅”，这显然是军事酋长的名称。“部”的大人，从各邑落的小帅中选出，拥有“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的权力。乌桓的成年男子，战时皆为战士。东汉时期乌桓军事组织不断扩大，东汉灵帝初年已有上谷、辽西、辽东、右北平四王。中平四年（187），汉中山太守张纯叛汉人入乌桓，统一乌桓各部，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部乌桓的元帅。

乌桓的蓄奴制度 乌桓人的蓄奴之风，约始于两汉之际。由于王莽暴虐乌桓，乌桓豪帅叛莽而投降匈奴，并在汉朝的边郡进行战争，掠夺人口，即：“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于是，给乌桓作“吏”的乌桓豪帅，开始蓄养奴隶，致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之事。乌桓向汉朝贡献奴婢，是其已蓄养奴隶的明证。乌桓的蓄奴之风，并不意味着乌桓已进入奴隶社会。在乌桓形成自己的奴隶制之前，曹操在汉末便把他们编为三郡乌桓骑兵、并带到中原地区参加作战去了。

乌桓人的习俗 在婚俗方面，《后汉书·乌桓传》说：“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牛、马、羊畜，以为聘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在葬俗方面，乌桓人“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

以彩绳纓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充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归岱山也。”在原始信仰方面，乌桓人“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把天地、山川、鬼神、祖先列为祭祀的对象。

乌桓人的发式，发饰等习俗，《乌桓传》记载说：“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箇步摇。”箇即妇人首饰，首饰上有垂珠，步行则摇动。

两汉时期的乌桓人，已成为我国北方的一支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的民族。

鲜卑族称 鲜卑按其部落起源的地区同其它部落融合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东部鲜卑和拓拔鲜卑。而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则认为：鲜卑可分为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前者源于大兴安岭东侧，后者在大兴安岭北段。公元一世纪末，北匈奴西遁，致有东部鲜卑南迁，北部鲜卑西进。

东部鲜卑起源于蒙古草原东部的鲜卑山，原为东胡部落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后汉书·鲜卑传》说：“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语言习俗与乌桓同。”鲜卑的住地，据《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其地东接辽水，西当西城，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乐水即今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而鲜卑山的地点，则历来说法不一。清人张穆《蒙古游牧记》考证，鲜卑山在今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乌桓自汉武帝时降汉，南移至老哈河流域，鲜卑遂向南推进，居地西拉木伦河流域。

鲜卑的语言及习俗 据王沈《魏书》记载：鲜卑“其语言、习俗与乌丸同。……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可见，鲜卑与乌桓的语言，习俗相同，并属于一个语族系统。在发式上，男子娶妇、女子出嫁时均要“髡头”。所谓髡头，可能如后世满州人剃发之周围，留顶发的大部分，垂辮于后。

鲜卑的社会经济生活 鲜卑与乌桓同以游牧狩猎为主，出产以野生动物最为有名，其“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豹、鼬子，皮毛柔软，故天下以为名裘。”（《后汉书·鲜卑传》）

鲜卑的地域及其社会组织 西汉初年，鲜卑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徙居辽东塞外。公元91年，北匈奴被汉朝大将军窦宪所遣右校尉耿种击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同上）公元二世纪中叶（汉桓帝时期），檀石槐兴起，统一鲜卑各部落，建立了一个草原部落军事大联盟，其辖地“南抄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王沈《魏书》）于是，檀石槐“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东至辽东接夫余、秽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当时，鲜卑“称兵十万”（《后汉书·鲜卑传》），不断入寇汉朝北部边郡，杀掠百姓，掠夺财物。檀石槐死，军事大联盟分裂，各部大人“割地统御，各有分界”。

鲜卑的社会组织，史书记载不详，很可能与乌桓相似。东汉末年，鲜卑出现了“大人”世袭制度，即“自檀石槐后，诸大人逐世相袭。”在《后汉书》、《三国志》中，鲜卑皆同乌桓合为一《传》，《传》中言乌桓较详，而有关鲜卑社会的情况，每以“与乌桓同”略而不谈，只记与乌桓之异。因此，鲜卑的社会情况，只能从有关乌桓的记载中参见其详。事实上，鲜卑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情况，与乌桓大体上是同步进行的。

秦汉时期，在乌桓、鲜卑之东即在我国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许多少数民族如夫余、高句丽、东沃沮、北沃沮、挹娄、秽貊、朝鲜等。这些民族在两汉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均有迅速的发展。

三、蛮、越各族

武陵蛮 西汉时期，在洞庭湖以西的山岭中，居住着以龙为图腾的盘瓠蛮，又称武陵蛮。《后汉书·南蛮传》说：“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汉代武陵郡在今湖南西部和贵州东部，是苗族居住区的中心地带。两汉间，有称武陵蛮、澧中蛮、潯中蛮、零陵蛮、长沙蛮者，也有称五溪蛮的。武陵蛮以农耕为主，“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婁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可见，武陵蛮虽有自己的军事首长（“渠帅”），赐有印绶，但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机关，故“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然而，他们有本族的语言和习俗，又有本族的地域，在汉代已形成一支民族。

莫徭蛮 同武陵蛮相错而居的还有莫徭蛮。据《梁书·张纘传》记载：“湘州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因此向化”，很可能是瑶族的先民。

廪君蛮 廪君蛮居今鄂西、川东地区，以虎为图腾，又称巴蛮或巴郡南郡蛮。《后汉书·南蛮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瞿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鍾离山。……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后来，巴氏子务相被立为君，“是为廪君，……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戛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铤。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秦、汉政权向廪君蛮的君长和平民征收赋税，这无疑将促进廪君蛮的分化，加速其历史发展的进程。

板楯蛮 板楯蛮居于四川嘉陵江边。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秦昭王时有“巴郡阆中夷人”射杀曾伤害千余人的一只白虎，秦人与夷人“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佗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青酒一钟。’夷人安之。”从秦、夷盟约的内容来看，与秦政权对廪君蛮的政策不同，板楯蛮并不向秦交纳田租赋税，两者之间互不侵犯，违者有罚，在秦与板楯蛮之间并不存在着隶属关系。西汉政权建立后，开始向板楯蛮的平民征收赋税，“渠帅”免交，即“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税，余户乃岁入宝钱，口四十。”板楯蛮“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1954年在四川昭化县宝轮院及巴

县冬笋坝发现的船棺葬,从出土铜器上虎形花方的特点来看,可能即是板楯蛮祖先的墓葬。战国时期的船棺葬,地域文化特点较多;而秦汉之际的,则显著地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这表明,自西汉时期起,板楯蛮正经历着汉人融合的历史过程。

百越 “越”本国名,国人皆为闽族,后亦称越族,居于东南沿海之地。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之后,“越”名声大振。战国之后,遂有“百越”之称,是泛指南方民族之统称。蒙文通说,当时统称北方民族为“胡”,南方民族为“越”,故有“北走胡,南走越”之说。(《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所谓“越有百种”、“各有种姓”,说明“百越”是包括方言习俗各不相同许多民族共同群的统称。大略可分为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骆越(西瓯)三种。

东瓯 东瓯与先秦吴、越同族,为越王勾践之后。秦并六国,将其后废为君长。《史记·东越列传》载:东瓯君长名摇,曾佐诸侯灭秦。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以“闽君摇功多”,立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永嘉县,一说为温州)。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吴王濞反,从吴反汉;吴王败,又受汉指使,杀吴王子丹徒。建元三年(公元前138),闽越击东瓯,汉遣兵往救,于是东瓯请举国内附。

闽越 闽越亦为越王勾践之后,居今福建地区。战国时,楚威王伐越,杀越王无疆,并其地。秦并六国,废闽越王无诸(亡诸)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诸侯群起伐秦时,无诸身率闽中兵从之,后又佐汉击楚(项羽军)。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封为闽越王,都东冶(即建安,今之福州),成为汉外藩诸侯国。建元六年(公元前135),闽越发兵击南越,南越告急,汉

王朝遣将击闽越，其王郢发兵拒之。郢弟余善谋杀之，以报汉军。汉罢兵，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又立余善为东越王，元鼎五年，汉发兵击南越时，余善上书请以兵从之，又“持两端，阴使南越”。元鼎六年（公元前111）秋反汉，遣兵入白沙、武林、梅岭、杀三军三校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冬，汉兵入东越，东越诸将杀余善以降。汉封越之有功诸臣：繇王居股为东成侯，在九江郡；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在临淮郡；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在济南郡；东越将多军为无锡侯，在会稽郡。之后，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徙其民于江、淮间。

秦汉时，东瓯、闽越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从社会经济上看，《汉书·地理志》记载：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窳赢蛤，食物常足。”越人是以农业为主，渔猎也占很大的比重。手工业也相当发展，纺织业很有名气。他们生产的荃、葛、帛之类的纺织品，成为东越王向汉王朝进贡的礼物。越人习于水，造船业也很发达。又，好武使剑，其青铜剑驰名国内。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也大大增加。《汉书·吴王濞传》记载：“东越兵可万余人”，“（闽越）其甲卒不下数十万”。这个记载，可能有点夸张。有人估计其人口可能在百万左右。越人信巫鬼，重淫祀、“鸡卜”，崇信天神上帝。有专门从事宗教职业者“越巫”。考古发现的“船棺”，也是越人的遗存。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阶级社会。

南越 南越指秦王朝所置桂林、南海、象郡所管辖下的居民。《史记·南越列传》说：“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当时徙住的“中县之民”有五十万。赵佗以秦吏为南海郡龙川（今广州）令。陈胜、吴广起

兵反秦时，南海尉任嚣病死，死前委赵佗，行南海尉事。赵佗移檄关邑，“绝道聚兵自守”，并以法诛秦所置长吏，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赵佗是秦人，祖居真定（今河北正定）。《论衡·率性》说：赵佗“化南夷之俗，背叛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说明赵佗顺应南越之俗。赵佗“甚有文理”，治国有方，制止了越（粤）人相互攻击之俗，社会安定。南越其俗“椎髻箕坐”，东越其俗“断发文身”，两者虽同属“百越”，而是不同俗的民族。

骆越 骆越或作雒越。骆越之名首见于《汉书·贾捐之传》。骆越有时称西瓯。两者为同一族体。据《史记·南越列传》《索隐》引《广州记》、《水经·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皆谓骆越在交趾，分布在今广西南部 and 越南北部。秦征定西瓯，以其地置象郡。秦亡时，赵佗并其地，成为南越的一部分。其习俗，既不同东越，又不同南越。

《后汉书·南蛮传》说：“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来徙居罪囚，与当地居民杂居，乃稍知语言，“渐见礼化”。考古学家们称此地区文化为“雄王时代”的文化，属青铜器文化。代表的器物有船型和骆鸟纹饰的铜鼓和有吹鼓手像的铜勺等。到前两汉之际，该地文化也为汉文化所代替。

四、西南夷各族

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西汉时统称西南夷。有关西南夷各族的概况，《史记·西南

夷列传》与《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略同。《史记》和《后汉书》的作者根据西南夷各族的地理区域、经济生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以及族属的不同,把同夷区分为如下四类:

第一类是贵州西部的夜郎、云南滇池区域的滇、四川西南部的邛都。他们均以定居农业经济为主,“耕田、有邑聚”,有“椎结(为髻如椎形)、左衽”的习俗,国有“君长”。

第二类是洱海区域的雋、昆明,他们以游牧经济为主,“随畜迁徙无常”,有“辫发”的习俗,无有“君长”。

第三类是在今四川成都西南的徙、笮和成都北部的冉駹,他们以农业和游牧业为生,即所谓“或土箸,或随畜迁徙”,国有“君长”。

第四类是在今甘肃南部的白马氏,属氏族的一支,以农业和游牧业为生,国有“君长”。

在西南夷各族中,如按语系划分,属于羌语系统的有冉駹、笮都、邛都、滇、雋、昆明、棘人、叟、摩沙,现分述如下:

冉駹 冉駹夷分布在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区域,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置汶山郡。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说:该地山中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冉駹为其中之一部。其地“土气多寒,在盛暑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邑。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十余丈为邛笼。”畜牧业及狩猎业在冉駹经济生活中居主要地位。农作物中唯有麦类,由于“土地刚卤”,谷、粟、菽之类皆不生长。有旄牛,出名马,多杂药,又有麝香,皆为著名特产。各部落的首领、“王侯”知文书,执法甚严,残留有“贵妇人、党母族”的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和火葬的习俗。

笮都 笮都在今四川雅安一带，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笮都人的习俗及出产，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

邛都 邛都在今四川西南部，元鼎六年以为越雋郡，包括原西昌地区、原凉山彝族自治州。邛都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后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蚕结、耕田、有邑聚”，“其土地平原，有稻田”，而“邛都县特好蚕桑，宜黍、稷、麻、麦、稻、粱”，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华阳国志·南中志》又载：“台登（泸沽）县山有磐石，火烧成铁，刚利”。此外，邛都还产铜，会无出铁。邛都人的习俗，《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冰：“青蛉县禺同山，有碧鸡金马光景，时时出见。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牂柯相类。豪帅放纵，难得制御。”

滇 滇人分布在滇池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不至于得，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汉武帝以其地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同上）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滇池地区“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怵官者皆富及累世。”可见，滇地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农、牧、渔业和采矿业均较发达，是西南夷中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汉武帝“赐滇王王印”，“居官者皆富及累世”，俗有“豪怵”奢侈之风，可知这一地区已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过着骄奢的生活。

雋、昆明 雋、昆明在洱海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牁榆(今大理),名为雋、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可见,雋、昆明人过着以畜牧为主的游牧生活,无君长,尚未进入阶级社会。《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可见昆明是南中地区的“大种”。当时,滇西自今保山往东北至大理一带,皆有昆明族部落,是居住范围相当广泛的一族。在西南夷中分布面最广,人口最多。唯洱海的东南部“有稻田,畜牧,亦出漂华布。”

棘人 棘人族原为氐羌中的一部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棘人,羌之另种也。”棘人初居青衣江流域。后来,一部分顺岷江而下,居棘人道县(今四川宜宾县)一带,再迁至朱提(今昭通)地区;另一部分则沿雅砻江而下,散居于金沙江与洱海之间,可见棘人在秦汉时期居住范围之广。从湟水流域到四川雅安地区、宜宾地区、西昌地区以至于曲靖至滇中地区,皆有棘人族人居住。以滇中地区为中心的棘人族居住区,东北与棘人道县相接,往南直到今玉溪地区和红河州北部一带,往西到楚雄、大理县一带,范围相当辽阔。棘人族是西南夷中与汉族接触时间最早的一个民族,因而在西南夷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水经·江水注》棘人道县引《地理风俗记》曰:“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秦纪》所谓棘人僮之富者也。”战国末年,楚将庄蹻率楚兵入“滇国”,“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与“滇棘人”融合了。在长期杂居中,棘人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无疑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由于棘人族在西南夷中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加之先后进入这一地区的汉族人口较棘人为少,长期融合的结果,其发展趋势是汉族融合棘人族之

中。

叟族 叟族是从氏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尚书·禹贡》说：“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汉书·武帝纪》说：“北伐渠搜，氏羌来服。”《华阳国志·汉中志》在武都郡、阴平郡之下曾提到“有氏搜，多羌戎之民”，“多氏搜，有黑白水羌、紫羌”。可见，叟族确系氏羌族的一部分。汉武帝时所设越雋郡（今西昌地区、凉山州），即以叟人为主。《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尤中《中国古代的西南民族》一书认为：“叟族在‘西南夷’中的分布面和人口仅次于昆明族。而且，凡有昆明族居住的地方，几乎都同时有叟族与之共居，他们互相交错杂居在一起。……叟族中的一大部分与昆明族共同形成近代的彝族；另一部分则形成近代的傈僳、哈尼、阿昌等族。”

摩沙族 摩沙族也是从氏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华阳国志·蜀志》越雋郡定笮县说：“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雋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定笮县）在郡（越雋郡）西，渡泸水（今雅砻江），宾刚缴，曰摩沙夷。有盐池，……”可见定笮县是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区，其中有不少是摩沙族的人口。所谓摩沙、笮、昆明“皆夷种也”，是说他们同出自羌族。在定笮县的中心区（今四川盐原县一带），是摩沙、叟、昆明族共同杂居区。这里的特产是池盐。

在西南夷中，出自百越系统的各族有夜郎、哀牢。

夜郎 夜郎主要分布在今贵州省。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传说夜郎侯乃“剖竹”所得“男儿”，以竹为姓。“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

绶。”早在战国末年，楚顷襄王派庄跻伐夜郎，“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夜郎与滇、邛都同属于“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一类，与邻近地区不同的是：“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句町县有桄榔木，可以为面，百姓资之。”自汉武帝时起，夜郎境内的主体居民，大部分都已称为“僚”，见于《后汉书·西南夷传》的“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此外，还有一部分居民称之为“濮”，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的“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秘生”。在哀牢人的居住区内，除“僚”、“濮”之外，还有“鸠僚”、“闽濮”杂居其中。

哀牢 哀牢族主要分布在今云南保山地区，汉武帝时设雋唐、不韦二县，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设为永昌郡。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哀牢是一个以龙为图腾的民族，共推“九隆”为王，“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哀牢族所居地区，“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这里，物产丰富，“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瑠璃、犛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貘兽”。在丰富物产资源的基础上，哀牢人的纺织品远近闻名，即“知染采文绣、罽毼、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汙。”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哀牢在永平十二年已拥有“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人。哀牢王自九隆死后，“世世相继”，出现了世袭权力，其下又“分置小王”，可知哀牢族已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在习俗上，哀牢人有“穿鼻儋耳”的习俗，“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

庶人则至肩而已。”(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西南夷传》)

五、氐、羌及西域各族

羌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湟水及黄河沿岸羌族的历史,始于战国初年的无弋爰剑。西汉时期,羌人仍保持原有的种号,不另立种姓。每个种姓,可能为一个部落。东汉时期,羌族中的迷唐种势力强大,人口多达三万。每个种姓的最高首领称“大豪”,其下每十个人左右有一个“小酋”。各种姓之间,为着某种军事、政治上的共同目的,经常有不稳固的结盟关系,以便对付来自外族的共同威胁。据《后汉书·西羌传》记地爰剑后的子孙分支共有百五十种。到东汉时,在羌族的八十九种中,唯鍾种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慮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犂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

西汉时期,河湟羌的畜牧业和农业均有较大的发展,以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首要地位。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击败先零羌,“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卤马牛羊十余万头,车四千余辆”,可见羌人畜牧业的兴旺。此外,羌人的农业也有所发展。仅青海湖以东湟水流域的一段,“计度临羌东至浩亶,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

羌人中有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豪”、“小豪”,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史书还记载羌族入侵内地,既掠夺财富,也掠夺汉

族人口,并使之降为奴隶。至于河湟羌在两汉时期是否已进入奴隶社会,还不见有足够的资料说明。

居于河湟的羌人,又称“西羌”。西汉史籍中的西羌,是泛指居于西陲的羌人。东汉史籍中的“东羌”,则是指徙于内地的羌人。西汉时虽有羌人内迁,但羌人的大批内徙,是在东汉时期。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例举建武十年(公元34)至延熹八年(公元165)西羌的内徙事件,总共29次,人口数总在70万以上。内徙羌人有由豪帅率领归附、战败投降、被汉军俘虏等三种不同情况,因此内徙后的待遇和本身的组织结构也不尽相同。

被安置在陇西、金城等的羌人,因与西羌住地相连,保有较大的独立性。其中,金城属国内的三万余羌人,被称为“属国羌”,仍保有原来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不承担租税徭役,只是接受属国都尉的监督。被安置在边塞地区的羌人,被称为“守塞羌”或“保塞羌”,他们所处地位除与属国羌大体相同之外,还有帮助郡县防守边塞的义务。被安置在安定、北地、上郡、西治以及三辅等内郡的羌人,因与汉人杂居,要受郡县的制约,与属国羌和守塞羌的地位有较大的区别,但与汉族的编户民亦有不同。徙入陇西、金城等边郡的羌人,叛服无常,来去不定,种姓较杂。内徙羌人,其种姓家支大体上被保存,豪酋仍能支配本族,有一定的势力。两汉政权对归附的豪酋,有的还授予官爵,承认其对羌民的统率地位,但实际权力比内徙前要大大削弱了。

汉安帝永初年间,爆发了东羌大起义。先零种滇零自称天子,于北地郡“招集武都、参狼、西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

东犯赵、魏，南入益州，寇钞三辅，断陇道。”（《后汉书·西羌传》）起义队伍打破了种姓家支的界限，力量强盛，同东汉的军队相争对峙长达十年之久。

两汉时期的内徙羌人，由于与汉族杂处，羌人社会不可能保持原有形态。两个民族的杂居和相互影响，加速了彼此融合的进程。

氏 两汉时期，今陕西、甘肃、四川交界地区，均有氏族居住。其中，武都郡是氏族聚居的地区，故有“武都氏”之称。《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又说：“广汉两白马为武都郡”。《后汉书·西南夷传》说：白马氏所居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氏人勇戇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氏族的农牧业经济比较发达，《魏略·西戎传》说：“善种田，畜养豕牛马驴骡”，“出名马、牛羊、漆蜜”。特别是仇池山（今甘肃西和县南）地区，农业尤为发达。从“有麻田”、“俗能织布”的记载看，氏族的纺织业亦有一定的发展。在习俗上，氏族的衣“尚青绛”，嫁妇时服装的缘饰“似羌”、“似中国袍”，“皆编发”，表明氏人有自己民族的服制、共同的服色爱好和相同的发式，有着共同的心理状态。总之，氏族有自己比较集中稳定的分布地区，经济生活均以农业为主，有独立的语言和自己的风俗习惯，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状态，“这说明氏族已是一个具备基本民族特征的独立的一族。”（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122页）

关于氏族与羌族的关系，《史记·西南夷列传》有“白马最大，皆氏类也”语，《后汉书·西羌传》则说“或为白马种，广汉

羌是也”。白马或称“氐”，或称“羌”，因此自古便有氐羌同源、氐出于羌的说法。但有人认为：氐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与羌有以下四点不同：一是氐族以定居农业经济为主，羌族则“所民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羌人的居室“织犂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北史·宕昌传》），与氐人所居板屋不同。二是氐人在服饰上有前文所述的特点，而羌族嫁女则“披大华毡以为盛饰”。（同上）羌人的“皆衣裘褐，在服色上没有讲究，而氐人在服色上不仅尚青、绛、白色，而且“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南史·武兴国传》）。三是羌俗“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而氐人则无此俗。四是氐人有本族的语言，与羌语不同。黄烈认为：“陇坻一带正好是氐人分布区，由于其与羌相邻，先秦人乃目之为氐地之羌，但又觉察出其与羌有别，乃称为氐羌，或单称氐，氐乃由地名而转为族名。”（《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126页。）

西域各族 汉代所言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新疆、中亚在内的广大地区。汉人称这一地区的居民为“西胡”，意即西部胡人，与“东胡”的取名意义相同。实际上，西域的居民不全是胡人。《汉书·西域传》西夜国说：“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氐羌行国”，又说：“蒲犁、依耐及无雷国，皆西夜类也。”可见，西域的南道诸国多氐、羌族居民。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说：“在大沙漠至狐胡，亦有十余国，总称北道诸国，其居民多系原始的蒙古种。”此外，在北道还有“塞人”。《汉书·西域传》乌孙国说：“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种云”，又说：“捐毒国，……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又说：“休循国，……民

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又说：“罽宾国，……塞种今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可见，在伊犁河流域南部偏西一带，是塞种散居的地区。

关于塞人的人种，颜师古《汉书注》说：“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汉书·西域传·大宛国》：“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而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魏书·西域传》说：“康国（康居）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有人根据上述记载认为：塞人即斯基泰人，为雅利安种，属印欧语系，是从黑海以北经中亚迁徙而来的。

新疆地区以天山为界，分南北二部，北部为准噶尔盆地，南部为塔里木盆地。汉初西域三十六国，大多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的绿洲上。盆地的北缘各国称北道诸国，南缘的各国称南道诸国。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北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汉书·西域传》）。

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北道、南道诸国，多数以城廓为中心，以兼营农业、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有的国家还能自铸兵器。唯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粮食仰赖邻国供给。上述南道、北道诸国，语言不一，互相无统属关系，人口多在千人，数千人至两三万人不等，其中人口最多的龟兹，亦不过八万人。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则为游牧区域。

西域的主要国家有乌孙、大宛、大月氏、车师、鄯善、于阗、莎车、疏勒、龟兹、焉耆等。

乌孙 乌孙是西域势力最强大的国家，在伊塞克湖之南，地域辽阔，大抵在伊犁河流域原为“塞人”居地，后大月氏赶走塞王，居于此。后乌孙昆莫击败大月氏，占有此地，因上述之故，“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乌孙“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各级官吏的设置，表明乌孙已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权，富者有马多达“四五千匹”。乌孙“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栢，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乌孙“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

大宛 大宛在伊犁西南，喀什噶尔西北，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相接，属中亚国家，“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副王、辅国王各一人。……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即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耆酒，马耆目宿（即苜蓿）。宛别邑七十八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可见大宛在风土、物产、民俗方面，与大月氏、安息等中亚国家同属一类，与西域不同。大宛以定居农业为主，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马，葡萄酒业甚为发达。

大月氏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原是“随畜迁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本居敦煌、祁连间”的民族。后被匈奴冒顿单于攻破，“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大夏地处妣水之北，妣水即今阿姆河。“大夏本无君长，

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后汉书·西域传》又载，大月氏据有大夏后，“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牂顿、都密，凡五部翕侯”。后百余岁，贵霜翕侯攻灭其他四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国势强盛。大月氏人从敦煌、祁连间西迁大夏，后又建立贵霜国，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

车师 车师在今吐鲁番地区，分车师前国、车师后国二部。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北与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后部西通乌孙。”（《后汉书·西域传》）车师前后二部，人口均在五、六千人左右。

鄯善 鄯善本名楼兰，在今新疆若羌县，有一万四千人口。《汉书·西域传》说：鄯善“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草，怪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婼羌同”，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并能制作金属兵器的国家，为南道十国中的大国之一。

于阗 于阗在今新疆和田一带，有人口一万九千，居民多从事农牧，多桑麻，产美玉，有文字。东汉初年被莎车“攻并”，汉明帝时于阗王广德灭莎车，“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自葱岭以东，唯此二国为大。”（《后汉书·西域传》）

莎车 莎车王治莎车城，即今新疆莎车县，有人口一万六千三百人，“有铁山出青玉”，是从新疆“南道”通往西方大月氏、安息的交通要冲，农业比较发达。

疏勒 疏勒故治在今新疆喀什市，有一万八千六百人口，“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是新疆“北道”通往

西方的交通要冲。境内有喀什葛尔河,叶尔克羌河流贯,便于农业灌溉,产铜铁,有城廓、文字。

龟兹 龟兹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有八万一千三百人口,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能铸冶,有铅”(《汉书·西域传》),能酿酒,有文字,擅长音乐,是西域南、北道诸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

焉耆 焉耆王治员渠城,在今新疆焉耆西南四十里城市附近,有人口三万二千一百。这里水利富足,“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后汉书·西域传》)。《汉书·西域传》又载:焉耆“近海,水多鱼”。可见,焉耆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捕鱼业。

第三节

汉族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两汉时期,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均有较大的发展,各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比以前更加密切;同时,彼此间也发生过许多次的战争。汉朝对其他各族的战争,有的属于防御性质,对维护安全、保障生产有积极作用;有的则属于对少数民族的侵犯,造成了破坏。从总体上看,各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加速了各族的发展,促成了汉代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

一、同北方各族的关系

汉族同匈奴的关系 汉族同匈奴的关系，在汉代的民族关系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战国末年，匈奴势力渐强，时常南下，秦、赵、燕三国皆在北部边地筑长城以御胡。“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史记·匈奴列传》）。秦末农民大起义期间，“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楚汉战争期间，匈奴冒顿单于杀其父头曼单于而自立，“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疲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万。”

汉初，匈奴“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高祖刘邦使人厚赂冒顿之阏氏，方得逃出重围。由于汉初因连年战乱，经济凋敝，汉王朝无力反击匈奴，遂采取“和亲”政策，“高帝乃使刘（娄）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

汉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匈奴仍时常侵犯汉王朝的北部边郡，多所骚扰、掠。惠帝至景帝继续奉行“和亲”政策，多

次嫁宗室女于匈奴单于，每次赏赐的金银布帛等财物，有增无已。“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十四万骑入侵，游骑逼近国都长安郊外。直至汉武帝时期，据史书所载，仅公元前129年至前120年的十年之，匈奴连年入侵北边，杀掠汉族官吏和人民，数以万计。这对北部边郡人民的生产和身家性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威胁。

西汉前期同匈奴奉行“和亲”政策的七十年间，汉匈之间的“关市”贸易亦有所发展。即史书所载的“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今帝（即汉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同“和亲”并行的“通关市”政策，加强了汉与匈奴之间在经济上的物资交流。这一期，汉匈之间使者往来频繁，文书交往不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和交往，比以前有飞跃的发展。

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日益增强，对匈奴的连年不断入侵发动全面反击的条件已趋成熟，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至无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九年之中，汉军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接连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公元前128年，匈奴二万余骑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又入雁门郡，“杀掠千余人”。于是，汉武帝派卫青将三万余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公元前127年，卫青复领兵从云中郡出击，北抵高阙至陇西，“得胡首虏数千人，牛羊百余万”，夺回河套一带。同时，设置朔方郡，修缮秦时蒙恬所筑边塞，募民十万口徙于朔方，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

汉设置朔方郡后，匈奴仍连年侵扰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每次皆杀掠“千余人”至“数千人”不等。汉军在大将军卫青率领下亦曾多次出击。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余骑出陇西远征匈奴，“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浑邪王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因故俗为五属国。汉又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口充实西北边郡，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

公元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率十万骑、步兵及转运者数十万人，分别从定襄、代郡，入漠北追击匈奴。卫青败匈奴于漠北，单于率残部遁走，汉军“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阼颜山赵信城而还。”霍去病“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这次战争的胜利，解除了长期以来匈奴对西汉王朝北部安全的严重威胁。

西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使北部地区生产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边境与内地之间，邮亭驿置的普遍设置，使联系更加密切；徙民和戍卒的开发，在荒原上种植了谷、麦、糜、秫；屯田的兵民，使中原的先进工具和生产技术得以在边境推广；旧有长城的修缮和亭燧、城堡系统的建立，使保障北方安全的屏障更加巩固。总之，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对匈奴战争之后有了

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匈奴战败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五个单于并立。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 5 年），呼韩邪单于归汉，率众南徙至阴山附近。汉元帝以宫女王嫱（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结束了汉匈之间的战争局面。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忙于进行国内的统一战争，匈奴的势力又有所恢复，不断骚扰边境。东汉政权因一时无力反击，罢定襄郡，内徙其民于西河；又徙雁门、代郡、上谷等郡吏民六万余人于居庸、常山以东。因此，匈奴左部得以转居塞内。建武二十年（公元 44 年），匈奴一度进至上党、扶风、天水等郡，严重地威胁着东汉王朝的安全。

不久，匈奴连年遇到旱蝗灾害，人畜多死。加之乌桓乘机进攻匈奴，迫使匈奴北迁。此时，匈奴上层发生内讧，日逐王被南边八部大人拥立为南单于，袭用呼韩邪称号，请求内徙，得到东汉王朝允许。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 50 年），南匈奴入居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又转驻西河郡的美稷（今内蒙伊克昭盟东），分屯部众于北部边郡，助汉守边。东汉王朝赠给南匈奴以金、银、车、马、弓箭、衣服及“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乐器、鼓车、棨戟、甲兵、饮食什器，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贍之。”（《后汉书·南匈奴传》）供给费用，年达一亿零九十余万钱。从此，南匈奴与东汉和平相处，边境安宁，原内徙的北部边郡的汉族居民，亦陆续回归本郡，使边郡地区的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汉和帝初年，南匈奴已拥有二十三万人口，并逐步转向定居农业生活，同时逐渐向东、向南迁徙。

匈奴分裂后，北匈奴控制着西域，时常骚扰河西和北方郡县，杀掠南匈奴和汉人。后来北匈奴“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光武帝为避免骚扰，答应“合市”。“赐南单于羊数万头”。“北匈奴复遣使如前。”

汉明帝永平年间，北匈奴强盛，数寇边，汉军及南匈奴曾多次发兵还击。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军四路出击北匈奴，北匈奴“悉度漠去”。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师“出朔方，击北虏，大破之。北单于奔走，首虏二十余万人”。汉军出塞三千余里，至燕然山刻石而还。次年，汉军复取伊吾（今新疆哈密）。次年，汉军出居延塞，“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种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向西方远徙，离开了蒙古高原。此后，原在匈奴东面的鲜卑族西进，占据了匈奴的故地。

汉方族同乌桓族的关系 西汉初年，乌桓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妻子”（《后汉书·乌桓传》）。汉武帝时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乌桓势力逐渐强大，常攻击匈奴，也骚扰幽州边境。

东汉初年，“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光武帝“以布制赂乌桓”，并于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封乌桓“渠

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徕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东汉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附近）复置护乌桓校尉，兼领鲜卑，管理同乌桓、鲜卑的“互市”事务。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汉中山太守叛入乌桓，为乌桓各部元帅，入寇汉边。次年，幽州刘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汉献帝初年，乌桓王蹋顿强盛，河北边地汉族更为逃避战乱，投奔乌桓者多达十余万户。

汉族同鲜卑族的关系 汉初，鲜卑“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后汉书·鲜卑列传》）匈奴南单于附汉后，汉同“鲜卑始通驿使”。光武帝末年，一些鲜卑大人陆续率众归附东汉，被封为侯。北匈奴被东汉击走后，“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由此渐盛”，不断侵犯东汉北部边境。公元二世纪中，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尽据匈奴故地”，将领地分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主领，连年寇扰幽、并、凉三州郡，“杀略不可胜数”。檀石槐死，鲜卑分裂，力量渐弱。

二、同南方各族的关系

汉族同越族的关系 越族迁居江淮之后，汉朝将河东渠田予越人。《索隐》记载：“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习水利，放与之而少其税，入于少府。”越族俗尚“断发文身”，初迁居时，其俗相杂，后遂逐渐地同汉人融合，成为汉王朝的编户民。

赵佗自秦末农民大起义时自立为南越王后，汉高祖“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史，和集百越”（《史记·南越尉佗列传》）吕后时，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

予牡，毋予牝”（《汉书·南粤传》），给南越农业经济发展造成困难，赵佗对此不满，“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后遂“乘黄屋、左纛、称制”（《史记·南越尉佗列传》）。汉文帝时为避免对南越用兵，为赵佗修治在河北的祖坟，给赵佗在家乡的兄弟以高官，并派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因此取消帝号，恢复藩属关系。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路博德、杨仆等率汉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平定南越。汉以南越、西瓯及相邻之地立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

汉同蛮族的关系 东汉初年，武陵蛮强盛，“据其险隘，大寇郡县”（《后汉南蛮传》）。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汉遣伏波将军马援等击破之，“为置吏司，郡蛮始平”（同上）在东汉王朝期间，继武陵蛮之后，澧中蛮、零阳蛮、五里蛮、零陵蛮、长沙蛮以及日南蛮、象林蛮、交趾蛮、九真蛮、合浦蛮、苍梧蛮、郁林蛮等南方诸蛮族，曾先后多次“反叛”汉朝，杀掠郡县。这些叛乱，均被东汉朝廷所派的军队或由郡县的军队平定。巴郡南郡蛮在西汉时期，依秦时“故事”向汉王朝交赋，并无战事。东汉时期，潯山蛮、巫蛮、江夏蛮曾先后“反叛”，亦被汉军平定。板楯蛮平民百姓向汉朝交纳贡钱，“世世服从”，并无战争。只是到东汉桓帝、灵帝之世板楯蛮曾数次“反叛”，均被汉军讨平。

汉同西南夷各族的关系 西汉初年，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贩运笮马、髦牛和棘人僮（奴隶），巴蜀的铁器和其他商品亦运至西南夷并转贩到南越，两地之间有经济上的交往。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反汉，杀汉使及犍为郡太守。次年，汉兵从巴蜀攻下且兰，置柯郡及越雋郡、沈黎郡、汶山郡、益州郡。东汉时期，西南夷各族中

虽时有“反叛”事件发生,但更多的是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如夜郎人尹珍“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城始有学焉”(《后汉书·西南夷传》);汶山以西的白狼等部相率内附,“作诗三章”即所谓《白狼歌》,歌颂汉朝恩德,诗文载于《后汉书·西南夷传》。此外,汉朝还通过哀牢地区,同滇西和缅甸境内的掸族发生往来。掸国王“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同上)

三、同西方各族的关系

汉同氏羌族的关系 西汉时期,羌人曾与匈奴连兵十万攻令居塞,汉遣李息等率兵十万将羌人征服,并设置护羌校尉。汉宣帝时,羌人反抗汉人统治,围攻金城郡,汉宣帝令赵充国等率兵六万,屯田湟中,取得胜利,并设置金城属国接纳归附的羌人,与汉人杂居。王莽时又在羌人地区设西湖郡,并徙汉人入居此地。东汉初,汉王朝曾多次派兵镇压羌人的反抗,并将部分羌人迁居陇西、汉阳等郡及三辅地区。汉安帝时期,爆发了羌人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屡屡打败汉朝的军队,进击关中,截断陇道,斗争先后持续了十二年,才被东汉统治者镇压下去。连年征战,东汉所耗军费达 240 多亿钱。汉顺帝时,凉州、并州和羌人又发起反抗斗争,持续十年之久,东汉又耗军费达 80 余亿钱。汉桓帝时,羌人再发动反抗斗争,东汉王朝起用陇右、河西大姓皇甫规、张奂率兵作战。皇、张实行“招抚”羌人的政策,并惩治羌人所痛恨的贪虐官吏,羌人先后归服达二

十余万人。

汉同西域各族的关系 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同西域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自张骞偕同乌孙使者来长安后,张骞派往大宛、康居、大夏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的使者陆续来到长安。汉王朝每年派往西域的使者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每批百余人到几百人不等。这些使者“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因而使者队伍实际上也是商队。当时,受匈奴控制的楼兰、姑师,常劫掠汉使,断绝交通。为此,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王恢率轻骑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姑师。不久,汉同乌孙“和亲”,借以箝制匈奴。为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和获得大宛所产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二次西征大宛,迫使大宛与汉军言和。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立都护府,治乌垒城,护南道和北道各国,并“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汉书·西域传》序)。至此,西域各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已完全确立,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之内。

东汉初期,匈奴势力又控制了西域各国,汉王朝无力西顾。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耿忠进击匈奴到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击破匈奴、匈奴主力被迫西迁,至永元六年焉耆等国归汉,西域五十八国方得全部内属东汉,西域南、北二道交通得以通畅。这一期,班超作为汉朝派往西域的特使,在西域奋斗三十年,为帮助西域各国解除匈奴的威胁,使西域重新与内地联为一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两汉王朝同西域各国之间虽有过战争,但更主要的则是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自南北通路打开之后,中原同西域乃至

更远地区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蒜、胡桃等作物以及西域的良马、橐驼等各种奇禽异兽和毛织品，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以至佛教和佛教艺术，也是经西域而传入内地的。同时，中原地区的冶铁、凿井等技术和大量金属工具与丝织品，也传入西域地区。总之汉与西域各国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大大地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第五章 秦汉时期 的思想文化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学术思想

一、秦代法家思想 与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结合

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巩固国家的统一，继续推行秦国自商鞅以来行之有效的法家学说。在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同时，兼采邹衍阴阳家学派的“五德终始”学说，以维护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体的统治。

李斯，就是当时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约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 280 年），卒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 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布衣出身，曾任郡小吏，后为荀子学生。李斯继承了商鞅的思想传统，入秦后推行法治，得到秦王嬴政的

重用，由长史升至廷尉、丞相。

秦始皇、李斯推行和贯彻法家的政治学说，竭力主张建立以“法、术、势”为其内容的君主专制和以郡县制为其基础的中央集权制。

首先，采取了加强皇权和尊君的措施。秦始皇把统一全国的功劳，完全归为己有，并要建立万世帝业。为了表示自己至高无上的威权，他在统一全国后就去掉“王”的称号，改称为“皇帝”，并规定：皇帝的命称之为“制”、令称之为“诏”、印称之为“玺”，皇帝自称曰“朕”。又以臣下不能议论皇帝为由，废除过去实行的谥号，自称为“始皇帝”。正如史书记载：“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了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心理。事无大小，都取决于皇帝，确定了他在全国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他独揽全国大权。从此，“皇帝”就成为历史封建国家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个象征。

秦始皇为了长久地统治人民，不但要求在法律上的固定形式，而且要求思想学术上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形式。他为新建的王朝制造理论根据，使皇帝的威权神化，除运用法家学说外，还采用了战国末年齐国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学派的“五德终始”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用五行相胜来解释朝代更替，但不能说明其相胜的动因何在，故而最后归之于天意，认为每一种“德”将要兴起的时候，天必然会把这种德的祥瑞显现出来。邹衍这种神秘的学说，早在吕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应同》篇中就有记述，那时并未得到秦始皇的注意。秦始皇称帝时，齐国有人把这种学说向朝廷上奏，并说从前秦文公出猎

时获得一条黑龙,可见水德的符瑞在 500 年前就显示了。“秦以周为火德,能灭火者,水也”(《史记正义》),所以,秦始皇采用了“五德终始”说,并施行了“水德”的一套制度法令:

其一、冬季属水德,故规定以十月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

其二、水德尚黑,以黑为正色,衣服、节旗、旄旌皆改用黑色。

其三、水德与“五数”中的“六”相应合,故以六为标准数,各种器物都用六来记数。

其四、按阴阳家所说“水主阴,阴刑杀”相应合,“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史记索隐》)。因此,秦王朝重严刑峻法,不讲“仁恩和义”(《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进一步把法家思想与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结合起来,为君主独裁专制政体服务。

秦始皇兼采“五德终始”说这套神秘的宗教迷信,企图假借一种超社会与超自然的力量,使皇帝的威权神化,同时表明 he 自己是应水德的祥瑞而兴起的,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而他所有的政治措施也都是出于天意的。这样,对于人民也就更具欺骗性,使人民服服贴贴地接受其统治。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五德终始”说不仅被秦始皇所采用,也被此后的历代皇帝所采用。

其次,为除分封制,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政体。正如李斯所概括的那样:“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禁止“私学”,加强思想专制。

秦始皇、李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就必然

要加强思想专制；因而他们采取排斥儒、道各家，禁止各家“私学”的存在，强制人们“以吏为师”，独尊法家，甚至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的残暴事件。

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秦王朝在思想领域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是秦始皇专制政治的表现。它暴露了封建专制主义一开始就具有残暴和愚昧的一面。秦始皇企图通过禁绝百家、以吏为师，以至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残暴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手段，以达到一统思想、巩固秦王朝专制统治的目的。其结果却恰恰相反，除了造成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摧残，压制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学术高潮、严重阻碍了文化发展以外，并没有起到统一思想以巩固统治的目的，反而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破裂，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以至把秦王朝推向了迅速灭亡的道路。这足以说明，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是不可能用专制强暴手段来解决的。

秦始皇、李斯焚书的作法，实际是商鞅、韩非的“燔诗书而明法令”，“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法家理论的具体实施。这是秦王朝对人民加强思想统治的专制手段之后，其目的在于愚民，使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被禁锢在政府的法令条文之中、行动被限制在为地主阶级法律条文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允许有任何违反的思想和行动存在。

同时，秦王朝在加强思想的专制统治方面，还很注意对人民进行封建礼教的灌输。秦始皇在前后 11 年的 5 次出巡中，每到名山胜地，往往刻石立碑，除用以歌功颂德、宣扬武威和法治，还提倡封建礼教。在泰山的刻石中，强调教化的作用，宣

传“贵贱分明、男女礼顺”，“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封建礼教。在会稽刻石上规定说，寡妇有子而再嫁，是背叛已死的丈夫，不守正道；妻子弃夫改嫁，儿子不得认其母云云。从历史上来考察，如此讲求妇女的节操，由皇帝刻石颁布，这还是首见。这说明，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和封建主义思想统治的加强，对妇女的封建束缚和压迫也随之加重了。

第四，秦王朝在实施法家政治学说时，还表现为对人民的严刑峻法。赤裸裸地、毫无掩饰地炫耀自己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正是法家思想的一个特点。秦始皇、李斯根据韩非的法家理论，认为惟有采取“以刑去刑”的手段，即对轻罪使用重刑的办法，才能使人们不敢轻易犯法。在出土的《秦律》竹简中，仅律令就有 20 余种，刑法繁多而且残酷无比。但是，秦的严刑峻法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秦末，人民动辄触法陷刑，以致“赭衣塞路，圜墙成市”，兼之皇帝和各级官吏的穷奢极欲，对人民横征暴敛和繁重的徭役，迫使人民铤而走险，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随之，也结束了“法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宣告了秦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破产。

然而，秦王朝毕竟在当时适应了历史和时代的需要，为大一统的封建体制奠定了基础；他的迅速覆亡，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在利用何种思想学说以利于长治久安的问题上，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二、汉初黄老思想

秦代统治者选择的统治思想和采取禁止“私学”、“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造成的失败教训,引起了汉初统治者的警惕。他们以秦为鉴,在文化学术思想上来取了开放的方针。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2),废除了秦王朝的《挟书律》,并多次派人“求亡书于天下”。于是,过去被列为焚书对象的先秦诸家“私学”的书籍,又逐渐出现。朝廷还礼聘秦博士和邹鲁儒生,传授儒家经典和制度朝仪。先秦诸子之学有所复苏和流传,并涌现出各自的代表人物。儒家如原为秦博士伏生、叔孙通;道家如盖公、曹参;法家,如晁错、桑弘羊;纵横家如酈食其、蒯通;阴阳家如张苍,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思想家,如陆贾、贾谊、司马谈等,继承战国末期综合诸子思想的学风,进一步对道、法、儒、阴阳等诸家思想进行综合和总结。但由于当时社会的需要和统治者的竭力提倡,黄老之学成了汉初的指导思想,给当时学术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因此,汉初学术思想界,一方面表现为诸子思想的活跃、综合和总结的趋势;另方面又多半是以黄老思想为主干。陆贾、司马谈等的思想中,就呈现出以黄老思想为主干,兼采儒家等诸子思想的特征。就连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贾谊,也不免受其影响而兼尚黄老,在他的《新书·道书》篇中,也大谈“道”为政教之本,主张统治者采取“清虚而静”的黄老“无为”思想。尽管如此,当时仍然存在着学派之争,其中尤以道、儒之争为烈。正如司马迁所说:“世之学老子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这种论争,直到武帝初年还在继续。

秦王朝的暴政，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秦灭后又是连续4年的楚汉之争，长期的战乱造成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汉初统治者的首要任何就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以恢复和发展经济。同时，由于汉高祖刘邦错误地总结了亡秦的教训，大封同姓诸侯王，造成地方诸侯王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也需要用灵活的策略来逐步解决，以巩固封建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根据这客观形势，不能继续推行“严刑峻法”的统治，于是，战国中期以来主张“清静无为”的稷下黄老之学就应运而生，成为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

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命运，都要以它满足一定社会需要的程度如何而定。由于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的思想理论，符合汉初急需恢复经济的客观要求；加之它注重权术，在治理人民方面比一味迷信暴力的法家，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较多的蒙蔽性，因此得到当初统治者的提倡和采用。从汉高祖起，到武帝初年起用儒生为止的四朝（高、惠、文、景）60余年间，统治者大都信奉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

汉初黄老“无为”思想的主要代表有陆贾、盖公、司马谈等人。

陆贾，约生于秦王政七年（公元前240年），约卒于汉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原为楚国人，后为刘邦谋士，协助助刘邦统一全国。他奉刘邦之命总结秦亡汉兴经验教训，写成《新语》一书，很得刘邦赞赏。陆贾经常向刘邦讲述儒家《诗》、《书》经典，主张治天下要“文武兼用”，才是“长久之术”。他认为秦王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就是一味迷信武力的法家思想造成的后果：“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因而

他主张以黄老“无为”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他说：“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则天下大治。……故无为也，乃有为者也。”（同上）可见陆贾的“无为”思想，意在要求汉初统治者少生事、少扰民，避免像秦王朝那样“举措太众、刑罚太极”而引起人民的反抗，就能使人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从而达到稳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而这样的“无为”，目的还在于“有为”。

陆贾这一“无为”而实际“有为”的黄老思想，是对稷下黄老之学的继承和发展，它是建立在稷下黄老之学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万物和人类都是“天地相承，气感相应”（《新语·道基》）而生成的。并且强调天道和人道是有区别的，社会的治乱兴衰是由统治者政治措施造成的，与“天”无关。所以他说：“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以也，乃国君者有所取之也。”（《新语·明诚》）

陆贾的黄老“无为”思想与盖公在齐地时对曹参治政的指教基本相似。汉初名相曹参，曾为齐王的相。那时天下初定，百姓流亡，他向“善治黄老之言”的盖公请教“安集百姓”之术。盖公向曹参提出“贵清静而民自定”（《史记·曹相国世家》）的建议，行之九年，齐国大治，世称贤相。据司马迁《史记·乐毅列传》记载：盖公就是齐地学有师承的黄老学者，盖公受教于乐臣公。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而乐臣公“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经河上丈人传下来，历经安期生、毛翥公、乐瑕公而至乐臣公，又传盖公。“盖公教于

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萧何死后，曹参升任相国，继续推行“清静无为”的思想方针，时人赞颂他“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司马迁赞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的继任者陈平也是提倡黄老之学，文、景二帝也都遵循黄老思想，参与文、景两朝朝政的窦太后，更是“黄老之术”的尊崇者，于是，战国稷下道家的黄老之学发展成为汉初学术思想的主流。而且，汉初的学术趋势，是在继承战国末期综合诸子思想学说的趋势下向前发展的，因而汉初道家黄老之学也自然带有综合诸子思想的色彩。所以到了汉武帝初年，当时最为博学的思想家司马谈就从理论上总结了汉初道家黄老之学的思想特征。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是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这说明原来托名于黄帝、渊源于《老子》的战国稷下道家的黄老之学，发展到汉初的道家黄老后学，它们呈现出综合诸子之学的学术趋向。例如它兼采阴阳家的“序四时之大顺”，儒家的“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法家的“正君臣上下之分”，墨家的“强本节用”，名家的“正名实”等，其中有的是《老子》所反对的，如尊卑贵贱的名分，还有的是《老子》所没有的。而汉初的道家黄老后学吸取了各家之学，并顺应时代的变迁和客观事物发展的需要而有了新的变化。因此，它能在社会实际中得到运用，并取得“事少而功多”的显著效果。司马谈指出，“道家无为，又

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群臣并至，使各自明”，“立俗施事，无不相宜”等，既是对汉初黄老思想的赞颂，又是他希望恢复汉初“无为无不为”局面的思想反映，而他所崇尚的黄老之学，就是在战国稷下道家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兼采各家之长的汉初道家黄老后学。

司马谈在思想上还强调“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同上），提倡去除主观成见，虚心体察客观事物，并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故而他说：“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事之情”（同上）。同时，他还要求人们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任其自然，“有法无法，因法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同上），做到虽有法度，但不拘泥于法度，应依据“时”“物”的变化而确立法度。在他看来，君主的统治也应如此，“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同上）。

此外，司马谈还发扬名实的“正名实”的思想，强调名家相副，不听信不符实的空话。他认为这样，就可“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是非好坏自然明白，就能如实按客观规律办事，“乃合大道”，从而可以不露声色地成就大业。

最后，司马谈还从形神关系出发，在承袭先秦道家的贵生、养神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生死观和形神观。他说：“凡人之所以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正由于他基于“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和“形神离则死”的观点，因此他十分强调要“先定其神”，才能去“法天下”。

由于司马谈的概述，使人们了解汉初黄老后学的某些思

想要点；而概述又过于简扼，对其思想理论却又难以弄清。公元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经法》等四篇古佚书，则为进一步阐明汉初黄老后学的思想理论提供了重要资料。

三、儒道争雄与 经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儒道争雄

鉴于秦王朝短祚的严重教训，汉初在对待学术文化方面的方针，与秦王朝实施文化专制政策相反，推行了兼容诸家思想学派和学术相对自由的政策。这种文化政策，与当时政治上务求安定的方针，是相一致的。汉文帝尊奉黄老之学，但是对其它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往往破格重用。比如原秦朝的柱下御史、“无所不通而尤邃律历”（《汉书·张苍传》）的学者张苍，就是在文帝时官至丞相的。还有洛阳青年贾谊，“颇通诸家之书”（《汉书·贾谊传》），20余岁即超迁为太中大夫。文帝对信奉阴阳学说的公孙臣，优容礼遇，召为博士，并支持他根据“五德”说进行改制。他对儒家经典的搜求、整理和研究，也表现了足够的重视。在这种学术空气下，一些思想学派先后继起，而且表现相当活跃。当时的黄老思想，乃是汉家的统治思想，其风靡一时自不必说。其它如阴阳家、儒家学派，也颇受朝野尊重。

阴阳家所创立的“五德终始”说，自从受到秦始皇的青睐，

直到文景时仍然盛行不衰，突出地表现在汉初的改制之争。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自认为汉为“水德”，无异将秦挤出“五德”系统，引起了一场改制的争论。汉文帝即位那年，又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此人就是贾谊。他认为汉承秦后，应该属于“土德”，并起草一份改制的方案。这就是改正朔，色尚黄，数用五，定名，兴礼乐，革除秦的水德的制度。当时文帝刚刚即位，一切举动小心谨慎，觉得改制是一件大事，不敢轻举妄动。不久，贾谊受到排挤，改制的事也就搁了下来。

文帝十四年（前166年），鲁人公孙臣上书文帝，认为汉为土德，预言黄龙将作为土德的符瑞出现，再次提出改制的主张。汉文帝将它交给丞相张苍去办。张苍精通天文历法，主张汉为“水德”，对公孙臣的议论持反对的意见，结果把事情闹翻了。

张苍与公孙臣的意见相左，汉文帝不好裁决，只好把它搁在一边。第二年春天，陇西成纪（今甘肃通渭东）出现黄龙，果然应了公孙臣的预言。于是，汉文帝任命公孙臣为博士，与诸生草拟土德之制。从此，张苍推说年老多病，什么事都不再过问了。

与符瑞有关的，还有赵人新垣平鼓吹所谓“神气”，把汉文帝搞得团团转。新垣平对文帝说，长安东北有“神气”，是上天降下的好征兆，应该修建一座祠庙，用来祭祀上帝，才合符瑞。文帝深信不疑，在渭阳（今陕西渭水北岸）建成五帝庙，还亲自去祭祀。后来，又封新垣平为上大夫，赐给他大量的财物。

新垣平鼓吹“神气”，居然能升官发财，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先叫人到阙下上书献玉杯，然后对汉文帝说：阙下有

宝玉气飘来。汉文帝叫人一看，果然有人来献玉杯，上刻“人主延寿”四字。新垣平多次捉弄汉文帝，有人上书告发，说他搞的都是欺君的骗局。最后，新垣平下狱治罪，被夷灭三族。此后，汉文帝就懒得再提起改制和鬼神之事了。

“五德”说是阴阳家利用五行相克的原理，附会人事和政治制度的学说，在秦汉之际颇得封建统治者的信赖。汉初长达数十年的改制之争，反映阴阳家思想影响之深远，甚至在汉代人的思想中，以及汉初一些学派的思想，都无例外地打上了阴阳五行的烙印。

比阴阳家影响更大的、在学术上更活跃的，要数儒家学派了。汉初儒家学派再度崛起，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对儒生溺冠辱骂，这个学派遭到各种贬绌。西汉建立之后，汉家新贵多数为武人出身，又奉黄老道家为主教，对儒学并不提倡。但是，儒家学派至少不像秦时无容身之地，加以它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要学派，有着深厚的思想影响的基础。当时即使在刀光剑影的战争年代里，民间对儒学的研习却一直没有间断。当年刘邦击败项羽，引兵北上围鲁的时候，鲁中诸儒“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史记·儒林列传》）。儒家在政治上并不得势，而崇奉儒学、研习儒学的人却不在少数。如叔孙通为汉家制订礼仪，追随他的弟子竟有 100 余人，而且还能随时召来一大批儒生。由于儒学有着这样深厚的基础，一旦时机成熟，这个自古以来的学派就要腾跃了。

这个时机在文景期间终于到来了。汉初那股针砭秦政之败的潮流，直至文景时期犹方兴未艾。为了汉家长治久安，当

时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无不以秦王朝为例,提出有关“治乱”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指责秦废“礼义”,酷法严刑,不施“仁义”。这股社会思潮一经兴起,儒家思想就得到了广泛宣传,有人甚至主张兼用儒学治国,儒家学派的地位日益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经典的传授,也更加普遍。尤其在惠帝废除“挟书律”,取消私家藏书的禁令以后,一时搜求先秦古籍成风,许多儒家经典相继被发现,这就为儒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如济南人伏生,原来是秦朝的博士,专门研究《尚书》。秦始皇焚书时,他将《尚书》藏在夹墙之中,后来长期兵荒马乱,他也顾不上这部儒家典籍了。直到西汉建立之后,伏生才找到这部书。可惜已经遗失很多,只剩下 29 篇,但是《尚书》终究没有绝种。从此伏生在齐、鲁教习《尚书》,培养许多弟子。到文景年间,伏生的弟子遍及各地,以至山东的学者,多能教授《尚书》。伏生传播《尚书》数十年,成为名噪一时的专门家。

又如河间王刘德,修古好学,四方求书,所得皆先秦旧书。他在封国内大兴儒学,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当时有的诸侯王,甚至将儒学作为家学,世代相传。刘邦异母少弟刘交,少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刘交立为楚王。即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史称“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汉书·楚元王传》),连他的孙辈刘戊,也受《诗》于申公。

在文景承平之世,儒家影响日益扩大,对于儒学的研究,也愈加为当时人所重视。文帝曾经命诸生根据《六经》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说明《六经》包括许多统治经验,对它的研究还得提倡。于是,汉文帝开始立经学博士,召集一些人研

究儒家的经典。

汉文帝重视对儒家经典《尚书》的整理研究。他得知那位90多岁的儒者伏生，在齐鲁传授《尚书》颇负盛名，但是却因年老不能到长安来，便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他家里学习《尚书》。伏生的两名子弟欧阳生和张生，文景时都被任命为《尚书》博士。

汉文帝立了《书》博士，还要立《诗》博士。当时精通《诗》的，鲁有申公，燕有韩婴，汉文帝任命他们为《诗》博士。景帝时，还有齐人轅固生，也以治《诗》为博士。这三人讲的《诗》各不相同。仅《诗》一经，文景时即可分为三派。

汉文帝立了《诗》、《书》两经博士，儒家影响越来越大。到景帝时，董仲舒治《春秋》，被任命为博士。还有齐人胡毋生，也是《春秋》博士。这样，在文景时期，儒学共立了《诗》、《书》、《春秋》三经博士。

汉代的博士可以招收弟子受业，申公的弟子就有百余人，董仲舒的再传弟子，恐怕还要多。这些博士转相传授弟子，儒家的影响不断扩大。尽管当时儒家在政治上还不得势，但是在学术上的势力越来越大，并与道家成为文景年间主要的两大学派。

随着儒家的影响及其势力的日益增大，到景帝时期，它在学术上已经足以跟道家学派相抗衡了。当时出现的儒道互黜，以至争夺“霸主”地位的趋势，就是这方面的具体体现。有一次，儒学博士轅固生与好黄老术的黄生，就“汤武受命”的问题，在景帝面前进行过一场辩论。轅固生锋芒毕露，把黄生驳得无言以对，明显站在黄生一边的汉景帝，只好出来解围方

罢。

还有一次，窦太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辕固生瞧不起黄老术，竟直言不讳地批评《老子》，将它斥为“此是家人言耳”（《史记·儒林列传》），简直不把它当成一家学说看待。窦太后一怒之下，逼他入圈刺野猪，差一点丧了命。幸好汉景帝给了他一把快刀，辕固生一刀刺中猪心，野猪随手倒地，才免遭危险。

儒道互黜的现象，表明儒学在汉初的影响正日益扩大，道家思想愈益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终于拉开了儒道争霸的序幕。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下，融合了其它学派的思想，大有将儒学提高到正统的地位，以取代当时指导政治的黄老思想的势头。儒学向着正统道路不断发展，这自然是文景年间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必然的结果。然而，文景时期对不同思想学派的兼容，却直接卵翼和造就一代新的儒学的成长，从而为汉家建立空前的大帝国准备了思想理论。

景帝后元三年（前 141 年），被称为“遵业”皇帝的汉景帝死后，儒学作为汉家新的统治思想，终于登上政治舞台。

经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经学，是指研究和注解儒家经典的学术。自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以来，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诏天下郡国立学官，从而儒家经学取代了先秦诸子之学和汉初黄老后学，成为居于独尊地位的文化学术形式和封建正统思想。

汉初,经过 60 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国力已相当强大,这就为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所作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汉武帝北击匈奴、内削王权、镇压由于封建赋税繁重和土地兼并而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巩固大一统的集权统治。他在位的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当时的中国屹立于世界文明国家的前列。于是适应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黄老“无为”思想,已经不符合新形势的需要,统治者迫切感到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来为维护新的统治服务。

汉初以来的学术思想,原是继承战国末期诸家综合趋势向前发展的,随着汉王朝封建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出现,各个学派就都为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封建专制政权出谋献策,并都在吸收和综合各家的观点,改变着自己的面貌。以经学大师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就是在这一新形势下形成的。因此,这一儒学思想体系,已经不是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一番改造、以适应汉王朝统治需要的儒家学说。它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主,兼采各家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封建统治的思想,构建成一个庞大的、较为严密的儒学思想体系。其具体内容就是根据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法家的集权思想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说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为汉王朝的“大一统”封建集权统治构建了思想理论体系。

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 179 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广川(今河北枣阳)人,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今文经学的创始人。他著有《春

秋繁露》等书。他少时攻读公羊春秋，勤于学，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受赏识被任命为江都易王相，后入任太中大夫，复出任胶西王相。晚年托病归家著书讲学，因经学声望高而常为朝廷征询政事。董仲舒既是武帝时代新的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也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理论家。《汉书》称他为“群儒首”（《董仲舒传》）、“为儒者宗”（《五行志》）。

适应汉王朝一统天下的政治需要，董仲舒向汉武帝推荐《春秋》“大一统”的理论。他在向武帝所上的《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汉书·董仲舒传》），把封建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必须遵循的法则。他以“大一统”思想来解释《春秋》，说孔子作《春秋》，就是主张“大一统”的，例如《春秋》开卷首句“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就解释说：“何言王正月，大一统也”。实际上“王正月”的原意是因当时各国历法统一，故说明是按周历、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来统一历法。董仲舒则采用这句话来作为政治统一的依据，并说“一”是“天之常道”，“常一而不灭”（《春秋繁露·天道无二》）。为了维护“大一统”，又进而神化“大一统的政治代表君主，宣称君主的权力是“天”神一样，主宰生杀予夺的大权：“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深察名号》），并把君主说成是秦汉统一中国、建立封建专制集权的思想反映，也是董仲舒在制造舆论，神化“大一统”，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和皇权的垄断地位。正如董仲舒自己所说：“君人者，国之本也”，“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立元神》），“君之所以为君，威也。……威不可分”（《保位权》）。此外，董仲舒还提出，“一统天下”的口号（《立元神》），强调“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并指出

《春秋公羊传》所说的地方诸侯不得“专制”、“专地”等等，这就为汉武帝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董仲舒把《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认为有了统一的思想，才能“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因此，他向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同上），企图通过政权的强制力量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新的儒学来统一地主阶级的意志和步调，强化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他不允许“师异道、人异伦，百家殊方，指决不同”（同上）。他认为如果这样，将会造成“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同上）的严重局面，中央集权的政治上的统一，都需要相应的思想上的统一作保证。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顺应当时历史的需要而起到了它的作用。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禁绝各家的著作和思想，只是在选拔人才和作为统治思想方面，不取“百家”，而以儒学独尊。因此，在汉代，对黄老、兵、刑、农、医和阴阳等家之学的研究还是允许的。所以，当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秘书时，“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并不存在废弃“百家”的现象。但既然尊儒，以儒家思想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必然具有抑制其他学术思想发展的消极作用。即使如此，“儒以六艺教民”，承担着保存和传播封建文化的主要任务，因此在当时提出尊儒，既是发展文化教育和提高知识分子社会政治地位和作用的表现，也是自秦至汉初以来，汉代统治阶级政策的一大转变。与秦代的法家统治，以吏为师、无书简

之文,甚至焚书坑儒,以及汉初黄老讲究“清虚而静”、不注意文化建设相比,这种尊儒政策,在当时,显然有利于促进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

西汉中期的“大一统”理论主张和政策措施,对于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所建立的封建政权来说,无疑是必要的;何况当时地方割据势力还存在,分裂割据活动还严重地阻碍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切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促进全国大一统的理论政策,对于发展经济文化以及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都起着积极进步的历史作用。

与“大一统”理论相关的,是先秦儒家的道德“人格”观念这时已逐渐演化成明确的“国格”观念。董仲舒提倡“无辱宗庙、无羞社稷”的“国格”观念,强调“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竹林第三》)。司马迁则把“国”放在首位,称赞蔺相如、廉颇“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蔺相如廉颇列传》)的观念。苏武出使匈奴,也正是这种“国格”观念,使他居匈奴十九年受尽磨难而不屈不挠,始终坚持民族气节。这种“国格”观念,显然要比“夷夏之辨”的狭隘民族观念进步,是我国古代的爱国主义思想。尽管它还夹杂着封建思想,但它却在各个历史时期,鼓舞着无数志士仁人,为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独立而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它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而为后人所继承和发扬。

西汉中期的儒学,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论,又吸取了阴阳家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构建成一套“天人感应”说,来为封建统治者的神道设教制造理论根据。

董仲舒把“天”说成是有意志、有绝对权威的至上神。“天

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对策二》）至上神的“天”，不仅主宰天上诸神，也支配人间的帝王，而且还是宇宙万物的创世主，是上天和人世的最高主宰。因此，就连君王的权位也是“受命于天”，而“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违，则民有逆命。故曰：“人一有庆，万民赖之”（《为人者天》）。这样，“天子（君）秉受天命，代表和体现“天”（神）的意志和权力，主宰人世、统治百姓，这就形成了后来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天——天子——民”的统属格局。从来“天”的神权，无非是地上王（君）权的投影。随着秦汉王朝“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确立，王权得到了加强，神权也随之加强。董仲舒伸张神权，正是武帝时期王权加强的思想反映，同时也是他企图借“天”的权威来达到进一步加强王权的目的，用以说明君权（王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还认为人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意志创造出来的，即“人副天数”。他说：“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生有喜怒哀乐答（按：即反应），春秋冬夏之类也。……天之副在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为人者天》）从人的形体、气质到内在的道德……无一不是“天”的复制品。既然“天人相副”、“天人同类”，天和有人有相同的气质和情感，他们之间就可以相互感应，这就是他“天人感应”神学理论的基点，这无疑是十分荒谬的理论。如果说其中还有某些合理的思想成分，那只能说是董仲舒看到了人和自然之间还存在着某些有机联系的现象。即使如此，那也是被他加以神学的比附、甚至利用当时人和自然科学的成果来加以歪曲，为其神化目的论服务。由于当时天文学、物理学

和医学的发展,发现了自然界、特别是同类物之间相互感应的现象,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同类相同》),天气变化对人体的某些影响,“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阳应而起也”(同上),董仲舒就利用这些自然现象间的相互感应,以论证他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

“天人感应”说的神学特点,是“天”具有自由意志并通过人世的赏罚以表现其意志。而且“天”的意志还可以通过天子的金口玉言传达到人世,听“天子”——君主的圣旨,就是服从“天意”。“天”可以通过祥瑞或灾异,表示对君主为政得失的意见。当君主受“天命”或有“功德”时,就会出现麒麟、凤凰、灵芝、甘露以表示喜庆和褒奖,这就是“祥瑞”;反之,如果君主政事不修或者国家衰亡之时,就会出现山崩、地裂、灾荒和日、月蚀等灾异现象,以示“谴告”。灾异谴告,是出于“天”对君主的爱护,是“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必知且仁》)。也就是说,君主要按“天”的意志(天道)行事,否则就是遭到“天”的惩罚。而“天意”(天道)的主旨是:“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对策》),是崇阳贱阴、任德不任刑。所以,董仲舒强调君主要顺天而行仁政,不可逆天而行暴政。所谓“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同上)这就将儒家的仁政学说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说的神秘主义相结合,为儒家的仁政学说提供了神学的依据。

董仲舒虽然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论,但已不受“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命定论的束缚。一方面强调要按“天意”办事,

否则即会招来灾祸；另方面又充满自信，认为只要君主推行仁政，就可得到“天”的保佑。因此，他在《天人对策》中也同时强调“人主之大，天地之参也”，“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这是地主阶级在他上升时期对自己力量和命运充满信心的一种精神状态的表现。所以，在他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中，既承认“天”的主宰作用，同时也多少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

“天人感应”说的主要用意，还在于董仲舒所说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屈民而伸君”，正是君主推行独裁专制的必然表现；“屈民而伸天”，则是借“天”的权威来限制君主过于独裁专制，避免因不能听取臣下的规劝以实施“仁政”而最后导致王朝的覆灭。这既是董仲舒对以往王朝覆灭命运的忧惧，所谓“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对策》），同时也是作为理论家的思想敏感。董仲舒已敏锐地察觉到：随着汉武帝对“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的巩固，封建赋税和兼并农民土地现象也随之加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为了防患于未然，不得不抬出“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以示告诫，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无不效仿这种神道设教的办法，假借“天”威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某些臣子也效法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说，用以警戒和约束君权的滥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也为西汉末至东汉的“谶纬”迷信，提供了理论根据。

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体系

在西汉中期的儒学思想体系中,还贯穿着“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形而上学观点。从阴阳家的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说出发,把自然和人类社会都固定在阴阳五行为结构的模式中,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被誉为“天次之序”,并成为永恒支配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结构。

董仲舒还把战国后期出现的、具有对立统一含义的“合”的观念绝对化,认为自然现象中的“合”表现为有主次、有规律的阴阳变化,始终是阳主阴辅。在社会上,“合”则表现为君臣、父子、夫妇等的贵贱尊卑关系的不可逾越。这是封建宗法等级秩序的反映。因此,董仲舒所说的“道”正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秩序的封建伦理纲常和政治上的封建统治原则。

董仲舒这种强调五行的“天次之序”的不可更变。强调“合”的稳定性,强调维护汉武帝所建立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以及论证封建尊卑贵贱的天经地义,即成了时代提出的课题。同时,在董仲舒看来,随着封建所有制的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建立,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秩序已经凝固化了,不容许再有什么变动。他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正是武帝时期封建统治巩固和稳定的思想反映,又用之来论证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后来,它一直成为历代封建统治尊奉的理论信条。

董仲舒的历史观,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循环论的历史观。他继承了战国末年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提出了“三统三正”说。“三统”说,就是每个新王朝改服制,循环采用黑、白、赤

三种颜色。“三正”说,是每个新王朝开始,都轮流采用夏历寅、丑、子三个月中的一个为一年的开始。如夏朝是黑统,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朝是白统,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朝是赤统,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到了汉朝,又回到黑统,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如此循环不已。而所谓“改正朔”只是表明一个新的君主,重新受天命统治人民,只是封建统治的形式改变,而绝不是改变它的实质。所以,董仲舒说:“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汉书·董仲舒传》),即具体形式可以改变,如“改正朔”、“易服色”之类,但作为封建统治原则的“道”,则是不能改变的。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也只是为了补救旧的统治者对于“道”的过失,重新恢复“道”的权威。这一理论的目的,在于论证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

人性论上,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儒家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孟、荀的观点。

董仲舒虽不同意荀子的性恶论,但却吸取了荀子关于人性需经后天人为(“伪”)的教育,人性才会具有善的性质的观点。故而他进而指出:“性待教而为善”,犹如禾需要经过人力加工而成为米,是因为“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深察名号》)。董仲舒虽不赞同孟子关于人性有天赋善端的性善论,但他却又提出“天生民性,有善质”(同上)的观点,认为人的自然之性中本来就具有可能成为善性的“善质”,如禾、茧、卵之提供了为米、丝、雏的条件,但要由先天提供的“善质”变为现实的善性,还是要靠后天的教育。这个观点,是对孟子性善论的改造,以用宣扬王道教化的作用。他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王承天意以

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同上)在此,指出人之善性是靠后天的教养,是有合理之处的,但又把成民之性说成是受天意的安排和圣人、王道的教化,这和荀子强调后天人为(“伪”)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这既说明了董仲舒的人性论,也反映他的天命论的神学思想实质。

董仲舒又把人性分为三等,提出了“性三品”说,认为“有斗筭之性、中民之性、圣人之性”。他进而解释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实性》)。因为“圣人之性”是先验至善的,是受“天意”以教民成善为己任的,故无须后天的教化。“斗筭之性”是天生为恶,即使经过教育也不可能转化为善的。这二者是极少数,其中只有“中民之性”是大量的,他们天生有“善质”,但尚未成善,还有赖于圣人、王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伦理规范方面,先秦时期的儒家已经提出了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五伦”。法家韩非也从政治统治着眼,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看作是“天下之常道”(《韩非子·忠孝》)。董仲舒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番充实和调整,并以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说的“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作了充分的论证,从而建立了一个完备的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体系——三纲五常学说。

董仲舒的道德伦理学说,是以“天”为出发点的,因为“天”的观念,在董仲舒的神学思想体系中占着主导地位。他赋予“天”为主宰一切的至上神的性质,认为“人副天数”,人只是“天”的副本。人的一切,包括形体、情感乃至伦理道德,都是“天”所赋予、或是“天”意的体现。由此,他又进而以天道之阴

阳、推出人世间的等级尊卑关系。他说：“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天辨在人》）落实到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董仲舒根据这种“阳尊阴卑”的神学，明确是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并把它归之于“天意”，即“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

此外，董仲舒还把先秦时期已经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五个道德范畴，概括为伦理学上的“五常”，而且把“五常”配入“天道”的“五行”模式中。他以仁配木，以礼配火，以信配土，以义配金，以智配水，宣扬遵循“五常”，就能“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对策》）。“五常”是维护和调整“三纲”的基本原则。

在董仲舒的纲常伦理学说中，还明显地贯穿重孝道的思想。“夫孝者，天之经也”（《五行对》），“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同上）董仲舒以五行相生说来论证孝道之天经地义，认为子之孝父就是取法于土（地）之事天、土老祖宗奉火。之所以如此强调孝道的重要，是因为汉代的封建统治建筑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故而巩固与强化家族的宗法伦常关系，是“三纲”的根本环节。正如董仲舒所说：“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为人者天》）可见，提倡孝道，在于“安百姓”，巩固小农家庭这一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而且，在封建社会，“孝”和“忠”是紧密相连的。君主统

治的“国”，只是“家”的扩大，皇权只是家长所有权的扩大。因此，在董仲舒提倡的“土德”中，贯穿了“忠”“孝”二义：“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义》），“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五行对》）。这说明汉代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以及《孝经》自汉初以来得到广泛的流传，都有它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学说，从理论上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提供了思想武器，从而强化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统治。这一思想武器，为封建统治者沿用了2000余年之久。

从秦到汉初，统治思想经历了由法家思想到黄老思想的70余年的历程，给后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为西汉大思想家董仲舒进行意识形态的变革提供了有益的探索。秦皇、汉武开创并奠定了中国2000余年封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格局，又为董仲舒吸取地区文化传统和各家思想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董仲舒作为汉武时代新的儒家学派的创建者，西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大理论家，他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为主的邹鲁文化思想，同时也吸取了燕齐方士的阴阳家思想，和以刑（形）名家思想为主的三晋文化思想。他在改造先秦儒学和融合各家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儒家为主体的一个庞大的儒学新体系。西汉中期确立的这一儒学思想体系，它的面貌与孔子创建的早期儒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一个学派的思想而发展演变为全国性的封建统治思想体系，而这一封建正统思想体系的确立，对于此后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起了奠基作用。

由于在西汉时期,封建社会正处于蓬勃兴盛的上升阶段,董仲舒创建的儒学思想体系,总体上说,基本符合时代的需要,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着某些促进的作用。但是,正是由于这一儒学思想体系的深刻、庞大,使它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遵循,所发展。而随着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和腐败,它的社会作用也日趋保守和反动。

四、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是世界文化伟人。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巨著——《史记》,对我国的史学乃至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除此之外,他在学术思想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

在自然观上,司马迁承继其父司马谈的黄老后学,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神秘化的阴阳五行学说采取讥评的态度。他还以其造诣甚深的自然科学知识(天文历法方面)为根据,认为阴阳、四时和二十节气等是不可更改的,还进一步肯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们必须遵循这一规律,不可违背,“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因此,他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学说,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批判。他指出,项羽的失败是他自己的过失,并非什么“天意”,批评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史记·项羽本纪》)

司马迁还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观察和以历史上大量的事实为根据,说明善人往往不得善报而遇灾受害者“不可胜数”,但恶人却有“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竟以寿终”的。从而揭露了所谓“天道有知”、“天之报施善人”的欺人之谈。

他还反对那种认为敬事神鬼和求仙可致长生不死的迷信。在《封禅书》中,讥讽了汉武帝为了求得长生不老而多次受方士的欺骗和愚弄;同时也对汉武帝的封禅、祭祠,“用事于鬼神”的靡费和荒诞,作了尖锐的揭露和鞭挞。

司马迁还试图从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即经济生活中,找寻社会意识问题的根据。如他把人们从事农、矿、工、商等经济活动的历史,看成如同“水之趋下”一样,是自然的发展过程,而且和自然现象的变化一样是有规律可寻的;并且认为社会生产的分工和发展,是被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所推动的,而不是什么政治力量和神的意志所能创造的。他说:“故待农而食之,虞(矿)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所验邪?”(《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认为社会上等级和奴役关系的产生,起源于彼此占有财富的悬殊,他揭示出富者剥削和奴役贫者,是人类社会的现象,而并非是“天命”的安排。

司马迁还继承了《管子》的道德观,认为财富的占有情况也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并进一步发挥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同上)司马迁抨击“天道”,肯

定“利”和“欲”，他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寻找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问题的根源，说明他意识到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与当时讲求以神意解释一切的儒家学派相对立。他肯定“利”，把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放到重要地位，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既反映了人民利益，且与当时儒学大师董仲舒所宣扬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仁义为名义来抹煞人民生存权利的观点针锋相对。

司马迁还具有较进步的道德观。司马迁将先世的人本思想充分地予以发扬，凡于当世、于历史、于人们、于国家有所贡献和作为的，尤其是不符合世俗的道德观念，就予以记述和歌颂，与当时的封建伦常道德观念，大相径庭。其进步的道德观，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对“以武犯禁”、“义不苟合当世”的“游侠”的描述和评价上。由于“儒、墨皆排摈不载”而使秦以前的“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司马迁“悲世俗不察其意……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笑之”，故而在《史记·游侠列传》中，集中地赞颂了他们违反封建道德、破坏封建秩序的英雄行为，同时也表露了自己独立不羁、与世俗相背的道德观。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和人民，各有其自己的道德标准：统治者的道德标准是符合其利益的是仁义，凡触犯其权益的即为不仁不义：“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司马迁提出了道德标准问题，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虚伪的道德学说，鄙薄了某些人“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的行为，同时歌颂了“游侠”。“游侠”中有许多是劳动人民，或者是同情和帮助劳动人民的，司马迁为他们未被载入史册而“恨之”、而“悲”之，而秉笔入史。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

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庄，不受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这些“布衣之徒”、“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如汉初的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则“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司马迁认为这些人都是“有德”者，其行为均属仁义。“何知仁义，已殄其利者为有德”。这是司马迁所肯定的真理。

对于“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歌颂货殖者，因为他们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功，也就是“有德”了。对于“取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的官吏，由于他们不是遵循君君臣臣，能冒死抗争“以达主义”，也是“有德”。起于陇亩、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叛逆口号的陈涉（胜）、吴广，则因“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站在受暴秦残酷迫害、揭竿而起的人民一边，将陈涉，吴广的“发难”，比作汤、武之举，从封建统治者之道德观看是叛逆，而司马迁则将其列入“世家”，体现了司马迁深厚强烈的人本思想和敢于同封建道德观相抗争的进步的道德观念。

司马迁还主张从不断变化的发展观点去考察国家成败兴亡的道理。他在《报任少卿书》中，阐明自己著述《史记》是为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要以“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进化观点来观察历史。因此，《史记》重视历史变化，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他肯定了吴起、商鞅变法的成就，肯定了秦统一

的历史作用，“世异变，成功大”。《史记》中的十《表》、八《书》，都是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他在《自序》中所方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就包括了要求考察历史现象发展过程的意思，也正是他“通古今之变”的方法论。司马迁这种注意历史变革的历史进化观点，必然与当时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相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否定了神秘的“五德终始”说解释历史的观念。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是光辉灿烂的一页，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遗产。

五、经学的神学化和今古文之争

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到了汉武帝以后，随着阶级矛盾和社会政治危机的加深，讲究阴阳灾异和符瑞之说的迷信色彩越来越浓，今文经学的《易》和《春秋》等儒家经典更成为附会灾异迷信的渊藪。董仲舒之后，号称博通群经的夏侯始昌、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刘向、匡衡、萧望之等人。都以擅长说阴阳灾异而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他们把所有的政治得失都归结为“天意”。

到了西汉末期的哀、平之世，在连年天灾和农民起义高涨的压力下，西汉王朝摇摇欲坠，封建统治者只有乞灵于神学迷信的宣传，企图假借“天命”和“神”的启示来欺骗和奴役人民。于是，一种把儒家经典和神学迷信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的谶纬神学，就大肆泛滥起来，取代了今文经学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支配地位。东汉初期，谶纬神学更为发展，成为一时的风尚。

“讖”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四库全书·易类六》）的神秘预言，是“神”对人间吉凶祸福的启示，其内容主要是政治性的。“讖”作为古老迷信，起源很早。《史记·赵世家》载：秦穆公一次病中，梦见上帝对他说：“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讖于是出矣”。这是一条有记载的讖语，估计“讖”的出现，比记载还要早。此后，如秦始皇时，方士徐市献《图录》，书曰：“亡秦者胡也”。陈胜起义时，“陈胜王”的鱼腹丹书，都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政治隐语，预示国家的兴亡和君主的祸福。

“纬”是对“经”而言的。根据纬书的说法，孔子作《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后又作《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相补充。其明显特点是将经学作神学的解释和比附，并把这种解释和比附托之于孔子。“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之后，更是“托诸孔子”，“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盖以妖妄之词，遂与讖合而为一。”（均见《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六》）可见，“纬”比“讖”晚出，它是在儒家六经被奉为神圣经典之后才出现的。至于“讖”“纬”相通以至完全合流、泛滥，那是西汉哀、平年间的事。

讖纬的著作有许多名称，因为有图有书，也称为“图书”、“图讖”、“图纬”。讖纬的主要内容是符命、预言，所以又叫“符命”、“讖记”，或称“经讖”。纬也采用讖书的占星术（望侯星气）而预测灾祥。故又称“纬候”。

纬书自隋以后大都散亡，留存至今的，仅有易纬《乾凿图》、《乾坤凿度》二种，其余只有残篇片断。

谶纬的泛滥，有它的思想原因。纬书继承了伏生《尚书大传》和董仲舒《春秋阴阳》以神学解释和比附经义的学风，是今文经学内的神学成分在元、成之世恶性发展的结果。但是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由元、成以后的哀、平之世的社会政治危机所促成。《汉书·孔光传》记：哀平之世，“阴阳错缪，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而百官群职旷废、奸轨放纵，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使统治阶层中的各派政治势力（如豪强、宗室、外戚等）为争夺政权展开了激烈而复杂的斗争。他们把各自的政治利益，加以经义的比附和神化为上帝与孔子的意志，于是谶纬神学即成了统治阶层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工具。他们利用政治危机，编造谶语加以渲染，蛊惑人心。如说：“日钋之后，必有亡国杀君、奔走乖离相诛，专政押主，灭兵车，天下昏乱，邦不宁。”（《春秋纬·潜潭巴》）“主势集于后族，群妃之党横潜为害，则月盈”（《春秋纬·运半枢》）。哀帝建平二年，夏贺良根据谶纬劝皇帝换年号，认为这样可以挽救当时社会政治危机。于是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改称号为圣对刘太平皇帝。王莽为了达到篡权和托古改制的目的，说谶文要他代汉。之后，王莽大量伪造“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摄皇帝当为真”等符命谶语，于居摄三年，改元为初始元年，正式代汉为帝。

刘秀、公孙述等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都利用农民起义高涨之机，假托“神”的启示，争先恐后地编造谶语符命作为自己承受“天命”的根据。光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刘秀以皇

帝名义宣布“图讖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于是讖纬蔚然成风,一度达到了神圣权威的顶峰。正如史书所说:“王莽矫用符命,乃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时宜时,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后汉书·方术列传》)可见,讖纬的泛滥是与社会政治危机紧密相关、互为因果的。

讖纬泛滥的结果,使经学进一步神学化、庸俗化,儒学演变为粗俗的神学形式,它虽有某些宗教的作用,但它并不具有宗教对彼岸世界(天国或西方极乐世界)的超现实信仰的内在性格和主要特征。它只是为某些政治集团服务的神学迷信。在讖纬神学中,虽然灾异和符命的思想占很大比重,但也有纲常伦理思想的宣传。纬书中就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纬·含文嘉》的观念,并强调“逆天地、绝人伦,则天汉灭”,如此宣扬人们履行封建伦常义务之重要,更说明了讖纬神学的世俗性,并不具有追求彼岸世界的宗教性质。

此外,纬书的内容相当复杂,包罗万象,涉及自然、社会和经常等各个方面。它以“天人感应”说为其理论基础,将经学,科学与神学迷信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在哲学思想方面,易纬进一步将孟喜、京房为代表的象派卦气说神秘化,尽管其内容是十分粗陋的神学唯心主义,但却含有丰富的思想资料,为后代易学所继承,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在它的神学呓语中,同时也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辉的科学思想。如“地动说”的提出:“地恒动而人不知,譬如人在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书纬·考灵曜》)

总之,对讖纬神学不能一概否定,要作具体分析。而它的出现,是今文经学发展合乎规律的现象,是西汉末年社会政治

危机的产物。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被确立为统治思想开始，经过宣帝的石渠阁会议对“五经同异”的讨论，经学统治的加强，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经学的法典化，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经学统治时期。之后，随着王权的削弱和经学的统一，作为统治思想的经学，也随之开始没落。

西汉政府在京城设立太学，教授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从学官弟子中选拔官吏。后来，郡县都设立学校，设置经师，乡聚也设置了经师，经学成为当官食禄的工具。这些经书为了讲授便利，都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改写，所以叫做“今文经”。后来，又逐渐发现一部分儒家经典，有些是以前没有流传下来的，有些是内容增多了的，这些经书用战国时期的篆文书写，因此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被发现后，长时期没有设立学官，由民间私人传授。今文经和古文经不只是书写文字和读法不同，而且随着经师传授的源流不同，对文字的训诂和内容的解释也有很大的差异，表现了不同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

武帝、宣帝时期，经学内部虽已出现不同流派的矛盾纷争，但由于当时所置五经博士所用的都是今文，还未出现与今文学派相抗争的古文学派。学者们多半专治一经，每一经师，门徒众多，师生相承、代代相传，由于固守师法、家法而解释各异，形成不同宗派和“累世经学”的传授系列。加之各派都把从事经学当作进入仕途换取利禄的手段，于是师生之间结成一种知识行帮，经学的经师，往往是政府中的大官，他们荐举任用亲信，门生故吏多半占据要津。到宣帝时，这种知识性的封

建行帮,在社会上成为一股左右朝政的、新的强宗士族的政治势力。

经学内部不同派别的各种矛盾,有的是属于学术性的,如经义阐发的义理之学和经义解释的训诂之学的矛盾,有的则纯粹是狭隘的门户宗派之见,以及争立学官的权利之争。武、宣时期,由于经学内部的矛盾纷争,很难形成统一的经学。例如当时解释《春秋》的,就有《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两派。武帝时被选中为统治思想的,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谷梁》派受到贬抑,但因武帝太子(卫太子)喜好《谷梁》,虽未立博士学官,仍允许继续传授,可是两派矛盾已明显存在。宣帝(卫太子之孙)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问于丞相韦贤、长信少侯夏侯胜、侍中乐陵侯史高等人,他们都是鲁人,并认为《谷梁》本鲁学,《公羊》是齐学。宣帝由此好《谷梁》学,有意扶植《谷梁》,遂引起《公羊》、《谷梁》两派的矛盾激化。宣帝为了解决经学内部的纷争,企图团结各派建立统一的经学来更好地为巩固统治服务,故于甘露二年(公元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会议,令各派代表人物“杂论五经同异”,各派议论分歧,由“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汉书·艺文志》),最后由宣帝亲自裁决,作出结论。石渠阁会议是经学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虽然没有达到统一经学的目的,但多少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想法,为建立统一的经学准备了条件。会议结果,除保留原有博士之外,还增立了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等博士。

哀、平之世,西汉统治发生严重危机,导致讖纬神学的泛滥,在思想界还同时兴起了与今文经学派相对抗的古文经学

派。这是在哀帝时期，由今文经学刘向之子刘歆发起的。刘歆在整理国家图书馆（秘府）藏书时，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并了解到这些古文经在民间的传授情况，建议为它们立学官。古文经学家们也以刘歆为首奋力争取，遭到原来的今文经学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责备他们“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今古文经学的区别，一般来说，今文经学讲义理的居多，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尊孔子为素王、为汉制法、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古文经学侧重于训诂，以“六经”为古代史料，重《周礼》和《春秋左氏传》，尊孔子为先师、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

刘歆等古文经学家这次争立学官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显示出古文经学已作为一支力量开始向今文经学的官方垄断地位公开挑战。后来王莽当政，刘歆成为其得力助手，古文经终于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古文经书《周礼》（即《周官》）更成了王莽托古改制的工具。古文经的官学地位，随着王莽的失败而被废除。尽管东汉初年，今文经学仍把持官学的垄断地位，但古文经学已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地传播开来，其社会地位与影响已经不可忽视。章帝甚至下诏：“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扶微学，广异议焉。”（《后汉书·章帝纪》）古文经学亦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植。

东汉初年，由于古文经学的兴起，于是在思想界形成了它与今文经学、谶纬神学三足鼎立的复杂而矛盾的形势。它们既

互相排斥,又相互吸收、妥协,并把维护封建伦常看作是经义的根本宗旨,有了建立统一的经学的趋向,章帝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就是在这种趋势下召开的。

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采纳了校书郎杨终关于召集群儒议定五经的建议,下诏解决“五经章句烦多”和“共正经义”(《后汉书·章帝纪》)即统一经义的问题。因为经学自西汉发展以来,经学义理的分歧和训诂的烦琐支离越来越严重,“今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疲)老且不能究其一义”(《汉书·楚元王传》)。经学如此烦琐和经义说解的杂乱,反而淹没了经义的根本宗旨,起不到统治和指导思想的作用。因此,统一经义的问题,不能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参加白虎观会议的学者比较广泛,各派都有。由于章帝爱好古文经,古文经学的观点颇有影响,古文经学家贾逵所概括的《左氏》深于“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成了贯穿《白虎通》的指导思想。这实际上也是继承和发展了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封建伦常的核心思想,为白虎观会议统一、融合各派经学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会议结果,由章帝亲临裁决,并责成杨终、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论》(或称《白虎通义》),即《白虎通》

《白虎通》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之后,进一步把儒家经典同阴阳五行和谶纬揉合在一起,广泛地对封建政治制度和道德伦理规范作出解释。它所列的四十三条专题,几乎包括了封建社会从思想到制度的上层建筑的基本内容,尤其是对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作了阐释和规定,全面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直接为封建宗法统治和君主专制统治服务,起到了封建

法典的作用。

《白虎通》首先对君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用了明确规定。它在《爵》条中,强调“天子”这个爵位是上帝的赐予,是君权神授,所谓“天子者,爵位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子之子也。”在《号》条中,它又把天子奉为“位号天下,至尊之称,以号令臣下”的极权人物。为了抬高君权,它在阐述五行关系时,“土”被解释为五行之首,特别突出“土居中央”的“中央者土”(《五行》)的神学观点,以此来论证君主集权专制的神圣地位。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白虎通》在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纲六纪”说,认为尽管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有各种复杂关系,但主要是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父子、夫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之间的血缘关系,而师长、朋友则是从属于此二者的。因为在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除了政治、经济方面隶属于统治阶级之外,还要受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君权与父权相结合的所谓“君父大义”就成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也正是《白虎通》之所以把“君父大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道理所在。因此它说:“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强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纪纲为化,若罗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三纲六纪》)三纲六纪构成了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之大罗网,抓住了“君父大义”,即能纲举目张,封建统治秩序就能得以巩固。

《白虎通》还根据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

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进一步提出“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归功于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同上)的神学观点,并大加阐发:“天道莫不有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五行》)从而把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以适应东汉王朝加强封建宗法统治的需要。

白虎观会议,使经学的统一、融合的步伐大大推进了一步,但并未终止今古文经学的纷争。东汉时期,今古文经学派之间的矛盾纷争,固然有义理和训诂的学术分歧,但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谁是经学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思想的问题。其实质是争夺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争夺财产和权力再分配斗争的反映。尽管他们争论不休,但在白虎观会议上,双方在提倡“君父之义”的封建纲常和宣扬谶纬神学上都是共同的。正是由于他们思想基础和阶级利益的基本一致,所以在白虎观会议之后,虽然仍有纷争,但总是趋向于接近,有些学者因而兼通今古,打破了师法和家法的藩篱。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当时号称“博通”,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终于统一、融合了。经学的统一,并未促使其发展,反而影响或阻碍了经学的发展。后来,随着玄学思潮和以佛、道为代表的宗教思想的兴起,经学终于被它们所取代,并促使中国的学术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六、桓谭与王充的 唯物论、无神论思想

在官方哲学大肆宣扬迷信妖妄的乌烟瘴气笼罩下，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王充勇敢地站出来，对这种唯心主义神学展开了斗争。东汉初，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曾因公开反对谶纬神学，几乎被刘秀以“非圣无法”的罪名而置之死地。在他的《新论》一书中，他用火和烛的关系，来说明人的思想、精神对形体的依赖关系，他说：“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形于虚空。”桓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开了对唯心主义神学批判的先河；继桓谭之后，王充则对之展开了全面批判。王充，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生于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死于和帝永元（公元 89—104 年）年间。他一生刻苦学习，善于独立思考，喜欢辩论，专心著述，家中门窗墙壁随处置放刀笔，每有心得就及时记录下来。他的著作超过百篇，保存下来的有包括 80 余篇、20 多万字的《论衡》一书。他把自己的这部战斗性强烈的主要著作取名“论衡”，就是为了“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即实事求是地衡量理论是非，反对一切虚妄浮夸。

王充首先批驳了“天人感应论”。他依据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天地没有知觉，没有意识，世界万物是一种恬淡无欲无为无事的“气”自然形成的。他说：天如果真能关心君主的政事，能用灾异来谴告君主，那就不如选立尧舜那样的圣君，政事自然办得极好，根本用不着天再来操心。天何苦要选立一

些昏愚的君主,让他们胡作妄为背离道德,然后又才来谴告惩罚,增添无穷的麻烦和灾难。他恢复了先秦儒家在天人关系上强调人事为主的思想,他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即是说,圣人动辄讲天,不过是为了增加自己言论的威望,借以感化坏人、吓唬愚民的。实际上是根据人心在讲话,并不是来自渺茫的天体。所以天心是在圣人的胸中,谴告也是出自圣人之口,与灾异并无关系。王充还反对“天生五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的神学目的论,他讽刺这种说法是把天当成了为人服役的农夫桑女。他说人们有血有肉,知道饥寒,见五谷可食就取来吃,见丝麻可衣就取来穿,与天并无关系。“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为之乎?物自然也。”这种观点肯定了自然界的物质性,又说明了自然界变化的客观性,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神学有力的批判。

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武器,王充也反对当时社会上各种鬼神迷信活动。他指出精神依存于形体,“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人病死就同烛光熄灭一样,所以他说:“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这就根本否定了鬼神的存在。他还举出现实的事例说:人们被别人打伤了,就会到官府报案,因为他活着有知觉。但如人们被别人杀死了,官府既不知何人所杀,甚至家属还找不到尸体所在。如果死人有知,被杀死比被打伤严重得多,他应当去报告官吏,也应当告知家人自己尸体的下落。但是死者却从来不能这样作,足见人死不能为

鬼也不再有什么知觉。对于炼丹服药成仙、升天长生不死这些传说，王充也逐一加以批驳。当时讹传淮南王刘安学道求仙，广召天下方术之士炼成仙药，全家吃后都成了仙。甚至余剩的药被家中鸡犬舔吃，也都跟随升天。王充根据确凿的历史记载，指出淮南王刘安在汉武帝时谋反被察觉，畏罪自杀，王后、太子及家属全被杀死，哪有什么“鸡犬升天”的好事。他还进一步总结说：“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惟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这是对生死问题带有辩证法意味的见解，足以破除对神仙方术的迷信。

王充还坚决反对今文经学的造神活动。那些经学家把孔子说成是“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使孔子变成了阴阳怪气的神仙。王充根据《论语》等比较可靠的先秦儒家著作，指明孔子本人和他的弟子都说孔子是好学不倦，随处求师请教，一生不断积累知识，这才逐渐达到学问渊博、见识超群的圣人境界，并不是什么天生的“先知”。所以他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圣人也同样是通过学习成长起来的，“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因此他也反对盲目迷信圣人，指责“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认为这种鹦鹉学舌的奴才习性，不能弄清道理提高认识。学问的根本方法就在于大胆提出疑问，同老师辩论是非。所以他明确宣称：“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

逆于理？”并且专门写了“问孔”篇，对孔子的某些言行提出驳议。这在独尊儒术、把儒家经书视为最高法典的汉代，是异常大胆的行为，虽然还不是对儒家根本理论的批判，也算得难得可贵了。

根据这种独立思考的求实精神，王充对厚古薄今的传统观念也展开了批判。他指出：“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辩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一方面是迷信古人，再方面是迷信书本，“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这种偏见就使得人们既不能如实了解古代，也不能正确评价当时。这就是王充所批评的“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王充则指出，上古人民茹毛饮血，没有粮食吃，后世掘井耕地，饮井水吃五谷。上古人民岩居穴处，披兽皮鸟羽，后世居住宫室，穿绸布。这并不是上古单纯质朴，后世浮华轻薄，这是生活条件的发展改进，而人们的性格并没有变得不同。因此他强调汉王朝版图远比商周辽阔，许多戎狄蛮夷都已进化成为汉朝臣民，生活文化显著提高，垦辟了大量荒地，臣服了众多人民。刘邦、刘秀的功绩远过于周文王、武王，汉文帝、武帝、明帝、章帝等也胜过周成王、康王、宣王，所以能够再建汉朝，创立从古未有的奇迹。用以矫正“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那种厚古薄今的传统偏见，这在当时，可说是震聋发聩的高论，他的勇于批判传统旧思想的斗争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正因为如此，他的名著《论衡》，在当时被看作“异书”，而一度被埋没，直到东汉末年，才逐渐流传起来。

不过,王充思想中也包含有机械论、经验论的因素,有时错误地把一些假象或传说当成事实。如象大谈汉王朝得到的祥瑞符命,连王莽时制造的种种骗局都信以为真,未能摆脱“天人感应论”的影响。在社会现象上,他更无法理解国家治乱安危、人们富贵贫贱的真实原因,只好归之于命运。他说:“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兴;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即是说,人们在这种渺茫的命时面前是毫无作为的,这也是一种宿命论的历史观。这说明,王充的唯物论,并不彻底,还有着很大的缺陷。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都不可能完全正确,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时代及社会地位的偏见和局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七、熹平石经

东汉熹平四年(公元 175 年),蔡邕与其他一些官员奏求汉灵帝正定六经文字。汉灵帝接受了蔡邕的建议,开始把儒家经典刻写在石上。这就是儒家经典的第一次刻石,历史上称为“熹平石经”。刻写石经是古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从 2 世纪起,一直到 18 世纪,所刻儒经总计不下 7 次之多。自东汉熹平四年和曹魏先后刻立石经,以及后来各代所刻,石经便成为当时儒家经典的定本。

前 2 世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儒家思想定为一尊,政府设立了博士官,给予研究各经的学者以博士的官职,以后儒家

经典便成为读书研究的主要课程，并以之教育学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常引用儒家经训。因此经文的正确性与权威性就非常重要了。当时的书籍，包括儒家经典在内，完全靠手工抄写，代代相传，加上各家经师不同的注释，鲁鱼亥豕，矛盾混淆，在所不免。《后汉书·蔡邕传》说：“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另外，虽然从汉武帝时政府就提倡今文经，但民间仍有人传习古文经，今古文之争也很激烈。西汉末年，刘歆借王莽的政治势力，把《古文尚书》、《古文春秋左氏传》和《周礼》立于学官，王莽依据这些经典进行政治改革，最终自立为皇帝。东汉光武帝刘秀很快恢复了汉朝的统治，重新废去古文经而提倡今文经。为了排除异说，确立今文经的标准本，借以防止政治上的纠纷和保障今文经的地位。东汉灵帝接受了蔡邕的建议，开始把儒家经典刻写在石上。从而恒久而统一地保存了儒家经典的经文，同时也开了后来以木版雕刻儒经而成为官府最早采用雕版印刷术的先河。

熹平刻石之举，始自熹平四年（公元 175 年），至光和六年（公元 183 年）止。历时 8 年，共刻儒家经典 7 部。这 7 部经典是《易经》、《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尚书》等 7 经，共计 20 万字。刻写在 46 块石碑上，经文刻于石碑正反两面，立于洛阳太学之东，列成 U 形，开口处向南。经文顺序是碑碑相接，各碑正面之文相连，然后背面之文相接，起自正面首碑，终于背面末碑，每碑高约 175 厘米，宽 90 厘米，厚 12 厘米；每字约 2.5 厘米见方，字里行间没有线格。为节省空间，段与段之间以点或空格分开，仅有极少数的段落另起新行。石经的底本是汉代许多本子里精选出来的。最佳的本子

刻为正文，而附以他本的异文。石经的文字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一种字体书写，故也称“一字石经”；又因为隶书即所谓今文，所以又称作“今文石经”。“熹平石经”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五经一定，争者止息。”

石经于光和六年（公元 183 年）刻制完成。其后不久便遭逢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董卓之变，损毁不少。以后魏文帝即位，下令修补石经。近年发现的春秋和诗经的残碑上，便有许多文字是经过修补或重刻的。自从 6 世纪中叶以来，石经被迁移了不知多少次，有些石碑甚至被当作建筑房屋的材料。魏书《孝静帝纪》记载，东魏武定四年（公元 546 年）自洛阳迁都于邺时，一部分石碑沉于河底，北周大成元年（公元 579 年）余碑迁返洛阳。到了隋开皇六年（公元 586 年）又再迁往隋代的都城长安。唐初，编纂隋书的魏征，曾收集石经，那时，石经全文仅残存大约 1/10。

时至今日，汉石经已无完整者，只剩下由地下发掘出来的少数残石。现存较大的一块是 1934 年在洛阳出土的《公羊传》残石。正面长 49 厘米，宽 48 厘米；反面长 48 厘米，宽 47 厘米，正反两面共存 624 字。60 年代，河南洛阳偃师县汉太学遗址发现过两块《尚书》残石，存二百余字，经文之后刻有石经序。1980 年有一次更大规模的发现，共获残石 600 余块，其中有字者 96 块，共存 366 字。残石内容以《仪礼》为多，也有《春秋》、《论语》的文字及《仪礼》、《鲁诗》校记等。

汉石经的刻立为后来统治者作出了榜样。从此。刻石活动为后来统治者所效仿。他们纷纷刻石经以确定经文的字体

和文本。这一传统自 2 世纪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科技文化

一、刘向、刘歆父子完成《七略》

汉高帝灭秦，萧何收秦朝廷所藏图书。后来项羽烧秦宫室，图书因得萧何收藏，可能未受损失。汉武帝令民间献书。汉成帝使陈农到各郡国搜集遗书。自汉武帝到汉成帝，照刘歆《七略》说，“百年之间，书集如山”。汉成帝令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算（占卜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书）。每校完一书，刘向做成本书提要，连同定本送给汉成帝。刘向校书的程序是先用几个本子校对，校正后写在竹简上，叫做杀青书（竹简在火上炙干，去竹汗，可免朽蠹）。再经过校正，最后写在素帛上，成为定本。刘向校书 20 余年，死后，汉哀帝令刘歆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刘歆继承父业，做成了《七略》（刘向所作书名为《别录》）。《七略》是（一）《辑略》——诸书总论和分论；（二）《六艺略》——儒家经传包括小学（文字学）共九种；（三）《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 10 家；（四）《诗赋略》——赋 4 种，诗 1 种；（五）《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天象气候兼迷信）、技巧 4 种；（六）《数术略》——天文、历谱（包括算术）、五行、蓍龟（卜筮）、杂占

(主要是占梦)、形法(看舆地形势及看人和物的形相)6种;(七)《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起。《七略》书已亡佚,班固《汉书》据《七略》作《艺文志》,共有书6略、38种、596家、1.3269万卷。《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把不值得保存的书籍都废弃了,例如经学博士的讲义,一篇也不录取。它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并作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

二、赵过在农业上的贡献

赵过是西汉武帝末年人,作过“搜粟都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武帝时推行赵过创造的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技术,使我国农业获得了重大的进步。

赵过创立的新耕作法,叫“代田法”。“代田法”是一种适于北方旱地作物的耕作方法。推行“代田法”以前,我国实行的耕作方法,是翻地之后,即在地上散布五谷,不分行列,叫做“纒田法”。“纒田法”是原始的耕作方法,地力用尽,必需休耕,上田1年,下田要3年,这种落后方法,阻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代田法是在地上开沟培垅,作物种在沟内。随着作物的生长,在中耕的同时,将垅上的土培到苗的根部。最后,沟变成垅,垅变成沟。明年沟垅再互相轮换。这种耕作方法,能够经常保持地力,并且有利于抗旱保墒,防止庄稼倒伏,也节约了人力。显然,“代田法”较之“纒田法”,是一次耕作技术上的重

大革新。

赵过在创立“代田法”的同时，还改进了农具。根据史书的记载，我国自春秋以来，就实行牛耕，但很不普及。赵过改进旧的耕作方法，创制耦犁，推行牛耕。据说，2牛3人，每年可种田五顷。由于当时一般农户无力养牛，赵过提倡用人力犁，最多1天能耕30亩。赵过又在过去1脚耒和2脚耒的基础上，改进成3脚耒。1人牵牛，1人扶耒，1天可以播种1顷。

由于实行了“代田法”和改进农具，史书上说，每亩每年可增产1石以上，好的甚至可以加倍。

在赵过的建议下，大司农增设由赵过主持的手工作坊，选取有技巧的手工业工人专门生产新农具，又令全国郡守派遣县令、力田（地方小农官）和乡村老农到长安学习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

赵过的“代田法”，曾在皇帝的离宫内，由宫卒进行试验，打的谷子一般比其他的田地多出1石以上。于是，汉朝廷又命令在关中“公田”和边郡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进行试验推广。以后，又把代田法推广到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弘农（今河南西部）等地普遍实行。史书上说，这些地方的农民都称赞代田法好，“用力少而得谷多”。

根据汉昭帝时桓宽《盐铁论》上记载，推行“代田法”，主要在关中地区。贫户缺少牛马，只能用旧农具耕田，所以，行“代田法”的主要是富户而不是贫苦农民。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耕作方法势必逐渐被淘汰，赵过所创新农具和新耕作法，必然得到更大规模的推广。从在居延所发现的汉简上面，可以看到有“汉昭帝初年”“代田仓”的记载，以汉简和史书互

相参证，证明史书上“代田法”曾在居延推行的记载，是确实的。从“代田仓”的建立也可推断，推行“代田法”后，粮食是得到了增产的，赵过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第一部农业 科学著作《汜胜之书》

农业，在中国历史悠久。相传神农氏“教民稼穡”，具体年代已难以考证。从近几年在黄河两岸发掘出的古老农村遗址看，有物可证的中国农业史至少有 7800 年了。然而，农业作为科学研究，并写出农学著作却较晚，那还得从西汉成帝在位时（前 32 年—前 7 年）的《汜胜之书》算起，距今 2000 年左右。

汜胜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知名的一位农学家，他的名字在中国广大农民中也许不大为人所知，但他的有些农学技术，却一直沿用至今。如有些园艺家依据他的著作《汜胜之书》中记载的“种瓠法”，种出了重达 200 多公斤的大冬瓜，七八尺长的大豆角。

何谓“种瓠法”？瓠，也叫瓠瓜，俗称“葫芦”。据说原生印度和北非，其实早在 7000 年前，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已有生长，人们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中，已发现了葫芦的种子。汉代时，葫芦已成为黄河两岸人民种植的一种经济作物。它的嫩果可作蔬菜，老果可作容器，瓢子可喂猪，种子可以榨油作烛照明。关中地区的老农把瓠瓜种得又大又好，创造出的一套成功经验，就叫“种瓠法”。

那办法是先挖坑松土，深翻施肥，每坑散种 10 粒瓠种，10 棵瓠苗生长到 2 尺多长时，把苗蔓拢在一起，用布条缠扎 5 寸来长，外面用泥土封好。几天以后，缠扎的地方就长在一起了。然后，在 10 棵苗蔓中选择长得最茁壮的 1 棵留下，把其余九棵掐去。这样，10 棵瓠根在地下吸收养料，集中供给 1 条茎的生长需要，结出的瓠瓜特大。大的瓠瓜制成容器，可以盛放 1 石粮食。瓠瓜原是怕旱又不耐涝的，为此，在瓠坑四周挖出小水沟，让水慢慢渗透过去，使土壤中总保持着适量的水分，瓠瓜因而长得又硕大又水灵。

“种瓠法”开创了依据人们的需要改变植物生长状况的新途径，为后世嫁接果木、培育植物的新品种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汜胜之是曹县人，即今山东曹县。他曾被朝廷派往关中地区管理农业生产。后升迁为御史。汜胜之虽身为官员，却接近农民，虚心向老农请教，学习那读书做官的人所看不起的农业知识。他写了一部书，总结了关中地区农民的种植技术和经验，发展了战国以来的农学。这书就被称为《汜胜之书》，在汉代就很有名。书中记载有耕田、种麦、种瓜、压桑、选种等耕作技术，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区田法”、“溲种法”则更为著名。

“区田法”，类似今天的挖坑点种。即把耕地分成一方方小区，区与区间培出土埂。分区的大小，坑内挖土的深浅，是根据作物的不同来决定的。比如种谷、麦，每亩耕地分到若干个小区。这样，可以做到深翻、保墒，集中施肥、浇水，节省人力、畜力，又便于管理。这种方法是适合当时中国北方黄土地带种植旱作物的特点的，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也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科学方法。金代明昌 7 年（1196 年），今山西南部曾遭大旱，官府

遂推行“区种法”，使百姓度过了灾荒。现在，在北方的山区仍被采用着，在园艺中则更为多见。

“溲种法”是一种古老的浸种法。播种前 20 天左右，用马骨煮出清汁，泡上含有毒性的中药附子，加进蚕粪和羊粪，搅成稠汁浸种。浸过的种子蒙上了一层带有药味的有机质，种下以后，可以避免虫蛀，萌发后，因根部伴有养料，长得整齐茁壮。这种方法，今天看来也是合乎科学道理的。

《汜胜之书》是中国的第一部农业科学著作，对后世的农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可惜，原书在公元 10 世纪到 14 世纪的宋、元时就失传了，现在的《汜胜之书》是后人从《齐民要术》及《太平御览》等古籍中辑录下来的，大约只有 3700 字。

四、秦汉时期地理学的发展

秦汉时期形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对于疆域广大国土的统治，要求地理学知识的提高。所说服力“天子受四海之图籍”。秦亡后，秦的图籍为萧何所收，大约西汉在它的基础上绘制出《汉舆地图》。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前，在河北得到西汉全国的舆地图，高兴的对邓禹说：“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当时不独有全国的郡国图，而且常常通过行军作战，依据山川形势实际，制作专用地图。如西汉时期李陵率兵出居延，就绘出他一路行军所过的“山川地形”。东汉时，侍御史李恂持节使幽州时“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他们所绘制的都是一个地区的专图。还有东汉大将马援在率兵进攻隗嚣时，战前他“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向刘秀讲解作战计划，

他所用的已接近于一种活动的地理模型。近年来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汉代绢制彩色长沙地区地图的发现,使人们对西汉地图学的水平有了具体的了解。据说绘制这样详确比较细致可靠的地图,需要数学、地理学、测绘技术等多方面的知识。在2100多年前就有这样绘制水平的地图,在世界地图学史上是罕见的。东汉班固编写的《汉书·地理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疆域地理志著作,它记载了公元1世纪初(西汉末年)的全国行政区划以及沿革、户口、山川、物产,是历史地理方面的宝贵著作。

五、蔡伦造纸

“蔡伦造纸”的故事,在中国原是家喻户晓的。

纸,作为书写材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传中国上古曾有过结绳记事的时代。那时,连文字也不曾有,更谈不上书写文字的纸张了。

商、周时代文字已经成熟,可还不曾有纸。那时把文字镌刻在龟甲兽骨上,也有的刻在泥范上,铸成青铜铭文。刻骨铸器,工序繁难。因而,甲骨钟鼎上的古代文字篇幅都很简短,难得有长篇巨制。

春秋战国以后,开始使用竹简木片。这比刻骨铸器方便多了,然而,仍很笨重。西汉时,以辞令见称的东方朔写了篇文章,用了3000根竹简,进呈皇帝时,由两人很吃力地才抬进宫去。战国时,思想家惠施外出游学,随身携带的书就装了5车,故有“学富五车”的典故。这样多的简册,运输、存放都很麻烦,

人们曾形容说“汗马牛”、“充栋宇”。因而形成了“汗牛充栋”的成语。

当时,除竹外,丝帛也开始用来作书写材料。古书上说“著于竹帛”。竹是竹简,帛是缣帛,即一种依据书写的需要裁好的丝织品。20年前,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等地的古墓中,曾发现有西汉早期的帛书和帛画。这种缣帛在古代就叫作“纸”。所以,纸字的表意偏旁从“系”,那就是因为最早的纸是一种丝织品。可是,这种“纸”价格昂贵,除皇家富室,一般人谁能用得起呢!

竹简笨重,缣帛昂贵,这对文化的传播都极其不利,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质轻而价廉的书写材料,到了东汉,这种材料终于找到了,这就是“蔡侯纸”。

蔡侯纸是东汉和帝时蔡伦监造的。蔡伦(?—121),字敬仲,桂阳(今湖南彬县)人。他是位宦官,却颇有才学,曾职掌皇家的工场,监造各种器械。凡他监造的产品,“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即成为以后人们生产这种东西的榜样。蔡伦堪称精于制造的专家。

以植物纤维制纸,在民间早于蔡伦之前200余年,用的是大麻和苧麻,工艺粗疏,质量很差。蔡伦精心总结了民间造纸的经验,改进了造纸的工艺,又选用价格便宜的树皮、麻头、破布、废鱼网等作原料,终于制成了质地轻薄、价廉耐用的书写材料——纸。蔡伦后被封为“龙亭侯”,故而世人就称他监造的纸叫“蔡侯纸”。

蔡伦善于总结前人的生产经验,并加以改进,使古代的造纸术臻于完善,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称道的。他是位出色的改革家。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纸、印刷术)之一。

历代史家都把纸的首创和发明归于蔡伦一人，这是不确切的。旧史中这种事例不少，往往把那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集中了无数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形成的重大成就，记在一位“英雄”的名下。蔡伦不是中国造纸术的首创者和发明者，然而他确实在造纸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

近 1 个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家们先后在新疆的罗布泊、内蒙古的额济纳旗、陕西的西安市灞桥以及扶风等地，多次发现西汉古纸。最早的灞桥纸不晚于汉武帝时代，比蔡伦造纸时代大约要早 200 年。不过，这些纸都不是用于书写的。而在出土的东汉古纸上，却大多有书写的字迹，包括书信、诗钞、日常文书等。这同蔡伦造纸的故事吻合，恐怕不是偶然的。

中国造纸术经蔡伦改革后，大约过了 500 余年，经由朝鲜传入日本；600 多年以后，传入阿拉伯，再传入欧洲；1500 多年以后，辗转传入美洲。这样，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的文化财富。

六、天文历算家张衡

张衡(公元 78~139 年)字平子，东汉时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伟大天文学家之一。

张衡的祖父曾经担任蜀郡太守等职，后来家道却中落了。张衡从小过着较为清贫的生活，这就使得他能够接触到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和一些生产、生活实际，从而给他后来的科学创造事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张衡从少年时学习就很刻苦,后来到都城洛阳的太学,访师交友,探讨学问,阅读了不少的书籍。在他 37 岁的时候,开始担任太史令的官职,专为朝廷观测、记录天象、选择“黄道吉日”(可以举行重大活动的好日子)和记载全国各地发生的某些自然现象。这些工作不能不促使张衡对于天文、历法乃至地震等自然现象进行广泛的研究。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他认真地研读过扬雄(西汉末年的学者)的《太玄经》(一部哲学著作,里面谈了许多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问题),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又深入学习和研究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成就,并通过多年的实际观测和研究,最后写成了一部天文学的巨著——《灵宪》。

原来,我国自古以来,对于宇宙天体的看法,就有三种不同的论点。一种是“盖天说”,又称“天圆地方说”。认为天是圆的,像一把张开的伞,地是方的,像一个棋盘。一种是“宣夜说”。认为天没有一定形质,日月星辰都浮游在天空之中。另一种则是“浑天说”。认为天地的形状像个鸟蛋,天像蛋壳,地像蛋黄,天和地的关系就像壳包着黄那样,所以叫做“浑天”。张衡就是“浑天说”的主要代表。在《灵宪》中,张衡大胆地对天象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他说,“月光生于日之所照”,“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正确地说明了,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它的光是受到太阳的照射后反射出来的;月亮对着太阳的时候,是满月,背着太阳的时候,月亮就不见了。他从日、月、地球所处的不同位置,对日月蚀的成因,作了我国最早的科学解释。张衡还对在中原地区(指他所在的洛阳)能够用肉眼观测到的星数做了精确的统计,指出较亮的星 2500 颗,常明星 124 四

颗,叫得上名字的星 320 颗。这个数字和现代天文学家所统计的,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能用肉眼看到的星数为 2500—3000 颗,基本相同。他在《灵宪》中绘制的标明星体位置的《灵宪图》,是我国最早的一张星图。

在张衡以前,已经有人制造过观测天象的“浑天仪”。公元 117 年,张衡根据他的“浑天说”,创制了比以前都精确全面得多的一架“浑天仪”。“浑天仪”是一个可以转动的空心铜球。铜球外表刻有 28 宿和其他一些恒星的位置;球体内有一根铁轴贯穿球心,轴的两端象征北极和南极。球体的外面装有几个铜圆圈,代表地平圈、子午圈、黄道圈、赤道圈。赤道和黄道上各刻有 24 个节气。凡是张衡当时所知道的重要天文现象,都刻在“浑天仪”上面了。为了使“浑天仪”能自动转动,张衡又利用水力推动齿轮的原理,用滴壶滴出来的水力发动齿轮,带动空心铜球绕轴旋转。铜球转动一圈的速度和地球自转的速度相等。浑天仪旋转时,刻在它上面的天象依次表示出来,和天体上星球的运动十分相像。这样,人们坐在屋子里,便能从“浑天仪”上看到天体运动的情况。

张衡把他对天体构造、各种天象的看法和他制作水运浑天仪的方法等,专门写成一篇《浑天仪图象》,加以介绍。另外,张衡还改进过测定天体位置的浑仪。

从公元 89 年到 140 年,50 年左右的时间,东汉都城洛阳和陇西一带,共出现过 33 次地震。特别是公元 119 年,洛阳和其他地区连续发生了两次大地震,促进了张衡加紧对于地震现象的研究。他终于在公元 132 年,发明并制造出了我国第一架测报地震的仪器“地动仪”。这架“地动仪”通体铜铸,形状

很像一个大酒樽。樽顶上有凸起的盖子，可以打开。樽的外部装饰有篆文和山龟鸟兽等花纹，上面铸着 8 条龙；龙头按照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排列；每个龙嘴都衔有 1 个小铜球，并在它的下面蹲着 1 只铜制的、头向上仰、张着嘴的蛤蟆。“地动仪”的内部，有 1 根叫做“都柱”的上粗下细的铜柱。“都柱”周围伸出 8 根横杆（曲杠杆），分别和 8 个龙头的上半部衔接。哪个方向发生地震，地震波传来，“都柱”就会倒向地震发生的那个方向，压在曲杠杆的下端，由曲杠杆再牵动龙头，将龙嘴里的铜球掉到蛤蟆的嘴里，并发出清脆的响声。这样，看守仪器的人便能知道地震发生的日期和方向了。

张衡制造的这台“地动仪”，相当灵敏准确。138 年的一天，“地动仪”正对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铜球落了下来。可是住在洛阳的人丝毫没有感到什么地动，有些“学者”怀疑“地动仪”的灵验。但是过了几天，便有人从陇西赶来报告说，那里在几天前发生了地震。于是人们“皆服其妙”了。陇西距洛阳有 1000 多里，“地动仪”能够精确地测知那里的地震，它的精密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欧洲在 1880 年才制造出地震仪，距张衡已经晚了 1700 多年了。

张衡在气象学方面，还创造了一种测定风向的仪器——“候风仪”，又叫“相风铜鸟”。是在 1 根 5 丈高的竿顶上安放一只衔着花的铜鸟，可以随着风向转动。鸟头所对，便是风的方向。这个仪器和欧洲装在屋顶上的“候风鸡”相似。但是，“候风鸡”是在 12 世纪才出现的，比起张衡的“候风仪”已经晚了 1000 年。在地理学上，张衡还绘制过《地形图》。此外，张衡还

能文善画。他青年时代用 10 年时间，精心雕琢、反复修改而成的《二京赋》，为人们广泛传诵。他画的画很出色，因而享有东汉 4 大名画家之一的声誉。

张衡的治学态度非常认真、刻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几十年如同一日。这正是他博学多才，成就为一个科学家的“秘诀”。为了纪念张衡的科学贡献，1956 年，人民政府在石桥镇重修了张衡墓和他少年时读书用过的“平子读书台”。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墓碑上亲笔题了“万祀千龄，令人敬仰”8 个大字，给张衡以很高的评价。

七、张仲景与华佗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名机，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南阳）人。约生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公元 150 年），死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左右。他是我国古代一位卓越的医学家。

东汉末年，战事频繁，瘟疫流行，人民病死的很多。张仲景家族原有 200 多人，不到 10 年，死了 2/3，其中因患伤寒而致死的占 7/10。他同情人民的疾苦，精心研究医学，整理和总结前代医学的理论和经验，广泛收集民间的验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了他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16 卷。后人把本书分别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二书。

张仲景在医学上的贡献，主要是系统地总结了汉以前对伤寒（指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一类急性传染病，不是

通常所说的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和杂病(以内科病症为主,也包括外科、妇科等方面的病症)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

在诊断辨症方面,张仲景运用望色、闻声、问症、切脉等 4 种方法,分析病情,找出病源。为了辨识病理变化,他把伤寒的各种类型和不同的病程阶段,加以细致的区分,归纳为太阳,阳阴,少阳,太阴,少阴,厥阴 6 大症候群,每一症候群用一组突出的临床症状作为辨症依据。中医诊断学的 8 纲(即: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在《伤寒杂病论》中也已具备了雏形。

在治疗方面,根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病人,不同的气候等条件,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中医叫“辨证施治”。张仲景用汗、吐、下和及“寒病热治”、“热病寒治”概括了治疗学的方法原则,为中医临床的辨证施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他的著作中,除选收了大量内服方药外,还介绍了针、灸、温熨、药摩、浸足,吹耳以及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疗方法。此外,他还主张疾病要早预防。他认为只要饮食有节,劳逸适当,就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减少疾病。

由于张仲景在医学研究方面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因此受到后人的尊敬,被称为“医圣”。他的著作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神医华佗

华佗也是一位为我国广大人民所尊崇、怀念的名医。

华佗生于公元 2 世纪(在东汉和三国期间),比扁鹊要迟

六七百年。他是沛国(治所在今安徽宿县西北)谯(今安徽亳县)人。他从小就能刻苦钻研学问,精通各种经书,尤其喜爱研究医学和养生的方法。后来他去徐州(州治在今山东郯城西南)游学,拜名医做老师,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渊博的医学知识。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和针灸科等,他样样精通,外科医术尤其高明,因而后世尊称他为外科的祖师。他医病的方法很多,而且简便易行,用药不过几种,给病人针灸,取穴也不过几处,但疗效很高,当时的人都称他为神医。

华佗除了有非常高明的医术以外,还有不慕名利的可贵品质。沛国相陈珪曾经推荐他做孝廉,太尉黄琬也曾征聘他去做官,他都一概拒绝了。他宁愿捏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大众治病。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甘陵(今山东临清市)、盐渰(今江苏盐城县西北)、东阳(今山东恩县西北的东阳城)、琅玕(今山东临沂市北)一带,是华佗当时的主要行医的地方,这一带的人民没有不赞扬他的。到现在,江苏徐州还有华佗的纪念墓,沛县也还有华祖庙。

三国时的曹操常常患头风眩,医了好久没有见效,听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就请他医治。华佗替他扎了一针,头便不痛了,因此曹操强要华佗当自己的侍医(私人医生),供他一个人使唤。华佗既是一个不慕名利的人,当然不愿意做曹操的侍医。他借口妻子有病,告假回家,不再到曹操那里去了。曹操忿怒极了,派人到华佗家里去调查。曹操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他小豆 40 斛;要是没有病,就把他逮捕来办罪。

传说华佗被逮捕送到曹操那里以后,曹操仍旧请他治病。

他给曹操诊断了以后，对曹操说：丞相的病已经很沉重，不是针炙可以见效的了，我想还是先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掉病根。曹操认为华佗有意谋害他，大发脾气，把华佗关进牢狱里。后来，华佗就被曹操杀害了。

在被逮捕送往曹操那里去的路上，华佗还给人治病。被关进牢狱以后，他知道曹操不会放过他的，于是抑制住悲愤的心情，逐字逐句地整理他的 3 卷医学著作——《青囊经》，希望把自己的医术流传下去。这三卷著作整理好以后，华佗把它交给牢头，牢头不敢接受。在极度失望之下，华佗把它掷在火盆里烧掉。牢头这时候才觉得可惜，慌忙去抢，只抢出 1 卷，据说这 1 卷是关于医治兽病的记载。

从这里可以看出华佗是 1 个有骨气的人，他具有不怕威胁，不为利诱的高贵品质。

华佗没有留下专门著作，这是我国医学的一个重大损失。《中藏经》、《华佗方》等医书，虽被认为是他的著作，实际上却都是后人假托的。

华佗的弟子有吴普、李当之、樊阿等人。吴普著有《吴普本草》，李当之著有《本草经》，樊阿精于针炙，在医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华佗在医学上的贡献很大。华佗最出色的是外科手术。为了施行手术的需要，他总结前人的经验，利用酒能够使人麻醉的性能，发明了“麻沸散”。病人用酒服麻沸散后，便会完全失去知觉，剖腹割背也不会感到痛苦。华佗除用手术来治外科病以外，还常用外科手术来医治内脏的疾病。华佗能把内脏的病变部分割掉，或者加以洗涤。动了手术以后，伤口用丝线缝合，

敷上特别配制的药膏,据说四五天后便可以愈合,一个月左右便可以平复。

麻沸散的配制方法,早已失传,后人虽有种种推想,但都不可靠。不过华佗在 1700 年前已经能用麻醉法来进行外科手术,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他对祖国医学上的一个卓越的贡献。

关于华佗的高明的外科手术,留传下来许许多多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华佗家里送来了一个肚子痛得十分厉害的病人。华佗按了病人的脉搏,再按 揪了他的肚子以后,断定这个人患的是肠炎(就是盲肠炎)。华佗认为针灸已经迟了,非开刀不可。于是他就给病人服了麻沸散,并施行了剖腹手术,割去溃烂的盲肠,然后再用丝线扎好,敷上药膏。经过华佗的手术以后,这人的病就完全好了,不久伤口也结上了疤,一个多月以后就能干活了。

又有一次,一个孕妇请华佗看病,华佗诊断这妇人是受了伤,但胎儿还未落下来。妇人的丈夫知道自己妻子受了伤以后,胎儿已经落下来了,认为华佗的诊断不太正确,不要华佗给她治疗。过了 100 天左右,这妇人又来找华佗了。华佗诊察了以后,仍旧断定胎儿没有下来,并且说,她原来怀的是双胞胎,上次落下了一个胎儿,失血过多,身体大大亏损,因而留在肚子里的胎儿也不能生长了。华佗还断定这胎儿已经死了,要是不把这个已死的胎儿弄下来,产妇就活不成了。于是华佗先给产妇扎针和服药,服药以后,产妇虽然肚子很痛,但胎儿还是不下来。于是华佗请另外一个妇人给这个孕妇按摩,果然取下一个死胎。

还有一个病人，肚子的中部痛了10多天，胡子和眉毛都因而脱落了，来请华佗诊治。华佗认为是脾脏腐烂，应该剖腹割治。经过华佗把他内脏的腐烂部分割掉，敷上药膏，并给他服了汤药，100天以后，这人也恢复了健康。

小说《三国演义》里还有华佗替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这事虽然不见于史书，但《襄阳府志》里却有这段记载。

华佗给人治病总是灵活地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找出病源，然后决定疗法，决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也决不生搬硬套。例如，有两人头头痛发热，一同来请华佗治病。一个叫倪寻，一个叫李延。华佗细细诊察了他们的病情以后，知道二人的病象虽然相像，但致病的原因不同，于是给倪寻吃泻药，而给李延吃发散的药。当时有人问华佗说，他们两人患同样的毛病，为什么给他们服不同的药品？华佗就告诉他，倪寻是伤食（吃东西太多而生的病），李延是外感（受冷感冒），病状相同而病源不同，所以给他们吃的药也就不同。倪寻和李延服药以后，到了第二天，病都好了。

华佗还能用心理疗法来医治疾病。相传有一个郡守病了，请华佗给他医治。华佗诊断出他的病不是一般药物可以医治的，而只有在大怒之下才可痊愈。因此，华佗不给他开药方，反而向他索取了很多的诊金，并且大摆架子。几天以后，华佗偷偷地走开，留下一封信，信里把郡守大骂一通。果然不出华佗所料，郡守因为他的这种无礼举动大为愤怒，派人追捕，要把华佗杀掉。郡守的儿子知道内情，故意阻止。这使郡守越发激怒。盛怒之下，郡守吐了一滩黑血，病也就好了。这个传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无疑是对华佗灵活运用心理疗法医治疾病

的赞扬。

传说华佗还用冷水浴来给人治病。有个妇人患寒热病，经年不能痊愈，去找华佗给她医治。当时正是十一月里，天气非常寒冷，华佗叫她坐在石槽里，用冷水浇灌，然后用火来使她温暖，并且用厚被把她蒙盖起来。这妇人出汗以后，病果然痊愈了。

华佗也很善于用民间单方来治病。据说有一次华佗在路上遇着一个因咽喉阻塞吃不下东西而呻吟着的病人。华佗告诉他可以向路旁卖饼的人买 3 两蒜齏(jī)和 3 升酸醋，调好后吃下去，病就可以治好。病人依照他的话做了，不一会就吐出一条虫来，病也就完全好了。

华佗除了有很高明的医术以外，还是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他继承并且发扬了我国古代“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传统思想，否定了方士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鬼话，批评了单纯的医疗观点。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进行体育锻炼，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这是华佗对人们健康的另一贡献。

华佗常用“户枢不蠹，流水不腐”这两句话来说明他的这种思想。这意思是说：譬如门户的枢纽，由于天天转动，所以不致于被虫蛀坏；流着的水，也因为经常在运动，所以不会腐败发臭。根据这个原则，华佗创造出一种叫做“五禽之戏”的体育活动来。

所谓五禽，就是虎、鹿、熊、猿、鸟。华佗把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卧倒身子、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张翅飞翔等动作联系起来，编成一整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得到舒展

的体操。他的弟子吴普和樊阿用这方法来锻炼身体,增强了体质。吴普到 90 多岁时,听觉和视觉都很好,牙齿也很坚固;樊阿活到 100 多岁,身体也很健康。华佗把这套锻炼身体的方法,到处推广,使很多的人受到好处。

华佗在 1700 年前就创造了这样一套合乎科学的医疗体育和锻炼身体的方法,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华佗在医学上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就,除了他的刻苦钻研、虚心学习以外,同时也同时又能勇于打破迷信、不受传统的束缚而又能接受前人有用的遗产,同时他又能重视人民大众宝贵经验的缘故。

用汤药和针灸等方法治不好的内脏病症,便用外科手术来治疗,这是华佗的重大贡献。但这种治疗方法在当时却受到医学界有守旧思想的人的攻击,他们认为用剖割手术会使人的元气大受损伤,经过剖割手术的人,即使不死,也活不长久。这些人的攻击并没有使华佗畏缩不前,他为了替人们解除痛苦,毅然决然地继续钻研并利用外科手术来治病,以事实来回答这种攻击。结果,华佗博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把我国医学向前推进。

五禽之戏是华佗批判地接受前人遗产的好例子。从秦朝以来,迷信修仙的人讲究“导引”,这就是模仿动物的动作,活动全身,以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华佗抛弃了其中的迷信部分,而吸收了合理的部分,并且加以发展和系统化,因而创造了这一套合乎科学的锻炼身体的方法。

上面说到华佗用蒜薹和醋这个民间单方来医治寄生虫病,是他重视人民大众宝贵医疗经验的证明。华佗一生游历了

不少地方,到处采集草药并且向老百姓请教,他把所获得的丰富知识加以总结和提高,根据病人的特殊情况而决定医治方法和用药的分量,所以能够得到很好的医疗效果。相传有一个樵夫在深山里迷了路,肚子很饿,看见有个隐士在采黄芝吃,他也采了几枚,吃了很耐饿。樵夫回家后把这事告诉华佗,华佗就上山去采集,经过实验证明黄芝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华佗就用黄芝来配入药方,作为强壮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华佗替人治病也是处处从实际需要出发的。东汉末年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安徽、山东、江苏一带,战事尤其频繁。在战争中被杀伤的人很多,对于外科的需要自然是很迫切的,华佗因此特别努力于外科医学的钻研,他发明麻醉法和能掌握非常高的外科手术,都与这种实际需要有关。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文学

一、诗

先秦的诗歌创作主要是集体创作,个人收集加工整理,《诗经》便是诗歌集体创作的杰作。战国后期,南方楚国出现了屈原、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个人创作,诞生了《离骚》《九歌》等不朽诗篇。

西汉开始,个人诗歌创作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四面楚歌

方息,西汉开国元首刘邦的《大风歌》如鹰击长空,拉开了个人诗歌创作的序幕。继之而起的汉武帝、司马相如、王嫱、马援、班固、张衡、梁鸿、秦嘉、赵壹、蔡邕等都有不同凡响之作。诗歌创作从民间集体创作走向个人创作,是诗歌不断成熟的标志。东汉初年出现了文人五言诗的创作,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的创作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而以《古诗十九首》和秦嘉、徐淑夫妇、蔡邕、郦炎、赵壹以及无名氏等为代表的创作,以其出色的成就,宣告了文人五言诗的成熟。梁代钟嵘曾赞扬这些作品“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他们直接开辟了建安时代“五言腾踊”的局面,并成为后世诗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

汉乐府是汉代兴起的一种重要诗歌样式,是一种与音乐有关的诗歌体裁。汉乐府民歌主要出自下层民众之手,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直接地反映了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其中有表现人民的苦难和反抗情绪的作品;反映战争和徭役的灾难;暴露和讽刺统治者的荒淫腐败;歌颂清官的政绩;表现爱情、婚姻、家庭生活。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叙事性,当然也不乏浪漫主义气息,语言质朴、自然、生动活泼,富于生活气息。形式灵活自由,篇章句式变化多端。《战城南》、《陌上桑》、《妇病行》、《孤儿行》等都是优秀的作品,而《孔雀东南飞》则代表了汉乐府的最高成就。

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它的大胆反映现实的精神在诗歌史上影响深远。后代凡是反映民生疾苦,暴露现实黑暗的诗作,往往采用乐府的形式。

式,以至于批判现实成为乐府的一个特点。

二、赋

赋是中国古代独具一格的文学样式。

赋作为一种文体,出现于战国后期。在此之前,这一名称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诗经》中与比、兴并称的表现手法,其特点即朱熹所谓“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二是指对《诗》的称引和诵读。这种诵读形式与配乐歌唱有显著区别。因而《汉书·艺文志》中有“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为赋,可以为大夫”之说。《左传》等先秦古迹中有不少关于赋诗的记载。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上述两重含义都有联系,它普遍采用了铺陈形容的手法,同时又脱离了音乐而用于朗诵。故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认为与《诗经》有渊源关系。

中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以赋命名的作品是荀卿的《赋篇》,但已残缺,今仅存《礼》、《知》、《云》、《蚕》、《针》五篇,作品主要采用主客问答和隐语的形式,铺陈了上述各种事物,句式以四言为主,韵散相间,已初步具备了赋的基本特征。而后来在南方的楚国,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诸如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神女赋》等,除保持主客问答形式和韵散相间外,铺陈更为细致,文词更为华美。作品的浪漫色彩增强,其形式和风格也接近汉大赋。西汉初年流行于文坛的是在形式上模仿楚辞的骚体赋,代表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以及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文中散文化倾向已逐渐明朗。

真正标志着汉赋成熟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该作在写法上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层层展开铺叙描写,结构宏阔,辞采绚丽。通篇以散句为主,间有骚句,其中很多比喻和描摹可谓精采纷呈,令人荡胸涤意,耳目一新。《七发》虽不以赋名篇,但实际上已具备了汉大赋的特点。

至汉武帝时期,帝国空前统一强盛,极大地开阔了文人们的胸襟和视野,并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素材。汉武帝非常喜爱辞赋,鼓励创作,招揽作家。因喜爱枚乘之赋,用安车蒲轮征他入京,又因司马相如善作词赋,亦把他招入朝廷,拜为郎官。在汉武帝周围聚集了大批辞赋骚客,东方朔、吾丘寿王、枚皋、董仲舒、主父偃、桑弘羊、司马迁、王褒皆以赋著称,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夫也“时时作。”赋的创作空前繁荣。

这一时期,司马相如是最著名的辞赋家。其《子虚赋》、《上林赋》堪称汉赋的压卷之作。不仅在体制上为汉大赋创制了很好的范例,而其内容上极尽歌颂朝廷的强盛和天子的尊严,宣扬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气势和声威之能事,具有“润色鸿业”的作用。同时,又对统治者提出委婉的劝告,但讽谏的意味非常微弱,不足以压倒颂扬之声,人们形容这一特点为“劝百讽一”。在形式上,结构宏伟、韵散相间、辞采富丽。文中采用虚构人物设为问答的方式,进行穷形尽相的描写铺陈,通过夸张、排比、渲染,造成波澜壮阔的气势,其场面极其雄伟壮观,震撼人心,后人虽极力模仿这种铺张扬厉的写法,总是难以追攀其阔阔气势。武帝以后,伴随着帝国的衰落,汉赋也呈衰落之势。西汉后期,虽有扬雄、班固推波助澜,亦难以启及,不能

和武帝时期相提并论。

东汉中期以后,社会危机加剧,外戚、宦官当权,朝政日非,文人们已无心润色鸿业。体制呆板的散体大赋开始被人们冷落。抒情小赋成为创作的主流。它们一般不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而是开门见山、直抒胸臆。体式短小灵活,风格明快、真挚。往往具有较多的批判现实的内容。张衡的《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堪称精品之作。

三、散文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并在统一的大帝国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车同轨”、“书同文”等措施,客观上推动了全国文化的交流。

由于秦代崇尚法家学说,刑法残暴,又酿造了“焚书坑儒”案,在这个仅存十多年的短命帝国中,文化的发展是可悲的,可以说这是个荒歉的年头。秦代屈指可数的文学家大概只有李斯、赵高等人。

李斯的《谏逐客书》可以堪称整个秦代文学的压卷之作。该文言辞激扬顿挫、音韵铿锵,说理透辟,颇具煽动性。

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时期,它上接先秦,下启魏晋。这一时期文学开始表现出与学术脱离走向独立的趋势,人们开始把文学与学术著作加以区分,出现了“文章”和“文学”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讲究文采辞藻的作品,后者指学术,特别是指儒学,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是文章之士,而董仲舒、桑弘羊则属文学之士。这一分工推动了文学

的深入发展。

散文在两汉时期上承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继续取得辉煌成就。汉代散文可以分为史传文和论说文两大类。

西汉初年,因秦末连年战争,社会经济极端凋弊。汉王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恢复社会经济,巩固自己的统治,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采用黄老学说,在政治上推行清静无为,没有顾得上思想上的禁锢。因此,各派学说得以并存,言论较为自由。被秦朝的文化专制摧残殆尽的论说散文便在这种土壤中重新生长起来。于是战国之遗响、大汉之新声交响和鸣,时人为之振奋。所谓战国之遗响,是说这些作品思想活跃,议论纵横,大都注重形象与文采,不同程度地带有战国散文的风格;所谓大汉之新声,是说这些作品在思想上体现了兼收并蓄,熔百家于一炉的时代特点,反映了作者对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拥护和为国效劳的热情,感情充沛,气势强劲,体现了新兴的大汉王朝的蓬勃朝气。

西汉初年著名的论说散文家有陆贾、贾谊、晁错、邹阳、枚乘。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枚乘的《谏吴王书》,邹阳的《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体现了西汉初年论议散文的巨大成就。

西汉初年上承诸子流派的散文巨著《淮南子》内容广博,包罗万象,涉及天文、地理、政治、哲学、道德、风俗、法制、兵略等很多方面,当属杂家流派,但思想倾向上仍以道家为主,体现了汉初推崇黄老又兼容百家的思想。无论思想、内容与文学艺术成就,《淮南子》都堪称不朽之作。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

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是自成一家之作。”《淮南子》的问世，亦是汉初文坛的一大盛事。

西汉中期，伴随着帝国的空前统一强大，散文创作也空前繁荣。它们继续保持前期散文充满政治热情，有文采、有气势的特点，笔力劲健，辞气畅达，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辞赋的影响，在内容和文风上体现出三大特点：①歌功颂德为现行政策服务之作大量产生。著名的有司马相如的《封禅文》、《谏猎疏》、《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辞藻艳发，气势不凡，虽属歌功颂德，却又不全是阿谀，客观上也反映了汉帝国空前强盛的事实。②出现了一些感慨士之不遇，抒写牢骚不平的作品。随着太平盛世的到来，汉武帝加强了思想控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任用酷吏，滥施刑罚，实行儒法并重，文人的实际地位下降，很多作家倍受压抑，有志难伸，怀才不遇，愤懑抑郁之情时有发泄，著名的作品有东方朔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③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典雅醇厚、坐而论道的儒者之文应运而生。代表作品如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天人对策》等，充满浓厚的天命论思想，道学气、学巾气很浓。

汉宣帝时期，桓宽的《盐铁论》是西汉中期一部别具一格的论说散文，书中采用了“两刃相割”、“二论相订”的方式，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丞相、御史大夫之徒和贤良文学的互相诘难，不仅反映了双方的观点，而且展示了不同人物的风采和当时激烈的辩论情景。文中运用很多排比对偶句式，大量引类譬喻，尽力铺陈渲染，造成了鲜明的形象和充沛的气势。其形式

和风格均带有词赋化的特点。这以后,象这样议论纵横、激切慷慨的文章就不多见了。

西汉后期,伴随着儒家统治地位的确立,今文经学盛行,政治日益黑暗,外戚专权。由董仲舒开始的雍容典雅,带有浓厚的经学和神学气息的文风在此时大盛。刘向是这种文风的代表,其《谏营延陵过侈疏》,反复征引历史事实,深入分析利弊得失,对汉成帝不顾百姓疾苦,大规模营造陵墓进行劝谏。文章洋洋洒洒上千言,雍容舒缓,而又深切透辟,带有循循善诱的特点。明代茅坤称之为“西京第一奏疏”。他的《使人上变事书》、《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也是这一类名作。刘向之后,京房、翼奉、谷永等人也是借谈阴阳灾异抨击时政的著名作家。

刘向之子刘歆在今文经学盛行之际大力提倡古文经学,其《移让太常博士》一文是猛烈抨击今文经学和今文博士的力作,文风泼辣犀利,义辩辞刚,带有一股凌厉之气。

扬雄是西汉后期的另一著名论说散文作家,曾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解嘲》是其论说散文的代表作,该文对统治者压抑人才,造成庸夫显进,奇士难容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东汉初年到章帝时期,政治稳定,统治阶级大兴儒学和讖纬之学。一方面歌功颂德之文盛行,另一方面反对讖纬之学的文章也应运而生,前者如班固的《典行》、《答宾戏》;后者如王充的《论衡》、《新论》、《陈政事疏》、《抑讖赏疏》等。王充的论说文代表了东汉前期论说散文的最高成就。

东汉后期,政治更加腐败、外戚和宦官交替当权,国有累

卵之急，民有倒悬之危。今文经学和讖纬之学日渐荒诞，令人反感。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亦开始动摇。文人们的忧虑和不满如沸水翻腾，象班固那样的歌功颂德之文再也无法写下去了，揭露和抨击时政的作品多了起来。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荀悦的《申鉴》等政论文专著都是振聋发聩的名篇。李膺、陈蕃、范滂、朱穆等名士亦是当时的名家手笔。他们在作品中敢于触及现实矛盾，直抒忧愤，抨击外戚、宦官，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抗争精神。

东汉散文已体现出重视骈偶和词藻的倾向。不少作品带有较多的对偶句，辞藻华美、音韵铿锵，初步具备了骈体文特征，如仲长统的《论志》等。这直接开了魏晋散文的先声。

在史传散文方面，两汉时期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部历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这以后，中国历朝史传，无论《后汉书》、《三国志》还是其他历朝史书的撰写，没有不受《史记》和《汉书》影响的。

《史记》既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又是生动的文学作品。先秦历史散文大都以记事或记言为主，在记事或记言中兼及人物描写。《史记》则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事件的作品，开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全书共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洋洋洒洒五十万言。

《史记》继承了先秦历史散文随事写人的传统，善于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让各种人物作充分表演，通过他们自身的语言、行动来展示其性格特征；善于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不同性格的碰撞，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善于用一些生活细节和传闻轶事来刻画人物。因而《史记》中的人物大都丰满

充实,很具有生活气息。吴起、李斯、项羽、刘邦、张良、韩信等都是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

《史记》的叙事非常精彩,并有不少富于戏剧性的场面描写。很多作品情节曲折,刻画细致,矛盾冲突激烈紧张,故事性强。象《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公子列传》、《项羽本纪》等都不乏精彩的叙述和描写。《史记》语言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创造而成的,既平易朴素,又丰富多彩,准确生动。

《史记》为后代的传记文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也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萃渊薮。

《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在二十四史中的影响仅次于《史记》。

作为一部史传文学,《汉书》继承了《史记》注重人物刻画的传统,通过富于个性特征的语言和行动来实现主人公的思想品质,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象苏武、李陵、霍光、赵充国等人物形象均堪称典范之作。在语言上,《汉书》比《史记》更为简洁、整饬,书中有些传记袭用了《史记》原文,但行文更为简洁,大大缩短了篇幅。班固又酷爱古字和骈文,使文章显得典雅、富丽,读起来虽不如《史记》浅豁生动,但也别具风味。这些语言风格颇受范晔推崇,并直接影响了范晔《后汉书》的编撰。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还体现了很高的学术价值。比之《史记》,《汉书》中增设了一些记载学术活动和文人事迹的传记。而且在体例上增设了“艺文志”,详细地叙说了古代典籍的流传散聚,论述了各类作品的源流及功用,为研究古代学术和文

学提供了参考。此外《汉书》的人物传记中大量收录了主人公的经世之文和辞赋,将它们穿插在文中,既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更增添了作品的文学色彩。

两汉著名的史传散文还有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范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等,这些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节 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

秦汉时期我国文化对亚洲各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同样,外来优秀文化的传入,也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内容。秦汉各王朝封建统治者同个别邻国统治者之间,虽然也相互发动过暂短的战争,也有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奴役压迫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但更多的时间里,在国家之间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劳动、创造,共同缔造了文化交流的伟大基础。

一、中朝经济文化往来

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相邻。中朝两国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以前,就发生经济、文化上的往来。战国以后,燕、齐两地人民反抗封建统治,不断逃往朝鲜。西汉初年,燕人卫满率领

1000 余人，渡 汎水（今朝鲜清川江），入朝鲜，投靠朝鲜王箕准，后来被立为朝鲜王，都于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市南），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惠帝、吕后时，汉辽东太守“约满为外臣”并不得阻止朝鲜以外各部首领同汉交通。卫满孙卫右渠统治时期，汉武帝以右渠招诱燕、齐人外逃和阻挠真番邻近各部来汉谒见天子为理由，派使臣涉何到朝鲜责备卫右渠。右渠拒绝。涉何返汉途经 汎水边界时，指使自己的御者刺杀陪送他的朝鲜裨王长。何归汉隐瞒真实情节并谎报“杀朝鲜将”，被拜为辽东东部都尉。右渠怨恨涉何，遂发兵攻杀涉何。汉武帝乃以此为借口，于公元前 109 年（元封二年）秋，令楼船将军杨仆率兵 5 万人自齐地渡海，右将军荀彘出辽东攻卫右渠。卫右渠率众坚决抵抗。汉军屡遭失败，后由于朝鲜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右渠被大臣所杀，卫氏朝鲜灭亡。汉武帝在卫氏统治地区设置真番、乐浪、临屯、玄菟四郡。设郡以后，朝鲜人民不断反抗汉朝统治。当西汉统治力量削弱时，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兴起。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南部马韩、辰韩、弁韩亦陆续兴起。东汉时，公元 32 年（建武八年）高句丽王遣使至东汉，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东汉中期，高句丽王宫即位以后双方虽时有冲突，但朝鲜全境同汉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明显加强。朝鲜特产檀弓、班鱼皮、文豹、果下马等输入中国。中国的漆器、铜镜等工艺品和铁制生产工具继续不断运往朝鲜，交通往来不绝。

二、中日文化往来

在朝鲜半岛东南隔海的日本（倭），汉代时期分立为百余

个小国。西汉武帝时,有 30 多个小国通过朝鲜半岛与汉朝发生外交关系。东汉时期,公元 57 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曾遣使来汉,光武帝刘秀赐给印绶。“汉倭奴国王”的金印已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叶崎村发现。通过不断的交往,中国的铁器、铜器、丝帛,传往日本,丰富了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三、“丝绸之路”的开辟

公元前 3 世纪,我国即以盛产丝织品而闻名于世界,被称为“丝国”。西汉武帝时张骞出使,同葱岭(帕米尔)以西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公元 119 年(元狩四年)左右,张骞第二次出使时,携带的金、帛价值千巨万,用作为馈赠的礼物。汉使不仅到达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还到达了奄蔡、安息、条支、犁靬等国。此后,中亚、西亚各国也经常派使节到汉朝长安,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汉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根据当时文献记载,通往中亚、西亚的大道,有南北两条。南路从长安、金城(兰州)出发,经敦煌、楼兰(即鄯善)、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到大月氏。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大月氏以西到达安息,即今伊朗。再往西到达条支,即今伊拉克一带,最后,直到大秦,即罗马帝国。北路从长安、金城出发,经敦煌、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龟兹、疏勒,越葱岭到大宛,再往西经安息,而西达大秦。这两条中西交通大道就成为后来著名的“丝绸之路”。

公元 97 年(永元九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条支

海边(今波期湾)为安息船人所阻。甘英是历史上第一个探求开辟欧亚交通的人物。关于“丝绸之路”上的友好往来情形,《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有许多具体生动的记载。通过这两条路,中国的丝绸和养蚕、缣丝技术,以及井渠法、造纸术都先后西传。中亚、西亚的特产如胡桃(核桃)、石榴、胡萝卜、胡豆(蚕豆)、大蒜等等以后陆续传到中国。公元87年(章和元年)和公元101年(永元十三年)安息国王曾两次把狮子和条支大鸟(又名安息雀,即鸵鸟)赠献给东汉王朝,。中文的“狮”字就是从波斯(安息)语“狮尔”音转过来的。

从1959年到1969年,在“丝绸之路”的我国境内新发现了大批汉唐时期文物。在民丰(汉名精绝)这个当时曾是南路要冲的地点,发现了“汉司禾府印”,说明那时在当地曾设立了专为供应汉朝使者和行旅所需食粮的管理屯田事务机构。在当地发现的斜纹起花组织的毛毯,花纹图案有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写实的葡萄纹样,也有属于中原传统的龟甲四瓣花纹图案,都具体表明当时文化交流互相影响和往来密切的情形。

四、佛教东传与中印文化交流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由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创立后,开始向印度各地和一些亚洲地区传播。汉武帝时,西域的交通得以开辟,西域诸国与汉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日渐频繁,这为佛教的传入提供了条件。

西汉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国使

者尹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佛教传入的最早记载。东汉初年，在统治者上层人士中已出现佛教信奉者。楚王刘英年轻时好游侠，结交宾客，晚年则倾心于黄老与佛教，为王斋戒祭祀。东汉永平八年（公元 65 年），刘英派郎中令奉黄缣白纨 30 匹送到国相处，说：“我托在蕃辅，过错与罪恶积得很多，感激皇上的大恩，奉送这些缣帛，以便可赎曾有之罪。”明帝知后，下诏令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洁身斋戒三月，与神为誓。有什么可以嫌疑，而有悔过的？还予赎罪之物，以助那些伊蒲塞（即居士）、桑门（沙门）吧！”当时人们是将佛教看作是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将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的，以求福祥，楚王所聚汇的大批方士中，有的便是信奉佛教的沙门和居士。与此同时，汉明帝也派使者去过西域寻求佛经，并抄回了佛经《四十二章经》，存放在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屋中。此后，外来的僧者也日益增多，佛教流播更广。并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建起了佛寺，绘千乘万骑壁画绕塔 3 匝，并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绘制佛像。

建和元年（公元 147 年），大月氏僧支谶来到洛阳，建和二年（公元 148 年），原安息国太子安世高，游历传教也至洛阳，两人在那里开始了大规模的译经生涯。先是由安世高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阿毗昙五法经》等佛经 34 部 40 卷，接着由支谶译出《道行品经》、《首楞严经》、《般舟三昧经》等佛经 15 部 30 卷。安息居士安玄也差不多同时在洛阳经商，他通汉语，常给沙门讲论佛法，并与汉族沙门严佛调一起翻译了《法镜经》。严佛调是汉地第一个出家者，他除与安玄合译佛经外，还著《沙弥十慧章句》，是第一部汉僧佛教著作。这些活动，

大大推动了佛教在内地的深入。受此影响，桓帝本人也尚于佛教，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桓帝在洛阳濯龙宫“设华盖以浮图（浮屠）老子”，将佛老置于一块加以祭祀，以求得延年益寿与长治久安。

中平五年（公元 188 年），青、徐二州爆发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朝廷任命陶谦为徐州刺史。此后一短时期内，境内较为安定，北方洛阳、关中一带的流民纷纷逃到此地。丹阳人笮融、马谦同乡，也聚众百人投奔陶谦。陶谦任命他督管广陵（今扬州）、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彭城（今徐州）3 郡的粮运。笮融信佛，于是利用职权把 3 郡的钱粮用来大建佛寺。佛寺十分宏伟豪华，以铜为像，黄金涂身，披上锦采裳，垂铜盘 9 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纳 3000 多人，让人在此课读佛经。这是中国正史上首次明确记载兴建佛寺佛像的事。笮融而且下令凡愿信奉佛教的人，都可以免除徭役，以此来吸收百姓。这样招致的民户达到 5000 多。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在 80 里的范围内铺席设酒饭招待前来参加法会的人，据说：“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万人，费以巨亿计。”

东汉末年，译经活动也很盛行，佛经中的一些内容开始成为人们著述、说理、言谈中的材料。另外，在桓帝、灵帝时来汉地的译经僧，也在译经的同时配合讲解。如安世高在洛阳“宣敷三宝，光于京师”；“于是俊杰归宗，释华崇实者，若禽兽之从麟凤，麟介之赴蔡矣。”为了传教方便，还从大量佛经中摘出要点，做成“经抄”本。还有的外国沙门按佛经大意撰成“义指”，以此而广视听。这种不同形式的传教方法，最终则使西来的佛教在中国扎下了根，并经由魏晋时期的进一步推波助澜，遂成

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佛教文化。

五、中国同越南、 缅甸等国的经济文化交往

早在秦统一之前,在越南北部已有了骆越部落。秦汉之际,赵佗割据岭南的南海、桂林等郡称王,击灭骆越国。汉武帝出兵灭赵氏政权,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设郡之后,越南人民多次掀起反抗,尤以王莽时期以后为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发生在公元 40 年(建武十六年)交趾郡麋冷县女子征侧、征贰姊妹的起义。这次起义得到九真、日南、合浦各地纷纷响应,攻下 65 城。征侧自称女王,历时四年,最后在东汉伏波将军马援镇压下失败。越南人民的反抗一直同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相呼应。

秦汉时期中越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非常密切。据记载,早在西汉初年就有中国大量铁制用品运往越南。越南的象牙、犀牛、玳瑁、珍珠经常输往中国。东汉时期,在封建经济、文化影响下,越南农业生产有了发展,推广铁犁牛耕技术,兴修水利,并有了学校设置,社会经济生活有了更大进步。

西南邻邦缅甸同中国交通往来始于公元前 2 世纪张骞通使西域之前。中国的特产品大约是由当时的蜀郡经过西南经夷地区运往缅甸,再经缅甸贩往身毒等地。张骞每第一次出使归来,汉武帝依据张骞的报告,曾企图从西南夷开辟一条通往身毒的道路,未能实现。可是到西汉中期以后,从当时的交州

合浦郡徐闻县(今广东徐闻西)乘船去缅甸的海上通路却开辟出来。海上通路的开辟,使两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东汉时,公元97年(永元九年)地处缅东部一带的掸国国王雍由调,派使者携带许多本国珍宝来中国。东汉和帝赐给金印紫绶。后又在公元120年(永定元年)这位国王又派使臣向东汉献乐和“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的大秦“幻人”(魔术师)。

东汉顺帝时期,公元131年(永建六年),叶调国遣使者到东汉赠礼。叶调国据考证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印度尼西亚也有许多汉代文物的考古发现,可见当时两国间已有经济、文化往来。

秦汉以后,岭南地区渐渐开发,当时的番禺(今广州)和徐闻都是中国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据《汉书·地理志》载,从徐闻出发,船行约五月可到都元国(在今马来半岛)又船行四月可到邑卢没国(在缅甸海岸),继续航行大约20余天即达谶离国(在缅甸海岸),由此如舍船登陆步行十余天可到达夫甘都卢国(在缅甸蒲甘城)。夫甘都卢国人当时以“劲捷善绷高”闻名。自夫甘都卢国再船行约二月余则可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海岸的康契普腊姆)。据《地理志》载,黄支国自汉武帝以后,常常来中国。汉武帝也招募使者偕黄门令属下的翻译人员同时出海去黄支,用黄金杂缯换取那里所产的明珠、璧、琉璃、奇石等珍异之物,有时还搭乘他们的商船。从黄支国返航,约八个月到县皮宗国(今马来半岛西南),再船行二月到日南回国。在黄支国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是汉朝使者到达的最远之地。当时,南海、孟加拉湾海上交通已相当发达。大秦王

安敦的使臣就是在公元 166 年即东汉末桓帝延熹九年,从海路经日南来到中国的。